中国药业史

唐廷猷 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责任编辑：薛　军
版式设计：郭小平
封面设计：金石凯达

ISBN 7-5067-2529-0

9 787506 725293 >

ISBN 7-5067-2529-0/R·2150

定价：24.00元

中国药业史

唐廷猷 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登记证号：（京）07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药业史/唐廷猷著.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10

ISBN 7-5067-2529-0

Ⅰ.中… Ⅱ.唐… Ⅲ.①制药工业-工业史-中国②药品-商业史-中国 Ⅳ.F4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929 号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甲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保定时代印刷厂 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

开本 850×1168mm $^{1}/_{32}$ 印张 11¼

字数 266 千字 印数 1—3000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电话：62244206）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药业的特色地位、形成发展、商品来源、对外贸易、经营技巧、行会组织、庙会药市、假药防止、开发利用、基本名词探源和著名百年老店等11个方面的内容。重点是药业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形式上采用通史与专论相结合。叙述上史论结合、观点明确、资料性强、可读性强为作者历时16年之开创性、奠基性力著，填补了系统研究中国药业史的空白。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现实的借鉴作用。

本书以医药行业的主管部门、医药企业的管理者和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及医药院校师生为主要对象，亦可供从事医学史、药学史、经济史、商业史的研究人员和其他爱好者参考阅读。

序 1

我从事中药行业管理工作数十年，深知中药行业的生产、供应、销售及其宗旨理念，是中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丰富的内涵和优良传统，值得我们发掘和继承。因此早就盼望有一本系统研究中药行业史的专著出现。唐廷猷同志的《中国药业史》出版，真是一个喜讯。初略浏览，内容丰富、系统，包括中药行业的特色地位、形成发展、商品来源、对外贸易、经营技巧、行会组织、庙会药市、假药防止、开发利用、基本名词探源及著名百年老店等 11 个方面。重点是药业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形式上通史与专论相结合。叙述上史论结合，史料丰富，观点明确，资料性强，可读性强。文字上通俗易懂。很值得中药行业从事生产、经营及科研教育工作者一读。

本书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漏。但是唐廷猷同志作为四川省中药学校的一名副校长和教师，历时 16 年完成此书，确实已尽心力。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引起更多的人来研究药业史，发扬中药业的优良传统，加强中药企业的文化建设。这不仅能使中国药业史更加充实完善，对于当代中国药业的发展也是有益的。

中国中药协会会长

张洪魁

2001 年 7 月于北京

序 2

我历来重视中国药业史问题。因为它不仅是为国家医药行业的管理、企业经营和学校教育服务，而且里面有很多学术问题值得研究，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但是，由于资料匮乏，系统研究这一课题的难度很大，新中国成立 50 多年来还没有一本学术专著问世。十几年前，我知道唐廷猷同志想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没想到今天，他真的拿出了研究结果。近 27 万字的《中国药业史》的出版，实在是一件喜讯。中国药业史这一重大领域的空白，终于有人开始填补了。

本书内容全面、系统，显著特点是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医药等背景，研究、回答了很多药业史中的重大问题和鲜为人知的问题，如古代药业孕育形成时间及发展分期、医药结合一体与分业、医药业的立法、第一部药材商品学、官药局体制兴衰、药业的开放传统、药业文化、药业营销策略与技巧、假药防止、最早的药市等等。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可读性强，是本书又一特色。很适合医药行业的主管部门、医药企业的管理者和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及医药院校师生阅读。它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受条件限制和课题难度较大等因素影响，书中存在不足和遗漏难免，但仍不失为一本佳作，毕竟是 16 年辛勤结出的硕果，故乐以为序。

中国中医药学会中成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金世元

2001 年 7 月于北京

前　言

1984～1986年，我在中国药材公司参加《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中药篇》编写工作时深深感到：当代中国的中药生产经营是历史上的继续，需要一些历史内容作为先导。但是，这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各省市药材公司提供的本地资料，涉及历史的少而零星，内容多是几个大的药材集散地简史，时间也多为民国，少数上溯到明清。当时，全国掀起改革开放高潮，医药行业正在开展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如何杜绝伪劣药品、如何提高中药质量、如何降低紧缺品种等问题的大讨论。有人举古代药业的一些情况为例加以说明。以上原因，引起我思考两个问题：中国药业的历史情况究竟如何？它对当代中国药业有无借鉴作用？这无疑是填补空白的开创性研究课题。

在中国药材公司老同志王德澍主任、张洪魁经理的支持下，我大胆地下了决心，一面工作一面研究这个课题。后来支持和鼓励我的还有：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郑金生、中国药学杂志主编张天禄、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禹华年、山西省中药材学校校长周晓明、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社长黄泰康、成都中药六厂厂长蒋厚良、宜宾药业公司中成药分公司经理江志高、安岳县药检所中药室主任张向红等。经过16年的艰苦努力，四易其稿，终于写成了这本27万字的《中国药业史》，算是对医药行业的一个贡献。历史主要是为政府、行业和企业服务的，愿能有所裨益。

由于现代药业情况为大家熟知。本书主要写中国古代、近代药业的特色地位、形成发展、商品来源、对外贸易、经营技巧、行会组织、庙会药市、假药防止、开发利用、基本名词探源及著名百年

老店等内容。形式上采取通史与专论相结合。叙述上史论结合，力求观点明确、资料性强、可读性强。可供行业主管部门、医药企业的管理者和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及医药院校师生阅读。

写这本书初衷虽好，但由于个人水平和条件有限，一定存在诸多不足。望读者批评指正，使《中国药业史》不断充实完善。

中国药业史的内容十分丰富，我只是做了抛砖引玉的工作，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人来研究它。

唐廷猷

2001 年 7 月

作者简介

唐廷猷，男，汉族，1940年11月生，重庆合川人。1963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专业。现任四川省中药学校教务副校长、高级讲师、主任中药师、执业中药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发表论文和科普文章35篇。参编专著《中国药膳学》、《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中国商品大辞典中药材分册》，主编全国医药中专规划教材《中药炮制学》。《中国药业史》为16年力著。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药业的行业特色及地位……（1）
一、医药结合　古代药业的显著特点……（2）
二、工贸一体　药业经营的基本模式……（3）
三、道僧卖药　零售药业的一个补充……（3）
四、济世活人　药业遵循的精神支柱……（4）
五、庙会药市　药材批发的重要市场……（5）
六、对外开放　药材进出有国际市场……（6）
七、精细分工　药业发展的深化要求……（7）
八、技术复杂　经营药业需较高素质……（8）
九、药业文化　商业文化的优秀代表……（10）
十、传统药业　全国商业的重要行业……（12）
第二章　药业的形成与发展……（14）
一、神农氏时代　发现药物的开始……（14）
二、奴隶社会　漫长的药业孕育期……（16）
（一）夏代无药业 ……（16）
（二）商代后期开始使用药物 ……（17）
（三）西周的官民两用医药机构 ……（19）
（四）春秋时期孕育药业 ……（21）
三、封建社会　药业的形成与发展……（24）
（一）战国时期　药业萌芽 ……（24）
1. 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建立 ……（25）
2. 流动医生与坐业医生 ……（26）
3. 战国市场上的药材商品 ……（27）

4. 李悝法经中的医药立法 …… (29)
(二) 秦汉时期　统一后的药业迅速发展 …… (31)
1. 统一度量衡、货币与发展水陆交通 …… (31)
2. 临床医学和药物学体系初步建立 …… (32)
3. 秦汉医药市场与城市药业 …… (34)
4. 第一部药材商品学专著——《范子计然》 …… (39)
(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药业三大类商品形成 …… (46)
1. 长期战乱与经济重心南移 …… (46)
2. 医学药学向分科方向发展 …… (47)
3. 三国药业及互市 …… (48)
4. 晋代兴起成药业 …… (49)
5. 南北朝的官药局及药材批零市场 …… (51)
6. 医药分工明朗化 …… (56)
(四) 隋唐五代　全国药业大发展 …… (58)
1. 经济繁荣与全国特产物资大博览 …… (59)
2. 国家医著及国家本草 …… (60)
3. 全国的优质药材及土贡药材 …… (61)
4. 定期药市与城乡药业 …… (75)
5. 吐鲁番与内地的药材贸易 …… (78)
6. 业医营药之家的标准设计 …… (79)
(五) 宋金元时期　药业体系全面建立 …… (80)
1. 经济发展与医药昌盛 …… (81)
2. 官营中药工商体系的建立 …… (83)
3. 城市民营药业大发展与行会组织 …… (87)
4. 药材民族贸易 …… (90)
5. 金代药业 …… (91)
6. 元代药业 …… (92)
(六) 明代　官营药业衰落与民营药业兴旺 …… (94)

1. 商品经济发展与医药成就 …… (94)
2. 全国药材交流市场初步形成 …… (95)
3. 官药局体制衰亡 …… (96)
4. 民营药业蓬勃发展 …… (98)
5. 民族地区的药材贸易 …… (101)
6.《本草品汇精要》中的道地药材 …… (102)
7. 炮制理论和炮制方法基本定型 …… (112)
8. 宫廷用药与严酷的药材土贡 …… (113)
（七）清代　封建社会药业鼎盛期 …… (115)
1. 人口激增与争做良医 …… (116)
2. 全国城乡药业大发展 …… (117)
3. 三级药材市场全面形成 …… (123)
4. 精细分工与草药业壮大 …… (127)
5. 药业饮片加工繁琐受批评 …… (128)
6. 西药传入与西药业萌芽 …… (129)
四、民国时期　药业的困境与曙光 …… (130)
（一）摧残与反摧残斗争 …… (131)
（二）帝国主义侵略使药业陷入绝境 …… (135)
（三）全国药材高级市场大转移 …… (136)
（四）县以下中药业 …… (139)
（五）成都“七·四”药工运动 …… (140)
（六）西药业迅速发展 …… (141)
（七）革命根据地及解放区药业 …… (144)
1. 封锁围剿药品奇缺 …… (145)
2. 大力兴办公营药业 …… (145)
3. 保护发展集体个体药业 …… (148)
4. 多渠道的药材来源 …… (149)
5. 发展中医药的一贯方针 …… (150)

五、空前繁荣的新中国药业……（152）
（一）理顺管理关系和坚持中西医药团结发展 ……（152）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药业 ……（154）
（三）中国药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62）
第三章 药材商品的来源……（164）
一、野生药材采集……（164）
二、药材种植……（168）
三、采种药材的加工出售……（174）
四、新中国的药材种植业……（177）
第四章 中药的对外交流与贸易……（181）
一、汉代 对外交流与贸易开始……（181）
（一）通西域与丝绸之路的大黄香药贸易 ……（181）
（二）南方丝绸之路的肉桂犀象贸易 ……（183）
（三）与朝、日、越的医药交流 ……（184）
（四）两汉的外贸管理机构 ……（185）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 交流贸易继续发展……（185）
（一）魏蜀吴的对外交流 ……（185）
（二）与朝鲜日本的交流贸易 ……（186）
（三）与南海以西诸国的交流贸易 ……（187）
三、隋唐五代 交流贸易大发展……（187）
（一）中朝药材频繁交流 ……（188）
（二）中国药材输出日本的第一次高潮 ……（188）
（三）与越南及南亚南洋诸国的药材交流 ……（190）
（四）大食输入中国的药材与胡商 ……（191）
（五）五代十国的香药进口 ……（192）
（六）东罗马帝国朝贡底野迦 ……（192）
（七）唐代的香药消费 ……（193）
四、宋金元 交流贸易鼎盛期……（194）

（一）空前增加的药材朝贡贸易 …… (194)
（二）中朝交流新高与中日民间贸易 …… (194)
（三）宋与东南亚及以西诸国的药材贸易 …… (195)
（四）宋代输出的中国药材 …… (198)
（五）宋廷对进口药材的严格管理 …… (199)
（六）宋代大量进口香药及其原因 …… (200)
（七）泉州香药走私凶杀贿赂案 …… (203)
（八）进口药材犀角象牙 …… (203)
（九）元代的药材进出口贸易 …… (204)
（十）世界最大的胡椒市场泉州 …… (206)
五、明代　时闭时启的交流贸易 …… (207)
（一）两次海禁与两次开禁 …… (207)
（二）郑和下西洋的药材贸易 …… (208)
（三）海禁中的药材走私 …… (209)
（四）限贡中的搭附药材 …… (210)
（五）中朝医药交流贸易向深层次发展 …… (211)
（六）各国朝贡的主要药材 …… (212)
六、清代　从限制对外贸易到外贸主权丧失 …… (213)
（一）海禁停止药材正常外贸 …… (213)
（二）限制外贸中的重要商品大黄 …… (213)
（三）朝贡贸易衰落与药材出口 …… (215)
（四）东洋参、西洋参进入中国市场 …… (216)
七、民国时期　殖民地性质的原料药材大出口 …… (218)
八、新中国　中药进出口贸易大发展 …… (221)
第五章　药业的经营技巧 …… (229)
一、使用广告商标 …… (229)
1. 实物广告 …… (229)
2. 叫卖广告 …… (230)

3. 音响广告 …… (230)
4. 模型广告 …… (231)
5. 悬物广告 …… (231)
6. 雕塑广告 …… (232)
7. 供奉广告 …… (232)
8. 文字广告 …… (232)
9. 印刷广告 …… (232)
10. 图画广告 …… (233)
11. 灯笼广告 …… (233)
12. 音乐广告 …… (233)
13. 武术广告 …… (233)
14. 动物广告 …… (234)
15. 门面广告 …… (234)
16. 商标广告 …… (236)
二、加强各种宣传 …… (236)
1. 形象直观展示 …… (236)
2. 馈赠与慈善救济 …… (236)
3. 利用节日显示实力扩大影响 …… (237)
4. 争取参展评优 …… (237)
三、坚持药品质量 …… (239)
1. 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思想 …… (239)
2. 采购道地优质药材 …… (239)
3. 精细加工，创造品牌产品 …… (239)
四、开展优质服务 …… (240)
1. 延长营业时间，实行日夜售药 …… (240)
2. 医生坐堂，诊后及时取药 …… (240)
3. 配方单包，便于检查 …… (240)
4. 代客加工，方便顾客 …… (240)

5. 医疗咨询，问病售药 …… (241)
6. 赊销折扣，价格优惠 …… (241)
7. 热情服务，礼貌待客 …… (242)
五、开拓国内外市场…… (242)
1. 流动卖药寻找市场 …… (242)
2. 时机成熟发展市场 …… (243)
3. 抓住机遇开拓市场 …… (243)
4. 积极开拓国外市场 …… (243)
六、提高业务素质…… (244)
1. 启蒙必学医药知识 …… (244)
2. 实践中学习操作技能 …… (244)
3. 招聘能人上关键岗位 …… (245)
七、严格内部管理…… (245)
1. 机构精练，岗位职责明确 …… (245)
2. 多种工资形式 …… (245)
3. 建立制度奖惩分明 …… (246)
第六章　药业的行会组织…… (247)
一、唐代的药行…… (247)
二、宋代的药市…… (248)
三、明代的药行商会…… (249)
四、清代复杂的行会组织…… (250)
五、药材批发商的帮会组织…… (251)
六、民国后期的同业公会…… (254)
七、中药业行会组织的职能作用…… (254)
八、新中国的行业组织…… (255)
第七章　药市与药王庙会…… (257)
一、庙会与庙会市场…… (257)
二、古代药市的形成…… (258)

三、药王庙会与药材交易…… (261)
四、药王庙中的十六位药王…… (263)
五、当代的药材交流会与常年药材专业市场…… (267)
第八章 假药及防止措施…… (270)
一、历代都有假药…… (270)
二、防止假药的种种措施…… (272)
1. 制定打假法律 …… (272)
2. 制定国家药品标准 …… (273)
3. 建立药材检验和成药生产销售监督制度 …… (273)
4. 掌握药材鉴别加工制药技术 …… (273)
5. 强调职业道德 …… (274)
三、有益的借鉴…… (275)
第九章 古代药材的开发利用…… (276)
一、保健食品…… (276)
1. 保健食品的理论与市场形成 …… (276)
2. 保健食品的开发利用 …… (277)
3. 著名的疗效型风味小吃 …… (279)
二、保健美容品…… (280)
三、保健用品…… (284)
四、染料…… (285)
五、洗涤剂…… (289)
六、香料…… (291)
七、防蛀药 农药 灭鼠药 灭蚊药…… (293)
八、火药 鞭炮 焰火…… (294)
九、颜料…… (295)
十、其他开发利用…… (295)
第十章 药业基本名词探源…… (297)
一、药 药物 药品…… (297)

二、毒药……（298）
三、本草……（299）
四、医药……（300）
五、官药……（300）
六、中药……（301）
七、国药……（302）
八、药材　道地药材……（303）
九、生药……（304）
十、饮片　咀片……（305）
十一、成药　熟药……（306）
十二、草药……（307）
第十一章　著名百年老店……（309）
一、明代以前　1家……（309）
广州　海辐禅院……（309）
二、明代　4家……（311）
太谷　广盛号……（311）
佛山　梁仲弘蜡丸馆……（312）
广州　陈李济……（312）
汉口　叶开泰药室……（313）
三、清代　24家……（314）
温州　叶同仁堂……（314）
北京　同仁堂……（315）
定县　白敬宇眼药店……（317）
通海　老拨云堂……（317）
苏州　诵芬堂……（317）
绍兴　震元堂……（318）
苏州　沐泰山堂……（319）
上海　童涵春堂……（319）

广州 敬修堂……（320）
嘉兴 兰台药局……（321）
成都 同仁堂……（322）
芜湖 张恒春药号……（323）
东平 树德堂……（324）
新绛 德义堂药庄……（324）
安庆 余良卿膏药店……（325）
合川 存心堂……（325）
苏州 华家琢针店……（326）
杭州 胡庆余堂……（326）
苏州 童葆春堂……（327）
上海 蔡同德堂……（327）
贵阳 同济堂……（328）
济南 宏济堂……（329）
重庆 桐君阁熟药厂……（329）
樟树 长春药店……（330）
四、民国 1家……（330）
天津 达仁堂……（330）
参考文献……（333）

第一章　中国药业的行业特色及地位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文化灿烂，商业繁荣。古老的传统医学，为保障各族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悠久的传统药业，担负着为社会组织、生产、供应药物的重大使命。在中国众多的商业行业中，药业联系着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是一个不断兴旺的重要行业。几千年的经营活动，使药业的自身特点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医学和伦理道德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行业特色，确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分析、研究药业的行业特色，对把握中国药业的发展脉络，认识某些特殊的经营方式和举措，是十分重要的。

当代的中国药业是传统药业的继续与发展，包括中药业和西药业两大门类。由于西药业在我国历史较短，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逐步形成，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才获得了真正的大发展，所以本章论述的行业特色，实际上是中药行业的特色。在药业的诸种特色中，有的已过时不用，有的则依然有益。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特色，赋予它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对提高当代药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药业，是十分有益的和必要的。

一、医药结合　古代药业的显著特点

最早的采药卖药人，一定知道药物的医疗价值才把它作为商品出售。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医药知识逐渐积累，成为职业医生，通常采用流动行医卖药或摆摊、启肆售药的经营方式谋生。周代出现的宫廷医疗保健机构，也为民间诊病发药，具有商业性质。宋代建立的各级官药局，都设医官进行管理。纯粹的民间药商启肆，也请医生坐堂看病。这种医兼营药、药店请医的结合形式，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盛行不衰。究其原因，主要是药为医用，有医有药，看病取药，既方便病人，也使经营者能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但是，这种结合形式并不反映药业的全部实际，而是主要表现在零售药业之中。现在人们常说的古代医药一家，就是指这种情况。随着药业的不断发展，各地出现不少从事药材贩运、批发、加工的商人。贩运、批发能获大利，有的业医营药者又发展为批零兼营的大户。

医兼营药一般品种不多，数量不大，是医药不很发达的表现。随着医学、药学的不断进步，医、药不同的学科内涵日益明显。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医、药出现分工。医必兼药的情况有所减少，纯粹的药商逐渐增多。清代著名医学家徐大椿，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古之医者，所用之药皆自备之。……当时韩康卖药，非卖药也，即治病也。……今北方人称医者为卖药先生，则医者之自备药可知。自宋以后，渐有写方不备药之医，其药皆取自肆中，今则举世皆然。"（《徐大椿医书全集·医必备药论》）药业的医药结合主要表现为药店请医坐堂和加强药商与医生的联系上，做到医知药情，药之医用。医药分工是药业的第一次大分工。虽然很不彻底，甚至直到现在，业医营药仍然存在于医院和集体、个体诊所中。但它确有重大意义，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二、工贸一体　药业经营的基本模式

流动的卖药人，通常携带自制的丸散膏丹和某些特效药材问病售药。经营饮片、成药的铺户，在店面开门市店后设作坊，加工炮制合药，生产各种饮片和成药。就是规模很小的饮片铺，也置药刀、碾船、铁锅进行简单的加工。从事药材批发的字号，有工棚整理加工药材，提高商品的规格等级。专营某种药物的药商，更是自己加工自己销售。这种工贸结合一体的经营模式，既可使经营者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又能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商品供应，还能创造出自己的名牌产品，形成经营特色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因而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说，这种经营模式在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全行业一律。产生这种经营模式的原因，方便经营和利益驱动是主要因素，也与药业多以家庭为单位，规模较小有关。这与当时不高的消费水平无须规模化生产、不便利的交通环境需要有药品贮备、加工产品无规范化的工艺质量要求、因而加工技术较为简单的历史条件是相适应的。有的卖药人或药业铺户，在一定范围内自己采集、种植药材，加工出售，又显示出农工贸一体的经营模式。商业原本以买卖商品为其行业特征。药业集工贸一体的经营模式，在中国封建社会商业行业中是不多见的。

三、道僧卖药　零售药业的一个补充

道教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以追求长生不老为宗旨，热衷于用水银、朱砂、雄黄、砒石等矿物药烧炼“灵丹妙药”和画符驱魔除病。道教极具诱惑的宣传鼓动，曾使汉唐一些皇帝信以为真，请道士入宫烧炼不死之药，地位显赫一时，结果反使帝王们重金属中毒染上沉疴或早亡。道教徒在不断失败的同时也研制一些治疗性药

物。这种矛盾现象在晋代葛洪的著作和实践中表现最为突出。为了生活，道士负囊行医卖药，四处奔波，充斥于全国城乡，历时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有些道家，是历史上的著名卖药人。唐代携黑犬流动卖药的韦慈藏，甚至被药业尊为药王之一，供奉在药王庙中。

佛教源于印度，西汉时传入中国。佛教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皇朝的极大重视。隋朝有佛寺 3985 所，僧尼 23 万多人。唐代达到鼎盛，仅洛阳就有大小佛寺 1000 多所。佛教寺庙拥有大量土地和人力，形成强大的寺院经济。佛教的慈悲为怀思想，使他们重视开发公益事业，医药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大藏经》中有医方明之学，内有大量医学著作。大的佛寺普遍有问病施药机构。无论大小寺庙，都辟药圃栽种少量药材，作药源补充，也可作商品出售。信徒士人求药，多以功德形式捐资回报。僧人负囊卖药，足迹也遍全国城乡。唐代鉴真、义净都是著名的知药高僧。建于南齐年间（497～502 年）的浙江萧山竹林寺，历代僧人都研习医药，对妇科疾病尤其见长，有《竹林寺妇科秘要》等方书流传于世。南宋时，寺僧静暹治愈皇后重疾，宋理宗赵昀御笔亲书“晓庵”、“药室”二匾，并敕封静暹为“药王”。中国历史上药王不少，皇帝敕封则仅此一人。竹林寺医僧，“治病并不诊脉书方，唯问症发药”[1]，与市肆药业无异，用药品种却比药业少了许多。

佛寺、道观卖药和道僧流动卖药，在民国时期仍十分常见。但因规模零星，品种不多，只能对零售药业起补充作用。

四、济世活人　药业遵循的精神支柱

做买卖赚钱是一切商业的追求目标和宗旨。药业也不例外。但是药业经营的商品用于防病、治病，直接关系人们的健康与生命，表现出医药商品的特殊性和经营的重大责任性。民间流传“黄金有价药无价”的俗语，一些药材、成药取名“金不换”或“不换金”，

就部分体现了这种特殊性和责任性。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医药业在形成之初就接受了“仁爱”、“博济”思想，确立了人道主义目的，济世活人成为药业经营的精神支柱和另一宗旨。绝大多数药业铺户在取店名时，使用了德、仁、济、利、康、寿、惠、安等文字，公开向社会承诺这一宗旨。赚钱与济世这对矛盾的宗旨，药业在经营中加以巧妙应用，推出了薄利多销，对贫病者卖药实行赊账、减费或不收费，遇瘟疫流行特制丸散或熬中药“大锅汤”施药，经营中重视药品质量和职业道德，将部分赢利捐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等等。这些济世活人和有益大众的举措，为药业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反而赢得了顾客，促进了销售。历史上那些重义轻利的药业商人，受到社会的肯定和赞誉。唐代药商宋清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五、庙会药市　药材批发的重要市场

中医使用中药有四大特点：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应用，加工炮制保证安全有效，复方配伍适应复杂病情，道地药材控制药物质量。中国第一部医方书大多数为复方。历代中医也几乎全用复方治病。宋代的医方书载方达数万首。据称，至现代共有中药复方60万个。中医追求复方用药的目的，除了适应复杂病情外，还能增强疗效、监制毒性、降低人体和病源微生物的耐药性。复方中的药物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市场，其质量优者称为道地药材。药业必须组织到各地药材和道地药材，才能开展好经营，满足配方和制药需要。中国古代的庙会市场为此提供了绝好机会。一般庙会市场百货汇粹，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药业需要。药商们筹建属于自己行业的药王庙，选定日期年年举办药王庙会，各地药商有备而来，形成专事药材交易的药王庙会市场，称为药市。药市从中唐至民国时期，规模越办越大，成为全国药材批发交易的重要市场。新中国成立后，恢

复的安国、百泉、樟树三大全国药市，是古代药市的继续和发展。这种规模大、效益高、延续1000多年的专业庙会市场形式，在中国众多的商业行业中是绝无仅有的。

六、对外开放——药材进出有国际市场

向国外输出国产药材，也购进国外药材，几乎持续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药材对外贸易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交易用以货换货或金属货币支付的方式进行。贸易通过陆路、海运、边界联系五大洲的百余个国家和地区。自西汉以来，历朝政府都有专管机构，进行官方外贸和管理民间外贸。宋代市舶司出口到阿拉伯地区的中国药材达60余种，进口阿拉伯地区药材也有60余种。有的药材进口量很大，官方通过收税和倒卖获利收入十分可观，成为宋朝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朝贡与赏赐是官方贸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外国使臣或商人，代表本国君王向中国皇帝贡献方物和珍贵药材，中国皇帝给以优厚赏赐以示大国风度。有来有往，于双方有利。民间外贸人员众多，有的专营药材，有的兼营其他商品，有守法的贸易，也有非法的走私。历代皇朝对非法走私都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轻者罚款、没收货物，重者还予判刑治罪。中国的外贸商人用驼队、马帮和帆船作运输工具，行驶在丝绸之路的沙漠、重山峻岭的滇缅和波涛汹涌的海洋。外国商人也沿这些路来中国。他们在港口、京城和其他大城市出售贩运来的药材，有的还深入内地流动售药甚至开设药店。国外输入中国的药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有产的品种，输入作为补充，来自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的药材中多属这种情况；一种是中国不产而有特殊用途的药物，来自南洋、西亚和非洲的香药属这种情况。香药开始是供皇宫、权贵们在室内燃点飘香之用。后来，中国医生根据它们原有的医疗价值用于临床，并按中医药理论总结出性味、归经、功效、主治，成为中药里的新成

员。对凡能引种的药材进行引种栽培，成功后积极扩大生产，减少甚至停止了进口依赖。这些成就反映，中国医药有创造性学习、吸收外来药物的优良传统。中国本草书籍记载的外来药物在100种以上。中国药业的对外开放，互通有无，时间之长，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地域之广，是古代其他商业行业没有的。

七、精细分工　药业发展的深化要求

药业的经营分工，发展到民国时期已十分精细。习惯的大分类为中药业、草药业。草药业中有批发的草药行、零售的草药铺、草药摊。中药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三大类商品。生产、经营这些商品的药业铺户，分别形成药材业、饮片业、成药业。在实际经营中，大、中型铺户常是三者或二者同时经营，并无严格划分。

药材业的批发业务，有大批发的字号商，二批发的拆药铺，通常经营上百种药材。大批发中有的专做对外出口，有的专营某种药材；如清代的安庆茯苓行、樟树的硫磺行、禹州的甘草帮等。从事贩运的药商为数不少，小的称“包袱客”，大致也可以划在批发商之列。药材零售必须经过加工炮制制成饮片，属于饮片业的范围。专营贵重药材的麝香店、参茸庄、人参银耳店，专营日本人参和北美人参的东洋参店和西洋参店，则常是批零兼营。

饮片业的铺户通常自己将药材加工成饮片，通过门市配方销售。历史上也有专门生产、销售饮片的批发业，如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市）有“生药饮片”作坊。清至民国时期，药业发达的大城市和药材集散地，有专门切制硬质药材和规格要求较高的药材，称为刀房或片子棚，也是生产饮片的批发商；但是历史上饮片批发业并不发达。饮片批发真正大规模形成是在新中国时期。生产饮片的企业一般称为饮片厂，有的也称炮制厂，全国有570余家。

成药批发铺户集工贸一体。宋代的官药局、明代的陈李济、梁仲宏蜡丸馆、清代的北京同仁堂、芜湖张恒春等，都是历史上著名大户。它们也有门市零售自己生产的成药。成药零售铺户，有的经营数十种、数百种，有的仅经营一种，如宋代的李官人药铺，就经营他的双行解毒丸。零售成药铺中，有的按剂型及治疗特色分工经营，如膏药铺、眼药铺、丹药（外用药）铺、药酒店、神曲茶饼店等。

为药材贩运和大批发服务的有药材行栈，开展提供食宿、存放货物、代购代销等业务，从中收取一定佣金。药材行栈在各药材集散地为数不少，成为药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批发业、零售业提供特殊货源的还有一支加工业，专门生产加工技术复杂的特殊药品，如银朱作坊、轻粉作坊、樟脑作坊、制胶作坊、茶曲作坊、半夏作坊、凤尾络作坊等等，也是药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药业普遍经营模式是工贸结合，前店后坊，但从宋代开始，有了工贸分工。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药业第二次大分工。反映出社会对药品需求量增大，制药技术日趋复杂，人们的质量意识和对商品质量要求水平显著提高。只有工贸分工，各施其能，才能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古代、近代药业的工贸分工是很不彻底的。新中国也是经过了 50 多年的不懈努力才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目标。

八、技术复杂　经营药业需较高素质

经营药业，除需要一般商业管理能力和营销策略外，还必须具备相应的临床医药知识和药物鉴定、生产加工、贮藏养护技能，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古代有个著名的“愚人卖药”故事。是说父亲有事离开药铺，叫儿子卖药。一位顾客来买牛膝、鸡爪（鸡

爪连，商品名味连，多支呈鸡爪状，故名）。他用刀割下自家耕牛的膝盖骨，宰下鸡的脚爪交给顾客。结果是药没卖成反而吃了大亏。虽是笑话，意在说不识药、不懂药不能经营药的道理。

药材是自然界天然产物，有动物类、植物类和矿物类，商品繁多，是技术复杂的主要原因。仅据方书和主流本草所载，历代的用药数是：战国时期247种，汉代365种，南北朝730种，唐代844种，宋代1558种，明代1892种，清代2608种。1976年《中药大辞典》载药5767种，其中植物药4773种，动物药740种，矿物药82种，加工类药172种。1987年，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中药资源总数已为12807种，其中植物药11146种，动物药1581种，矿物药80种。扣除未经营的部分，大型药材公司经营药材约1000余种，中型公司600～700种，小型公司400～500种。加上有些药材有多种规格等级，大型公司经营的药材商品在2000种以上。这么多的药材商品，产区分布全国各地，还有数十种国外药材，决定了药材流通历来就是全国大市场。药材中大多数是植物药，容易受自然灾害、不同产地、生长环境、栽培技术、采收季节、加工方法、贮藏保管等因素影响，使产量和质量不够稳定。加上不同原植物、不同产地形成的多种规格等级，以及客观存在的混淆品和伪品，更增加了经营的复杂性。

中药商品里的饮片类、成药类，有一套复杂的加工生产技术，而且品种不少。《雷公炮炙论》记载南北朝刘宋时期，需要炮制加工的药材有300种。《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了宋代成药788种。现代，各地的《炮制规范》有饮片规格1000余种，各种批准生产的中成药约8000种。

零售药业要掌握药房管理和调配技能，还须具备问病售药的医药知识，做到小病当医生，大病当参谋；所以，在药铺从业的青年药工，业主都规定白天工作，晚上看、摸、闻、尝学习认药，熟读中医药的启蒙书《药性赋》和《汤头歌诀》，而且安排师傅进行传、

帮、带，并进行效果考查。经营药业在专业技术上的复杂性，要求从业人员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在其他商业行业中是少有的。

九、药业文化　商业文化的优秀代表

中药业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成功地结合运用了我国优秀的传统医药成就及文化观念，形成了中药行业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药业文化。药业文化反作用于药业，发挥出巨大的能量，起到了促进经济社会效益、团结广大从业人员、推动中药业向前发展的重要作用。

济世活人、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诚信为本、薄利多销的商业信念；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营道德，人贵千金、普同一等、有如至亲的服务态度，救济贫困、舍己助公的高尚风范等，在古代药业的思想观念文化中是十分全面和突出的。虽然其中不乏奸商，但为数不多，而且会受到行业的鄙视和谴责。

商品是多种文化的结晶和使用体现。中药商品是医药文化、工艺文化及包装文化的结晶和使用体现，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特别是在商品美、名称美方面，尤其千姿百态，文采悦人。形态上，植物药材有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块根的大黄有圆柱形、卵圆形、马蹄形、纵剖瓣等多种形状；饮片有片、节、丝、块、丁、绒、粉、颗粒、团卷九种类型，片形中又有横片、竖片、斜片，内部的特征花纹（植物药材组织特征）尽现眼底，既便于识别、煎出药性，又很美观；成药有丸、散、膏、丹、锭、曲、酒、露等多种剂型。丸剂包衣有红色的朱砂衣、金色的金泊衣、白色的滑石衣、黑色的百草霜衣、青色的青黛衣等等，撞光发亮，呈现出五光十色。中药的名称美堪称杰作，包含着丰富的知识文化和高雅的文采。单是药材、成药的命名思路，就有药物功效、药用部位、来源产地、生活习性、采收加工、形色气味、药材性质、典故传说、使

用剂量、服用方法、处方组成、假借比喻等十几种。尤以夸张功效和假借命名最令人赏心悦目。如千里光、千年健、金不换、白头翁、何首乌、地龙（蚯蚓）、海马、飞天蜈蚣、凤凰衣（蛇蜕）、龟龄集、抱龙丸、至宝丹、还少丹、三仙丹、七宝美髯丹、生龙活虎丹、渴龙奔江丹等。

店铺装饰布局具浓厚的文化氛围。房屋设计高檐阔面，古朴大方。唐代设计就考虑到环境保护和分开工作区与生活区。清代杭州胡庆余堂是建筑史上的杰作，房檐下的大字店名，给人以信任感。宋代有“仁爱堂”、“三不欺药铺”、“丑婆婆药铺”三个店名。前二者体现办店宗旨和信念。后者的女店主不一定丑陋，意在诙谐引人，就像麻婆豆腐、王麻子剪刀，其主人并不麻脸一样。店堂布局：齐腰的柜台供配方时放药发药，上摆药戥、算盘、压纸木方和铜、铁质药臼及瓷质乳钵；在靠近门面的柜台上放置药王孙思邈或其他的木质雕像，后面是高脚的万格药橱。药橱与天花板之间的空档，用当地名人书法、山水画作壁画装饰。店内显眼处挂“道地药材”（或地道药材）、“丸散膏丹”、“遵古炮炙”、“明码实价”、“童叟无欺”、“世隐韩康”等横匾或竖匾。店前立布制或木制广告介绍经营内容。有的在檐下高悬巨型木质或铜质的膏药串作为市招。堂内空隙地靠后置铁碾船，靠前处放凳、茶、水烟等供顾客休息、使用。生意兴隆时常是碾药声、捣药声、算盘声三响齐备，一派热气腾腾的工作场面。

中药业的宣传广告文化，形式、手段多种多样，可以说是集历史之大成，有的极具宣传效果。本书后有专论。

药业文化的成功杰作，是与药王庙会有机结合的定期药市。它由药业行会组织承办，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本书后面亦有专论。

不应掩饰，药业文化中也存在封建陋习，但究其主流是健康向上的。它的内涵丰富、突出，是中国古代、近代商业文化的优秀代

表。

十、传统药业　全国商业的重要行业

中药商业为社会组织、生产、供应防病治病的药物，是社会生活所必须的重要物质。这是中药业能够存在、发展的内在动力。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中国，中药是唯一的药物来源，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战国时期制订了有关医药的法律。秦始皇焚书坑儒保留农书、医书，重奖杰出的医家药商。东汉的开国皇帝曾经卖过成药。唐朝政府颁布具有药典性质的国家本草。宋代在全国建立官营药业体系和积极发展药材进出口贸易。元代严格管理有毒药材和严禁假药。明代首任皇帝朱元璋昭令全国药商参加药材交流会。满清皇朝把宫廷用药委托给民间药业承办，运用控制中药出口对抗帝国主义侵略。只有民国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例外，推行歧视、消灭中国传统医药的错误政策。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药逐渐传入中国并有较快发展，形成两种药物体系并存格局。但是西药市场较长时间由外商垄断，民国以后华商西药业才有较快发展。抗战时期又遭摧残，战后几年发展不大。到1949年，全国大小西药业不足1万家，而中药业有10万余户。西药业远未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县以下的广大农村医药市场，仍由中药业主宰。

在中国古代、近代的社会商业中，中药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重要行业。一方面是中国人口不断增长，药品的社会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能给药业的经营者带来较好的效益，给国家带来较大的财政收入。尤其是宋朝政府，实际上已将药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来发展。崇宁年间，京城五家官药局的利润收入，就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0.67%，如果加上药材的外贸收入，百分点至少可以翻几翻。到南宋的建炎、绍兴年间，仅药材的进出口贸易收入，就超过

全年财政收入的10%以上。而官药局的药品零售价比民营药业低1/3，可见民营药业获利之大，国家收税之丰。所以，从宋代至民国，中药行业始终是大中城市的重要商业行业之一。

进入20世纪下半叶，西医药在现代科技基础上获得巨大进步与发展。新中国的西药业经过50余年大发展，才在产值和销售上赶上并超过中药业，成为防病治病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中药也增加了国内销售和扩大了世界影响，出口达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药正在逐步为世界真正接受，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第二章　药业的形成与发展

药业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孕育、形成与发展，和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医学、药学发展相联系。

一、神农氏时代　发现药物的开始

我国很多古籍记载，神农氏时代已有了商品交换。如《易经·系辞下》说："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淮南子·修务训》又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补三皇本纪》总结为"神农氏……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把这两种说法联系起来，似乎神农氏时代已有了医药商品交换。

神农氏时代是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有说距今六七千年，有说约在公元前 27 世纪至公元前 22 世纪。这时人们开始种植谷物，饲养家畜，定居生活，从原始的采集守猎经济向原始的农牧经济过渡。社会生产发展与生活改善，促进了原始手工业的出现。人们有了一点剩余的食品、物品，如装饰品、打猎工具、加工工具、兽皮等可供交换。但是，那时城市并未出现，剩余的食品、物品也不多，没有货币，也没有固定的市场，只能在散居的空地或井边进

行小量互通有无的物物交换。仅是商品交换的萌芽时期。

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地，散居着不少的大小部落。在黄河流域有两个强大的部落。一个部落姬姓，首领是黄帝；另一个部落姜姓，首领是炎帝。两个部落是近亲，结成了部落联盟。传说黄帝的部落善于打仗、建房屋、造舟车、制蚕丝、做衣服，并把这些功劳归功于黄帝个人，黄帝成了勇敢智慧的神，为千古赞颂。传说炎帝的部落善农耕，后人称为神农氏。农业生产的工具和种植技术，由炎帝创造发明并教之于民。炎帝也被称为神农。神农是农神之意。炎帝还为民寻找可食的植物、可饮的水源，常为此中毒，因而有“一日而遇七十毒”之说。这说明，原始的农牧业经济生产水平低下，生产的食物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还要依靠采集可食用的野生植物作为补充，从而导致有医疗作用的药物发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他是不能忍受的，甚至有被毒死的危险。于是有了并非神农亲自口尝，而是由他所带的一头形似雄狮的神兽代尝的传说。神兽全身透明，五脏六腑、经络骨节清晰可见。神农将采集到的草药喂给神兽，观察药性在体内如何循行，在何脏腑发挥作用，并把它记录下来成书传世。后来，神兽尝了何首乌身体变黑，又吃了蜈蚣中毒而亡。神兽为民寻找药物而献身的精神，受到药业的崇敬，人们将它制成雕像予以供奉。

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是人们在觅食过程中发现药物的生动反映，也是传说的真实意义所在。人们在觅食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有毒植物，食后轻则引起头痛、眩晕、恶心、呕吐、腹胀、腹痛、腹泻，重则引起抽搐、昏迷、死亡；也可能遇到另一些植物，食用后减轻或消除了原有的病痛，甚至使人食欲增加、精力充沛、身体强壮。众多人们的长期体验并代代相传，使人们积累起一定的经验，可以带着解除某种疾苦和强壮身体的目的，去采集所需要的植物，于是形成了药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的形成，在神农氏时代还是朦胧不清的。真正的形成是在商代的后期。神农时代始有医药，只能是发

现认识药物漫长过程的开始，还不可能出现药物商品及其交换。

二、奴隶社会　漫长的药业孕育期

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从夏王朝开始，经商、西周，至东周前期的春秋时代结束。历时1600多年。

（一）夏代无药业

公元前21世纪，生活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的夏后氏部落，由于禹治洪水有功，被推举为舜的首领继承人。可是禹扶持自己的儿子启为他的继承人，破坏了氏族社会传统的“禅让”选举制度，开创王位世袭制。公元前2070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奴隶社会的夏朝，揭开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帷幕。公元前1600年夏被商汤部落推翻，夏传17王，历时470年。

夏朝属地分为九州，疆域东到渤海，南到两湖，西至甘南，北抵豫西。王都设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较氏族社会有了大的发展。有了原始的城市——邑。邑是人们的聚居点，内有交换场所——市。交易以物物交换为主，也有用贝壳作货币使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各州朝贡的手工业品。交换的参与者是奴隶主贵族。

夏朝十分迷信鬼神。医药仍处在发现过程的初期，没有发现用药的记载和交换。

夏朝能够制造粮食的发酵酒。《战国策》记：“昔者，帝女（禹的女儿）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酒给禹带来了醇香甘甜，也带来了先兴奋后麻醉的体验，从而得出过饮坏事的结论而自动绝酒。酒，后来被称为“媚药”、“百药之长”，在医药上广泛应用。不过夏朝的酒不多，真正开始药用并在市场上销售是下一个朝代商代的事。

（二）商代后期开始使用药物

公元前17世纪，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强大起来，逐渐向黄河中游发展。公元前1600年，商王汤发兵夏桀王成功，建立商朝。定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后，商朝也称殷或殷商。商朝末期的第30位王帝乙迁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公元前1046年殷商为周武王所灭。商朝传31王，历时554年，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盛世之一。

商代后期，农业实行轮流休耕制，摆脱了熟荒耕作制的原始性。从此人们能比较久地定居。粮食作物已能种植粟（小米）、黍（粘黄米）、稷（黄米）、麦、稻，经济作物能种桑、麻。养蚕业、畜牧业有很大发展。手工业的青铜冶铸、陶器烧制、丝麻纺织、骨角制作、玉石雕琢、漆器制造、竹木舟车等都有较大进步。有了较多的剩余商品，于是出现了专门从事买卖活动的人。做买卖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以此为职业，成为社会的重要分工行业——商业。商族人善做买卖，这种行业又在商代形成，所以古代就把做买卖的人叫做商人，他们形成的行业叫做商业。至此，古代经济的三大分工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商代基本完成。

商朝属地宽广，城邑比夏增加和扩大。殷商时城址也比较固定，更有利于商业发展。商人们用牛车、马车、舟船、人力运输商品。交换形式有物物交换和货币交换。货币使用贝币，有海贝、玉贝、骨贝、铜贝。农产品、手工业品、珠宝和奴隶是市场上的主要商品。商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商代的医药水平比夏代有很大进步，但是水平仍然很低。人们普遍对医药还不了解或缺乏信任，依然处在发现药物的初期阶段，不大可能有很多的药物商品交换。这从甲骨文里可得到证实。

刻在贝壳、兽骨上的甲骨文，是中国比较成熟的最早文字，开始了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新时代。经过100年研究发现，甲骨文的主

要内容是殷商王朝占卜吉凶记录，故又称卜辞。现在发现的殷商甲骨文约4500个单字，能够辨认的约2000个。其中有殷人所患疾病的记载，记有眼疾、耳疾、齿疾、产疾等20多种疾病。记载的患者为王室成员及武士。占卜的时间，大约在距今3278～3378年的百余年间。殷人仍然顽固地相信上帝，迷信鬼神，信赖巫术，认为疾病是上帝降灾和鬼神作祟。如殷王武丁好多次生病，都占卜到是野猪或蛇在作祟。生病后又靠巫来占卜辨吉凶，靠巫术求救而不用药物，所以甲骨文里有病字而未见药字，也未见医字。在巫术不灵，病痛难忍时，殷人也采用按摩、针砭、灸焫等法解除病痛，针用骨制。砭是锋利的石块或带尖的石块，可以破痈排脓。灸焫是用草扎把点燃灼烤，可以止痛。有一条提到用鱼治疗腹疾，一条记用枣治疗疟疾。[3]鱼、枣都是常用食物，不管疗效如何，却是用药（食物）治病的最早记录，也是药食同源的有力证据。有关医药卫生的甲骨文摘举如下。

病　虫病　龋病　沐浴　香酒　按摩　针砭　灸焫

巫术终不能治病。处于开始萌芽的按摩、针砭、灸焫也不可能胜任其责。必然迫使人们寻求药物。《尚书·说命篇》有殷王武丁说的一句话："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即用药若不到使人头昏眼花的地步，疾病是不会好的。武丁是战功卓著的一个著名殷王，他生病还靠占卜问原因、辨吉凶、求保佑，当然说不出此话。武丁后的殷商还有200余年时间，摸索出了不少用药经验，为西周医院药治奠定了基础。所以此话的实质，反映商代后期人们已开始用药治病。那时用药治病普遍存在较强的不良反应。是人们对药性的认识、掌握还很肤浅，剂量也可能偏大，更没有经过后来才出现的加工炮制的原因。现在还不知道商代后期使用了些什么药物。肯定为

数不多。不多的药物少量市场交易是可能存在的。

殷人嗜酒，市肆里有较多的酒店。如果带着舒畅情志，消除疲劳，祛寒暖身去消费，酒可视为最早进入消费市场的药物。医字的繁体写法是醫，从酉，酉是酒的古写，说明酒是有医疗作用并为医生所使用。

（三）西周的官民两用医药机构

公元前 11 世纪，居住在渭水中游黄土高原的周部落强大起来。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统兵灭殷纣建立周朝，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史称西周。西周至公元前 771 年周平王东迁京都于洛阳时止，传 12 王，历时 275 年，是中国奴隶社会的极盛时期。

西周建立后，周王大封诸侯国，传说有 1800 个。诸侯封国都建自己的城邑作国都。各国都之间建立了 5 个等级的道路交通系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商业比殷更为发达。商业活动开始规范。商业交易仍在城邑里的专门区域“市”内进行，启闭有时间规定，有各种管理官员和制度。商品交易仍有物物交换和货币交换两种形式。货币除贝币外，增加了铸成刀形的铜币。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是奴隶、牲畜、兵器、珍宝、粮食、水果、竹木、衣物、鱼龟兽等。

西周人仍然迷信鬼神，相信天命，巫在疾病的“防治”中有很高的地位。但是，西周的医药知识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产生了很大的飞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王室医疗保健机构并对民间开放。这是中国医学史、药业史上的划时代进步，是医学科学战胜巫术迷信的重大胜利。

《周礼》是记载西周王室制度和施政纲要的重要典籍。相传为周武王的重要助手周公旦所作。《周礼》第一篇《天官冢宰》医师章，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医事制度和医政设施，设立总管医药政令的医师（官名），下设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实行医疗分工，疗效考核；制订诊法、治则、疗养常规、病历保存及死亡原因报告等

规章制度；医生、各种管理人员和技工、杂工共52人。“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是说医师掌管医药卫生工作的行政命令，贮备药物供医疗需要。凡国内有内科、外科病的病人求医，医师则分别安排医生给他们治疗，年终考核医疗成绩的高低，制定医生的薪金俸禄。“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凡有疡者，受其药焉”。“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凡疗兽疡，灌而劀之……然后药之”。食医是周王的营养医生，管理周王的饭食、饮料、肉食、酱类及各种众多的美食。疾医是内科医生，负责万民的疾病治疗调理。疡医是外科医生，负责外科病的治疗并发给患者药物。兽医治兽病用灌药，治兽疡先冲洗干净、刮去腐肉脓血，然后用药。疾医、疡医用的五药是草、木、虫、石、谷五类药物，这是西周的药物分类法。石是矿物药，虫是动物药，草、木、谷类是植物药，是按天然来源的大分类法。植物药中的草、木、谷又是按用药部位来分类，使分类更加具体。《周礼》的五药分类法，为后世的药材分类奠定了基础。疡医用的祝药，是涂搽的药水或外敷的药膏。劀杀之齐（剂）是提脓化腐的药剂。五毒，是用胆矾、朱砂、雄黄、砒石和磁石烧炼制成的粉状药剂，后世称为丹剂、丹药。

可以看出，这个规模很大的中国第一家官办医疗保健机构，是官、民两用的，它集医、药、医政于一体，有药库、药房和药剂配制，还向患者发药，药业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周都如此，在其他诸侯封国都邑也可能有类似的机构设置。王室有官医为民疗病，民间也一定有少数医生存在。医生制药、用药、售药，必然带动药材的生产、流通。虽然对整个西周医药市场还不够明了。但品种不多、数量不大的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及其加工品，肯定已经进入流通市场。

历代中医书籍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不管哪种方式，看到你的信息我会第一时间回复，尽全力帮您！

加微信可以扫描以下二维码加我！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四）春秋时期孕育药业

公元前770年，各诸侯国不满周幽王昏庸，进攻王都，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周平王继承王位，迁都洛阳，史称东周。东周于公元前256年被秦国所灭，传25王，历时514年。东周时诸侯国割据称雄，王室政权日益衰落。史家称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称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

春秋近250年，诸侯国之间互相兼并为100多国，其中以晋、郑、卫、秦、齐、楚、宋、鲁、吴、越等十几国较为强大。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由井田制向私有制过渡，奴隶制处于不断崩溃之中，中国奴隶社会进入末期。

春秋时期依然迷信鬼神，相信天命，无论民间、贵族、王室，巫在疾病的“防治”中都有很高的地位。《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18年），晋景公梦见一个大鬼，它披发及地，捶胸顿足地大骂他：你杀死了我的孙子，你好缺德，我请得上帝许可前来报仇。大鬼打坏了他的宫门及寝门而入。晋景公恐惧万分，躲进内室。鬼又打坏了内室门，晋景公惊醒了。他招来桑田地方的巫人占卜问事。桑田巫说的与梦中一样。晋景公问吉凶如何？桑田巫回答说，你等不到吃新麦时就会死去。新麦熟了，新麦饭做好了。晋景公又召来桑田巫，让他看了新麦饭后就把他杀了。就在晋景公将食新麦饭的时候，觉得腹胀，上了厕所，由于腹泻引起气脱死在厕所里。《论语》也记载，说孔子生了病，学生子路提出想为他祷告，肯求上帝保佑。

尽管如此，巫术是不能治病的。人们必须寻求药物。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认识、使用了大量的药物。在医药与巫术之间进行的斗争中，医药又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

表现之一，出现了记载大量药物的书籍《山海经》。《山海经》主要是春秋时代的地理物产志，也是最早记载大量药物的书籍。全

书不足31000字，而记载药物达124种，其中动物药66种，植物药51种，矿物药2种、水类药1种，土类药1种，未详者3种。有简单的性状、产地、疗效记载，有2种药记“其味酸甘”。用途可分为补益药、生育药、避孕药、美容药、预防药、毒类药、解毒药、杀虫药、兴奋药、兽用药十类，治疗31种疾病。用药方法有服、食、佩带、坐卧、洗浴和涂抹[4]。

表现之二，在临床实践、天文学和五行学说的基础上，萌发了中医病因说，批判了鬼神致病论。公元前541年，晋平公患病，巫卜说是山川星辰之神——实沈、台骀作祟。晋平公求医于秦，秦景公派医和前去诊病。医和对晋平公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非鬼非食”，又对他讲“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过则为菑（疾病）”的道理。除医生不信鬼神外，一些上层人物也开始怀疑巫术能治病。就在晋平公患病求医于秦之时，也请了郑国大政治家公孙侨（子产）。子产说晋侯之疾是由饮食、哀乐不节所致，与山川星辰之神毫无关系。公元前458年，楚昭王有病，巫者占卜说是“河神作祟”，他的大夫请他祭拜河神，昭王不同意，孔子称赞楚昭王有远见卓识。孔子生病时子路请祷，孔子也拒绝了[5]。

表现之三，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邑，约有100多个，普遍建立了专为民间服务的官办医院。齐国政治家管仲在《入国篇》中记述：“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音哑、跛躄、偏枯、握递（手指和上肢卷缩），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这是一种救济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医院，国家管治、管衣、管食，直到死亡。国都中也有用药治病的官医，称为“掌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从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6]。“国”，指诸侯封国的都邑。当时“国”中人口不多，所以掌病能够根据君王旨令行于

国中问病。这种行于国中的问病，实为针对封国都城民间的巡回医疗。问病必然给药，说明当时已有了较多的药物贮备。

各国统治者重视民间医疗，是春秋时期频繁的兼并战争形势所需。只有人民身体健康，才能有强壮的兵源和社会劳动力，才能争得民心拥护。地处东海之滨的越国，以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为都城。公元前 494 年，越王勾践被北边的吴国打败，成为吴国的属国。勾践在卑身事吴的掩护下，决心报仇雪耻。暗中采用休养生息，富国强兵措施。为了增加人口，规定妇女怀孕必须报告，以便官府派医生监护。发展医药成为一条强国的措施。这些措施若没有药物、药业作保证，掌病和监护孕妇是不能发挥作用的。

表现之四，巫也开始采药。巫自称是人神、人鬼之间的媒介人。他们装神弄鬼，占卜吉凶，画符驱魔，以除病痛。但是巫者们都心里明白，他们那套巫术是骗人的把戏。最多只能起到一些心里安慰作用。在社会医药实践取得成功的影响下，巫也开始采药，操巫术与药治两种技能，称为巫医。《山海经·图赞》记："群有十巫，巫咸所统……采药灵山，随时登降"。《山海经·海内西经》也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等六巫操不死之药"。

表现之五，军队开始用药物防病治病。这应该是在春秋前就有了，可惜缺乏史料。《左传》记载了宣公十二年（公元前 597 年）冬，楚国大夫申展叔为了防治军队痢疾，询问还无社准备好了药物没有的一段隐语（军事保密）："有麦麹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之疾奈何?"麦麹即曲，山鞠穷即芎穷（川芎）。还无社都说没有。申展叔命令他尽快准备好。

官方和军队需要的药材品种多、数量大，主要靠民间提供。《论语》里有孔子的学生季康子向他献药，孔子说对药性不了解，不敢吃。说明民间有零售药业存在。很显然，在春秋时期的城市里，有我国早期的药业存在。由于那时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加上迷信思想盛行，药业的形成还处于孕育之中。

春秋时期药业有多大规模？有多少常用药材在市场上流通？目前很难做出判断。

首先，尽管各诸侯国都邑有官办的医院和行于国中的掌病，也有像秦国那样的高明医生医缓和医和，更有遍及城乡操巫术与药治的巫医，但是都无具体的用药记载。

其次，《山海经》中载的124种药物，绝大部分未被后世本草所收载，甚至未被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采用。说明仅是初期记载，经验很不成熟。而书中未作药物记载的丹粟（丹砂、朱砂）、雄黄、蔓荆、苟杞（枸杞）、犀、桂、白芷、芎穷（川芎）、蘼芜（芎穷苗）、薯蓣、芍药、满冬（麦门冬）、桔梗、藁本、菟丘（兔丝）、术、枣等，反而成为后世的常用药物。春秋的《诗经》，在诗句中提到了约100多种药用植物，如卷耳（苍耳）、芣苢（车前草）、梅（梅实）、茅（茅根）、葭（芦苇）、唐（兔丝）、女萝（菟丝子）、扭（女贞子）、茹蔥（茜草）、芩（黄芩）、葛（葛根）、台（香附）、莞（白芷）、堇（乌头）、苓（甘草）、桑葚（桑椹）、蓫（益母草）、艾、勺药（芍药）、薨（泽泻）、果蠃（栝楼）、菽（大豆）、杞（枸杞）、虹（贝母）等等。多数当时主要作野菜食，也是后来才作药用。

但是，可以肯定，春秋的药业主要是官办的医院药业，已遍及春秋都邑，有数十种常用药材在市场上流通。其中的姜、桂、麦蘗、芎穷、杜衡、丹砂、砒石、雄黄、胆矾、磁石可能是最常用的药材商品。

三、封建社会　药业的形成与发展

（一）战国时期　药业萌芽

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土地私有制确立，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成为两大对立阶级，开始了中国的封

建社会时期。这一时期各诸侯国兼并更加激烈，最后形成燕、赵、韩、魏、齐、楚、秦七雄争霸的政治局面，周则成为一个很小的国家。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战国历时254年。

摆脱了奴隶制的战国经济、文化获得了巨大发展。农业上广泛使用铁制工具，改进耕作技术，扩大粮食、经济作物栽培品种和面积。手工业迅速发展，出现了大批官营、私营和个体作坊。交通进一步改善，各国之间有陆道相通，陕西与四川之间，开始架设翻越秦岭的栈道。人口增加，城市扩大，商业繁荣，各种学术思想争鸣活跃。

1. 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建立

战国时期医、巫并行于世，医学与巫术的斗争更加激烈，进入决定性阶段。

当时巫的信誉仍有市场。名医扁鹊过虢国都城时，正值太子患尸厥昏仆假死症。城中举行盛大的祈祷消灾活动，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事情。扁鹊说服了虢君为其治疗。扁鹊叫弟子子阳针刺百会穴，叫子豹用熨药热熨复阳，又内服八减之剂的汤药，太子苏醒、坐起。后服药20天痊愈。但是扁鹊在卫国为一个大夫的儿子看病时，有灵巫在场。病家相信灵巫，不要扁鹊治疗，结果病人死了。针对这种情况，《吕氏春秋》批判说：如今世人崇尚什么占卜祈祷的迷信活动，以期去病延年，结果疾病越来越多。有什么好处？所以那些巫祝之人，被古人鄙视。《黄帝内经》也批判说：那些迷信鬼神的人，不配跟他们说医学的道理。

医药是实践性的科学。医药在与巫术的长期斗争中，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出现了《黄帝内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黄帝内经》是中国第一部医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是在引入战国朴素的唯物辩证法阴阳五行学说后，对战国及其以前医学知识的总结。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主要总结中医学

的生理、病因、病理、诊断及治疗原则。《灵枢》又名《镵经》，专论用针、灸治疗疾病的原理和方法。在治疗手段上，体现药物、针灸并重和特别强调食物疗法的时代特色。《黄帝内经》的出现，全面否定了鬼神致病论和巫术消灾论；奠定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促进了中医学和中药学沿着这一体系迅速发展。

在《黄帝内经》问世前，还出现了一本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全书记载了治疗 52 种病证的 280 个医方，用药 247 种。医方多是简单的复方，有剂型规定，药物有剂量和炮制要求；是战国及其以前时期临床医学的经验总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期的药业水平。但是，《五十二病方》中也夹许多巫术，如治疣法有 7 条，第 1 条为药治，第 5 条为药治与巫术结合，其余 5 条全是巫术治疗。医、巫并重十分明显。

2. 流动医生与坐业医生

西周以来就有职业医生存在。史料所载皆为王室官医，如西周的食医、疾医、疡医、兽医，春秋秦国的医缓、医和及各国都邑的掌病。战国时期人口增加，医学划时代进步，职业医生增多。除王室官医外，民间也出现了一批职业医生。尽管有八九百个的战国城市在不断扩大，但规模仍然很小，人口不多，加之多数人收入低，信巫不信医犹存，医生死守一地待诊，难以维持生计。故民间医生多流动于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称为行医。行医之人，自负药囊，自带针砭，诊病施治给药，倒也方便。

战国著名的民间流动医生，有俞氏、矫氏、卢氏、文挚、秦越人等。文挚是宋国（河南商丘县东南）洞明人，常到齐国（今山东大部地区，都城在临淄）给齐闵王看病。一次视病后说："非怒则王疾不可治"。征得太子同意后，就不脱鞋登床踩着闵王衣裳问病。闵王怒不与言，文挚又说些难听的话，闵王大怒，呕吐而起，病就轻了。但是闵王仍大怒不解，要将文挚开水煮死。太子与母后联合求情也不行。这个糊涂君王竟将救命的天才良医处死了。秦越人是

民间医生的杰出代表，医术高明，被尊称为扁鹊。扁鹊是齐国勃海郡鄚（今河北任丘县鄚州镇）人。成名后带着弟子流动行医。先后到过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虢国之陕（今河南陕县）、赵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为带下医（妇科医生）、周都洛阳为耳目痹医（老年病医生）、秦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为小儿医，还到过蔡（今河南上蔡市西南）、宋（今河南商丘县东南）、魏（今河南开封市西北）、鲁（今山东曲阜市）、卫（今河南濮阳市西南）诸国，足迹中原大地。扁鹊带的弟子先后有子仪、子同、子阳、子明、子豹、子容、子越、子游等8人，都成为名医。

战国后期七国称雄。各国都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城市较前繁荣。技术高明的医生，用不着奔走于城市之间就能获得较多收入，形成坐业医生。坐业医生自启药铺，既方便病人诊后取药，又能获更多利润。《荀子·法行篇》说“良医之门多病人”，反映这种药铺带医的零售药业，生意是很不错的。

医生、药铺增加使求医、购药变得容易。医学药学进步使治疗效果提高，促进了城乡人们破除迷信邪说，树立医药才能治病观念的形成。城乡人民的医药消费成为正常消费。魏国国相李悝计算普通农家费用时，将医药费用含在其中。他计算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年收粟五十石，除去田税、衣食、祠用外，尚差四百五十钱。“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7]。

3. 战国市场上的药材商品

战国市场上的药材商品，《五十二病方》提供了主要依据。《五十二病方》247种药物中，涉及蔬菜、谷物、禽兽、鱼类的是大多数，属于食物，疗效很低，不算作药材；至于像女子布、浴汁之类的物品、脏水更不能算药材，也不可能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只有那些疗效确切，被《神农本草经》收载、大宗或比较大宗的药物，才是市场上的药材商品。

《黄帝内经》讲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只载了13个处方，20种

药物。《庄子·徐无鬼篇》说乌头、桔梗、芡实、猪苓，医生们常是作为君药（主药）在使用。春秋时期的一些常用药，如胆矾、磁石、曲、杜衡等，虽未见于《五十二病方》，也必然仍在使用。

不排除市上有售而未上书的药材。但综合以上文献，可以大致确定战国市场上的常用药材商品有近 80 余种。它们是：

矿物药：丹砂、砒石、雄黄、胆矾、磁石、水银、硝石、戎盐、铁落、伏龙肝。

植物药：甘草、乌头、续断、黄芩、术、菖蒲、牛膝、芍药、芎穷、蒺藜、青蒿、兰草、冬葵子、景天、石韦、当归、茜草、防风、艾、白蔹、黄芪、葶苈、藜芦、蛇床子、柴胡、白芷、半夏、麦冬、赤小豆、生姜、干姜、薤白、芥子、山药、肉桂、辛夷、蜀椒、皂荚、吴茱萸、厚朴、芜荑、桑白皮、枸杞根（地骨皮）、枸杞、芫花、杏仁、李仁、大枣、芡实、桔梗、泽泻、连翘、鹿衔草、细辛、杜衡、独活、桂心。

动物药：鹿角、牡蛎、乌贼骨、蜂蜜。

菌类药：茯苓、猪苓、雷丸。

加工药：曲、血余炭、百草霜、阿胶。

这些药材的分布很广。东部的牡蛎、乌贼骨，南部的生姜、肉桂，西部的当归、蜀椒，北方的甘草、黄芪，中原的牛膝、芍药等等，包含了战国的全部疆土，因而药材的交流贩运也在战国各地进行。

战国市场的饮片商品，随炮制技术的产生而出现。它既反映炮制方法的多少，炮制工艺的精粗，也反映零售药业的经营水平。《五十二病方》也是最早记载药材炮制法的医方书。有的只列炮制法，有的记述了工艺过程，大大超过了洗、捣、吮咀（咬碎、咬断）的炮制起萌水平。已有炮、炙、燔、煅、熬、酒渍、酒淬、酒煮、黑豆煮、切细等十余法。《黄帝内经》记载了治半夏、血余炭两个炮制品。治半夏是半夏的处方饮片名，未记述“治”的工艺过

程，说明已为药业熟悉。战国市场上的常用药材约80余种，估计由药材加工炮制后的饮片约有100余种。这些饮片有的临方炮制，有的则须事先加工为成品，绝不可能到配方时才去点炉煮药。《五十二病方》记载的用药剂量单位，有斤、斗、合、枚、挺（根）、果（颗）、束、把、枰（小把）、齐（剂）、三指撮、三指大撮、三指撮到节、一栝（杯）、半栝等。除斤、斗、合外，余为估计量。反映战国时零售配方剂量不很准确，多为用手抓药的实际情况。

战国市场上的成药商品；是官办医院和民间医生简单的临方制剂。这是现代中成药的源头。由于生产工艺简单，工艺落后，没有包装，贮存困难，只能临方小量加工或提前几天加工。虽然成药（临方制剂）的加工量小，剂型却不单一。《五十二病方》使用的剂型有汤剂、散剂、丸剂、熨剂、软膏剂。丸剂应用最多，制法有酒制丸、油脂制丸、蜡制丸和醋制丸。《黄帝内经》13方中有汤剂、膏剂、丸剂、丹剂、药酒剂、熨剂、敷剂。除去汤剂，扣除重复，战国市场上的成药剂型有丸、散、膏、丹、熨、酒6种。

战国市售的著名成药极难查实。估计西周疗疮的“五毒之药”仍然常用。扁鹊治虢太子尸厥的“熨药”不知处方组成。《庄子·逍遥游》记载了一个成药的来源和疗效。是说宋国有个世世代代以洗絮为职业的家庭，能制造一种防止手冻裂的好药。吴国（今江苏苏州市）的一个食客向吴王推荐说，可以用百金之价买这个处方，自制留供军用。吴王同意了。当年寒冬，越国军队进攻吴国。吴军与越军水战，大败越军。此药起了很大作用。可惜不知处方为何药。普通百姓尚能如此，启肆医生和流动医生更是自制些膏、丹、丸、散，诊后售药，病人即可使用。不仅方便了病人，也使流动医生的负药重量减轻、体积缩小。

4. 李悝法经中的医药立法

各诸侯国为了能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国家政权，都在国内展开了以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为主的变法运

动。李悝（公元前 445 年～公元前 395 年），魏国（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文侯执政时的国相。是一个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率先于各国变法。他著《法经》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地主阶级法典，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基础。

医药业的发展必然有意、无意带来差错事故，医药纠纷增加，需要有一个仲裁、惩罚依据。在医药较为发达的魏国，《法经》中制定出了这方面的法律条文。

李悝《法经·五杂法》中，有“医合药不如方”的专条规定：“诸医为人合药（配制药物）、题疏（开药方）、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徒二年半。冥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亦如之”。由于药铺、药摊卖药是照医生的处方办事（如方），“卖药不如本方”则是指的药业铺户。《五杂法》还对在役的丁匠、奴婢、边防人员的医药保障做了规定：“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8]。

不管执行情况如何，李悝《法经》的这些规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它从立法角度，强调了医药工作具有法律责任和人道主义目的；国家对医药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对役底层人们患病应享用医药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比起奴隶社会有病信巫不信药、以底层人们作王公贵族陪葬品来，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其次，这一医药立法，也反映出战国药业包括医营药业和药商药业，已在城市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

但是，不能对战国时期的药业规模估计过高。因为战国时期医、巫并行，药治和针灸并重；医学理论体系处于刚刚形成之际，用药经验不足，使用品种不多；广大农村人口无钱消费医药，药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药业水平不可能很高，处于中药业的萌芽时期。

（二）秦汉时期　统一后的迅速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嬴政自称始皇帝，定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疆域控制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公元前206年，秦皇朝为农民起义所灭。秦传2代、2帝，历时仅15年。军阀刘邦夺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汉朝。汉朝初都洛阳，后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史称西汉。传10代、12帝，历时231年。公元25年，西汉政权在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没落的汉室王孙刘秀，纠集反动势力镇压起义军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传8代、14帝，历时195年。西汉疆域比秦扩大了许多，增加了河西走廊及西域的广大地区。东汉时又扩大到澜沧江以西的哀牢地区。公元220年，东汉政权由魏、蜀、吴三国割据取代。秦汉441年，国家基本处于统一，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1. 统一度量衡、货币与发展水陆交通

秦朝采取了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首先废除了西周以来的“封国建藩”制，在地方建立受朝廷控制的郡县制。初置36郡，后增至40多郡。又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还开水渠、修道路、统一车轨，大力发展水陆交通。

郡县制的建立，拆除了各国的关津城堑和堤防障碍。战国时期各国各自为政铸造货币，有布币、刀币、铜币、环钱四大体系。各种铸币形状不同、重量不同、进制不一、种类繁多，交换困难，给商业造成极大不便。秦统一规定货币为上、下币两种。黄金为上币，单位镒，重20两，作马蹄形。铜币为下币，单位半两，实际重量在8～16克之间，圆形方孔。后来圆形方孔铜钱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要流通手段。统一后的度量衡，基本以十进制：合升斗、寸尺丈以十进，百斤为石，十六两为斤，分钱两又以十

进。也成为后世的基本制度。

道路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东北通战国时的燕晋（今河北、山东一带，直到海边）。东南通吴楚（今江苏、浙江一带）。又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修新道，在今云南、贵州边远地区修“五尺道”。又筑从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北）经上郡（今陕西北部）、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至咸阳的“直道”。加上战国时就有通往蜀地的栈道，秦时陆路交通四通八达。水路交通，战国时中原有鸿沟（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南至淮阳入颍水通淮河），南有邗沟（今江苏扬州北至淮安入淮河），沟通黄河、淮河和长江水系；东有三江（松江、钱塘江、浦阳江），南有汉水等主要水道，业已构成纵横交错的水上交通网。秦时又在湘桂边境修灵渠，沟通湘、桂二江，从而沟通了长江、珠江水系，成为开发岭南的重要运输线。

汉朝又在秦朝基础上不断新修官道。官道以长安为中心，能通往各地，还开辟了两条经西域通往中亚的南北两条商道。各道沿途置驿站，便利军事和商旅。水路修治了渭水，开凿砥柱，沟通黄渭交通。海运也开始发展。汉朝还统一铸造新的“五株钱”，每枚标准重 3.25 克，大大减轻了秦币的重量。西汉的地方行政，仍实行秦代的郡县两级制。另有封赐的诸侯王国，级别与郡级相同，史称郡国制。全国有 15 郡 9 封国 1587 县。东汉实行州郡县三级和封国制并行的地方行政管理。全国划为 13 州 78 郡 27 王国。13 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凉、益、幽、并、朔方和交州。秦汉的这些措施，对包括药业在内的商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 临床医学和药物学体系初步建立

到了汉代，中医学的临床医学体系和药物学体系初步建立，医学、药学有了划时代进步。

临床医学体系初步建立，以《伤寒杂病论》问世为标志。《伤寒杂病论》由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写成。是在“博采众方”、“勤

求古训”基础上，治疗当时流行病和常见病的经验总结。这部书被后人编辑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伤寒论》针对外感热病，提出了以六经辨证为纲领的辨证论治治疗体系。《金匮要略》针对内伤杂病，形成以脏腑辨证为纲领的辨证论治治疗体系，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基础。除去重复，两书共用方 323 首，用药 180 余种。使用了汤、酒、丸、散、膏、栓等十几种剂型。丸剂中首记蜜丸剂，成为后世应用最广的成药剂型。对药物提出了 40 余种炮制要求。又奠定了中药药剂学和中药炮制学的基础。《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成为后世中医必修的两大临床医学经典。

药物学体系的初步建立，以《神农本草经》问世为标志。《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末，是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书。《本经》在总结汉代以前药学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药物性味、有毒无毒、功能、主治、配伍、采制、加工等药性理论，按上、中、下三品分类记载药物 365 种，为后世本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书中总论（名例）指出的“君臣佐使”组方原则；“有毒宜制”、“阴干曝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的采收加工、炮制原则；“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的制剂原则，对药业的生产经营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问世前，还有一部《治百病方》的医方书，是 1972 年从甘肃武威旱滩汉墓中发掘出的木质简牍，又称《武威医简》、《武威药方》，为东汉早期的墓葬品。所治之病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记有病名、症状、处方、剂量、炮制、剂型、用法、服药禁忌等内容，用药 100 余种。比战国的《五十二病方》用药成熟了很多。

至此，医疗由战国时的药物、针灸并重，发展到汉时以药物治疗为主要手段的新时期。医学、药学的进步，推动中药商业的同步发展；中药商业的发展，又为医学、药学继续进步提供物质保障。

3. 秦汉医药市场与城市药业

秦皇朝重视医药。早在春秋时期，秦国名医就享誉各国。晋景公患病向秦国求医，秦桓公派医缓给他治病。晋平公患病，又向秦国求医，秦景公派医和给他治病。战国时扁鹊到过秦国，在咸阳见人们喜欢小孩，就当了儿科医生。秦始皇为消灭反对派，用了焚书坑儒的严酷措施，但对医药书籍加以保护，对发展医药有贡献的人给予重奖。《史记》记载，巴（今重庆市东部）地有个名清的寡妇，继承祖业，开采丹砂致富。秦始皇在她逝后令筑“怀清台”纪念，给予了罕见的荣誉。刘向《列仙传》记载，有琅玡（今山东胶南县琅玡台西北）人安期卖药于东海边。说明在边远的海滨渔村有流动的卖药人。安期研制了一种成药，名神捷散。他用一钱神捷散，治愈了到泰山采药病困殆死的李少君，名声大振。秦始皇东巡时召见了安期，交谈很久，并赐他金璧数千作赏。秦始皇想永做皇帝，相信世上存在和能够制造“长生不老”药。他派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去寻找仙药。又请方士入宫，起炉鼎烧炼仙丹。结果都未能如愿，病死在东巡途中的沙丘（今河北平乡县东北）。用矿物药烧炼长生不老药起源于战国道家。经秦始皇这样的大人物提倡示范，虽未成功，但对抗衰老延年药的寻找、研制，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炼丹求长生持续了 1000 多年，促进了矿物药材的开发、应用与销售。秦皇朝只过了短暂的 15 年就宣告灭亡，留下的药业史料太少。

两汉前后历时 426 年，疆域扩大，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城市里有 30 多个商业行业，药业是其中之一。药品的市场供应已能基本满足发展了的社会需求。

临床医学体系的初步建立，使医生认识了不少的新病种，用药的经验成分下降，新的有效药物大量增加。根据《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和《治百病方》的用药情况，结合《范子计然》和战国的用药实际，大略推测汉代药业经营的常用药材比战国时期增

加了一倍半，达到202种。其中植物药148种，动物药24种，矿物药20种，加工类10种。奠定了后世常用药物的基本内容。

植物药

藻菌类：海藻、茯苓、猪苓、雷丸。

叶　类：竹叶、艾叶、苏叶、侧柏叶。

花　类：旋覆花、红花、菊花、款冬花、辛夷花、芫花。

果实类：五味子、枳实、巴豆、瓜蒌、吴茱萸、连翘、乌梅、枸杞子、山茱萸、大枣、栀子、蒺藜、皂荚、瓜蒂、诃子、橘皮、花椒、槐角、蔓荆子、苍耳子、楝实、地肤子、女贞子、麻子仁、蛇床子。

种子类：杏仁、桃仁、葶苈子、瓜蒌仁、赤小豆、王不留行、冬葵子、薏苡仁、酸枣仁、槟榔、柏子仁、芥子、芡实、菟丝子、莞蔚子、车前子、决明子。

皮　类：黄柏、杜仲、厚朴、秦皮、肉桂、梓白皮、牡丹皮、桑白皮、地骨皮、五加皮、白鲜皮、合欢皮。

茎木类：桂枝、通草、竹茹、桑寄生。

全草类：麻黄、细辛、石韦、瞿麦、茵陈蒿、肉苁蓉、败酱、青蒿、石斛、淫羊藿、萹蓄、夏枯草、紫草。

根及根茎类：防己、牛膝、木香、商陆、白芍、白头翁、地榆、远志、人参、黄芪、甘草、苦参、沙参、白芷、防风、独活、当归、柴胡、秦艽、紫草、丹参、黄芩、茅根、玄参、大戟、巴戟天、茜草、续断、桔梗、龙胆、白薇、紫菀、常山、乌头、附子、天雄、葛根、甘遂、地黄、天花粉、白术、麦冬、天冬、大黄、重楼、升麻、川芎、藁本、生姜、干姜、天麻、白及、泽泻、半夏、黄连、贯众、白前、菖蒲、知母、山药、射干、贝母、薤白。

动物药：白僵蚕、土鳖虫、桑螵蛸、斑蝥、水蛭、虻虫、海蛤壳、牡蛎、龟甲、鳖甲、鹿角、鹿茸、羚羊角、犀角、象牙、玳瑁、乌贼骨、龙骨、珍珠、牛黄、五倍子、蜂房、麝香、蜂蜡。

矿物药：砒石、雄黄、朱砂、胆矾、赭石、磁石、禹余粮、赤石脂、芒硝、火硝、硼砂、石膏、滑石、硇砂、阳起石、紫石英、硫磺、水银、钟乳石、白矾。

加工药：饴糖、蜂蜜、阿胶、鹿角胶（白胶）、淡豆豉、神曲、大豆黄卷、血余炭、百草霜、铅丹、胡粉。

汉代对城市药业的管理，除交易只能在商业区“市”内进行外，还严格规定包括药商、业医营药者在内的所有商人，必须如实申报资产，并交纳 10% 的所得税，否则罚戍边两年，没收资产。《汉书·食货志》第四下记载：“诸取众物鸟兽龟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收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褐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在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申报），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市场还要求商品按上、中、下三等出售，市场的管理官员在每季度的第二个月进行检查，平抑市场价格。“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扬物上中下之贾（价），各自用其为市平，毋枸它所”[9]。

当时的犀角“上价八千中三千下一千”，柏脂“上价七十中三十下十”，螵蛸“上价三百”，皂荚“上价一枚一钱”。其他药材，也多有质量标准。等级之间的价格相差在两倍以上。珍稀药材与一般药材价格相差悬殊，必然刺激药商在经营上注意质量提高和珍稀贵重药材。

牛黄为牛的胆结石，有良好的解毒、退热、镇静作用，为不易获得的治疗要药。西汉权臣梁冀将此列为专卖商品。但是市场上的牛黄仍然紧缺，以至皇室需用也要八方采购。《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出珍药……并货牛黄”。丹砂既作药用，又是颜料、炼丹、产生水银的原料，是最重要的矿物药材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说，大城市市场上一年需要丹砂一千斤。与染料交叉需用的红花、栀子、茜草，销售量就更为可观。买卖药材有利

可图，一些官僚也参与其中，做起药材生意来了。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在西汉末是没落王孙，手中钱已不多，就与下人朱祐合伙在长安买蜜合药，制售蜜丸。后来朱祐佐刘秀战功卓著，夺得政权，被封为偏将军、安阳候。《东观记》记载了刘秀追忆这段往事，赐予朱祐白蜜一石的史实："上在长安时，常与朱祐买蜜合药。上追念之，赐白蜜一石"[10]。

这一史实也说明汉代药市上有成药出售。外行刘秀尚能如此，药铺、尤其是医营药铺就更为普遍了。最有名的成药卖药人，莫过于居潜山（今安徽潜山县境）下石父祠的崔文子。他自制"黄散"、"赤丸"，"卖药都市（京都洛阳药市）。……后有疫气，民死者万计，长吏之文所请救。文拥朱幡系黄散以徇人门，饮散者即愈，所活者万计。后去，在蜀卖黄散。故世宝崔文赤丸、黄散，实近于神焉"。

汉代经济重心在北方黄河流域，药业也以这一带最为发达。西都长安是西汉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也是全国药材集散地之一。长安医生集中，如楼护家为世医，从小就随父出入贵戚之家。药业不仅有较多的摊铺，还有专门生产、销售外科用药的丹药铺，业主王君房因此成为巨富。最有名的卖药人是韩康。《后汉书·韩康传》记，韩康又名韩伯休，常到名山采药，在长安出售，三十年老少不欺，口不二价。一个不认识他的妇人向他买药，要求减价。韩坚持不肯。那妇人发怒地吼道：你难道是韩伯休吗？要价这么说一不二！近代不少药铺还打出"世隐韩康"的牌匾，把他视为中药商业的先驱和楷模。地处黄河中游的今河南地区，是名医张仲景的故乡，药业十分发达。东都洛阳位于中原复地，是商业大都市，药业兴旺。扁鹊曾在洛阳当过老年病医生。著名卖药人崔文子、元俗常在洛阳卖药。科学家张衡《南都赋》记南阳地区盛产百余种药材。最有名的卖药人是壶翁。《后汉书·费长房传》记载：汝南郡（今河南上蔡县）"市有卖药老翁，悬一壶于肆头"。"肆"是

出售同类商品排列成的行列，可见卖药的同业人不少。汝南郡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大郡，超过230万，所以药业较为兴旺。这位不知姓名的卖药老翁，将一个装药的葫芦高悬在摊前作为市招，十分引人注目。后来“悬壶”成了卖药、行医的标志和代名词。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人元俗，善用巴豆。一次他用药治好了河间王病，河间王竟要以女儿相嫁。元俗不从，趁夜逃走隐居于常山下。

武威郡（今甘肃武威市）地处河西走廊东段，是与西部少数民族互市的重要城市。中原、西北、西域药材也在这里交易。武威出土的《治百病方》，记有药物价格和取药人名字。如“牛膝半斤，宜五十”，两次记有“子威取”。很显然，《治百病方》不是单纯的医方书，而有药业经营的史实记录，反映武威药业已有较高水平。

西域归汉后，与内地开展药材贸易。西域商人把地产的红花、雄黄、硇砂、芦荟、补骨脂、羚羊角、牛至等药材运往内地。中原商人向西域运去大黄、肉桂、黄连、茴香、花椒等药材。

汉代蜀地名医不少，涪翁、程高、郭玉是其代表，为药业发达地区之一。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北通长安，南有五尺道经宜宾通云南昆明。药材出川多经北路栈道运往长安转销各地。全国著名的药材有附子、黄连、蜀漆、蜀椒等。西汉文学家杨雄是成都人，他在《方言》一书中记益州（今四川成都市以北一带）盛产附子，说明已是大宗商品。在江南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市），有蓟子训骑着驴子去都亭桥卖药。都亭桥可能是会稽一个小的药材市场。

南方的两广地区，西汉时置有九郡，关市通畅，与内地有药材交流。运销内地主要是犀角、象牙、玳瑁、海珠等南方药材。

汉代的零售药业，向正规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治百病方》使用了升、斤、尺、两、分、颗、枣、枚、方寸匕、五分匕、一刀圭、三指撮等12种剂量单位。称取量较战国精确。对药物的炮制要求也比战国时多而严格。仅《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规定的炮制要求有近40种。其中，净制法有去皮、去皮尖、去毛、去芦、

去核、去穰、去节、去心、去足翅；水制法有水浸、汤浸、清酒浸、苦酒浸、水洗、酒洗、暖水洗、泡、淋；切制法有㕮咀（捣成碎粒）、斩折、切、削、破、剉、劈、捣、碎、研；火制法有炒、炙、炮、烧；水火共制有蒸、煮、熬、蜜煎。有的还提出了炮制标准。如“烧灰”、“烧令黑”、“烧灰存性，勿令灰过”、“熬黑”、“熬黄”、“熬焦”、“炒去汗”、“洗去腥”、“洗去咸”等。这些炮制法对用药纯净、剂量准确和安全有效，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4．第一部药材商品学专著——《范子计然》

《范子计然》是一部记载大量药物、被《神农本草经》多次引用的文献。它的内容鲜为人知，作者及成书朝代也尚无定论。从以下三方面分析应是西汉时书。第一，书中不少药物产地是西汉时地名，如三辅、楚国。“辅”，指京城附近之地。三辅，是与京城长安紧邻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凤三地之合称，类似于京城的郊县，始置于西汉。东汉时京城在洛阳，原三辅之地不能再称为三辅。楚国，为汉高祖刘邦赐封给韩信的郡国。韩信死后又立弟、孙等为王。东汉时废。第二，西汉时商品开始按上、中、下三等出售。《范子计然》记载的86种药物中，有四种按此分等定价。第三，《范子计然》中的某些药名，战国时还未出现，为西汉时始用。如人参、柏脂、犀角等。此书既然是西汉时书，作者就不可能是春秋末期人范子和计然了。

范子又名范蠡，春秋末越国大夫。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经商。后在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定居，自称朱公。他善经营，成了大富商，德高尚，常资助贫困，在商界很有名气。后人称商业为“陶朱事业”。计然的说法较多：有说是春秋末宋国大商人，南游越国时范子还拜他为师；有说是越国大夫；有说计然就是范子；有说计然是范子所著之书的篇名。很显然，范、计二人都是成功的大商人，经营有道，被后人视为商业之圣贤、商人之典范。书名《范子计然》，用二人名，是写书人借名人效应而已。就像《神农本草经》

非神农所作一样。若计然不是人名，则书名的含义可译为《范子的经商谋略》。但观其内容，既不是谈二人的生平事绩、商业思想，也不是论范子的经商谋略。名与实不相符合。

《范子计然》的内容，据清人黄奭辑本[11]，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简述了天、地、日、月、三光、风雨、露、四时、九田等气象、地理知识，后面记录了102种商品。除去五谷、布、繒、罗、紈素、绨、锦、白素、饼、酱、玉、铅粉、墨、兔毫、狐皮等15种衣、食、美容、文化用品外，其余87种全为药材商品。占商品总数的85.3%。其中植物药65种，动物药6种，矿物药16种。1种无产地（滑石），4种产地不详（芜荑、消石、芎藭、射干），其余82种记有品名、产地。39种记有优质品的质量标准。4种（犀角、螵蛸、柏脂、皂荚）记有上中下等级及销售价。2种药材（兰、赭石）有两种商品规格。优质商品的质量标准包括产地、形状、粗细、色泽、质地、气味、采集季节等7项指标要求。

82种药材有100个产地。分布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25个郡、郡国和县，在今之12个省、直辖市。

甘肃省　4郡1县产16种，陇西6种、武都5种、天水3种、北地1种、羌道1种。

陕西省　2郡3县产47种，三辅35种、汉中9种、华阴1种、洵阳1种、霸陵1种。

山西省　2郡产9种，河东8种、上党1种。

河南省　2郡2县产11种，宏农5种、河内1种、洛阳4种、嵩高1种。

山东省　2郡产3种，齐郡2种、东海1种。

河北省　1郡产1种，魏郡。

四川省　1郡产4种，蜀郡。

重庆市　1郡产2种，巴郡。

湖北省　1郡产2种，南郡。

江西省　1郡产2种，豫章。

安徽省　1郡国产1种，六安。

江苏省　1郡国产1种，楚国。

陇　西：郡名。今甘肃临洮至兰州一带。治所在临洮。

武　都：郡名。今甘肃南部武都、文县、成县、徽县一带。治所在武都。

天　水：郡名。今甘肃通渭西南一带。治所在通渭西。

北　地：郡名。今甘肃庆阳、环县一带。治所在环县东南。

羌　道：县名。今甘肃宕昌西南一带。治所在宕昌西南。

三　辅：郡名。治所在西安。

汉　中：郡名。今陕西安康、南郑一带。治所在南郑。

华　阴：县名。今陕西华阴一带。

洵　阳：县名。今陕西洵阳北一带。

霸　陵：县名。今陕西西安东北。

河　东：郡名。今山西西南部。治所在今夏县西北。

上　党：郡名。今山西东南部。治所在今长子县西。

宏　农：郡名。今河南灵宝东北。治所在灵宝函谷关。

洛　阳：县名。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河　内：郡名。今河南西部黄河以北地区。治所在武陟西南。

嵩　高：县名。今河南登封县。县北有嵩山，亦名嵩高。

齐　郡：郡名。今山东淄博、临淄以北一带。治所在临淄。

东　海：郡名。今山东郯城至江苏邳县以东至海。治所在郯城县西南。

魏　郡：郡名。今河北临漳县一带。治所在临漳县西南。

蜀　郡：郡名。今四川成都、绵阳、平武、阆中一带。治所在成都。

巴　郡：郡名。今重庆、涪陵、万县一带。治所在重庆江北县。

南　郡：郡名。今湖北南部武汉、黄州、荆州、江陵一带。治所在江陵。

豫　章：郡名。今江西九江、南昌一带。治所在南昌。

六　安：郡国名。今安徽六安县一带。治所在六安县北六合城。

楚　国：郡国名。今江苏铜山、徐州一带。治所在铜山县。

《范子计然》所载87种药材，全无功效主治，说明不是供医生使用的本草。本书以气象地理知识为先导，药材商品突出品名、产地和优质标准，4种药材有等级价格，书名又为商界名人。很显然，《范子计然》是西汉时一本以药材商品为主的《商品学》手册，或者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供采购销售人员使用的《药材商品学》手册。它的作者，很可能是陕西的一个药材批发商人。

从药材产地分析，82种药材的100个产地中，属于黄河流域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6省，占87个；属于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6省市，占13个。说明西汉时药材主要产区和药业发达地区，在北方的黄河流域。与当时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相符合。

虽然《范子计然》不能完全反映西汉药材市场实际，甚至也不能完全反映黄河流域药材市场实际，但它反映出西汉药材市场正在形成的初期阶段水平：商品在全国流通；优质标准、道地药材、规格等级、优质优价等商品特性，已在萌芽；矿物药应用比例较大；药材商品约100种。39种有优质标准的药材中，以产地与色泽结合为标准者29种，与形状结合者1种（人参），与粗细结合者2种（秦艽、杜若），与质地结合者1种（松脂），与气味结合者1种（当归），与色泽、采收季节结合者1种（白芷），与色泽、粗细结合者1种（黄连），共36种。可以认为，这36种是西汉时的道地药材。无产地和产地不详3种药材中，1种（芜荑）以色泽、2种（滑石、芎藭）以质地作标准。36种道地药材中，有的保持至今，

如蜀郡的黄连、附子，陇西的当归、秦艽，六安的石斛，华阴的细辛，河内的牡丹，三辅的麻黄等。以色泽作为优质标准之一者共32种。大部分与今吻合。如黄连、黄芩以色黄者善，已为二者的有效成分小檗碱、黄芩苷呈黄色所证实。

《范子计然》的出现，是西汉时对药材商品知识的一次总结，开药材商品学之先河。表明我国西汉药业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因而在中国药业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范子计然》所记87种药材商品：

白　蜜，出陇西天水。

犀　角，出南郡上价八千中三千下一千。

蠮　蛸，出三辅上价三百。

虎　鱼，出东海。

松　脂，出陇西如胶者善。

柏　脂，出三辅上价七十中三十下十。

蜀　椒，出武都赤色者善。

秦　艽，出陇西天水细者善。

皂　荚，出三辅上价一枚一钱。

栗，　出三辅。

慄　枣，出汉中。

芜　荑，出□地赤心者善。（缺字地名不清）

桑，　出三辅。

大　兰，出汉中三辅，兰出河东宏农白者善。

白　芷，出齐郡以春取黄泽者善也。

杜　若，出南郡汉中大者善。

石流黄*，出汉中。

石　胆，出陇西羌道。

---

* 现称石硫磺

赤石脂，出河东色赤者善。
凝水石，出河东色泽者善。（凝水石即寒水石）
石钟乳，出武都黄白者善。
礬　石，出汉中色白者善。（礬石即信石、砒石）
禹余粮，出河东。
消　石，出陇道。（疑为陇西、羌道）
滑　石，滑者善。
礜　石，出武都。
空　青，出巴郡。
曾　青，出宏农豫章。
卢　青，出宏农豫章。
扁　青，出宏农豫章。
石　赭，出齐郡赤色者善，蜀赭出蜀郡。
青　垩，出三辅。
龙　骨，出河东。
茯　苓，出嵩高三辅。
卷　柏，出三辅。
厚　朴，出宏农。
当　归，出陇西无苦者善。
细　辛，出华阴色白者善。
续　断，出三辅。
薯　蓣，出三辅白色者善。（薯蓣即山药）
附　子，出蜀武都中白色者善。
乌　头，出三辅中白者善。
提　母，出三辅黄白者善。（提母即知母）
雷　丸，出汉中色白者善。
藜　芦，出河东黄者善。
芎　藭，生治无枯者善。（原文如此，恐有错字）

芍　药，出三辅。（芍药指白芍）
野丈人，出洛阳。（野丈人即白头翁）
人　参，出上党状如人者善。
元　参，出三辅青色者善。
沙　参，出洛阳白者善。
紫　参，出三辅赤青色者善。
茱　萸，出三辅。（茱萸指吴茱萸）
黄　连，出蜀郡黄肥者善。
防　己，出汉中洵阳。
闾　茹，出武都黄色者善。
元　华，出三辅。（元华即芫花）
黄　芩，出三辅色黄者善。
蜀　漆，出蜀郡。
防　风，出三辅白者善。
石　斛，出六安。
半　夏，出三辅白色者善。
射　干，根如安足。（黄奭注：凝状如鸢尾出安定。）
蓬　草，出三辅。
牡　丹，出汉中河内赤色者善。
紫　葳，出三辅。
败　酱，出三辅。
石龙芮，出三辅。
云　实，出三辅。
款冬花，出三辅。
桔　梗，出河东洛阳。
巴　豆，出巴郡。
莽　草，出三辅青色者善。
狼　牙，出三辅色白者善。

麻　黄，出汉中三辅。
龙　芮，出三辅色黄者善。（恐与石龙芮重复）
黄　环，出魏郡黄色者善。
石　芸，出三辅。
甘　遂，出三辅。
马　刀，出河东。（马刀即长竹蛏贝壳）
霸　薰，出霸陵。
楚　薰，出洛阳。（薰，一种香草）
楚　蘅，出楚国。（楚蘅即杜蘅）
秦　蘅，出陇西天水。（秦蘅即产秦地之杜蘅）
蒨，　根出北地赤者善。（蒨根即茜草，用根入药）
水　萍，出三辅色青者善。
术，　出三辅黄白色者善。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药业三大类商品形成

1. 长期战乱与经济重心南移

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后，各地豪强地主武装势力乘机崛起割据称雄，相互并吞，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魏国定都洛阳，蜀国定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市），吴国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三国鼎立从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废汉献帝立魏起。263年魏灭蜀国。265年，魏国权臣司马炎夺魏政权称帝，建立晋国，仍定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于280年灭吴统一中国，结束了三国60年的分裂局面。

西晋只有初期太康年间，有过15年安定繁荣。西北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北方人口增加一倍以上。其后，晋武帝的封王们互相倾轧，发生了破坏严重的“八王之乱”。农民的田租、徭役加重，大量破产沦为流民。内迁的少数民族，也受到纳税、兵役等剥削压迫，民族矛盾激化。他们与流民联合举行起义，316年西晋灭亡。

西晋传4帝，历时52年。

西晋灭亡后，起义成果为五胡贵族所占，又割据称雄建立政权。加上西晋末建立的两个政权共16个，史称五胡十六国。他们混战达130余年。439年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后又出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共5国，史称北朝。西晋灭亡后的第一年，琅玡（今山东临沂市东北）王司马睿和北方的一些大地主、大官僚逃到南方长江流域一带，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立都称帝，史称东晋。东晋势力发展后，又进行了六七年的北伐战争，想收复失地，但未成功。420年，武将刘裕废晋安帝建立宋朝，史称刘宋。东晋灭亡。东晋传11帝，历时103年。刘宋灭亡后，南方又经历了齐、梁、陈三个政权，史称南朝。南北朝始于刘宋和北魏分立的420年，终于隋之灭陈的589年，历时169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370年的分裂混战局面，给北方经济带来巨大破坏和萧条。北方少数民族南迁中原，中原人民又南迁长江流域、晋安郡（今福建福州市一带）和岭南（今广东南部一带）地区，对长江、闽江、珠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依靠长江水系的水路运输和丰富的物产资源，长江流域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地区。上游的益州（今四川成都），中游的荆州（今湖北江陵）、亳州（今安徽亳州市），下游的建康、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等，都是商业繁荣的城市。南方珠江入海口的广州，则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城市。

2. 医学药学向分科方向发展

战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瘟疫流行，疾病增加，导致名医辈出，医药著作空前增多。《隋书经籍志》记载，仅南北朝医家类书就有382部。北朝馆陶（今山东馆陶县）人李氏，少习医，后投奔南朝刘宋，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向沙门僧人学习经方，医技大振；患者有的远道而来，李便在家中开辟堂厅收容病人，死则予以

安葬，是中国私人医院之始。这一时期的临床医学，在内科、外科、儿科、传染病、针灸、急救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最著名的医学家是华佗。

本草学继《神农本草经》之后，迅速向分科方向发展，出现了多种药学专著。侧重药物应用的有北齐·徐之才《药对》、梁·王末《小儿用药本草》和梁·甘濬之《痈疽耳眼本草要钞》。侧重药图的有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晋·徐衷《南方草物状》。侧重药物采集有《入林采药法》、《太常采药及合目录》。侧重药物炮制的有刘宋·雷敩《雷公炮炙论》。侧重药物制剂有梁·陶弘景《制药总诀》、刘宋·徐叔向《本草病源合药要钞》、《本草病源合药节度》。针对药材种植有南北朝·《种植药法》。反映食疗的有多种《食经》。继承、发展《神农本草经》的综合性主流本草，有魏·吴普《吴普本草》、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丰富多彩的各类本草问世，反映药学和药业水平比两汉有了较大发展。

3. 三国药业及互市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间不长，总计 60 年。其中，曹魏(220～265)45 年，蜀汉（221～263 年）42 年，孙吴（222～280 年）58 年。但各国都想统一中国。在大力扩军备战，彼此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同时，十分注意发展经济以增强实力。加上战争对医药的直接需要，使药业得到一定发展。

魏国占领的北方，历来药业较为发达。长安和魏都洛阳，仍然是药材集散之地。“药材”这一专用名称，首先在魏国出现。药业有利可图，曹魏将作美容用的胡粉纳入官方专卖。魏文帝时的中书监刘放，对此很不赞成。他抨击说，今官方贩卖胡粉，是与老百姓争刀锥之利，应该停止。

孙吴在南方奋力开发。著名的南方药都樟树，开始形成药材集市，称为药圩。珍珠，此时还主要作装饰品用，官府也纳入专卖。在孙吴管辖的南粤之地，分为交、广二州。交州含交趾、九真、日

南三郡，在今越国的北部、中部地区；广州含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在今广东、广西一带；均产海珠。其中合浦珍珠个大质优，最为著名。从秦朝起就被列为朝廷贡品。合浦百姓多以采珠为业。来去商人以米换珠。孙吴怕老百姓把好的珍珠私卖，严禁商人采买，害得老百姓吃不饱肚子。这一严格措施，直到西晋时才有松动。官府收购上等珠 2/3，次等 1/3，劣者不要；还规定头年 10 月至次年 2 月，是非产珠之时，商人可以自由采购如旧。孙吴还利用沿海港口，开展药材的对外贸易。

在西南的蜀国，成都的商业繁荣已超过魏都洛阳。包括药材在内的巴蜀和南中（今四川南部及云、贵地区）土特产，在成都集散。丹砂、犀角、附子、黄连、大黄是重要的药材商品。

三国之间虽有战争，但也有商业联系。不打仗时，边境上设有互市，进行官方、民间贸易。打仗时也有民间交易。一般药材的相互交流，靠这两种方式进行。官方之间，也有聘使来往，互赠物产，达到交易目的。魏黄初二年（221 年），曹丕遣使孙吴，求雀头香（香附）、犀角、象牙、玳瑁等物。群臣说魏求的是珍玩之物，不礼貌，不宜给。孙权说："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皆具以与之"。后来用这些商品换了魏马两百匹。孙吴还用这些药材与蜀易货，换得蜀锦等物。

4. 晋代兴起成药业

晋代药业有较大发展。在河南颍阳（今河南许昌市），有名医范东阳业医营药。凡有疾者，无论贵贱之人，皆为治疗，赞誉很广。豫州（今河南汝南县）的李子豫，自制八毒赤丸，用它治好了刺使之弟的重疾，也名声远传。广陵已成为药业发达的城市，会稽人恭伯专程去那里买药。

战乱与疾病流行，迫切希望得到药品即时治疗，人们对成药商品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这时，出现了"成剂药"的专用名称。首先记载"成剂药"是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他在《肘后备急方》

卷8中说："众药并成剂药，常自和合，贮此之备，最先于衣食耳"。并记有金牙散、玉壶丸、三物备急丸、紫雪、度瘴散、理中散、痢药、丁肿药、末药、冈草膏等十余种成药。常自和合，仍然是医生自制自用的成品药剂，并未作为商品向社会出售。但是，葛洪在卷2中又特别指出："理中丸、四顺、厚朴诸汤，可不预合，每向秋月，常买自随[12]"。这就说明，除医生自制自用成药外，在城市里，已有专门生产、销售成药的铺户，人们在接近秋天的时候，可以随时购买。成药正式成为中药里的一类独立商品，成药业已是药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这时成药的生产经营不是常年进行，而是在接近秋天时开始。由于无法妥善解决包装、贮藏问题，为减少霉变损失，只好选择在气候较为干燥的秋天。品种和产量规模都很小。葛洪（281～341年）是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主要生活在南方。成药业兴起之地，当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四顺、厚朴诸汤"不是汤剂，而是碎成粗粒或粗粉的煮散剂，所以可以在药铺出售。

晋代大地主的田庄很多，占有很宽的农田山林。里面有成百上千的农民、工匠，为他们进行各种生产劳动，实行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有的辟有药圃种药，自制自用，建立起自己的药业农工商体系，是晋代药业的一种特殊现象。

当时社会上，还兴起一股服食"五石散"风气。五石散由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种矿物药组成。五石全为温燥之品，服后内热蕴积，炽盛如焚。须吃冷食，喝冷饮，洗冷浴，薄衣缓步，使热邪得以直折发散，故又称"寒食散"。服食之风，由好色的曹魏尚书何晏倡导，说是能开心壮阳。官僚权贵、豪门富户，跟着服食成风。由于五石药广价廉，平民男女、沙门道僧也跟着效法以为时髦。此风一直由魏晋盛行至唐代，历时五六百年。五石散并非开心壮阳之好药，长期服用，反而引起中毒发病甚至死亡。北魏皇帝拓跋硅、晋哀帝司马丕及晋初贵族裴秀，都死于

五石散。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乱不断，疾病流行，出现一股五石散服食之风，是人们对政治前途渺茫、经济被破坏、文化凋零，感到思想空虚的一种表现。

晋代药业的迅速发展，使粉碎工具药杵臼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因而有《杜预集》“药杵臼、澡盘、熨斗……皆民间急用也”的记载。

5．南北朝的官药局及药材批零市场

北朝（386～581年）的北齐，建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迤东一带），是一个短暂的政权（550～577年）。北齐之初，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官府创办“惠民药局”，向贫病者施药，是一个地方性的医药救济慈善机构。北朝最后一个政权北周（557～581年），其地北辖盛产甘草的大漠地区。郦道元《水经注·元和志》丰州条下记，“其城，周、隋间俗谓甘草城”。北周时的丰州，为今内蒙古中部杭锦旗西北沟一带。盛产的优质甘草，在丰州城集中后外运，因而甘草城之名闻名于周、隋。

南朝（420～589年）的长江下游，药业发展特别迅速。陶弘景说这里有不断来去的“蜀药及北药”。评价荆州、益州运来的当归、乌头、附子、天雄质量最好。“假令荆益不通，全用历阳（今安徽和县）当归，钱塘（今浙江杭州）三建（指乌头、附子、天雄三药材），岂得相似”。长途贩运的货运量可能很大。如齐临海（今浙江临海县）太守孔秀，罢郡归来，运干姜二千斤，献给齐武帝萧赜。齐武帝还嫌少了，不高兴。江南地区商业繁荣，使邸店业特别兴隆。邸店类似现代的货栈。供外地商人食宿、存放货物、批发销售或转运货物。经营者多为大商、官僚。他们也乘机囤积居奇，低进高出，牟取暴利。梁临川（今江西南城县）王萧宏，在京城建康有邸阁数十处。囤积的货物有药材朱砂、蜂蜜等。

各地药材相互交流，市场上出现了同种药材的多种规格。首次记录在《本草经集注》的这些商品，有30多种药材的90余种规

格，丰富了药材商品的内容，它的复杂性也开始显露出来。《本草经集注》记载这些商品规格，有两种表述法：一是直称其名，如上党人参；二是讲产地，再述性状，后作质量优次结论。初略整理如下。

朱　砂　云母砂、马齿砂、豆砂、末砂。

矾　石　马齿矾、白矾、鸡屎矾。

茯　苓　茯苓、茯神。

术　　白术、赤术。

地　黄　生地黄、干地黄（陶说：作干者有法，捣汁和蒸。实为今熟地黄）。

菖　蒲　九节菖蒲、石上菖蒲。

甘　草　抱罕草、紫甘草。

人　参　上党人参、高丽人参、百济人参。

细　辛　华阴细辛、高丽细辛、东阳细辛。

升　麻　鸡骨升麻。

当　归　黑水当归（马尾当归）、西川北部当归、历阳当归（草当归）。

黄　芩　子芩、宿芩（枯芩）

黄　耆　陇西洮阳黄耆（今甘南临洮、临潭）、黑水宕昌黄耆（今甘南舟曲、宕昌）、蚕陵白水黄耆（今川西北松潘、陕西中部白水）、蜀黄耆、赤黄耆。

芎　藭　历阳芎（马衔芎）、蜀芎。

闾　茹　高丽闾茹、草闾茹。

菊　　真菊（甘菊）、苦薏（野菊）、白菊。

竹　叶　淡竹叶、苦竹叶、甘竹叶。

附　子　附子、天雄、侧子。

苏　　紫苏、野苏。

肉苁蓉　陇西苁蓉、北地苁蓉、巴东建平苁蓉。

甘　遂　草甘遂。
槟　榔　交州小槟榔、广州大槟榔、楮槟榔、槟榔孙。
防　风　彭城防风、郁州防风、襄阳防风。
木　香　永昌木香（云南木香）、外国木香。
橘　皮　东橘皮、西江橘皮。
梅　实　乌梅、白梅、生梅子。
大　黄　西川汶山大黄、河西陇西大黄。
龙　骨　白龙骨、龙齿。
蜂　蜜　崖蜜、木蜜、土蜜。
　蜡　　蜜蜡、白蜡（蜜蜡晒百日自然白，药家皆用白蜡）
犀　角　通天犀、水犀、光犀、犀屑。
蜈　蚣　赤足蜈蚣、黄足蜈蚣。
五味子　高丽五味子、青州冀州五味子、建平五味子。

麻　黄　青州（今山东淄博东）、彭城（徐州）、荥阳（今河南荥阳）、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麻黄、蜀麻黄。

《本草经集注》十分强调，产地不同，药材质量有优次之别，为后世道地药材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陶弘景记录的地产优质药材，粗略统计约52种，是药材市场的真实状况反映，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道地药材。汇总如下。

柏　实　出太山。
　术　　出蒋山、白山、茅山。多滋膏而甘（指白术）。
泽　泻　出汉中、南郑、青州、代州。形大而长，尾尖有两歧。
薯　蓣　出南康。最大而美。
甘　草　出抱罕。赤皮，断理，看之坚实，名抱罕草。
人　参　出上党。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滋实而甘（唐注：此形似潞党参）。
石　斛　出始兴。细实，色如金（桑灰汤沃之），形似蚱蜢。

龙　胆　出吴兴。味甚苦。
桂　出广州、湛惠。形大多脂肉（指肉桂）。
杜　仲　出建平、宜都。状如厚朴，折之多白丝。
干　漆　出梁州。燥性较缓。
细　辛　出华阴、高丽（辽东）。辛烈气重。
升　麻　出益州。细削，皮青绿色，谓之鸡骨升麻。
薏苡仁　出交趾。粒最大。
肉苁蓉　出陇西。形扁广，柔润，多花而味甘。
当　归　出陇西、洮阳、黑水。多肉少枝气香。
防　风　出彭城、兰陵。实而滋润，头节坚如蚯蚓头。
秦　艽　出甘松、龙洞、蚕陵。长大黄白色。
黄　耆　出陇西、洮阳。色黄白甜美。
黄　芩　出彭城。圆者名子芩为胜。
黄　连　出东阳、新安。色黄而实。
五味子　出高丽（辽东）。多肉而酸甜。
芍　药　出白山、蒋山、茅山。白而长大（指白芍）。
芎　藭　出历阳。节大茎细，状如马衔，谓之马衔芎藭。
麻　黄　出青州、彭城、荣阳、中牟。色青而多沫。
葛　根　出南康、庐陵。多肉而少筋，甘美。
前　胡　出吴兴。
厚　朴　出建平、宜都。皮厚，肉紫色。
石　韦　出建平。叶长大而厚。
蘗　木　出邵陵。轻薄色深。（蘗木，即檗木，为今之黄柏）
木　兰　出益州。皮厚，状如厚朴，气味浓。
紫　草　出平氏阳山。
白　鲜　出蜀中。气息正。
干　姜　出临海、章安。有两三村产者作上贡品。
大　黄　出河西、陇西、西川。紫地锦色，味甚苦涩。

蜀　椒　出蜀郡北部。人家种之，皮肉厚，腹里白，气味浓。

巴　豆　出巴郡。

甘　遂　出太山。皮赤。

葶　苈　出彭城。

天　雄　出宜都良山。性力强，谓为西建。

茵　芋　出彭城。

半　夏　出青州。肉白。

防　己　出宜都、建平。大而青白色，虚软。

闾　茹　出高丽（辽东）。色黄。

恒　山　出宜都、建平。细实而黄者，呼为鸡骨恒山。（恒山即常山）

牛　黄　出梁州、益州。一子如鸡子黄大相重叠。

麝　香　出益州。形扁。

蜈　蚣　出京口。赤足。

丹　砂　出巴蜀、广州、临漳。光明莹澈。

紫石英　出太山。色重澈。

雄　黄　出氐羌中。氐羌不通时，人间时有三五两，其价如金。

石　膏　出钱塘。白澈。

陶弘景说上党人参“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肯定不准确，而像上党所产的潞党参。上党地区既产人参又产党参。党参之名虽首见于清代《本草从新》，但在南北朝时，上党的采药人，将其采挖当人参出卖，运至江南一带，陶弘景所见是此，故做了上述记述。并不能因此说上党不产人参。明代上党人参采挖已绝，故党参被开发应用，载入清代本草。

南朝的零售药业，从一首“读曲歌”中得到反映。“自从别郎后，卧宿头不举，飞龙落药店，骨出只为汝”。这首供演唱的民歌，流行于南朝长江下游一带。说是妻子思念远行的丈夫，消瘦得像药

店里的龙骨（飞龙）。民歌中使用药店、龙骨之词，说明药店开设已较普遍，龙骨是药店里的常备药物。当时药店，能根据医生处方要求进行加工炮制，经营的饮片达到200余种。经营中存在配方缺味，短少称量和销售伪药现象。陶宏景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说：药店“顺方切须，不能多备，诸族故往往遗漏。今之所存，二百种许耳”。陶弘景对此还不满意，觉得太少。其实，他的《本草经集注》才载药730种。除去那些水火、泥土、果蔬、谷食、虫兽、有名未用等类中，根本不用或很少使用者，其余常用或较常用药物，只有二三百种。药店能备200余种，能做到顺方切须，已是非常高的水平了。至于零售药业中存在一些欺骗行为，实属难免的支流。

6. 医药分工明朗化

如果说南北朝以前的药铺、药摊，由医生兼营，医药结合为一体。那么，在南北朝时期，十分明显地出现了由药商独立经营的药业铺户，医业和药业开始有了明显分工。这种医业、药业分工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进步。它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医药进步的必然结果。

自东汉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的临床治疗体系以来，三国华佗用麻沸散进行外科手术，西晋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王叔和撰《脉经》，葛洪撰《肘后备急方》，南北朝龚庆宣撰外科《刘涓子鬼遗方》，标志着医学逐渐向更深入的分科方向发展。药业的技术性和复杂性，也比南北朝以前增强了许多。

首先，用药种数比汉代增加了一倍，而且产地、规格增多，再加上伪劣品，药材经营者必须掌握更多的商品来源知识和药材鉴别知识。如甘草，陶弘景说：皮赤，断理，看之坚实者是抱罕（今甘肃临夏市）草，最佳；有如鲤鱼肠者，被刀破，不复好；又有紫甘草，细而实，乏时可用。又说牛黄作假者不少，惟以磨爪甲染黄舐拭不脱者是真。

饮片的加工炮制，方法增多，品种增加，工艺日趋复杂。《雷公炮炙论》是第一部炮制专书，标志中药炮制学已发展为一门中药分支学科。书中涉及的主要炮制方法有蒸、煮、炒、焙、炙、煅、浸、飞等十几种。蒸法又分清蒸、酒浸蒸、药汁蒸；煮法又分醋煮、酒煮、盐水煮、甘草水煮、生姜汁煮、乌豆汁煮、浆水（小米炊熟，投冷水中浸五六日，味酸，生白花，色类似豆浆）煮；炙法分蜜炙、酥蜜炙、酥炙、猪脂炙、羊脂炙、姜汁炙、药汁涂炙；炒法分清炒、麸炒、米炒、酒炒、黄精汁炒；浸法分水浸、盐水浸、蜜水浸、米泔水浸、乌豆水浸、浆水浸、牛乳浸、酒浸、醋浸、药汁浸。所用药汁，有甘草汁、生姜汁、黄精汁、枸杞汁、兰汁、百部汁等十几种。对辅料制法、火候标准亦有明确规定。如蜜炙不用生蜜用炼蜜，并指出“凡炼蜜，一斤只得十二两半……，若火少火过，并不得用”。具体药物的炮制工艺，一般都比较复杂，甚至十分繁琐。举较简单的干地黄、半夏为例。干地黄：采生地黄，去白皮，瓷锅上柳木甑蒸之，摊令气歇，拌酒再蒸，又出令干。勿令犯铜铁器。令人肾消（伤肾），并白髭发。半夏：若修事半夏四两，用捣了白芥子末二两，头醋六两，二味搅令浊，将半夏于中，洗三遍用之。半夏上有涎，若洗不净，令人气逆，肝气怒满。

药物制剂，理论上有发展。《神农本草经》指出：“药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本草经集注》又指出：“疾有宜服丸者，宜服散者，宜服汤者，宜服酒者，宜服膏煎者，亦兼参用，察病之源，以为其制耳”。[13]完善了剂型选择的两大依据：药性和病情。剂型使用上，三国以前有丸、散、膏、丹、酒、栓、洗、灌肠等剂型，到两晋《肘后备急方》中，又增加了铅硬膏（膏药）、干硬膏、蜡丸、浓缩丸、锭、灸等剂型。制剂工艺，也更严格。首先要求剂量准确，古方剂量先要换算为今之剂量。投料药物先切细，于药力同出。粉碎前晒干，合捣、各捣者要分开进行。粉

末过筛，丸药用重密绢、草药用轻疏绢、石药用细绢筛。过筛后混合在臼中杵研数百次，使色泽一致。煎汤药，用微火令小沸；加水量依方药多少而论，大约二十二两药用水一斗，煮取四升。渍药酒，皆切细，生绢袋装，入酒后密封。合膏，用苦酒浸一昼夜后滤汁；煎煮，煮提三次，令药味得出；膏中有雄黄、朱砂等矿物药时，先捣极细，再投入膏中疾搅，凝后勿使沉积在下。丸散中用胶类药物，先炙使通体起泡，才能捣细入药。丸散中有巴豆、杏仁等富含油脂的药物，先熬黄后捣如膏，再与药粉混合捣研均匀等等。

医学、药学的进步，要求医生、药商各有专功才能适应发展需要。同时，药业的发展，使各地药材能够汇集一处，药店网点增加配方变得容易，医生必须营药已无必要。于是出现了陶弘景所说的，“众医睹不识药，惟听市人”的“医人”、“药家”分业局面。这种医、药分业是自发的、非强制性的，因而是局部的、不彻底的，集医药一体的药业仍然不少；但它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后世专业医生、药商就逐渐增多起来。

（四）隋唐五代　全国药业大发展

公元 581 年，外戚杨坚废北周建立隋朝。杨坚称隋文帝。仍以长安为京都。589 年，隋文帝灭南朝陈，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文帝在位 23 年后为太子杨广害。杨广称隋炀帝。杨广荒淫残暴，穷兵黩武，致使各地爆发农民起义。618 年，贵族李渊起兵占领长安建立唐朝。隋传 2 帝，仅存 37 年。唐朝初期、中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经济发展，国力雄厚，成为亚洲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天宝十四年（755 年），爆发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经济受到破坏，中央政权削弱，藩镇割据，人民痛苦，又引发农民起义。880 年，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后由于起义军叛徒朱温出卖，大齐被唐僖宗镇压失败。907 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唐传 21 帝，历时 289

年。唐灭后，北方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历时 53 年（907～960 年）。南方也先后出现吴、吴越、南汉、楚、前蜀、闽、荆南、后蜀、南唐九国，加上割据山西的北汉，史称十国；历时 77 年（902～979 年）。五代十国均为短暂政权，实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960 年由北宋取代。

1. 经济繁荣与全国特产物资大博览

隋朝虽只有 37 年，但初期采取了一些恢复发展经济的措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中后期又营造东都洛阳，有一百多个居住区和东、南、北三个大市场，人口超过 100 万，商业极其繁华。又开南北大运河，沟通黄河、淮河和长江。水路运输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今北京市），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北），有利于经济发展。地方行政，隋初划州、郡、县三级，置 201 州、508 郡、1124 县，后为州县二级，又改州称郡，杨广时置 190 郡 1255 县。

唐代历时近 3 个世纪，疆域广阔。“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南尽林州（今越南中南部），北接薛延陀（今蒙古杭爱山东支）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二十八里”。唐太宗时，全国划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 10 道，置 358 州 1551 县。唐玄宗时，又增京畿道、都畿道、黔中道，并将山南道改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江南道亦分为东、西两道，共 15 道。还将部分州改称为府，其余州改称郡，后又还郡为州。州、府、郡下辖县，地方行政划为三级。唐朝积极发展水陆交通。除维修原有的五大官道外，还加修各州府内道路，完善运河，使漕船（官方的运输船）能直达长安。商旅设施进一步改善，陆路 30 里、水路 50 里设一驿站，全国有陆路驿站 1297 所，水路驿站 260 所，建立了全国水陆交通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人口迅速增长，唐初为 2500 万，盛唐时达到 8000 万，促进了商业繁荣。

唐代商业以京城长安为中心，迅速向东南地区发展。扬州（今

江苏扬州市）、吴郡（今江苏苏州市）、毗陵（今江苏常州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升州（今江苏南京市）、余杭（今浙江杭州市）、会稽（今浙江绍兴市）、明州（今浙江宁波市）、东阳（今山东益都）、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等，都是著名的商业城市。成都、广州是西南和岭南的贸易中心。商铺仍集中在商业区“市”内，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日中击鼓二百下开市，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市。凡是州县以上治所均置有市。全国的都市、府市、州市、县市共计2600个以上。中唐以后，坊市制开始突破。店铺有在坊中或坊市之间开设，夜市也有出现。农村除有定期集市外，还出现了常年存在的草市。集市和草市，是农副产品的初级市场。

经济繁荣，各地有自己的著名产品。天宝二年（743年），陕郡（今河南陕县）太守韦坚，引浐水到长安城东望春楼下，积成广运潭，是漕运（粮盐等基本物资的官方运输）的终点。借唐玄宗登望春楼观新潭之机，韦坚精心安排了一次全国特产物资大博览。他汇聚江、淮漕船数百艘，使一官员坐第一船作先锋，口唱“得宝歌”，船上有盛装美女100人和歌，鼓笛音乐齐奏，来到望春楼下。后面为各郡漕船，皆标郡名，首尾相接长达数里。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市）船载有玳瑁、珍珠、象牙、沉香；宣城郡（治今安徽宣城）载有空青石、黄连；始安郡（治今广西桂林市）载有冉蛇胆……。韦坚还向唐玄宗献各郡轻货，又上百牙盘食。府县进奏，教坊出乐迭奏。观者人山人海。唐玄宗对水运交通改善和韦坚如此殷勤，自然各有奖赏[14]。

2. 国家医著及国家本草

隋唐五代，朝廷对医药十分重视，组织编撰了几部重大的医药专著，推动了医药业发展。

隋大业六年（610年），朝廷令太医院博士巢元方，主持编撰《诸病源候论》50卷。为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

唐代国内药材产地扩大，品种增加，外来药物也日益增多，药

材市场变得十分复杂。原来的本草已不适用。朝廷“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命苏敬等22名医官，重新编修，取名《新修本草》，简称《唐本草》。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新修本草》正式颁行。被誉为中国和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本书有目录1卷，本草20卷，药图25卷，图经7卷，共53卷。载药844种。比《本草经集注》增加114种。其中有安息香、龙脑香、胡椒、诃黎勒、底野迦（鸦片制品）等外来药物。《新修本草》卷帙浩繁，不易传写。五代后蜀国君孟昶，命翰林学士韩保升等，重新删订注释，颁行了《蜀重广英公本草》，简称《蜀本草》，实为后蜀国的简本药典。《蜀本草》新增药物14种。

唐代重要的个人医药著作，有永徽三年（652年）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永淳元年（682年）的《千金翼方》，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天宝十一年（752年）王焘的《外台秘要》。五代的《海药本草》，为住唐蕃商后裔李珣所撰，载药124种，大多数产于国外和中国南方，是一部反映唐朝至五代进口药材专著，具有重要的药业史价值。

3. 全国的优质药材及土贡药材

在商业繁荣、医学进步的推动下，药材商品来源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各地。连皇室的太医署用药，也由尚药局从全国采购。“凡药八百五十种，盖因方剂中有应取鲜植者，故别种以贮用，其他则仍从所出州土采办，贮之右药藏库”。原来，朝廷在长安辟300亩地的药园，是供太医署即时获取鲜药之用。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1：“药出州土”中记载，全国有519种优质药材，分产于13道133州；“其余州土皆有不堪进御，故不繁录耳”。这是唐代药业的一份珍贵史料。全录于后。

关内道

雍州（治今陕西西安市西北）2种：柏子仁、茯苓

华州（治今陕西华县）45种：覆盆子、杜衡、茵芋、木防已、

黄精、白术、拍白皮、茯苓、茯神、天门冬、薯蓣、王不留行、款冬花、牛膝、细辛、鳖甲、丹参、鬼臼、白芷、白蔹、狼牙、水蛭、松花、鳖头、桑螵蛸、松子、松萝、兔肝、远志、泽泻、五味子、菝葜、桔梗、玄参、沙参、续断、山茱萸、蕤藤、白薇、通草、小草、石南、石苇、龟头、麦门冬

同州（治今陕西大荔）7种：寒水石、斑猫、麻黄、蜚虫、麻黄根、芜荑、蒲黄

歧州（治今陕西层山）8种：鬼督邮、槜鸡、麝骨、麝髓、及已、藜芦、秦艽、甘草

宁州（治今甘肃宁县）5种：菴茼子、芜青、萹蓄、荆子、蝘虫

鄜州（治今陕西富县）4种：芍药、茼茹、黄芩、秦艽

原州（治今宁夏固县）5种：兽狼牙、苁蓉、黄芪、枫柳皮、白药

延州（治今陕西安塞西）1种：芜荑

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4种：泽泻、防风、秦艽、黄芩

零州（治今湖南零陵县）4种：代赭、野猪黄、苁蓉、狟脂

盐州（治今甘肃华池北）1种：青盐

河南道

洛州（治今河南洛阳市）3种：秦艽、黄鱼胆、黄石脂

谷州（治今湖北谷城）2种：半夏、桔梗

郑州（治今河南郑州市）1种：秦椒

陕州（治今河南陕县）2种：栝蒌、柏子仁

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县）2种：鹿角、鹿茸

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市）1种：鹿茸

虢州（治今河南灵宝）6种：茯苓、茯神、桑上寄生、细辛、栝蒌、白石英

豫州（治今河南上蔡县）2种：吴茱萸、鹿茸

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市）3种：阿胶、荣婆药、防风

莱州（治今山东掖县）9种：牡蛎、茼茹、海藻、马刀、七孔决明、文蛤、牛黄、海蛤、乌贼鱼

兖州（治今山东兖州西）6种：防风、羊石、仙灵牌、云母、紫石英、桃花石

密州（治今山东诸城）2种：海蛤、牛黄

泗州（治今安徽盱眙北）2种：麋脂、麋角

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1种：桑上寄生

淄州（治今山东淄博市西南）1种：防风

沂州（治今山东临沂）1种：紫石英

河东道

蒲州（治今山西永济）7种：龙骨、紫参、蒲黄、五味子、石胆、龙骨、龙齿

绛州（治今山西新绛）1种：防风

隰州（治今山西隰县）2种：当归、大黄

汾州（治今山西汾阳）2种：石龙芮、石膏

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市）4种：赤石脂、不灰木、人参、白石脂

泽州（治今山西晋城）4种：人参、禹余粮、防风、白石英

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7种：白菀、鬼督邮、白龙骨、柏子仁、矾石、礬石、甘草

晋州（治今山西临汾）2种：白垩、紫参

代州（治今山西代县）1种：柏子仁

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西南）1种：松子

慈州（治今山西吉县）1种：白石脂

河北道

怀州（治今河南沁阳）1种：牛膝

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2种：知母、磁石

箕州（治今山西辽县）1 种：人参

沧州（治今河北沧县东）1 种：藿菌

幽州（治今北京市）3 种：人参、知母、蛇胆

檀州（治今北京市密云县）1 种：人参

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市）1 种：野猪黄

平州（治今河北卢龙）1 种：野猪黄

山南西道

梁州（治今陕西汉中市）8 种：小檗、芒硝、理石、皂荚、苏子、狙脂、防己、野猪黄

洋州（治今陕西洋县）2 种：野猪黄、狙脂

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1 种：鹿茸

始州（后改称剑州，今四川剑阁）2 种：重台、巴戟天

通州（治今四川达县）1 种：药子

渠州（治今四川渠县）1 种：卖子木

商州（治今陕西商县）16 种：香零皮、厚朴、熊胆、龙胆、枫香脂、菖蒲、枫香木、秦椒、辛夷、恒山、獭肝、熊、杜仲、莽草、枳实、芍药

金州（治今陕西安康）8 种：獭肝、枳茹、莽草、蜀漆、獭肉、枳实、枳刺、恒山

山南东道

邓州（治今河南邓县）6 种：夜干、甘菊花、蜥蜴、蜈蚣、栀子花、牡荆子

均州（治今湖北均县）1 种：萎蕤

荆州（治今湖北江陵）1 种：橘皮

襄州（治今湖北襄樊）17 种：石龙芮、蓝实、蜀水花、茗草、雷丸、鲮鲤甲、乌梅、牵牛子、乾白、鸬鹚头、橙叶、栀子花、蜥蜴、蜈蚣、孔公蘗、败酱、贝母

夔州（治今奉节）1 种：橘皮

硖州（治今湖北宜昌）1种：杜仲

房州（治今湖北房县）2种：野猪黄、狟脂

唐州（治今河南唐县）1种：鹿茸

淮南道

扬州（治今江苏扬州）4种：白芷、鹿脂、蛇床子、鹿角

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光州（治今河南潢川）、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西北）、黄州（治今湖北黄冈）、舒州（治今安徽潜山）1种：石斛

申州（治今河南信阳市南）1种：白及

江南东道

润州（治今江苏镇江市）5种：蹶蹋、贝母、卷柏、鬼臼、半夏

越州（治今浙江绍兴）2种：榧子、刘寄奴

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睦州（治今浙江建德）、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建州（治今福建建瓯）1种：黄连

泉州（治今福建泉州市）1种：干姜

江南西道

宣州（治今安徽宣城）2种：半夏、黄连

饶州（治今江西波阳）1种：黄连

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市）1种：陟釐

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西南）1种：石斛

岳州（治今湖南岳阳）4种：杉木、蝉蜕、楠木、鳖甲

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市）1种：石斛

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市）1种：牛黄

永州（治今湖南零陵）1种：石燕

郴州（治今湖南郴县）1种：钩樟根

辰州（治今湖南沅陵）1种：辰砂

陇右道

秦州（治今甘肃秦安北）7种：防葵、芎藭、狼毒、鹿角、兽狼牙、鹿茸、蘼芜

成州（治今甘肃礼县）2种：苁蓉、鹿角胶

武州（治今宁夏同心附近）3种：石胆、雄黄、雌黄

廓州（治今青海化隆西）1种：大黄

宕州（治今甘肃宕昌西）3种：藁本、独活、当归

河西道

凉州（治今甘肃武威）3种：大黄、白附子、鹿茸

甘州（治今甘肃张掖）1种：椒根

肃州（治今甘肃酒泉）2种：肉苁蓉、百脉根

伊州（治今新疆哈密）2种：伏羌、葵子

瓜州（治今甘肃敦煌西）1种：甘草

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附近）1种：葡萄

沙州（治今甘肃敦西）1种：石膏

剑南道

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14种：苧根、枇杷叶、黄环、郁金、姜黄、木兰、沙糖、蜀漆、百两金、薏苡、常山、干姜、百部、火草

眉州（治今四川眉山）1种：巴豆

绵州（治今四川绵阳）7种：天雄、乌头、附子、乌啄、侧子、甘皮、巴戟天

资州（治今四川资中）1种：折伤木

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市）2种：巴豆、紫葛

邛州（治今四川邛崃）1种：卖木子

泸州（治今四川泸州市）1种：蒟酱

茂州（治今四川茂汶）9种：升麻、羌活、金牙、芒硝、马齿矾、大黄、雄黄、矾石、马牙硝

嶲州（治今四川西昌）1种：高良姜

松州（治今四川松潘）、当州（治今四川松潘西南）1种：当归

扶州（治今甘肃文县西南）1种：芎藭

龙州（治今四川平武）6种：侧子、巴戟天、天雄、乌头、乌啄、附子

柘州（治今四川丹巴北）1种：黄连

岭南道

广州（治今广州市）5种：石斛、白藤花、丁根、决明子、甘椒根

韶州（治今广东韶关市）3种：石斛、牡桂、钟乳

贺州（治今广西贺县）、梧州（治今广西梧州市）、象州（治今广西柳州市西南）1种：蚺蛇胆

春州（治今广东阳春）、封州（治今广东封川）、泷州（治今广东新兴西）1种：石斛

恩州（治今广东恩平北）1种：蚺蛇胆

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2种：滑石、蚺蛇胆

柳州（治今广西柳州市）2种：桂心、钩樟根

融州（治今广西融安南）1种：桂心

潘州（治今广东茂名市）1种：蚺蛇胆

交州（治今越南河内市）4种：檀根、三百两银、龙眼、木草蓝子

峰州（治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1种：豆蔻

《新唐书》地理志以太宗十道区划，记载了各地向朝廷的土贡清单，全为优质的土特产和手工业品，涉及大量药材及部分以药材为原料的洗涤剂和化妆品。如邠州的澡豆，相州、卫州、澶州的胡粉，兴州府的燕脂等。这也是唐代药业的一份珍贵史料[15]，录之于后：

关内道

华州：茯苓、茯神、细辛
同州：麝、凝水石
商州：麝香
凤翔府：榛实、
邠州：澡豆、白蜜、地胆
宁州：芫青、亭长庵茴、假苏
庆州：麝、蜡
丹州：麝
延州：麝、蜡
灵州：红蓝、甘草、花苁蓉、代赭、白胶、麝
会州：鹿舌、鹿尾
盐州：山木瓜
麟州：鹿角
胜州：鹿角、芍药、徐长卿

河南道

河南府：枸杞、黄精、美果华、酸枣仁
陕州：栝蒌、柏实
虢州：麝、地骨皮
滑州：酸枣仁
蔡州：龟甲
徐州：紫石
濠州：云母
郓州：防风
齐州：防风、滑石、云母
曹州：大蛇、蓦虎
青州：枣、红蓝、紫草
淄州：防风
登州：文蛤、牛黄

莱州：文蛤、牛黄
兖州：云母、防风、紫石
沂州：紫石、钟乳
密州：海蛤、牛黄

河东道

河中府：龙骨、枣
绛州：防风
慈州：白蜜
隰州：蜜
太原府：柏子仁、甘草、人参、矾石
汾州：石膏、硝石
辽州：人参、蜡
岚州：麝香
石州：蜜、芜荑
忻州：麝香、豹尾
代州：蜜、麝香、豹尾
朔州：甘草、豹尾
蔚州：松实、豹尾
潞州：人参、石蜜
泽州：人参、石英

河北道

怀州：枳壳、牛膝
魏州：紫草
相州：知母、胡粉
卫州：胡粉
澶州：胡粉
惠州：磁石
幽州：人参

平州：人参、蔓荆实
妫州：麝香
檀州：人参、麝香
蓟州：白胶
营州：人参、麝香、豹尾

山南道

江陵府：栀子、贝母、覆盆、乌梅、石龙芮
峡州：芒硝、五加、杜若、葛
归州：蜜、蜡、葛
夔州：蜜、蜡
澧州：犀角、恒山、蜀漆
朗州：犀角、葛
万州：药子
襄州：姜
随州：覆盆、葛
均州：麝香
房州：蜡、苍矾、麝香、钟乳、雷丸、石膏
金州：白胶香、麝香、杜仲、雷丸、枳壳、枳实、黄檗
兴元府：红蓝、燕脂
洋州：白胶香、麝香、蜡
利州：天门冬、芎藭、麝香
凤州：麝香
兴州：丹砂、蜜
成州：麝香、鹿茸、防葵、狼毒
文州：麝香、白蜜
扶州：麝香、当归、芎藭
集州：药子
通州：蜜、蜡、麝香、枫香、白药石

开州：茉苜实（车前子）

渠州：药实（贝母）

陇右道

秦州：芎藭

河州：麝香

滑州：麝香、秦艽

鄯州：挼犀角

兰州：麝香

阶州：麝香、羚羊角

洮州：甘草、麝香

岷州：甘草

廓州：大黄、戎盐、麝香

叠州：麝香

宕州：麝香

凉州：芎藭

沙州：黄矾、石膏

瓜州：黄矾、绛矾、胡同律

甘州：麝香、枸杞实叶

肃州：苁蓉、百脉根

北庭大都护府：阿魏

淮南道

扬州：空青、兔丝、栝蒌粉

寿州：石斛

庐州：石斛

舒州：石斛、蜡

光州：石斛

蕲州：白花蛇、乌蛇脯

黄州：连翘、松罗、蝼虫

申州：蝘虫

江南道

常州：薯蓣

苏州：石脂

湖州：木瓜

杭州：木瓜、干姜、牛膝

睦州：白石英、银花

越州：丹砂、石蜜、葛粉

明州：薯蓣、附子

处州：黄连

婺州：黄连、葛粉

台州：干姜、甲香

福州：海蛤、橄榄

漳州：甲香

宣州：薯蓣、黄连、碌青

歙州：黄连

江州：石斛

岳州：鳖甲

信州：葛粉

潭州：木瓜、葛

永州：零陵香、石蜜、石燕

道州：零陵香、犀角

邵州：犀角

黔州：犀角、光明丹砂、蜡

辰州：光明丹砂、犀角、黄连

锦州：光明丹砂、犀角

施州：蜡、黄连、药实

叙州：犀角

奖州：犀角、蜡
夷州：犀角
溪州：丹砂、犀角
溱州：丹砂

剑南道

成都府：梅煎
蜀州：红蓝
汉州：红蓝
嘉州：麝香
眉州：石蜜、葛粉
嶲州：麝香
雅州：石菖蒲
黎州：升麻、椒、麝香、牛黄
茂州：丹砂、麝香、羌活、当归
翼州：麝香、白蜜
维州：麝香、羌活、当归
戎州：荔枝煎
姚州：麝香
松州：朴硝、麝香、当归、羌活
当州：麝香、当归、羌活
悉州：麝香、当归
静州：麝香、当归、羌活
柘州：麝香、当归、羌活
恭州：麝香、当归、羌活、升麻
保州：麝香
真州：麝香、大黄
梓州：橘皮
遂州：天门冬

剑州：葛粉
合州：牡丹、药实
龙州：羚羊角、葛粉、厚朴、附子、天雄、侧子、乌头
普安州：天门冬煎
渝州：药实
陵州：续随、苦药
昌州：麝香

岭南道

广州：龟皮、鳖甲、蚺蛇胆、石斛、沉香、甲香、詹糖香
韶州：钟乳、石斛
循州：蚺蛇胆
潮州：甲香、蚺蛇胆、水马
泷州：石斛
封州：石斛
春州：钟乳、石斛
勤州：石斛
高州：蚺蛇胆
崖州：珠、玳瑁、高良姜
钦州：高良姜
梧州：白石英
连州：钟乳、水银、丹砂、白蜡
柳州：蚺蛇胆
融州：桂心
容州：丹砂、水银
白州：珠
安南都护府：槟榔、蚺蛇胆
陆州：玳瑁、龟皮、甲香
峰州：蚺蛇胆、豆蔻

雕州：象齿、犀角、沉香

福禄州：白蜡、紫矿

计180州9府，土贡药材及其加工品200余种。除去重复约130余种，可视为唐代的道地药材及优质保健美容品。

孙思邈和《新唐书》收载的地产优质药材，不可能万无一失。因为国家太大，各地优质药材也处在不断发现和发展之中，如永州（今湖南零陵县）《新唐书》记贡有零陵香、石蜜、石燕三种，“药出州土”中只有石燕一种。晚唐文学家柳宗元，在被贬到永州任刺使时，记当地有一种“黑质而白章”的异蛇，年年被朝廷征购。这种毒性很强的蛇，“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人（抵税）。永州之人争奔走焉”。这种异蛇名大白花蛇，即著名的祛风、止痉药蕲蛇。有一个姓蒋的人专捕此蛇，已三代人之久。

4．定期药市与城乡药业

各地优质药材增加，使全国市场进一步扩大。药商们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同时也增加了采购品种的多头运输。他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时间，大家汇聚一起，相互交易各地药材，提高经营效益。中唐时期，四川梓州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定期药市。唐末传到成都。五代时成都药市已有较大规模。药市出现对药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本书后有专论。

唐代的城市药业，较前有发展。长安在西汉时人口约30万，盛唐时达到100万[16]，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城里有东、西两大市场。大小药业和流动卖药人都集中在西市的“卖药坊”区域。最有名的药家要算宋清。他经营的药质量好，职业道德高尚，受到柳宗元的高度赞扬，为他写了《宋清传》[17]。“宋清，长安西部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鬻（见效），咸誉清。疾病疮疡者，亦皆乐就清求药，冀速已，清皆乐于响应。……清居药四十年”。宋清高尚的职业道

德将在另章叙述。其经营范围可以看出，有收购，有加工，有销售；销售中有针对“疾病疮疡者”的零售，也有针对“长安医工”的批发。长安的其他药铺也不少。《太平广记》卷 39 记，“唐宰相刘晏……游长安，遂至一药铺”。开元年间（713～741 年），甚至有专售引子药致富的药铺。“引子”是处方中起次要作用或引经作用的药物，多为鲜药和饮料、食品，如鲜姜、鲜葱头、鲜芦根、红糖、酒等。这些引子一般由病家自找。经营引子药能致富，说明药铺确实不少，生意兴隆。京城的大市场，也吸引了来自外地的流动卖药人。《太平广记》卷 37 记，“有卖药翁，莫知其姓名。……常提一大葫芦卖药。后于长安卖药，方买药者多”。卷 41，“有王老者，常于西京卖药，累世见之”。唐代十分开放，外商来唐做生意者不少。阿拉伯商人在中国统称为胡商，有不少人在长安卖药。唐人牛肃《纪闻》载：说有一个叫段子的人，天宝五年（746 年），路过长安，住在旅店里。店里住着一个卖药的胡商，每天驾驴载药数十斤到市场上去卖药。天天都有人到旅店向他求购难以买到的药物。可见这个胡商经营的品种不少。

扬州（广陵）位于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点，是国内外著名商业大城，也是药材的集散地。僧人皎然买药送杨山人诗里，有“扬州喧喧卖药市”的诗句，说明药市繁荣，买卖兴隆。《太平广记》里，有外地人到扬州采购药材，请人帮助运输的事：“唐贞元初（785 年），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尝遇一道士于市买药，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独负者，当倍酬其值。俊乃请行，至六合（今江苏六合县）约酬一千文，至彼取资。俊乃归告其妻而后从之”。道士购药百余斤，量不算小。药商采购，恐怕要超过此数很多。经营批发的药铺，当时已称为药行。扬州不仅名医多，大的佛教寺庙也置慈善性的医疗机构看病施药。著名的高僧鉴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练就了过硬的医术和药材鉴别本领。在扬州卖药的游贩、胡商也不少。彭城人刘商，“入广陵，于城街逢

一道士，方卖药，聚众极多”。道士“出一小药囊赠商，……乃开囊视，重纸裹一葫芦子，得九粒药，如麻粟”。原来道士是用葫芦子装微丸。

扬州西南的建康（今南京），药业亦较发达。一个叫杜鲁宾的药商，“以卖药为事。尝有客自称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人，恒来市药。鲁宾善待之。一日复至，市药甚多。曰：吾欠君药钱多矣，今更从君求此。吾将还西。……杜许之”。显然，杜鲁宾开的是大药铺，资金雄厚，外地老顾客可以长期赊账购药。扬州东南的延陵（今江苏武进县），有句容茅山人陈生去那里买药。因太重，到佣作坊请人挑药运回茅山。由于运费给得太低，佣工们都不答应。

西南商业大城成都，有东、西、北三个大市。唐末五代时，除有繁荣的定期药市外，城中药肆也很多。东市为药业区，有“卖生药”的黄姓药铺。卖生药即专卖药材，说明已有了经营分工。成都的流动卖药人也很多。“唐则天末年（705年），益州有一父老，携一药壶于城中卖药”。“前蜀（907～925年）……市内有一人弄刀枪卖药”。有个叫黄万祜的人，“每三二十年一出城都卖药”，大概是医高药良，蜀主王建还请他进宫叙谈。

南方的广州，是商业大城和外贸门户。南北药材和进口药材在这里集散。全国其他城市药业，亦有相应发展。如豫章人沈应善，精于用药和饮食疗法。他购贮药物，在居处筑一舍，名“来安堂”，诸药饮食，无不俱备。药铺取店名并经营药膳食品，沈应善可算最早的人。在光州（今河南潢州），有仆仆先生，30余年以卖药为业。

与城市商业不同，农村以集市和草市为流通市场。集市数日一聚，草市则是常年的固定市场。草市多在交通要道或城市近郊，有包括药铺在内的日用品商店。很多草市后来发展成为小城镇。川蜀的青城山（今四川都江堰市西南）草市即有药肆。《太平广记》卷31载：“唐天宝（742～755年）中，益州（今成都）有药肆；青城

山草市有药肆。……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并无此人，唯草市药肆云：常有二人来买（药）”。集市与草市，是农村药材交易的初级市场。

唐代的流动卖药人，足迹之广，令人惊叹。有个叫殷天祥的人“游行天下”，曾于泾州（今甘肃泾川）卖药，后又在浙西（今浙江西部）卖药，又在江西卖药十余年，后又入蜀卖药。这个卖药人可能是一个未成家的单身汉，以闯荡天下为乐。

在卖药人中，有的加工单一药材出售。如唐大中（847～859年）年间，华山下有一布襆，专售茯苓粉、片。可能是最早的饮片制售人。

5. 吐鲁番与内地的药材贸易

隋唐五代，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地药材贸易有较大发展。《新唐书》土贡清单，孙思邈“药出州土”，都表明不少药物来自边疆及民族聚居地。有人统计，仅来自西域（今新疆）的药材，就有114种载入《新修本草》。内地与民族地区药材交易中，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最为频繁。高昌，汉时为车师国治，唐时置交河郡交河县，曾建安西都护府于此，是内地进入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政府设有官市开展贸易。内地药材、西域药材和国外香药在这里交汇集散。官府、私商、胡商都进行药材交易，因而药业有较大规模。

20世纪70年代初，吐鲁番出土大量唐代文物。内有多种医书及与医药有关的私人书信、课钱账历、官市佣金账、杂物账、契约等医药文书。记有药名、计量、药价、买药人、药材出处、药物金额等大量药业史料[18]。

药价文书中的药物价格，是按上、次、下三等定值。计量单位有小两、分、条等。记有：

天门冬　小两上直钱五文

酸　枣　小两上直钱八文次六文

犀　角　小两上直钱九十次八十文

记载香药的文书盖有“交河郡督府大印”。记有：

麝　香　分上直钱一百二十文次一百一十文下一百文

丁　香　分上直钱三十五文次三十文下二十文

沉　香　分上直钱六十五文次六十文下五十文

白檀香　分上直钱五十文次四十文下三十五文

各种文书记载的主要药物除上述外，还有石蜜、白梅皮、白鲜皮、青黛、香药、硇砂、郁金根、瑜石等，此外还有化妆品胭脂、胡粉，洗涤剂皂夹及其他药材。香药有乳香、安息香、龙脑香、苏合香、降真香、冰片等。

《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账》记，有一年成交药材4190斤，其中香药140斤，硇砂925斤。一个叫康夜虔的药商，一次买药140斤；一次买香药800斤、石蜜1斤；另一次买香药572斤、瑜石30多斤。

一个药商一次购药800斤，说明高昌是一个药材集散市场。有个药行行人，贩卖药材至长安，一次领取的药价，折合大练（白绢）达到235匹2丈4尺。这家药行的生意做得很大。

6. 业医营药之家的标准设计

医药分业虽明朗于南北朝，但它是一个渐进过程，历代仍有不少医家经营药铺，融医药为一体。唐代的这种业医营药之家，有的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和规模。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对它的内外环境、房屋建造、工作生活区布局、制药设备安装及防火、卫生安排等，做了详细的设计，可视为唐代业医营药实体的建设标准。这一设计标准不可能是凭空想像，而是实际存在的提高。转录于下：

看地形向背择取好处。立一正屋三间。内后牵其前梁稍长。柱令稍高。椽上著栈。栈讫上著三四寸泥。泥令平。待干即以瓦盖之。四面筑墙。不然堑垒务令厚密。泥饰如法。须断风隙拆门牖。

依常法开后门。若无瓦。草盖令厚二尺。则冬温夏凉。于檐前西间作一格子房以待客。客至引入坐。勿令入寝室及见药房。恐外来者有秽气损人坏药故也。若院外置一客位最佳。堂后立屋两间。每间为一房。修泥一准正堂。门令牢固。一房著药。药房更造一立柜高脚为之。天阴雾气。柜下安少火。若江北则不须火也。一房著药器。地上安厚板。板上安之。著地土气恐损。正屋东去十步造屋三间。备饰准上。二间作厨。北头一间作库。库内东墙施一棚。两层高八尺。长一丈。阔四尺。以安食物。必不近正屋。近正屋则恐烟气及人。兼虑火烛。尤宜防慎。于厨东作屋二间。弟子家人寝处。于正屋西北立屋二间通之。前作格子。充料理晒暴药物。以安药炉。更以篱院隔之。外人不可至也。西屋之南立屋一间。引檐中隔著门。安功德。充念诵静之处。中门外水作一池。可半亩余。深三尺。水常令满。种芰荷菱芡。绕池岸种甘菊。既堪采食。兼可悦目怡闲也[19]。

（五）宋金元时期　药业体系全面建立

960年，后周节度使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建立宋朝。仍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史称北宋。赵匡胤称宋太祖，汴梁又称东京。北宋进行了十几年的战争，灭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合并了吴越和北汉，基本统一了中国。1127年北宋为金国所灭。传9帝，历时168年。北宋灭后，宋高宗赵构南迁长江以南，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建都，史称南宋。1276年，南宋为元军所灭。传9帝，历时150年。

在两宋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辽、西夏、金、蒙古4个民族政权。它们和两宋有政治、军事斗争，也有经济、文化和医药交流。

辽（916～1125年），是原居住在辽河上游的契丹国，强大起来后向西扩张，改国号为辽，统治着大漠南北及东北大部地区。辽与北宋对峙44年，辽占军事优势。1004年宋辽构和，宋向辽进

贡，在边境上设互市开展交易。1125 年辽为金国所灭，历时 210 年。

西夏（1034～1227 年），是以党项族为主的政权。原住陕、甘、宁毗连地带。强大后向外扩张。1038 年建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市），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控制着东到黄河，西界玉门（今甘肃敦煌），南接萧关（今宁夏固原），北抵大漠的广大地区。西夏与北宋对峙失利，1044 年双方议和，西夏对宋称臣，宋给西夏每年大量银、绢、茶补贴，恢复边界贸易。1227 年，西夏为蒙古所灭。历时 194 年。

金（1115～1234 年），是以女贞族为主的政权。原住松花江流域，受辽控制。力量强大后摆脱辽的控制，1115 年立国号金。金于 1125 年灭辽。1126 年灭北宋统一北方，与南宋对峙。1234 年，金为蒙古军所灭。历时 120 年。

蒙古（1206～1270 年），原是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上游的一个部落，逐渐发展壮大。1206 年铁木真被推为全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史称元太祖。1227 年蒙古军灭西夏。1234 年灭金。1271 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后，定国号为元。以开平（今内蒙古多伦）为上都，燕京（今北京市）为中都，燕京后又称大都。忽必烈被称为元世祖。1276 年灭南宋，统一中国。1368 年，元朝由明朝取代，传 11 帝，历时 98 年。

1. 经济发展与医药昌盛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以后，虽然民族矛盾尖锐，战争频繁，各政权还是在相对稳定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发展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尤其是辽、西夏、金和蒙古四个游牧经济政权，学习汉族文化、农耕和管理，积极发展农业和商业，促进社会发展。这些措施，使人口快速增长。宋初，经过唐末五代十国战乱，人口降至 4000 万。北宋增至 1 亿。宋金

对峙峰值达到 1.15 亿。元代人口又有较大下降，1290 年为 8500 万，仍超过盛唐 500 万。地方行政，宋代设路、州、县三级。路与唐代的道、元代的行省相当。与州同级的还有府、军、监建制。金代仍置路、州（含府）、县三级。

两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纺织、采矿、冶金、造纸、造船业也很发达。尤其是指南针、活字印刷和火药三大发明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国内商业繁荣，海外贸易达 50 余个国家和地区。医药的发展尤为突出，药业体系全面建立，古代药业发展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

北宋朝廷十分重视医学，专门建立了校正医书局，组织医药官员收集、整理、校正、编纂医药书籍。刊行的医籍有《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编修的本草书籍有，947 年的《开宝重定本草》，载药 984 种，宋太祖赵匡胤亲自为该书写序；1061 年的《嘉佑补注神农本草》和《本草图经》，前者载药 1082 种，由宋仁宗赵祯敕书名；后者载药 780 种，药图 933 幅；1108 年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载药 1744 种；1116 年的《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载药 1558 种；1159 年南宋的《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编行的方书有，992 年的《太平圣惠方》、1117 年的《圣济总录》和 1151 年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廷还在京城和州县开办医学教育，广泛培养医学人才。宋代的私家本草，以 1098～1108 年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1116 年寇宗奭的《本草衍义》最为重要。《证类本草》载药 1748 种，载方 3000 余首，有论有药图，有效用有炮制，保存了不少亡佚的古代医药文献，是承前启后的综合性本草巨著。金代张元素《珍珠囊》，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也是医家的心得之作。

医学进步在临床各科表现亦很突出。其中儿科成就最大。北宋郓州（今山东郓城）人钱乙，根据多年临床实践，著《小儿药证直

诀》。创治小儿心热烦躁的导赤散，治脾胃虚弱气机阻滞的异功散，治肾阴不足发育迟缓的六味地黄丸，至今仍为常用成药。金元时期，四大医家的学术争鸣，反映了不同环境的医疗实践。金代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刘完素，将大部病因归咎于火，提出“降心火，滋肾水”治法，后人称为“寒凉派”。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考城县）人张从正，强调病因无论内外皆为邪气，治病主张用汗吐下三法攻邪，后人称为“攻下派”。金代真定（今河北定县）人李杲，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病以补脾胃为主，后世称为“补土派”。元代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朱震亨，认为人体阴常不足阳常有余，治疗善用滋阴降火法，后世称为“滋阴派”。四大家的医学争鸣，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创了不少好的成药。

2. 官营中药工商体系的建立

北宋前期的经济发展，朝廷养成了一股奢侈之风。面对辽、西夏和金的威胁，不得不保持强大的军队。朝廷开支增加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而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聚敛财富成为巨富者不少。朝廷开始在熙宁年间（1068～1077 年）推行宰相王安石变法，限制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利益。根据“市易法”，国家对某些重要商品实行垄断经营，称为“榷估（榷固）”，有盐、茶、矾、酒、香药等商品。榷估有两种形式：绝对官营和由官府转卖给商人经营。官营商业果然有效，获利甚丰，是两宋特别是南宋财政相当重要的来源。

根据市易法精神，国家开办官药局，防止药商投机控制医药。1076 年，太医局在京城开封率先开办“熟药所”，又称卖药所，制造成药丸散膏丹和汤剂煮散，向社会出售。当年即获利 25000 缗（千文为一缗）。1103 年，卖药所增加到 5 所，另设 2 所“修合药所”，专事成药生产。隶属关系由太医局转到太府寺。太府寺为掌管国家财货政令、商税、贸易等的中央机关，使官药局地位有了很大上升。成药的经营部门和生产部门分开，是一个带方向性的进

步。同年，吏部尚书何执中上奏皇上宋徽宗，说官药局“其惠甚大，当推之天下，凡有市集、务置处之”。上奏得到批准，官药局便在全国陆续推广，形成了庞大的官营中药工商体系。1114 年，卖药所改称为“医药惠民局”，修合药所改称为“医药合剂局”。宋廷南迁后，不仅京城杭州置惠民局、合剂局，又于高宗二十一年（1147 年）重“诏诸州置惠民局，官给医书”。各地多有执行。如宝庆三年（1227 年），浙江鄞县置官药局，下设灵桥、江东、奉化等零售药铺 14 家，每天卖药 1000 贯（千钱为一贯）左右[20]。

太府寺对官药局的管理十分严格。生产熟药的处方，是各地提供的验方，经太医局验证有效后才被选中。为保证原料药材质量，专设“收买药材所”，置专职药官辨验药材真伪优劣。禁止将不合格生药制为熟药。对陈损药材予以烧毁。处方的药物用量、加工炮制、制剂工艺，按《局方》标准，由修合官负责监督实施。药成，内装仿单，外盒上贴“合剂局记”印记商标防伪。置监官防止偷盗、食用成品。出局又有专官负责检查，销售又各有监官。官府派兵对各局巡防保护，合剂局派 10 人，卖药所各 4 人。惠民局实行单双日轮流启闭制，启则卖药，闭则清算前日卖得的药钱。药钱五日一次交收买药材所和杂买务，供购药材和其他物品。晚上有人轮流住宿值班。规定的惩罚措施有：制售假药判一年徒刑。晚上不值班、百姓急病不及时卖药、利用职权从廉卖药、占公家便宜及虚报实情者，杖一百。辨验药材官作伪鉴，修合官制药不合格，经检查核实者罢官。局内人偷药、食用成品，告发者赏钱 20 贯，监官未查觉者罚钱 20 贯。偷药、利用职务之便虚报冒领者，以偷盗论罪。保管不善造成霉烂损失，要负责赔偿。官药局的管理人员都派能够胜任者担任。对办药局有功人员，提前 3 年晋升。熟药的零售价比民营药业时价低 1/3。合剂局后又称和剂局，突出了制药特色。

官药局产品质量高，价格低和服务好，受到社会广泛称道，顾客盈门，获利丰厚，也受到朝廷嘉奖。不少宋人著作记载了当时的

盛况。周密《癸辛杂识》说："和剂惠民药局，当时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药成分之内外，凡七十局，出售则又各有监官，皆以选人经任者为之，谓之京官局。……悉属太府寺。其药价比之时价，损三之一。每岁糜户部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21]蔡絛《铁围山丛谈》卷6载："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货药济四方，其盛举也。岁校（交）出入，得息钱四十万缗，入户部助经费，……时上每饬（敕令）和剂局，凡药材告阙，俾时上请焉"。崇宁年间（1102～1107年），全国财政年收入6000万缗，京城官药局的五个门市年上交40万缗，占0.67%，这确实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新生的官药局，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可是后来，京城惠民和剂局出现管理不善，腐败丛生，质量下降等严重问题。朝廷也因自身危机而不能革除。官药局反被留下骂名。

尽管如此。宋代官药局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一，它是一种经营体制的创新，打破了私营药业的一统天下，使宋代药业出现了官营、民营两种所有制并存局面。两种体系彼此竞争、制约、补充，有利于药业发展。官药局的成功与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官药局体制在全国州县推广，改善了城乡人民的医药供应，尤其是边远州县医药供应有了一定改善，有益于人民健康和破除巫术迷信。赵汝适《诸蕃志》卷下载："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县）……病不服药，信尚巫鬼，黄候申首创药局，人稍知服药之利"。文州（今甘肃文县）、龙州（今四川平武县）所管镇寨，有疾无医药，死者不少。要求本州县供应熟药出卖。更重要的是，如遇灾情、疫情和军需，官药局能够迅速组织人力物力，生产药品救治。如熙宁九年（1076年），驻安南（今越南）军队流行疟疾，太医局令熟药所即制瘴药30种，遣使臣送交安南行营总管司。南宋时，和剂局逐年支付三衙官兵防暑药20余万帖。绍兴十六年（1146

年）以后几成制度。隆兴二年（1164 年），两淮瘟疫流行，朝廷急令和剂局制赈灾药 4 万帖，派使臣遍诣两淮州县乡村散给。乾道元年（1165 年），临安水涝引起疫病流行，朝廷派医生救治，由和剂局发药。

第三，官药局颁行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可视为成药配制的国家标准，为宋代及后世的成药生产、宣传推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局方》原为和剂局成药配本，初刊于元丰年间（1078～1085 年），大观年间（1107～1110 年）由医官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校订增补。后绍兴年间（1131～1161 年）、宝庆年间（1225～1227）年、淳祐年间（1241～1252 年）多次重修增补。现存《局方》，共 10 卷，分为治诸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痼冷、积热、泻痢、眼目疾、咽喉口齿、杂病、疮肿伤折、妇人诸疾和小儿诸疾 14 门，载方 788 首，后附指南总论上中下 3 卷。788 个处方中，丸剂占一半以上，其次是散剂、煮散（汤方），另有少数锭剂、内服膏剂、外用膏剂、膏药剂（铅硬膏）及艾绒灸剂。每方详载处方组成、使用剂量、药物炮制、配制工艺和功效主治。

《局方》中的丸剂，有水丸、蜜丸、糊丸、蜡丸和半浓缩丸。用其他粘合剂制丸者，有枣肉和丸、猪胆汁和丸、甘草水和丸、甘草膏和丸、生姜自然汁和丸等。水丸为了增强粘度，有的加入阿胶汁、稀糊等。糊的选用多种多样，有糯米糊、粟米糊、面糊、蒸饼糊、生姜汁煮面糊、面醋糊等等。糊丸成后用布袋撞光。丸剂的大小使用估计量，有如弹丸、梧桐子、皂荚子、绿豆子、萝卜子、粟米等规格。丸剂的上衣有金箔衣、银箔衣、朱砂衣、青黛衣、麝香衣等。较大的蜜丸，多用油单纸裹丸。一般药多用纸袋、纸盒装。《局方》的指南总论，有“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专篇，对 185 种药材炮制法列为法定制药标准。人们对炮制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炮炙失其体性……虽有疗疾之名，永无必愈之效。是以医者，必须殷勤注意”。

和剂局生产的成药，多属有效的治疗药品，因而能盛行于世。其中的至宝丹、牛黄清心丹、川芎茶调散、藿香正气散、苏合香丸、理中丸、平胃散、参苓白术散、苏子降气丸、木香槟榔丸、二陈汤（煮散）、独活寄生汤（煮散）、紫雪丹、抱龙丸、乌梅丸、槐角丸、逍遥散、四物汤（煮散）等等，不仅宋代常用，而且仍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成药。

王安石变法推行十几年后，因触犯官僚贵族利益，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和攻击。王安石遭革职，变法被废除。但是官药局于国于民有利，成绩显著，因而得到继续发展。

3. 城市民营药业大发展与行会组织

宋代城市民营药业有很大发展，网点增加，分工精细，大铺不少，药市规模也较唐代为大。历代推行束缚商业发展的坊市制，至宋代已被彻底打破，包括药肆在内的各种商店，出现在居住区的大街小巷。两宋京城开封、杭州及苏州、成都，药业尤其繁荣。

开封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已逾 100 万，极盛时有 150～170 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有名号的药铺有 23 家。大内西廊南去有百钟（种）圆药铺。御廊西有香药铺。潘楼东旧曹门街有李生菜小儿药铺、仇防御药铺。牛行街有刘家药铺。马行街北的药铺特别集中，有大骨传药铺；金紫医官药铺有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元家、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小儿药铺有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柏郎中家；任家产药铺及香药铺。大内西右掖门外有张戴花洗面药、丑婆婆药铺、于道士卖齿药、荆筐儿药铺、盖防御药铺。大内前州桥东保康门有潘家黄耆圆。寺东门街有孙殿丞药铺、宋家生药铺。孟元老记述也不可能完全，当时京城井子刘家药肆，“高门赫然，正南大屋七间”，被认为是最大的药铺，未被录下。孟是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人，他在京时没有看到。除这些有名的药家外，摆摊、走街卖药亦不少。如大众娱乐场所“瓦子”中有人卖药，相国寺开放万姓交易有人卖药，御街州桥至南内前一带，

有不少趁朝卖药的小贩，适应京城人赶朝市的习惯。孟元老还记载了京城的“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这种行业着装，能起振奋敬业精神和整洁醒目的宣传作用。可惜不明药业人员着何种冠带置身于市。

南宋京城杭州，盛时人口已过120万。药业经营分工更细，兴盛超过开封。吴自牧《梦梁录》记载，淳祐年间（1241～1252年），有名号的药铺有猫儿桥潘节干熟药铺、五间楼前张家生药铺、狮子巷口观复丹室、保佑坊前讷奄丹砂熟药铺、中瓦子前陈直翁药铺、梁道实药铺、金子巷口杨将领药铺、官巷前仁爱堂药铺、备义坊三不欺药铺、官巷北金药臼楼太丞药铺、漆器墙下李官人双行解毒丸、外沙皮巷口双葫芦眼药铺、太庙前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大佛寺疳药铺、保和大师乌梅药铺、三桥街毛家生药铺、石榴园金马构小儿药铺、沿桥下郭医产药铺等18家。淳祐前的清河蒋御药家，每到元夕，“闲置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游人士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可谓大铺。小药铺可能更多。宋孝宗患痢，宫内众医治而不效，太上皇赵构十分忧虑。一日带随从巡市，遇见一小药铺，店主严姓，遣随从问能否治愈。答曰：专科。遂引入宫。严氏用新采藕节研细，用热酒调服，数服而愈。赵构大喜，赐以捣药金杵臼，并授荣誉性的防御使之官。世人称呼“金杵臼，严防御”。临安还有不少小本药摊，专卖膏药、手皴药、药线、香药、鼠药、蚊烟、荷叶、香囊等小商品。

两宋京城药肆经营分工，大致生药铺经营药材批发、饮片零售。熟药铺经营成药，药铺名未冠“生”、“熟”，可能药材、饮片、成药都经营。而小儿药铺、生药铺、熟药铺、眼药铺、风药铺、疳药铺、乌梅药铺、丹药铺（丹室）、口齿咽喉药铺及卖独门药铺，表示各自的经营特色和服务销售对象。那些流动药摊及卖膏药等小经营，则是对大药铺经营不足的一个补充。

零售药业扩大，推动药材贩运批发和加工业发展。孟元老形容

汴梁药材市场是“香山药海”，可见规模庞大。临安不仅有综合性的“炭桥药市”，还有“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和“珍珠市”3个专门市场[22]。

饮片、成药销售量增大，炮制、制剂技术日趋复杂，人们的质量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前店后坊的生产方式已不适应社会要求。在官办和剂局的启发下，临安的民间药商，率先于全国开办了“生药饮片”作坊和“熟药丸散”作坊，专事饮片、成药生产[23]。是中国最早的民营饮片企业和制药企业。生产企业出现，对扩大药品生产，提高药品质量，促进药品销售，发挥了重要作用。

江南地区其他城市，药业发展也很迅速。尤其是苏州，药铺林立，形成药市街。官药局规模庞大，有屋35椽，所采药材，远及川广。郭姓药家，制丸用朱砂为衣，称朱砂丸，新奇瑰丽，世人争购，因而成为巨富。朱姓药家，灯夕之盛，号称天下第一。药家江仲谋于苏州饮马桥南启熟药铺，绍兴五年，又在常熟梅里镇启一肆，生意都很兴隆。建康（南京市）药业，也有生、熟药铺的分工。《游宦纪闻》载，有个叫辛稼轩的人，随北宋神宗南渡，在建康为官，忽得癫疝之疾，阴囊坠重大如杯。有道人叫取叶珠治。叶珠即鲜薏苡仁。然城内没有，“只于生药铺买薏苡仁”。陆严为奉化（今浙江奉化）名医，有新昌徐妇难产，抬二百里前来求救。陆严曰：“此血闷也，红花数十斤则可活”。病家急购如数，煎汤薰蒸后胎下。急购数十斤红花抢救病人，奉化若无批发药业是不能办到的。长江中游的豫章、饶州药业也较发达。豫章杨秀才为了炼丹，“访数药肆买诸物”，“药直不啻（只）千缗”，可算是一次大规模的药物采购。饶州（今江西波阳县）民郭瑞友患翳膜障蔽，得知獭掌散、熊胆丸可治。到市场上去买二药，得獭掌散，点之不效。后得熊胆丸方，“即依方市药，旬日乃成，服之二十余日，药尽眼明”。熊胆丸用药十七品：熊胆一分，黄连、蜜蒙花、羌活各半两，防己二两半，龙胆草、蛇蜕、地骨皮、大木贼、仙零脂各一两，瞿麦、

旋覆花、甘菊花各半两，蕤仁一钱半，麒麟竭一钱，蔓菁子一合，研末，羯羊肝一具，作丸。饶州药铺能配齐十七味的熊胆丸方，说明经营品种比较齐全。饶州城内德化桥，有一家世售风药的高家药铺，因市招独特，非常有名。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有老妇沿街卖药。《夷坚志再补·卖药媪》记载："潭州宗室赵太尉家乳母，苦烂缘风眼近二十年。有卖药老媪过门云：此眼有虫，吾能谈笑除之，入山取药，晚下当为治疗"。

成都药业较前更加繁荣。每年为期3天的药市，吸引了全国药商参与交易。四川的芎藭、大黄、乌头已被《局方》用川芎、川大黄、川乌的处方名收载。市场最著名的成药是解毒丸。成都的草药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4载，他与一个"卖草药"的李山人很熟，见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访李生，乃以善价酬谢。他问为何药，答曰"媚药"。可见有效的草药亦能获得厚利。

宋代药业能获厚利，不少医官宫外启肆，开辟第二职业，称为金紫衣官药铺。汴梁的仇防御、盖防御药铺，及马行街北的金紫衣官药铺，都属此类。有的甚至辞官而去，启肆赚资。《夷坚志》记载："张二大夫者，京师医家。后徙临安，官至翰林医痊免退。居吉州（今山西吉县），启药肆，技能不甚高，而一意牟利，累资数万"。

宋代商业发展，官府推行按生产经营对象建立行会组织。药业行会组织首先在两京建立，对药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本书后有专论。

4. 药材民族贸易

民族地区盛产药材。两宋北边的辽、西夏、金和蒙古，虽然与宋时有战争，但由于双方需要，商业贸易从未间断。双方在边境设立官办榷场进行大宗货物交易，小规模榷场又称和市，为边民日常用品交易场所。官府对榷场进行管理并征收商税。北宋和辽都在涿

州（今北京市）、朔州（今河北霸县）、安肃军（今河北徐水）等地设立榷场。北宋向辽输出盐、茶、绢、一般药材、硫磺、焰硝及香药、犀角、象牙等。辽输入北宋的主要是马、羊、骆驼、皮毛及珍珠（北珠）、人参等药材。北宋与西夏沿边的河东路（治今山西太原市）、陕西路（治今陕西西安市），设有近 10 个榷场。北宋用缯帛、罗绮等丝织品，易西夏的甘草及牛羊；用香药、生姜、玉桂、漆器等，易西夏的蜜、蜡、麝香、羚羊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西南地区，有以白族为主的大理政权和以藏族为主体的吐蕃政权。他们用马及麝香、犀角、珍珠、水银及其他地产药材，换取宋的盐、茶、锦等商品。两宋与各民族政权的官方贸易，量大而品种少。民间的药材贸易，品种自然会增加很多。西夏的大黄颇负盛名，是商人贩运各地的大宗药材。西夏也与西边的回鹘贸易，商品中有药材和香药，这些商品主要是运往宋地，西夏收 1/10 过境税。

5. 金代药业

在女真贵族统治的北方金国，虽然有自己传统的民族医药，但长期与汉族文化交流，仍以中医药为主体，而且医药有一定发展。金在灭北宋十七年后的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 年），仿宋制置惠民药局。金元四大医学家有三家出在金朝，足证医药仍有相当发展。金与南宋对峙的百余年间，在西起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东沿淮水的边界线上，双方都置榷场进行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尽管大多数榷场随战和交替而时兴时废，但最重要的盱眙（今安徽盱眙县东北），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两个榷场始终畅通无阻。南宋向金输出以茶叶为大宗，药材有陈皮、香药、檀香、犀角、象牙等南方产品。金国向南宋输出主要有北珠、人参、甘草等北方药材。北珠又称东珠，是产于松花江下游及支流的珍珠，颗大光滑晶莹，可药用，但多作皇室、贵族装饰品用。大商人一次贩运北珠，有达数百粒之多。人参在北宋时因上党人参产量减少，至北宋末已“价与银等”。金国在灭北宋前，在宁江州（今吉林扶余县）东南石头城设

有人参市场，宋人多来此采购。北宋灭后，金国在与南宋的人参交易中，获得了丰厚之利。在战时榷场关闭时，官方贸易停止，民间走私仍很兴盛。山东沿海的走私船仍可将药材运至北方。金国与南宋的药材交流，使中国南北药业能够继续向前发展。

6. 元代药业

元朝不仅彻底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辽宋金的对峙，西夏、高昌、大理、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并存，长达370余年的分裂局面，而且还大力向外扩张，成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就本土而言，统治的地区，东南至海，西至新疆，西南包括西藏、云南，北抵西伯利亚大部，东北临鄂霍次克海。为汉、唐极盛时所不及。地方管理，元朝将全国划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浙江、江西、湖广十个行省。省以下置路、府、州、县。直属于中央管理的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称为“腹里”，与省同级。全国有11行省185路33府234州1171县。为了军事和发展经济需要，元朝积极改善和发展陆路、海运和漕运交通，发行全国流通的纸币，重视手工业、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元朝的国内外商业极为繁荣。尤其重视官营商业发展。

元朝积极推行官药局体制。在灭金后的第三年，就政令开局，官给钞本，择良医主之。《元史·食货志》有详细记载：“太宗九年（1237年），始于燕京等十路置局，以奉御田阔阔、太医王壁、齐辑等为局官，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又命王祐开局（大都惠民司）。四年（1263年），复置局于上都（今内蒙多伦市），每中统钞一百两，收息钱一两五钱。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以陷失官本，悉罢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又准旧例，于各路置焉。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调，所设良医，上路二名，下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给钞本，亦验民户多寡以为等差。今并着于后：腹里，三千七百八十锭。河南行省，二百七十锭。湖广行省，一千一百五十锭。辽阳行省，二百四十锭。四川行

省，二百四十锭。陕西行省，二百四十锭。江西行省，三百锭。浙江行省，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云南行省，真赕（少数民族使用的一种贝币）一万一千五百索。甘肃行省一百锭”。

元代的民营药业也较前发展。河南禹州（今河南禹州市）形成中原地区药材集散的常年大市，不少外地药商都到此采购。江西建昌府（今江西南城县），发展为赣东地区的药材市场。零售药铺空前增多，带来了药物中毒事故的增加。至元五年（1268 年），元政令禁止药业售卖乌头、附子、巴豆、砒霜和堕胎药。至元九年（1272 年）又规定，卖禁售毒药者，杖六十七，并追罚至元钞一百两给原告人，卖毒药致死人者，买卖双方皆处以死刑。至大四年（1311 年），禁售有毒药材又增加了大戟、芫花、藜芦、甘遂、侧子、天雄、乌喙、莨菪，共 12 种。延祐六年（1319 年），又禁令玩弄禽兽，聚集众人，街市售药，违者处以重罪。这些禁令，虽有过极，限制了这些药物的使用和销售，但对确保用药安全，加强毒性药材管理，整顿市场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元朝定京大都，成为政治、经济、交通中心，对北京、内蒙及东北药业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都著名的药铺有窦默的燕山活济堂。治跌伤损伤的金丝膏药也在大都及很多地区为人知晓。其他地方的著名药铺有：陕西长安刘泽山的济民药局，江苏吴县葛正蒙的复生堂。刘、葛均为世医之家，很有名气。葛正蒙的座右铭是“济世之道莫不乎医，去疾之功莫先乎药”。体现出医药济世活人的道德理念。吴县还有一位名医葛乾孙，又名葛可久，启肆营药。其人医术精，医德高，药物优。有《医学启蒙》和《十药神书》传世。“贫者持银求药，必以善药与之，退其银；或其银成色不佳，则易以好者，使供饘粥（稠粥），人皆称其仁”。一次炒大黄过焦，全部弃之不用。重质量精神可称楷模。

回族在元代增加不少。仅大都在中统四年（1263 年）就有近 3000 户。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朝廷在大都和上都各置回回药

物院一所，掌回回药事。回回人中有不少从事香药、珍珠贸易。

元朝统治者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将国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西域、西夏人）、汉人（北方汉、契丹、女贞、渤海、高丽人）和南人（南宋遗民）四等。蒙古人是统治者，色目商人受到多方优待，汉人、南人经商则受到多种禁令和限制，不利于包括药业在内的商业发展。

（六）明代　官营药业衰落与民营药业兴旺

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引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朱元璋加入一支红巾起义军并成为领袖，于 1368 年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朱元璋称明太祖。永乐十九年（1421 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崇祯十七年（1644 年）清军入关灭明。明传 16 帝，历时 276 年。

1. 商品经济发展与医药成就

明初扩大垦荒，推广农具、肥料，改善耕作方法，农业生产很快恢复发展。人口由明初的 6000 万，增至盛年的 14000 万。增加了 1.3 倍。手工业恢复后又有新发展。原有的商业城市及商业市场扩大，新的商业城市和工商市镇兴起，市场繁荣，水陆货运频繁。商品经济发展，明代出现大量雇工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作坊，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明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省、府与州、县三级。除南京、北京直辖朝廷外，全国划为 13 省、159 府、234 州、1171 县。军防重地、关口地称军，与州相当。

明代医药学比前有较大发展。名医张景岳创左归丸、右归丸等著名成药。1505 年，明太医院在宋代《证类本草》基础上，编修刊行《本草品汇精要》，载药 1815 种，并绘精美彩图，实为明代的大型国家本草。1590 年刊行的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药 1892 种，附方 11000 首，附图 1000 余幅，总结了 16 世纪前中国药学成就，不仅是中国药学史上的本草巨著，也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科学文

献。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棣热衷于医药研究，组织名医数十人编写刊行了《普济方》186卷，载方61739首。1404年，又刊行了亲自编写的《救荒本草》，载可食药物400余种，并附图说，其中三分之二为一般本草未收载，对本草学和食疗、营养学都是一大贡献。明代还出现了第一部反映零售药业的专著，高宝素的《药房随笔》二卷。原书虽已失传，但反映明代药业有了新的发展。

2. 全国药材交流市场初步形成

用药品种增加，药业向前发展，需要更大的药材市场交易各地商品。全国性的药材交流市场，首先在历来药业发达的河南禹州出现，以后有百泉、祁州、樟树等药市形成。

河南禹州（今禹州市），位于伏牛山东麓、许州（今许昌市）以西七十里，交通便利，药材资源丰富。曾是大禹的都邑。战国时候被《盐铁论》称为“天下之名都”，商业十分繁荣。任过秦国宰相的吕不韦，就是本地的大商人。元代时，禹州城已药肆林立并有较大药材市场，不少外地药商来此采购地产药材或进行交易，颇有名气。明太祖朱元璋对药材似乎特别偏爱，在建明后的第一年洪武元年（1368年），就诏令全国药商去禹州集结交易，初步形成全国市场。

百泉镇，位于豫北辉县城西北、太行山支脉苏门山南麓，卫源河在此发源。依山傍水，泉流百道，故称百泉。隋代在此建卫源庙。明代以前有佛事活动。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八日，朱元璋到此祭祀，令起庙会。以后形成庙会市场。每年4月8日前后，大宗太行山药材及外地药商参与交易。明末初步形成全国市场。

祁州（今河北安国市），位于华北平原中部的南北驿道上。有潴龙河、沙河流经，通海河达天津，距北京亦近。盛产数十种大宗药材。北宋时城南建有皮场庙，被供者传说能显灵为民去病，因此朝拜香火很盛。明永乐二年（1404年）建药王庙，有较大庙市。万历二十六年、三十六年、三十八年，由河北、山东、河南、山

西、安徽、福建等八省药商出资，连续 3 次维修药王庙，并在每年清明节举行一次药材交易。明末初步形成全国市场。

樟树为江西清江县属镇，位于赣江中下游，经鄱阳湖通长江，陆路交通亦便。四周盛产药材 100 多种。镇南有阁皂山，相传晋代医药学家葛洪曾在此采药、炼丹、传授医药，使樟树很有名气，引来药业汇集。南宋时有九月药市集散药材。明初建三皇宫后，每年 4 月 28 日举行庙会，各路客商纷纷沓至，开展药材交易达半月之久。明末，樟树药业已达 200 余户，基本形成全国市场。

次于上述四大药市的，还有河南马山口药市和云南大理药市。

马山口镇属南阳府内乡县，位于南阳盆地西缘与伏牛山的连接处，四周广出药材。嘉庆年间（1522～1566 年），已是商贾云集之地，有松茂堂等 60 多家药肆。马山口每年举行两次药材交流会。1 月 19 日至 2 月 4 日为 15 天春交会，5 月 13 日至 15 日为 3 天夏交会。赴会药商多时来至全国 13 省。大理药市后有记述。

3. 官药局体制衰亡

明朝除重视发展全国药材集散市场外，亦仿前制置惠民药局，经营官办的零售药业。《明史·职官志》记载，明朝在开国后的第三年（洪武三年，1370 年），朝廷下令两京及全国府州县置惠民药局。在南京、北京太医院下的惠民药局，设大使 1 人、副使 1 人掌管。京外各府州县的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医官掌管。全国陆续开局者不少。如江西建昌府、山东新泰县置惠民药局，而浙江置局者有杭州、苏州、宁波、萧山等 45 个府州县。

但是，明代的官药局在中后期逐渐衰亡，到了清代就再无朝廷下令置局的记载。轰轰烈烈的官药局体制，由北魏救济性事业开始，经宋进行抗衡私商垄断、办成赢利性工商企业的改革和推广，到金元继承，至明末而衰亡，历时 1200 多年。

官药局体制在明代中期以后逐渐衰亡有深刻的原因。

宋代，官药局初建的一段时期，由于管理严格，这一新生事物

有过增收、惠民的辉煌成就，受到朝廷嘉奖和社会赞扬。可是后来，官药局内部产生偷盗、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太府寺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亦未很好执行，打击不力，导致经营不善，药品质量下降，市场销售降低，经营亏本严重而留下骂名。南宋人周密说：官药局“宋祖初制，可谓仁矣。然弊出百端，往往为诸吏药生偷盗。至以樟脑易片脑（薄荷脑），台附（产浙江的天台乌药，为行气药）易川附（产四川的附子，为温里药），囊橐为奸，朝廷莫知之，亦不能革也。凡一剂成，则又皆为朝士及有力者得，所谓惠民者，元未尝分毫及民也。……然其间差舛者，亦似不少”。（《癸辛杂识·别集上》）如牛黄清心丸用药29味，其实只有前8味为该方组成，后21味药，为中山芋丸处方误抄加入。南宋人俞文豹的抨击最为中肯，他说：“朝廷置惠民局、和剂局，所以达济利之心，赞仁寿之治也。今惠民局以药材贵而药价廉，名虽存而实则泯。职其事者，太府丞也。非惟药材不能通晓，而骤迁倏易，亦不暇究心职业。所谓四官局，止于受成坐肆而已，惟吏辈寝处其间，出入变化，皆在其手。药材既苦恶，药料又亏减，稍贵细药，则留应权贵之需。四局所卖者，惟泛常粗药，缺者多而赎者（顾客）亦罕。一局输费，为数不赀（计算），民受其名，吏享其实，故都人谓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24]。如手握军权、为六大奸臣之一的宦官童贯，罢官时抄家，发现私库中藏和剂局理中丸多达几千斤之巨。

元代的官药局，也曾因经营不善“陷失官本”，而一度“悉罢革之”。

明代中期以后，政治十分腐败。皇室、权贵、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建立不纳税的庄园，而且还纷纷开客店、塌房和商铺。他们利用特权牟取暴利，收入归己挥霍。皇室、权贵私店经营广泛，数量众多。万历年间（1573～1619年）太监刘若愚著的《酌中志》记载，北京戎府街有皇帝与宦官合伙开办的宝和、和远、顺宁、福

德、福吉、延宝六家皇店，专门经营各地运来的杂货及犀角、象牙、珍珠、人参、鹿茸、朱砂、水银及其他药材，对官药局进行釜底抽薪。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 年），还将国家官店的大多数改为皇店，明目张胆侵吞国家商业及其资产。皇室与宦官聚敛了大量的私人财富。仅武宗的宦官刘瑾家产有黄金 24 万锭零 57800 两、白银 500 万锭又 158 万余两。大部分是文武官员的行贿钱[25]。地方官吏也加以效法。国税减少，采用加重农民负担和向民间工商业增税的办法弥补。迫使农民逃往城镇，城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强烈反抗，赋税收入更减，使财政入不敷出。嘉庆三十年（1551 年）亏空白银近 400 万两。亏损的官药局自然难得财政的支持而纷纷关闭。

同时，明代的官药局制度本身，并未得到认真有序的推广，也无宋代那样的统一生产机构和剂局提供熟药成品，惠民药局只能前店后坊或根本无坊，而且多数惠民药局已不是宋代那样的工商企业，而变成为贫病者治疗，遇疫施药的慈善卫生机构。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金坛（今江苏金坛县）水灾后大疫，巡按陈某在该地巡察时，才令金坛县选择良医，开药局施药。明·彭贻孙《太仆行略》亦记载："亢阳既极，五月大疫。府君彭期生蠲（积存）湖租市药，设药局于四门，各选良医主之，官给吮咀汤饮，全者甚众"。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措施，只是一种亏本的慈善机构而不是盈利的工商企业，当然不会持久。

另一方面，在明代官药局内困重重的同时，遇到了迅速发展的城市民营药业的有力竞争，致使明朝中期以后的官药局逐渐走向衰亡。

4. 民营药业蓬勃发展

明代，随着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民营药业有了蓬勃发展，药业铺户增加，经营分工、市场销售，较之以前更细、更大。

北京在洪武初年，人口不过数万。经过近 200 年后，在嘉靖年

间（1522～1566年）已增至百万。加上皇宫消费北京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商号在永乐（1403～1424年）初尚少，中期后显著增加，嘉靖年间已形成商业区。有粮、盐、布、棉、茶、纸、玉器、香蜡、糖、酒、裱褙、染、饮食、珠宝、生药等15个较大的商业行业。各地药材源源不断运进北京。药业迅速兴旺，并建立了药行商会，药业成为15个大的商业行业之一。著名的大药铺，有永乐年间开业的万全堂，嘉靖五年（1526年）的西鹤年堂，万历年间的永安堂、王回回膏药铺、马思远药锭。在频繁举行的各种庙会中，有药业参与交易。北京还有小药王庙和北药王庙，每月初一和十五举行庙会，使庙会市场更具药业交易专业色彩。在傍晚和黎明前交易的小市，亦有小贩地摊售药。

长江下游地区的各商业城市，药业进一步发展。在江苏，苏州近郊的南濠镇，已有药材交易的专业市场；陈姓药商在木渎镇启肆宁远堂，药业向城外发展。在镇江的何义务弃官启肆，说明药铺的收入不低。小的县城亦有不少新铺增加，如汤玉在武进县启药肆，岁用大黄数百斤。在浙江，杭州药业向扩大规模方向发展，许广和药号制售成药达到280余种；朱养心药室，主营外科丹药、膏药和眼药，生意十分兴隆；明末时出现药材牙行阜通药行，为省内外客商代办买卖，收取佣金。县城药业亦有较多增加，如应华在永康县启树德堂；周理卿在鄞县启肆；张文启与同道在仁和县合资启肆，竟选了官药局“惠民药局”作名号；上虞县的药业向城外发展更快，所属的百官、崧厦、章镇、东关等10个集镇，都有药铺开设。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市）有方鼎启肆，凤阳府（今凤阳市）有宋武启肆，二人常向贫病者施药济人，有较高赞誉。

中原河南药业，仍以昔日东都开封府最为发达。各种名号的生药铺、熟药铺、药材铺、香药铺、眼药铺林立于市。以余府街、山店街、书店街集肆最多，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医药商业街区。明代一幅北宋清明上河图仿制画，在汴河桥头增画了不少商铺，其中一家

为挂吊牌的人参铺，说明开封已有专营贵重药材人参的参店；在大街上的一家药铺，画面上有药工6人，分别在檐棚上晒饮片、临街碾药和称重城外运来的药材，柜台内坐一人面街，像是业主。这家药铺加上未露面的大概有十余人从业，开展药材收购、饮片、成药加工和零售，似乎算一个中上型药家。

山西是药材重要产区。晋商善于经营在明代已闻名全国。山西药业以晋南太原和晋中地区发展最盛。太原府的著名药铺有大宁堂、三和堂、济生馆和南郊小店镇的同心丹房。晋中则有太谷的广盛号，洪洞县一元堂和平遥县金兰堂。

岭南的广州，仍是南方的药材集散地和外贸港口。尤其以成药发展成就显著。著名的药铺有嘉靖年间的冯了性药号，万历年间的陈李济药店。周少参、陈海槐两药家更具名气，他们首创用白蜡制壳包装蜜丸，便于久存和运输，为大批量生产解决了最关键的贮运难题。周少参成药主销国内，陈海槐的成药主销东南亚地区，很受市场欢迎。蜡壳包装蜜丸的新工艺谁先创造？中国药材公司高级工程师朱哂考证是陈李济。陈李济开业不久即重点发展成药生产，选择了大蜜丸苏合香丸作主打品种。苏合香丸治中风（脑卒中）、胸痹（冠心病、心绞痛）宋代已很有名。惟方中十几味药一半以上为芳香药，苏合香、安息香还是国外原料的主药。包装不严密，香气易散失，影响疗效。宋代合剂局用蜡纸裹丸，效果亦不理想。时国内已掌握了木蜡（白蜡）生产技术，木蜡商品通过广州有部分出口。人们已知木蜡质硬，制壳易碎；蜂蜡质软，制壳易严重变形。明末清初，陈李济将木蜡、蜂蜡混合制壳，软硬适中，解决了这一难题。使陈李济的优质苏合香丸响誉全国。后来还挂起了“杏和堂陈李济蜡丸”的大吊牌。这一技术也很快为其他药家掌握。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推广到包装其他蜜丸品种，极大地提高了蜜丸的产量和质量。真没料到，现在看来这一十分简单的制药包装工艺，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北

京中医学院和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选择陈李济药厂的蜡壳丸生产工艺，拍成电视录像片，向全世界报道。陈李济早期的创新精神，为中国人增添了光彩。

广州西南 40 里的佛山镇，是明代著名的四大新兴市镇之一。四大名镇是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湖广汉口镇和广东佛山镇。佛山镇以纺织、造船和商业著名。万历年间成药业兴起。著名的药家是梁仲宏蜡丸馆，首批推出的产品抱龙丸极受市场欢迎。佛山成药业继续发展，后来成为岭南地区的成药生产基地，市场扩展到东南亚地区。这时，广西沿海的采珠业发展到极盛时期，钦州（今广西钦州市）成为珍珠的交易中心。被朱元璋赐为“白龙珍珠城”。

湖广省管辖现在的湖北、湖南。长江横贯中部，南有湘江，北有汉水两大支流。药材资源丰富，水路运输方便。地处长江、汉水汇合处的武昌府汉口镇，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工商市镇，药业开始兴旺。著名药铺为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 年）的沐泰山堂。

西安和成都，仍是西北、西南的商业大城和药材集散地。成都药业多集中城东东大街一带，形成一个较大的药市区。全国其他著名药铺，还有漳州的彩云居神曲茶饼店、沈阳的广生堂、凉州（今甘肃武威）的万寿堂等。万寿堂制售的万应膏药，能化腐生肌，消肿止痛，疗效显著，在西北一带很有影响，被称为凉州膏药。

无法统计明代城市药业的规模。以下两个较小的药材集散地药业情况是：江西建昌府，明末时已有大小药肆 40 多家，各路庄客遍及南北川广。河南内乡县马山口镇，有药肆 60 余家，业务往来包括全国的 13 省。由此估计，全国州以上的多数城市药业已成为重要的商业行业之一。

5. 民族地区的药材贸易

东北的契丹、女贞、满族，历来用人参、北珠、甘草等地产药材与汉族交易。尤其是人参交易，是十分重要的传统产业，明代更加兴旺。仅万历十一年（1583 年）、十二年，女贞三部之一的海西

女贞，从广顺关、镇北关入市交易 26 次，共售野山人参 3476.5 斤，值银 3 万余两。

北方的蒙古族，明朝政府从张家口到大同，陆续开放 13 处定期互市，除大宗的茶马交易外，还进行传统的南北药材交易。蒙古族出售的仍是地产的甘草、黄芪、柴胡、肉苁蓉等药材。

青藏高原的藏族，明朝政府在四川的雅州（今雅安）、打箭炉（今康定），甘肃的秦州（今天水）、洮州（今临潭）等地设茶马互市场所。藏族交易的主要是地产的麝香、虫草、大黄等药材。

南方的白族大理，则发展成为民族地区的最大药材市场。

6.《本草品汇精要》中的道地药材

医药业的发展，医生、药商都进一步明白，同味药材因产地不同，质量、疗效有优次之别。那些来自一定产区的优质药材被称为道地药材。道地药材的广泛使用，不仅提高了中药疗效，也提高了药业的经营水平。朝廷颁行的《本草品汇精要》，在产地项下专列“道地”一条，确认了 268 种道地药材[26]。依序全录品名、产地如下：

黄　精，嵩山、茅山。
菖　蒲，池州、戎州。
菊　花，南阳菊潭。
人　参，辽东、高丽、上党。
天门冬，北岳，地阴。
甘　草，山西隆庆州。
生地黄，怀庆。
苍　术，茅山、蒋山、嵩山。
白　术，杭州，于潜。
菟丝子，冤句。
牛　膝，怀州。
防　葵，兴州。

柴　胡，银州、寿州、栾州。
独　活，蜀汉。
羌　活，蜀汉。
升　麻，益州、蜀川。
车前子，开州。
木　香，昆仑、广州舶上来。
山　药，河南。
薏苡仁，真定。
泽　泻，泾州、华州、汉中。
远　志，夷门。
龙胆草，吴兴。
细　辛，华阴。
石　斛，广南。
巴戟天，蜀川。
赤　箭，兖州。
菴茼子，宁州、秦州。
芎　藭，蜀川。
蘼　芜，关陕，蜀川，东山。
黄　连，蜀道、澧州、东阳、新安。
黄　芪，宪州、原州、华原、宜州、宁州。
肉苁蓉，西羌、陇西。
防　风，齐州龙山、淄州、兖州、青州。
蒲　黄，泰州。
香　蒲，泰州。
续　断，蜀川。
漏　芦，江宁、上党、单州。
丹　参，隋州。
五味子，高丽、建平。

蛇床子、扬州、襄州、南京。
地肤子，密州、蜀州。
茵陈蒿，江宁府、绛州。
沙　参，淄州、归州、隋州、华州。
云　实，瀛州。
王不留行，成德军、江宁府。
耳　实（苍耳子），滁州。
葛　根，江浙、南康、庐陵。
葛　粉，南康、庐陵。
栝蒌根，衡州、均州、陕州。
栝蒌实，衡州、均州、陕州。
苦　参，成德军、秦州、邵州。
当　归，川蜀、陇西、四阳、文州、当州、宕州、翼州。
麻　黄，茂州、同州、荥阳、中牟。
木　通，海州、兴元府、解州。
白芍药，泽州、白山、蒋山、茅山、淮南、海盐、杭越。
赤芍药，茅山。
蠡　实，翼州。
瞿　麦，绛州。
玄　参，江州、衡州、邢州。
秦　艽，泾州、鄜州、岐州。
百　合，滁州、成州。
知　母，卫州、威胜军、隰州。
贝　母，峡州、越州。
黄　芩，宜州、鄜州、泾州、兖州。
白　芷，泽州、吴地。
狗　脊，成德军、眉州、温州、淄州。
石龙芮，兖州。

茅　根，澶州、鼎州。
紫　草，单州、东京。
前　胡，吴中、寿春、越州、衢州、婺州、陆州。
败　酱，江宁府。
白　鲜，江宁府、滁州、蜀中。
紫　参，滁州、濠州、眉州、蒲州、晋州。
石　韦，海州。
蕺　薪，兴元府、邛州、荆门军、陈德军。
白　薇，滁州。
菝　葜，成德军、海州、江州、江宁府。
大　青，信州。
艾　叶，蕲州、明州。
鼠粘子，蜀州。
地　榆，江宁府、衡州。
大　蓟，蓟州。
小　蓟，翼州。
泽　兰，徐州、梧州。
防　己，汉中。
天　麻，邵州、郓州。
高良姜，儋州、雷州。
百部根，衡州、滁州、陕州。
茴香子，简州。
款冬花，晋州、潞州、耀州、秦州。
红蓝花，镇江。
京三棱，随州、荆州。
姜　黄，宜州、澧州。
荜　茇，端州。
郁　金，蜀地、潮州。

延胡索，镇江。
肉豆蔻，广州。
补骨脂，南蕃、梧州。
零陵香，零陵、蒙州、濠州。
缩沙蜜，新州。
蓬莪术，西戎。
白　前，越州、舒州。
荠　尼，润州，蜀州。
白　药（瓜蒌子），兴元府、临江军、洪州、施州。
香附子，澧州、交州。
茇澄茄，广州。
胡黄连，广州。
甘松香，文州。
鳢　肠，滁州。
茅香花，丹州、岢岚军、淄州。
使君子，眉州。
地　笋（泽兰根），徐州、梧州。
翦　草，婺州。
附　子，梓州、蜀中。
乌　头，赤水、邵州、成州、晋州、江宁府。
侧　子，龙州、绵州。
半　夏，齐州。
虎　掌，翼州、江州。
大　黄，蜀州、陕西、凉州。
葶　苈，曹州、彭城。
桔　梗，解州、成州、和州。
莨　菪，秦州。
草　蒿，汝州、阴州、豫州、楚州、荆州。

旋覆花，随州、河南。
藜　芦，解州。
射　干，滁州。
蛇　含，兴州。
常　山，宜都、建平。
蜀　漆，明州、海州。
甘　遂，江宁府、京西。
白　敛，滁州。
青葙子，滁州。
白　及，兴州、申州。
大　戟，滁州、河中府、信州、并州。
茵　芋，绛州、彭城。
贯　众，淄州。
莞　花，雍州。
羊踯躅，润州、海州。
何首乌，怀庆府、柘城县。
威灵仙，并州、晋州、石州、宁化军。
牵牛子，越州。
蓖麻子，明州、儋州。
天南星，江宁府、滁州。
萹　蓄，冀州。
狼　毒，石州。
豨　莶，海州、文州、高邮军。
马鞭草，衡州。
白头翁，商州、徐州。
甘蕉根，南恩州。
鬼　臼，舒州、齐州。
马兜铃，信州、滁州。

仙　茅，戎州、江宁、衡山。
羊　桃，蜀川。
鼠尾草，黔州。
刘寄奴，滁州。
骨碎补，海州、舒州、戎州、秦州。
连　翘，泽州。
续随子，广州。
山豆根，忠州、万州。
茼　茹，淄州。
金星草，施州、陕州。
鹤　虱，滁州、成州。
赤地利（山荞麦），华州。
白附子，东海、新罗国。
紫　葛，江宁府、苔州、雍州。
蚤　休，滁州。
知　子，壁州。
葫芦巴，舶上者（进口）。
木　贼，秦州。
茛　草，荆襄。
谷精草，江宁、秦州。
牛　扁，潞州。
蒟　头　（蒟蒻），扬州。
山慈菇，吴中。
地锦草，滁州。
桂，　桂阳、广州、观州。
牡　桂，融州、桂州、交州、宜州。
菌　桂，韶州、宾州。
槐　实，河南平泽。

枸　杞，陕西、甘州、茂州。
地骨皮，陕西、甘州、茂州。
柏　实，乾州、密州。
茯　苓，严州。
黄　檗，蜀州。
楮　实，滁州、明州。
乾　漆，峡州、严州。
五加皮，江淮、吴中。
蔓荆实，眉州。
桑上寄生，江宁府。
杜　仲，建平、宜都。
木　兰，益州。
蓯　核，弁州。
沉　香，琼崖。
薰陆香，南番。
金樱子，舒州、泉州、宜州。
吴茱萸，临江军、越州、吴地。
槟　榔，广州。
栀　子，临江军、江陵府、建州。
紫　铙，昆仑。
食茱萸，蜀州、吴地。
芜　荑，延州、同州。
枳　实，成州、商州。
厚　朴，蜀川、商州、归州、梓州、龙州。
茗苦茶，雅州、蒙山、建州。
秦　皮，河中府、成州。
秦　椒，秦岑、归州。
山茱萸，兖州、海州。

猪　苓，龙州。
乌　药，天台。
菴摩勒，（余甘子）戎州。
卫　矛，信州。
海桐皮，雷州。
虎杖根，越州、汾州、滁州。
五倍子，蜀中。
天竺黄，闽中。
密蒙花，简州。
阿　魏，波斯国、广州。
牡　丹，巴蜀剑南、合州、和州、宣州。
巴　豆，戎州、眉州、嘉州。
蜀　椒，蜀川、金州、西域、施州。
皂　荚，怀州、孟州。
诃梨勒，广州。
楝　实，蜀川简州、梓州。
郁李仁，隰州。
莽　草，蜀州、福州。
黄药根，明州、秦州、施州、兴元府、忠州、万州。
南烛枝叶，江州。
石　楠，道州、关中。
木天蓼，信阳军。
鼠　李，蜀州。
小　檗，襄阳岘山东。
南　藤，泉州。
桦木皮，北土。
栾　荆，海州。
木鳖子，宜州、蜀郡。

钩　藤，兴元府。
卖木子，渠州。
芫　花，绛州、绵州、滁州、邯州。
橘，　广东。
青　皮，广东。
大　枣，青州、晋州、绛州。
栗　子，兖州、宣州。
蓬　藥，成州。
梅　实，安吉。
木　瓜，宣城。
枇杷叶，眉州、江南西湖。
荔枝子，闽中。
核桃仁，东京、陕西。
李核仁，蜀州。
胡　桃，北土。
橄　榄，泉州。
榲　桲，沙苑出者更佳。
马槟榔，云南。
胡　麻，胡地。
巨胜子，胡地。
胡麻油，胡地。
青　蒿，胡地大宛。
芥，　蜀州。
白　芥，西戎、太原。
菘　菜，扬州。
苦　菜，蜀川。
生　姜，汉州、温州、池州。
紫　苏，吴中。

香　薷，江西、新定、新安。

薄　荷，南京、岳州、苏州。

蕺，　扬州、关中。

7. 炮制理论和炮制方法基本定型

炮制理论和炮制方法，与药业的经营关系极为密切。明代中药炮制的理论基本定型，方法趋于完善，炮制学发展到极盛时期。《本草蒙筌》、《本草纲目》和《炮炙大法》反映的炮制内容是其主要代表。

《本草蒙筌》由陈嘉谟编著。他在“制造资水火”专节中，对炮制的质量要求、炮制法分类和辅料使用目的进行了系统总结：“凡药制造，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火制四：有煅、有炮、有炙、有炒之不同；水制三：或渍、或泡、或洗之弗等；水火共制造者：若蒸、若煮而有二焉。余外制虽多端，总不离此二者。匪故弄巧，各有意存。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脏仍仗软坚，用醋注肝经且资住痛，童便制除劣降下，米泔制去燥性和中，乳制滋润回枯助生阴血，蜜制甘缓难化增益元阳，陈壁土制窃真气骤补中焦，麦麸皮制抑酷性勿伤上膈，乌豆汤、甘草汤渍曝并解毒致令和平，羊酥油猪脂油涂烧咸渗骨容易脆断，有剜去瓤免胀，有抽去心除烦。大概具陈，初学熟玩”[27]。这些总结虽有一定局限性，但简洁易诵，概括了炮制的一些主要作用，在后世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书中还对甘草、白术、地黄、当归、柴胡、黄连、大黄、香附等数十种常用药物的不同炮制品效用差异作了说明。

李时珍《本草纲目》专列“修治”一项，记载前人和当时的炮制方法，还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予以发挥，几乎包括了明代以前的全部炮制方法及应用经验。如阿胶：“弘景曰：‘凡用皆火炙之’；雷敩曰：‘凡用，先以猪脂浸一夜，取出柳木火上炙燥研用’；时珍曰：‘今方法或炒成珠，或以面炒，或以酥炙，或以蛤粉炒、或以

草灰炒，或酒化成膏，或水化膏，当各从本方’”。对黄连炮制品临床应用，他说：“黄连入手少阴心经，为治火之主药；治本脏之火，则生用之；治肝胆之实火，则以猪胆汁浸炒；治肝胆之虚火，则以醋浸炒；治上焦之火，则以酒炒；治中焦之火，则以姜汁炒；治下焦之火，则以盐水或朴硝研细调水和炒；治气分湿热之火，则以茱萸汤浸炒；治血分块中伏火，则以干漆末调水炒；治食积之火，则以黄土研细调水和炒。诸法不独为之引导，盖辛热能制其苦寒，咸寒能制其燥性，在用者详酌之”[28]。明确阐述了炮制是中医辨证论治手段之一的思想。

缪希雍的《炮炙大法》是一本炮制专书，记载了400多种药物的炮制方法、操作程序及炮制后的贮藏要求，还论述了部分药物炮制前后的性质变化及不同的治疗作用。炮制方法部分内容摘自《雷公炮炙论》，大部分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炮制实际。书中还总结了雷敦所用的炮制方法，取名“雷公炮炙十七法”，并作为全书引言。实际上十七法总结得并不全面，与雷敦炮制内容相差甚远。

明代另外一些医药书籍，也记载了不少炮制经验和理论。李梴《医学入门》记：“芫花本利水，无醋不能通”，“诸石火煅红，入醋能为末”，“凡药入肺蜜制，入脾姜制，入肾用盐，入肝用醋，入心用童便；凡药用火炮、汤泡、煅炒者去其毒也”。李中梓《本草玄通》记：“煅则通红，炮则起烟，炒则黄而不焦，烘则燥而不黄”。傅仁宇《审视瑶函》中有“用药生熟各宜论”专论。提出了“补汤宜用熟，泻药不嫌生”的生泻熟补论。

炮制学的基本定型和道地药材受到肯定，明代零售药业的饮片质量和经营水平，都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8. 宫廷用药与严酷的药材土贡

明朝宫廷用药，前期控制较严，数量不大。永乐年间（1403～1424年）为5.55万斤。明宣宗时（1426～1435年），太医院奏尚衣监计划用辟虫香药2万斤，要求派人到福建等地收买。宣宗对此

很不赞成，说这不是急事，不必派人，香药也不要这么多，可减去十分之七。1436 年，明英宗初继位时，太医院计划购药材 9.18 万斤，被英宗减为 5.54 万斤。可是到嘉庆、万历年间，则分别达到 26.42 万斤和 24.96 万斤。约为永乐年间消费量的 5 倍。这与明廷中、后期政治腐败是相适应的。

宫廷用药的来源，除太医院派人采购、外国使节献贡外，还有各地土贡的特产优质药材。这往往给产区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甚至灾难。

山西上党郡原产人参，土贡强迫人民上山采挖而绝种。老百姓感到人参并未给他们带来财富，反而是李时珍所说的："民以参为地方害，今不复采取"。

张维斗在崇祯年间任四川荥经知县。他目睹黄连产区农民采挖野连的艰辛和土贡的严酷，写了一首黄连谣，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官僚的愤恨。全文如下。

黄 连 谣

采黄连，连从何地掘，托根自深崖，豺狼所宅窟，腰镰迤逦寻，虺虫同出没，毒气一中之，朱颜变白骨。呜呼！谁非天地父母身，忍抛驱命长屹屹。

采黄连，连界从何畀，孕毓自地灵，丰啬关天意，取者日加多，出者不能继，人情所必争，造物亦珍秘，幸者偶然获一二，否则终日挈空器。呜呼！谁非天地父母身，肠枯目断魂惊悸。

采黄连，连将何所用，和药佐君臣，上方充御贡，监司一纸催，县官神色动，命下如风雷，隶卒打门关，锒铛粹颈到公庭，虎吏两旁莫敢控。呜呼！谁非天地父母身，鞭笞肉飞不知痛。

采黄连，连价何以给，官价仅六分，民价倍几十，田

产粥豪门，贸易何地邑，犹自倩牙人，卖儿供赋入，一口不能抵数斤，持篦输将还岌岌。呜呼！谁非天地父母身，士女仳离啜其泣。

呜呼！黄连本性寒，入口旋欲吐，如此惨百罹，苦上更加苦，转苦冀成甘，盍益征连薄，御用恐难亏，谁撞登闻鼓，酌量从改折，剜肉犹可补，不然愁此一方民，空留明月照门户。

如此严酷的土贡后果，绝不止上党、荥经两地。

朝廷有些过高的土贡要求，也未必能如愿以偿。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朝廷昭云南布政司（即省府）取琥珀200斤，引起骚动不安。云南所属的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出琥珀，官库只贮有20余斤供缴，几年都不能贡足而止。有些地方规定的贡药不足，允许用其他药材代替。如规定祁州贡蟾酥、薏苡仁等药材，“有差种者，紫苏、大黄亦然”。紫苏、大黄都是该地的著名药材。

利用土贡和朝廷采购药材之机，贪官进行勒索，从中牟利，也是常有的事。前述荥经县向朝廷贡黄连，官府向农民的收购价，仅为市价的几十分之一，就是一例。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朝廷趁樟树药交会之际，派中使采购名贵药材。中使利用权势乘机压价勒索，引起一遍惊恐。愤怒的药商纷纷闭门停市抗议，使交易瘫痪。中使购药不得，县令出面调解，风波才勉强平息。明代的这种商民反抗官府勒索事件，不少地方都有发生。

（七）清代　封建社会药业鼎盛期

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女真建立后金国，成为与明朝中央政府对抗的地方政权。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清，改女真族为满族，控制着东北广大地区。明代后期政治腐败，激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1644年3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建

立大顺政权，明朝灭亡。5 月，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夺取了起义军的胜利果实。1911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灭清，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从 1644 年入京算起，清传 10 帝，历时 267 年。

清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省、府与州、县三级。除顺天府北京、奉天府盛京（今辽宁沈阳市）两个中央直辖城市外，全国划 18 省、188 府、221 州、1369 县。在清朝统治的 267 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初经过顺治年间（1644～1661 年）恢复，康雍乾盛世（1662～1795 年）的发展，疆土巩固，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嘉庆、道光时期，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控制加重，民族矛盾尖锐，清朝开始走向衰落。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速发展后，爆发了经济危机。它们把矛头指向东方的中国，终于在道光二十年（1840 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清朝战败，逼迫签定不平等条约。此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又签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教会而来的西方医药传入中国，并站住了脚跟，给传统的中国药业带来深远的影响。

1. 人口激增与争做良医

中国人口，明末降至 6 千万，乾隆六年（1741 年）增至 1 亿 4 千万，嘉庆十六年（1811 年）为 3 亿 6 千万，咸丰元年（1851 年）达到 4 亿 3 千万，比明末增加了 7 倍多。人口的快速大幅增长，带来包括药业在内的商业繁荣。

药业繁荣的另一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极为严格。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潮，学习医药的人数大增。这些人学成之后，一部分人挂牌坐堂行医，另一部分人则自启药肆业医营药，大大充实了药业队伍。清代医学，因温病学派形成而获得巨大进步。综合性医籍有官方 1742 年编写的巨著《医宗金鉴》。药学上出现了近百部本草著作，内容广泛涉及到药学的各个领域。著名的药学专著有赵学敏 1765 年的《本草纲目拾遗》、

吴其濬1841～1845年的《植物名实图考》。前者载药921种，新增716种；后者载植物药1714种。方药普及性读物和记述草药性能的通俗读物亦不少，成为药业青年学习医药知识的启蒙读物。

人口和医药人员猛增，使清代药业发展到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

2. 全国城乡药业大发展

清代，大中城市药业发展尤为迅速。

沈阳，1636年被清太祖努尔哈赤定为京都（时称盛京）后，发展为东北地区的药业中心，是人参、北细辛、黄柏、木通、五味子、甘草、鹿茸等关外药材的集散地。零售药业除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的广生堂外，纷纷开业的有1745年的宝和堂，1799年的万育堂和1824年的天一堂等著名药家。

清代的北京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人口已超过100万。南北药材源源不断运进北京，城内药铺、药行林立。著名的店铺首推康熙八年（1669年）开业的同仁堂，此外有万锦堂、同春堂、玉和堂、仁一堂、包太和、千芝堂、一小堂等。他们经营饮片，更重成药开发，使北京成为中国北方成药生产的主要基地。尤其是同仁堂成药闻名全国，刺激它在外地开设分店拓展业务。

天津，是清代发展起来的北方沿海大城市，始为县治。乾隆至嘉庆年间，启肆的大铺有桔荫堂、宝心堂、仁育堂、同善堂。道光年间又启隆顺榕。1860年，清廷与英、法签定“北京条约”后，天津辟为开放商埠。以后京奉、京浦铁路相继开通，药业随人口激增而发展加快，至清末已有大小药业80余家。业务以饮片、成药零售为主。天津的药材批发、转运业，从康熙年间提倡海运以来，发展很快。宁波、潮州、福建、广州商人海运来南方药材和成药，换取北方药材，刺激了天津药材批发贸易。南方商人还将远志、肉苁蓉、甘草、麻黄、黄芪、人参等北方药材输出国外，进一步扩大了天津的药材大宗交易。广东商人还在天津启肆开店，批零兼营。

著名的字号商有同德堂、生生堂、广和堂、怡和堂等，率先在天津形成实力雄厚的广帮。

上海，在清初只是一个小县，仅有一些流动的卖药人。康熙七年（1668 年），伤科医生姜衍泽启姜衍泽药店。以后陆续启肆的有章大亨、姚泰山、宋存德、同德生及竺涵春（1783 年更名为童涵春）等 20 余家药铺。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商埠，开设租界，人口剧增，商业开始繁荣。外地药商纷纷到上海启肆设立分店。如 1862 年广州鹿芝馆，1882 年汉口蔡同德等。广东药商在上海设店最多，继鹿芝馆后陆续启肆 50 多家。1830 年后，上海专营人参、鹿茸、银耳、燕窝的药店发展起来，成为药业的一个分支。同治年间，专营人参的药商成立了行会组织参业公所。上海处于长江入海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中西南北药材可经河运海运而至。加上药材、饮片、成药和参茸业的迅速发展，为它在民国时期发展成为全国药材、成药的高级集散市场创造了条件。至清末，上海已有药业 200 余家[29]，经营批发业务的药行约占 1/3。

广州药业历来发达，既是中国南方的药材集散地，又是著名的成药生产基地和外贸港口。道光十三年（1833 年）统计，全国运进广州的药材有：广东，珍珠、肉桂、槟榔；山东，药材；直隶（今河北），人参、枣子、药材；山西，麝香；陕西，药材；甘肃，水银、麝香；四川，麝香、各式药材；云南，麝香、槟榔；贵州，药材；两湖，大黄、麝香、槟榔、蜂蜜；江西，药材；河南，大黄、麝香、杏仁、蜂蜜。共 14 省。广州输出的是进口洋货、南药及布匹等商品[30]。鸦片战争后，广州对外门户开放，进出口药材增加，药业又有很大发展。除原有的老铺陈李济、冯了性等外，又增加了很多药铺。著名的有敬修堂（1790 年）、梁昌和（1843 年）、瑞草堂（1878 年）、岐生堂（1875 年）、迁善堂（1878）等。广州药业凭借雄厚的人力、财力，奋力向全国设庄启肆，推销自产成药，贩运南北药材，开拓全国市场。

早在康熙年间，广州、潮州及福建药商，抓住倡导海运之机，活跃地向北方开展大规模的海运贸易，号称“粤闽潮帮”。他们常用大海船30艘组成船队，每船载重约200吨，配有武器防备海盗袭击，船头油成红色，绘大眼鸡为号，习称“红头船”或“大眼船”。初春季风北吹，船队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海岸航行至勃海大沽口，再入海河抵天津，停泊在针市街后三叉河一带。船抵时，清廷命天津知县官服率属，放鞭炮、奏鼓乐，欢迎于海河沿岸。商人们下船先举行隆重的谢神仪式，诚谢“护海女神”妈祖保了一路平安。庆祝数日后开仓贸易。官府半税优待南来的商人，值百抽三折五，即15%的关税。历时40～60天。北上的药材商品有苏木、茴香、八角、玉桂、玉桂油、广藿香、松香、樟油等，成药商品有苏合香丸、如意丸、跌打丸、冯了性药酒、三蛇酒等。待秋季季风南吹，船队又满载北货返回，有人参、黄芪、甘草、麻黄、肉苁蓉等多种北方药材。往返一次可获利3倍以上。同治五年（1866年）海运由洋轮取代[31]。广州成药以质量优良，包装新颖，疗效可靠闻名全国。著名成药有陈李济苏合香丸、黄祥华如意油、梁财信跌打丸、冯了性药酒等。尤其是苏合香丸，广东士商入京，每携苏合香丸以代旅资，亦可高价出售获些小利。以广州药业为代表的广帮，除在上海、天津外，还在唐山（启有广元堂、广和堂）、营口（东盛和，采办粮食及人参等药材）、重庆、樟树、安国等地启肆设庄，主营药材购销批发业务。清末，仅重庆即有广帮药业50多家。此时佛山镇药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畸岭街有药材会馆并形成药材市场，发卖川广药材。大宗商品有龙涎香、燕窝、沉香、肉桂、鹿茸、大黄、姜黄、陈皮等药材及成药。蜡丸成药远销南洋及美洲，成为与广州齐名的南方成药生产中心。

重庆药业清初不很发达，仅有本地一些零售店铺和小批量的药材贩运人。由于川产药材品种多，质量好，在历史上早负盛名，加上全国药业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四川建立大型药材集散市场。重

庆地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嘉陵江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市）又有涪江、渠河二江汇流，川北及甘南药材可沿三江而下重庆。岷江经灌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在叙府（今四川宜宾市）与金沙江汇合，成为万里长江的起点。川西、川南药材顺江运至重庆。沿长江又可到汉口、九江、南京、上海。因此，重庆得天独厚的水路运输，使它具备商品集散地的优越条件，吸引外地客商。乾隆年间，江西临帮药商捷足先登，在重庆设立首家外省坐商批发药号“德记药号”。贩运两湖及安徽药材到渝销售，采购川产药材运回，获利甚丰，招致临帮更多药商到渝经营。以后德记药号又首开一家服务性的德记药材牙行，开展代买代卖、介绍购销业务，从中获取百分之五的高额佣金。临帮药业在渝成功，刺激了外地、本地药商投资的积极性。先后有广东、河南、陕西、汉口、浙江等地药商到渝设立药号、牙行。到咸丰年间（1851～1861 年），省外客商较大的药号、牙行已有 30 多家。本地药商由于资金不足，先从投资较少的拆药铺及药材行栈入手发展业务，资金雄厚后逐渐开展运销和大批发。至清末，除零售的咀片铺外，重庆已有药行 20 余家、药栈 60 余家、字号 100 余家、拆药铺 200 余家。药材批发的购销业务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但是，在整个重庆药材市场上，外省药商实力雄厚仍占据主导地位[32]。他们还开展药材运销的国外业务，本地药商却望尘莫及。

在大城市药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全国中小城市及县城、乡镇药业亦有很大发展。

汉口镇，从明代中期开始发展，清代已成为湖北、湖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药材的集散地。兴旺的药业已跻身于汉口六大商业行业（盐、米、当、木、花布、药材）之列。

赤峰药业起步较晚。历史上主要集散甘草、麻黄、肉苁蓉、关防风等内蒙、东北药材。雍正七年（1729 年），有宝生源药店在西横街开业。嘉庆十五年（1810 年），热河（治今河北承德市，辖今

内蒙古赤峰市等地）同仁堂总店设分店永安堂，药业开始兴旺。

太原府药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十大商业行业（粮、油面、布、药、干菜、酒、鞋帽、典当、银、钱）之一。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较大的药号庄铺分别有 16、22、21 家，是山西药业的繁盛地区。

重庆西北的合州，较大的堂号有乾隆年间的元仪堂，咸丰年间的杜协泰、王福山，同治年间的存心堂和拆药铺宏昌正药号。元仪堂生产的成药小有名气，邻县甚至贵州药商登门购货，业主以三十扣优惠批发。杜协泰、王福山生产的肥儿糕、神曲亦远近驰名，客户“购买争先，获利甚巨，……各铺仿造虽多，皆不及焉”。光绪年间，药业有较快发展，仅经营大批发的药材行栈就有谦复行、谦泰行、人和行、荣森行 4 家开业。至清末，合州药业已在州城中名列前茅。

四川西部的嘉州（今四川乐山市），地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嘉州及其周围地区产药甚多，著名药材有雅连、川牛膝、白姜、姜黄、泽泻、佛手、芒硝等。成为地区性药材市场。光绪年间名气较大的药业有杜玉田顺源药局、李厅石广大森药号等。青衣江上游的小县城洪雅，乾隆至光绪年间开业的药肆有 15 家，其中傅裕如的太和堂在全县闻名。

湖北东南边陲的通城县是一个小县，与湖南、江西 4 县和本省 1 县交界。清代中期商业开始发展。乾隆年间以来，有关全顺、钟兴发等 7 家药肆开业。嘉庆、道光年间，发展为毗邻 5 县的药材批发中心。关家药肆雇用药工 30 多人，累资白银 3 万余两。这样的规模在当时属大型企业。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关全顺向临县开设分店扩展业务。

多民族杂居的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交通极为不便。历史上虽有地产药材外运，但本地药业发展缓慢。康熙年间，在靠近重庆东部地区的遵义，有仁和堂、元和堂两家药肆开业。光绪初年

(1875 年)，熊姓万元堂、聂性乾元堂在省城贵阳开业，省外药商也在贵阳设庄开店，销售运来的药材、成药，收购运出贵州的道地药材。贵阳成为地方性药材集散地。光绪十四年（1888 年），于德楷办同济堂，是贵阳至今尚存的百年老店[33]。

新疆古为西域之地，与中原药材交易虽远在汉代，但中药店铺的真正开设起至清代，并有其特殊性。

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边防城镇离内地路途遥远，官兵生活物资供应十分困难。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伊犁将军明瑞上奏朝廷，要求自设官营商铺解决供应。得到批准，官铺即运作起来。官铺由驻防各营借军饷开设，每年派人从内地采购日用诸物，运回销售。所得余利散给兵丁供补买马匹、修理器具之用。计有官药铺、官布铺、官茶铺、官木铺、官面铺、官当铺等等。商品向官兵供应，亦向居民销售，经营很有生气。乾隆四十年（1775 年），朝廷认为边防军队开办官铺经商，“殊失防守边疆之意”，应予以禁止。终因开设日久，又深受军民欢迎，实际并未停止。只是招用一些诚实的民间商人参与经营，进货也多在相对就近的兰州、西安等地[34]。

官药铺的设置，天山北路有伊犁九城、台尔巴哈台城和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九城包括惠远、惠宁、宁远、绥定、广仁、瞻德、拱宸、塔勒齐和伊春。惠远城是伊犁将军衙署所在地，规模在中最大。天山南路设于喀什噶尔。官药铺的规模一般较小，塔尔巴哈台城的官药铺，每年从内地运来的药材不足 100 斤。这当然不是实际进货量，因为官药铺还可以从当地或外来的民间药商那里购得药材。

同治年间，中亚浩罕汗国（今阿富汗）柯古柏武装入侵，占领天山南北大部地区。光绪二年（1876 年），清廷派左宗棠率 6 万湘军入疆，苦战两年收复失地。湘军中有不少医药人员和随军药贩。战后他们留下来摆摊行医售药。光绪十年（1884 年），新疆建省，定省会迪化。形势逐渐稳定，有了固定的中药铺。第一任新疆巡抚

是湘军将领刘锦棠，他在迪化建定湘王庙，庙内设中药铺，由一名医官坐堂，诊病售药，仍具官药铺性质。第一家有名号的民营药铺名福临泰药店，由湘军转业人员开办。后又有湘人开杏林泰药店。迪化的市场潜力吸引外地药商纷纷启肆。光绪十三年（1887 年），甘肃张掖凝德堂率先设立分店。以后有陕西人启元泰堂，河北人启德生堂、德聚堂，山西人启永盛堂。后又有西安、天津、祁州药商设庄启肆，购销药材。由于新疆地广人稀，各民族多从事游牧业，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有自己的民族医药，入疆定居的汉族也不多，所以中药业的店铺仍然很少，规模不大。清末，迪化的中药铺也不足 10 家，从业人员仅有 80 余人[35]。

清代农村人口增加，县城以下乡镇启药肆增多，呈现药业向乡村发展趋势。如江苏谢济寿、朱元善启肆于苏州枫桥镇，陆绪卿启肆于南汇县周浦镇，山东于省三启肆于长清县潘家店。四川洪雅县的罗坝、中保、余坪、三宝、柳江五乡，启肆有济生堂等 12 家。

官药局体制清朝中央政府已不提倡，但个别地方官府仍有开办。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山东新泰县置惠民药局。光绪三十二年（1907 年），山东巡抚在济南聘请药商办惠民药局，官给资本。后因资金不足，难以维持，最后卖与药商经营，官药局很快夭折。将经营困难的官营药业卖给药商民营，开创了药业转制的先河。全国其他地方开业的大铺，还有苏州诵芬堂、芜湖张恒春、杭州胡庆余堂等。

3. 三级药材市场全面形成

全国城乡药业迅速发展和出口增加，促进了高、中、初三级药材市场在清代全面形成和扩大。

全国性的高级药材集散市场，祁州、百泉、樟树，明末虽初具规模，但盛世是在清代中期以后。它们既有平时的常年交易，又有每年的定期集市，来自全国的药商相互进行批发交易，形成全国性的高级药材集散市场。

祁州药市在雍正年间，一年举行春冬两次交流会。道光年间（1821～1850 年），全国药商 13 帮赴会，真正确立祁州药市的全国高级药材市场地位。

百泉药市在康熙年间（1662～1722 年）建药王庙，扩大药材交流。道光时会期增至 10 天，南北药材汇集，官府派兵保护，交易安全兴旺，高级集散市场地位明显确立。

樟树药市在康乾年间，全镇有药号、药行、药庄、药店近 200 家，其中本地药商 140 多家，外地客商 50 多家。4 月 28 日的交流会期间，南北药材汇总，“药材之利甲诸郡”，确立了全国高级药材集散市场地位。

次于祁州、百泉、樟树药市的，还有禹州药市和马山口药市。乾隆时期，禹州有药业 400 余户，城内居民十之七八以药为生。一度与祁州齐名，有“北祁州”、“南禹州”之称。马山口药市，交易发展到 20 余省。

中级市场为地区性药材集散地。本地和邻近州县药材集中于此外销，外地药材也运抵批发内转，有买有卖，调剂余缺。中级市场常是靠近药材产区、水陆交通方便的中小城市，每省都有数个分布，规模大小不等，成为沟通初、高级药材市场的桥梁。著名的中级市场，有四川的成都、重庆、宜宾市，云南的昆明、大理，贵州的遵义、贵阳，广西的南宁、桂林，广东的广州、潮州，湖南的衡阳、湘潭、长沙，湖北的汉口、荆州，安徽的亳州、安庆，江西的建昌，河南的开封、安阳，直隶（今河北省）的邯郸、天津，辽宁的营口、沈阳，山东的济南、荷泽，江苏的扬州、苏州、上海，浙江的杭州、金华、宁波，福建的泉州、福州，陕西的西安、汉中，甘肃的武都、天水，山西的太原、榆次等地。

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在安徽西北角，东西北与河南相接，与山东、江苏邻近。涡河从西向东贯流而过，上通黄河，下连长江。北宋时是开封至江南的漕运要道。陆路亦通四方。亳州和临近州县

盛产药材，又是三国名医华陀故里，医药业较为兴旺。康乾时期，药业繁荣，地产的白芍、菊花、紫菀、花粉等数十种药材在这里集散，成为皖北、豫东地区的著名中级市场。

建昌（今江西南城）南宋为军（州级行政）治所，药业较为发达。官府设有建昌军药局。元代，朝廷令在城北建三皇宫，塑伏羲、神农、轩辕像供祭拜。明代，府内置医学校、良医所和惠民和剂局。建昌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有黎滩河、盯江汇合而下抚河，纳赣江，贯波阳湖（今鄱阳湖）入长江；陆路通全省连福建、广东。南平、邵武、建宁、汀州及赣南、赣东北诸府四十余州县药商汇集交易，至清代后期基本控制了江西、福建邻近的四十五州县的药业，成为著名的中级药材集散市场。

地处川南金沙江与岷江汇合处的叙府（今宜宾市），为万里长江第一城。南与云南、贵州接壤。云、贵、川数十州县药材汇集于此，沿长江而下重庆，外地药材也沿长江而上达叙府集散，成为西南三省著名的中级市场。

中级市场以常年经营为主。药材产新季节，交易更加兴旺。有的地方也趁节日举行药材交流会促进贸易。如济南趁9月9日传统药市期在千佛山庙会汇聚，省内外药商交易15天方散，大宗商品为济银花、全蝎、桔梗等。大理药市在3月街街期举行。建昌交流会则定在4月28日孙思邈诞辰日。

初级市场遍布全国药材产区，多形成于运输方便的集镇或县城。产新季节，药农将自种或采集的药材带到市场。3天一次的赶集日是上市高潮，本地和外地药商沓至收购贩运。商品来源除本地所产外，往往还有邻县所产。限于产地不广，初级市场上的药材品种一般不多，有的甚至是单一药材。善于经营的药商十分重视药材初级市场，常常长途跋涉赴地采购或设庄收购，因此不少初级市场在全国很有名气。

东北的新城、朔州、宁江、开源、抚顺、广宁、宽奠、瑷阳、

清河等地，是人参交易的初级市场。官府和内地药商到此采购，基本形成三日一市制度。乾隆年间，民间药商人数增多，收参量大，官府收购减少，影响朝廷收入。嘉庆初，朝廷对民间药商用限制入关、发放参票、增加抽税等措施予以限制。

内蒙古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所产的大宗药材甘草、麻黄、黄芪、肉苁蓉等，运抵河北张家口、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县北）集散。

山西长子县鲍店镇，汇集晋东南的潞党、连翘、丹参等大宗药材，明末即有较大市场。清咸丰年间（1851～1861 年），从 9 月 13 日至腊月 23 日，进行长达 100 天的药材交易。有山西、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药商常年设庄收购。

湖北老河口位于汉水上游，陕、鄂秦岭山区药材汇集于此，药商采购后沿江而下运至汉口。

甘肃南部文县的碧口镇，位于白龙江畔并与川、陕接壤。甘肃、青海的当归、黄芪、党参、大黄及陕西的甘草、麻黄、黄芩、杏仁等大宗药材在这里集散，顺嘉陵江运抵重庆。

四川的著名初级市场更多。打箭炉（今康定县）、刷金寺（今红原县南）集散麝香、冬虫夏草、贝母、羌活等高原药材。中坝镇（今江由市）主要集散地产附子、川乌，川西北及甘肃的部分归、芪、党、黄也在此集散。灌县（今都江堰市）除集散地产的川芎、郁金、姜黄外，还有川西北的虫草、贝母、麝香、鹿茸、鹿角、木香、羌活、甘松等大宗药材在这里集散，向南供应成都或经岷江运至叙府、重庆。

此外，山东枣庄（酸枣仁）、广东新会（广陈皮）、河南沁阳（地黄）、陕西潼关（潼疾藜）、四川绵阳（麦冬）等市场亦很有名。名气不大的小市场，亦不乏药商问津。康熙九年（1670 年）陕西《泾阳县志》卷二记载：“石桥镇有红花市，五六月间，贾客轮辏，往来如织”。

据胡世林主编的《中国道地药材》统计，分布于沿江、沿海、沿古栈道、沿长城内外和铁路线上的大中小药材集散地，全国共110多个，形成了药材全国流通网。

4. 精细分工与草药业壮大

清代药业经营分工比前更加精细。

药材批发为两级经营。药号、药庄经营大批发业务，药源直接从产地收购或在市场购进，进出量大，是药业中的大户。拆药铺从事二级批发，货源多在药号、药庄整件购进，经拆散净选加工后小量批发给零售咀片铺。行商专事药材长途贩运，以前两者为销售对象。药材行栈为药商存放货物、解决食宿、代购贩运、介绍货源或买主，是药业里不可缺少的服务性中间商。有的批发商经营单种或数种药材。如樟树、安徽安庆的茯苓行，河南闻喜县的珍珠行，上海的人参银耳行，沈阳的参茸庄等。药材零售业称饮片铺或咀片铺。较大的铺户都前店后坊，集饮片加工、成药生产和门市销售为一体。多数批发药业也有零售门市作为窗口，批零兼营，扩大业务和影响。

清代成药生产经营超过明代。市售品种估计在1000种以上，滋补类和治疗类并重开发是其显著特点。桑菊饮、银翘散、安宫牛黄丸、冰硼散、六神丸、如意金黄散等是畅销商品。生产经营成药的最有名大户，是南方的陈李济、梁仲弘蜡丸馆和北方的北京同仁堂。成药品种增加和销售扩大，使竞争更加激烈。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创造名牌，成为一批小企业的经营策略，使经营某类或独门成药的分工呈上升趋势。如定州（今河北定县）的张极珠金牛眼药铺、马应龙眼药铺、白敬宇眼药铺，重庆的伍舒芳膏药，太原小店镇的同心丹房，泉州的神曲茶饼店，天津的厚德堂花柳（梅毒）药铺，广州的冯了性药酒等，都较为著名。

加工类药业有饮片加工和技术含量高的特殊药材加工。饮片加工天津称刀房，樟树称片子棚。重庆的加工业发达，同治年间

(1862～1874 年）有银朱丹粉作坊、轻粉红粉作坊、龟胶作坊、半夏樟片作坊、槟榔片作坊、建曲午时茶作坊等数十家。

草药是中药的组成部分，主要是流动的民间医生（俗称草医、草泽医）使用。草药医遍及全国城乡，携药流动，以看病给药方式销售。宋代成都已出现草药铺，生意不错。有的草药医还被请入皇宫诊病。清代的赵学敏是草医，在浙江钱塘县开利济堂，主用草药，成为清代最重要的药物学家。清代草药销量大增，一些药商纷纷开设草药行适应市场需要、形成药业的一个分支。樟树、上海、苏州、广州、成都等地都有草药行。苏州草药业实力雄厚，规模最大。光绪十九年（1893 年），姚荣卿在苏州山塘街启信隆草药行，品种齐全，除销本地外，还远销东北、华北及上海。光绪三十一年的坤记药行、泰丰药行，也主营草药。成都草药业经营者众，乾隆年间建立了草药业的行会组织神农会，会员达到 350 多人。盛产草药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经营草药的行铺、摊贩也为数不少。清末，贵阳有一家取名“发火柴”的草药铺，生意兴隆，至今仍尚存于贵阳市公园北路口。贵州、湖南的苗族草药摊席地而设，在南方大部地区流动售药，经营十分活跃。

5. 药业饮片加工繁琐受批评

饮片加工炮制发展到清代，出现了方法越来越多，工艺日趋复杂的情况，反映出中药炮制学在向前发展，药业的饮片质量意识不断提高。但是有些药业并未考虑真实的疗效价值，片面追求加工炮制精细，把一些有一定范围的炮制原则推广到其他药材，从而想树立良好形象，牟取更多的利润。

香附以舒肝理气为主要功效，炮制法繁琐最为典型，有生用、炒熟、炒黑、童便浸炒黑、童便浸炒、盐水浸炒、青盐炒、酒浸炒、醋浸炒、蜜水炒、姜汁炒、艾汁炒、盐酒醋童便四味合而浸炒等十几种。杜仲原多用盐水浸炒断丝即为佳法，后有治泻痢酥炙，除寒湿酒炙，润肝肾蜜炙，补腰肾盐水炙，治酸疼姜汁炙等多法。

苍术本多用米泔水浸切片晒干，或再用麸炒以缓和燥性，工艺较为简单。而《玉楸药解》所用的新法是苍术1斤，用大枣、桂圆、砂仁各8两煎浓汁浸后，平铺于瓷盘里的隔布上，下垫一层湿米，上盖一层湿米，入砂锅内蒸透晒干，再浸再蒸，汁尽而止。由于有去心者免烦，炒炭者止血之说，有的药业不惜功夫将麦冬抽去心，不管药性如何将枸杞炒炭。其他药物也有一些繁琐炮制法。

不少医家对此提出批评。张志聪说，上古诸方并无麦冬去心、橘皮去白（内果皮）之说，后有此法记载，“后人袭方书糟粕，不穷物性原本，无怪以讹传讹，而莫之止”[36]。他在《本草崇原》麦冬、橘皮条中明确表示，麦冬不去心，橘皮不去白。吴仪洛也说：“市医常将熟地、枸杞等炒作炭用，是甘润养阴之品，变而为苦燥伤阴之物，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37]。徐大椿的抨击最为严厉，他说：“制药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详于宋（刘宋）之雷敩，今世所传雷公炮炙论是也。后世制药之法，日多一日，内中亦有至无理者，固不可从，若其微妙之处，实有精义存焉。……后世好奇眩异之人，必求贵重怪僻之物，其制法大费工本，以神其说。此乃好奇尚异之人造作，以欺诳富贵之人之法，不足凭也。惟平和而有理者，为可从耳”[38]。以徐大椿为代表的一些医药学家，主张从临床实践出发，搞清源流，抛弃不合理的炮制方法，反对不顾药效的精制逐利，达到去伪存真目的，是清代炮制领域的革新精神，十分难能可贵。对药业降低成本，保证疗效，也极为有利。

6. 西药传入与西药业萌芽

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萌芽时期的西医药知识和自用的少量药物。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久治不愈。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用金鸡纳治愈，康熙大喜，在京城赐广厦一所。金鸡纳后被赵学敏收入《本草纲目拾遗》。1840年鸦片战争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展对华贸易，船医在澳门、广州设诊所。1834年，美国传教医生伯驾在广州设眼科医馆。主要为外国海员、商人服务。

道光十二年（1832 年），英人在广州开怡和洋行，经营部分进口西药，供应它们需要。

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在沿海和内地城市纷纷建立医院和诊所。至 1905 年，全国教会医院已达 166 所，诊所 241 家。1841 年，英国医生屈臣在香港开屈臣氏药房，1850、1860 年又分别在广州、上海设立分店。以后外商在各地所开药房逐渐增加。至清末仅哈尔滨就有德、日、俄等药房 30 余家[39]。设在上海、广州的英、法、德、瑞、美等外商洋行，扩大了西药进口业务，为教会医院、诊所、外商药房和后来开办的华人西药房提供药品供应。

华人开办的第一家西药房名泰安大药房，是 1882 年由旅美归侨罗开泰在广州创办。以后广州和上海陆续开办的华商药房有广安、必得胜和中西、华英、中法、中英、华美、济华堂、五洲等药房。至清末的 1911 年，华商西药房在上海已有 28 家，广州 27 家，武汉 20 家，开封 1 家。国人西药商业开始萌芽。

无论外商、华商开办的西药房，多兼营小量成药制剂，如碘酊、双氧水、红汞水、癣药水、癣药膏等。1900 年，德商科发药房在上海建科发药厂，生产十滴水、沃古林眼药、白松糖浆等。华人开办的第一家西药厂名梁培基药厂，是 1902 年由梁培基在广州开办。1910 年，中法药房总经理黄楚九在上海建龙虎公司，生产龙虎牌仁丹，以抵制日本仁丹。龙虎公司于民国初年（1912 年）改称中华制药公司。国人西药制药工业开始萌芽，比国人西药商业晚了三十余年。从清末起，中国药业已不是中药业的一统天下，萌芽的西药业以近代医学和科技为基础，显露出蓬勃生机。

四、民国时期　药业的困境与曙光

1912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开始了中华民国时期。但是，辛亥革命胜利并未带来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北方军阀在帝国主义扶持下，相继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府。北洋政府对外卖国屈辱，对内战乱不断，压迫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屠杀革命人民，篡夺了胜利果实，1927 年建立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南京政府。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爆发了八年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配合下，中国军民英勇抗战，打败日本侵略军。后又进行 3 年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民国时期在历史上虽然只有短暂的 38 年，但中医中药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摧残和西药业的有力竞争。中药业在严酷的形势下，经受考验，向前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一）摧残与反摧残斗争

19 世纪后期，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近代医学体系建立。清末，西人和国人的西医医院、诊所、药房逐渐增多，西医药在中国站住了脚跟。清廷洋务派官员也积极开办医学堂和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西医药。这时，一些人用西医学理论体系作唯一正确标准，认为中国传统医药“原始”、“落后”、“不科学”，应予废止；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合流”；一些人主张必须毫无疑虑地保持中医药。1903 年，清廷制定大学堂章程，医学 29 门课，中医课 1 门列在首位；药学 17 门课，1 门中国药材课也列在首位。虽为点缀，但未完全丢掉中医药，是西医学习中医药知识的开始。

民国元年（1912 年）11 月，北洋政府颁布《医学教育规程》，中医药教育拒之门外，引起全国中医药界强烈反对。各地抗议的电报、集会、文章不绝。上海神州医药总会联络全国同仁，组成全国 19 省市的“医药救亡请愿团”，次年 11 月赴京，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国务院请愿，要求将中医药纳入政府《医学教育规程》。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拒绝接受请愿书。12 月 29 日，汪在接见京师医

学会代表时甚至说："余决意今后废弃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全国中医药界更加气愤，纷纷抗议、批驳。1925年仍有请愿，亦招拒绝。中药业在这次斗争中，以理据争，态度坚决。香港九八药材商行在致电中说："废弃中医，亦即废弃中药，使我国药材利权丧失太大，必须挽回利权，而得民命"。药界署名"顽铁"的文章置问汪大燮："如广阔中医中药不合乎世界潮流，则为什么洋人搜罗吾古医学书籍，不惜巨资，且携以回国？若谓中药无效力，则为什么每岁输出大黄等数百万？你汪总长抱何种方针？何等计划？我无以名之，名之曰'洋迷之尤者'"。

北洋政府虽未批准中医药教育进入政府《医学教育规程》，但也未能真正执行废弃中医药政策。1922年、1925年的"医师管理法"，下令对全国西医（称医师）、中医（称医士）进行登记；1924年令对中药业进行注册登记，默许了中医药和中医药学校在民间存在的现实。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全国中医药界强烈反对，二是南方革命政权建立，北伐战争迫在眉睫。

1929年2月2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国中医药界义愤沸腾，各界人士亦多表同情。在上海中医协会倡导下，各地中医药团体云集上海，3月17日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262人参加。大会情绪激昂，会场内悬挂"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中国医药万岁"等标语。上海医药界停业半天以示声援，并为大会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大会决定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定3月17日为国医节；即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取消这个决议案，将中医与西医同等对待。请愿团由5人组成，中药界2人是隋翰英和张梅庵。迫于压力，南京政府表态决议暂不执行。以后，全国中医药界进行过10次斗争，南京政府迫于政治形势，于1931年1月15日成立半官半民、半学术半行政的

中央国医馆，同时解散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1936年1月22日公布中医条例。两大举措出台，使中医先后纳入内政部、卫生署管理，中医办学也获得承认，中医药待遇似乎改善到与西医同等地位[40]。

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虽然默认和形式上承认中医药，但仍在实际中推行歧视、打击中医药政策。与药业有关的有以下事件。

民国十年（1921年），北洋军阀曹锟和直隶（今河北省）省长曹锐，下令将安国药王庙迁往保定，妄图取缔安国药市。药业坚决反对。曹锐又令禁市。药商们亦拒绝不理。后又用设牙纪局抽牙纪税，庙会期间设关卡盘查敲诈勒索，打击药市。药商苦不堪言，派代表去保定、北京请愿，亦未获结果。愤怒的药商掀起捣毁牙纪局风潮，终致当局取消牙纪局，规定每年上交36000银元税款收场。

民国十三年（1924年），北洋政府以禁售海洛因、吗啡等毒品为由，搞药店注册登记。上海设立了中药注册管理局。每户收取150～400银元的高额注册费。中药店从不经营这类毒品，也要强行注册，否则不许营业，暴露了敲诈敛财目的。上海药业在行会组织和义堂主持下，竭力反对，拒领执照，声言要罢市抗议并呼吁各界支持。中医团体纷纷声援，全国总商会联合会亦力请撤销。当局怕事闹大，终于收回此令。

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党军队围剿江西革命根据地。樟树税局得令，再次征收所谓“特种物品产销清匪善后捐”。规定“药材精者按值征收百分之十，粗者征收百分之五”的高额捐款，引起药业一遍恐慌。樟树药业推举咸宁号经理朱景云为首的代表团，赴南昌省府和南京中央政府请愿，无获而归。为了抗征，药商纷纷抽资，转至湘潭、汉口一带，有的因资金不足而倒闭。德茂康、德生源两药号业主，因欠债无法偿还忧愤致死。庆隆药行业主徐林斋欠捐款5万银元服毒自杀。樟树药市凋零，药农亦受其害。1933年，著名道地药材商州枳壳每担跌至两块银元还不易脱手，

不少药农赔本破产。当时药界流传民谣说："国民政府真可恶，废除中药用西药，逼使中医改了行，药材当作煮饭火，药铺倒闭关了门，樟树药业遭大祸"。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重庆当局规定，运出每担药材征收 0.1 元的所谓"剿赤税"。其他捐税也多得惊人。合川至重庆百余公里嘉陵江水运，竟有统捐、护商、江防、澄江（途中重庆一镇）护商、峡防护商、澄江清乡费、峡防费、峡江面稽查、北碚（途中重庆一区）峡防、磁器口进关等 10 种。甘肃当归每担价 9.8 元，由碧口经嘉陵江运至重庆，各种捐税为每担 21.98 元，为成本的 2.3 倍多。沿途持枪的私设关卡"检查费"还未计在内。药业苦不堪言，有的停业，有的改道运输。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北平市卫生局借口中药店无经过学校毕业的药师，配方制药不科学，企图取缔中药业。北平市国药业公会遂委托中医雷振远开办"北平中药讲习所"。1940 年，国药业公会收回自办，重振教学计划，更名为"北平市国药业公会中药讲习所"。创办前的筹备期，国药业公会向北平市卫生局申请许可。得到批准但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要学习西医药知识，增设中药新说（类似西药生药学）和公共卫生课；第二要增设日文课，取得日本占领当局的同意并接受监督。国药业公会接受了全部条件，讲习所在故宫西朝房开学。北平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任名誉所长。国药业公会会长杨彦文、刘一峰先后任所长。赵树屏任教务主任。中药新说和公共卫生课教员由北平市卫生局委派。日文课教员由日本占领当局社会局委派。其余中医、中药课教员，均请北平著名中医担任。杨叔澄授中国药物学、中国制药学，讲述本草学、炮制、制剂内容。瞿文楼授中医诊断学。安翰青授中医病理学。仉几吾授中医处方学。国文课由韩汝愚授，主要讲古代汉语。学制先一年半后一年。招收北平各药店青年药工，上课多在晚上进行。共办 4 届，毕业 400 余人。由讲习所发药剂生毕业证书。有的毕业生后来成为

北京地区中医、中药界的有名人物，如郭士魁、金世元等。

（二）帝国主义侵略使药业陷入绝境

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一直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中国人民蒙受深重灾难，中国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中国药业亦不例外。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同仁堂制药工场被夷为平地。

日本帝国主义早有向中国扩张野心。从 1894～1945 年的 50 余年间，一直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甚至占领了中国半壁江山。中国药业遭到一场巨大的浩劫。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进攻上海，100 余家中药店变成废墟，3 万件药材被抢劫和烧毁，大批药店关门或搬迁。山西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1933 年有中药业 2572 家，1937 年底减少到 669 家。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前，安国城关药业工商户有 2227 家，从业人员 20229 人。1938 年底，日军第三次进攻安国时，药业仅存 80 户，从业人员 240 人。药业凋零、田园荒芜，药材生产迅速下降。安徽三大道地药材，亳芍抗战前年产 18000 担，1942 年降至 7000 担，1947 年仅产 3000 担；亳菊 1936 年产 2000 担，抗战期间降至 800 担，1946 年仅产 360 担；茯苓 1936 年产 30000 担，1945 年降至 20000 担。东北栽培人参，1929 年产水参 150 万斤，1939 年降至 100 万斤。1931 年“9.18”事变前，东北输出药材约 1800 万斤，1944 年仅输出 610 万斤，而且大多被掠往日本。造成国内东北人参、鹿茸、甘草、防风、龙胆草、细辛、五味子、黄柏、木通等药材奇缺。为了加速掠夺，日本通过扶持的傀儡政府，1941 年成立满蒙汉药株式会社，1942 年在天津成立药业组合等专门机构，垄断药业经营，组织中药运日。日本还运来自产的劣质药材当归、川芎、黄连等，换取中国优质的道地药材。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财经更加吃紧。为了填补战争亏空，

日军全部扣留没收天津码头的出口货物，中药材有数千件之多。内地药业也因各地药材交流中断无法经营。重庆中药批发业由 1930 年的 400 余家，降至 1944 年 2 月的 157 家。

战前刚有一定发展的西药业，也因日军入侵而受摧残。

西药工业原料多依赖进口。抗战期间，欧洲二战激烈，来源断绝，惟靠美国输入。1941 年 12 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来源亦绝。加上日本国内药厂和在华药厂生产的成药大量上市，中国制药工业占多数的中小药厂陷入绝境而纷纷倒闭，较大的药厂也经营艰难。西药商业也因日商的竞争或垄断，不少药房经营惨淡或停业。在沦陷期的广州，日本开设的药厂、药房，占整个西药业的 70%。湖北城镇销售的日本成药不下二三百种之多。

日本还掠夺中药资源，利用中国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开办原料药厂。产品运回国内，加工成品反销中国。早在 1917 年，日本就在赤峰市建立大和洋行，生产甘草膏。1941 年，在厚和市（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建立蒙疆甘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甘草膏。1943 年又在山西大同设厂生产麻黄膏。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三）全国药材高级市场大转移

抗日战争前，传统药材高级市场祁州（后改称安国县）、百泉、樟树发展到鼎盛时期。

祁州药市，1922 年牙纪局在春、冬庙会期间，征收 1% 的药材出境税，即征得银元 53 万余元。1925～1932 年，是最繁荣时期。每年平均进货总量约 8124 万斤，营业额 2530 万银元[41]。1927 年，到会的外地药商 1610 户，7395 人；本地药商 450 户，5100 人。蒙古、日本、朝鲜、俄罗斯及香港、南洋等地，也有药商赶来参加。交易药材除国产的外，还有印度牛黄、印尼血竭、越南犀

角、朝鲜人参、美国花旗参、日本东洋参及梅花片等国外药材，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际药材交易市场。1936 年，生药学家赵橘黄调查后写道：祁州“为从来南北药材集散地之一大市场，而尤以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之松潘，以及满蒙产品最为完备。其产品出于四川及长江流域各省者，则由平汉与京浦两路而达，出于闽、广、滇、黔等省者，则由水路经天津而达。故祁州之药材，实可称全国药材汇总之地，药商辐辏之区也。……祁州至南关，药市喧阗，药气薰天，熙来攘往”。1938 年，日军三次攻占祁州。药业大部分逃迁天津、北京及东北的大城市，在祁仅存 80 余户。1940 年，日伪华北政务当局想“复兴”祁州药市，确定农历 4 月 14 日和 11 月 15 日举行药王庙会，也采取了诸如成立复兴药业委员会、整修药王庙、增开商市、扩大宣传、优惠食宿、减免税收、确保安全等措施。甚至日本侵华陆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伙同伪河北省主席，亲到药王庙祭拜，响应药商也寥寥无几。就是这个冈村宁茨，指挥了 1942 年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把复兴药业的幌子撕得粉碎。1944 年，祁州药业也只有 104 户。全国药都的地位已不复存在[42]。

百泉、樟树药市，也因公路、铁路修筑、日军占领和大城市人口剧增等原因，失去昔日地位。全国药材高级市场，已逐渐转移到沿海的天津、上海、广州和内地的汉口、重庆、西安六大城市。沿海城市占了一半，反映药材进出口增长到一个新的高度。

天津药业 1914 年仅 80 多户。1937 年“七·七事变”前增至 300 余户。日军占领华北后，天津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大批难民拥入天津，城市人口剧增。东北药商拥进天津，推销关外药材，购进关内药材。大批祁州药商因避日军战火也拥入天津。其他行业商人见药业有利可图，也启药肆。药业猛增至 700 余户。天津成为南北药材的重要集散市场和出口港。

上海进入民国以后，是民族工业发展的中心城市。中药业由清

末的200余户，发展到抗战前的383户。中西部药材经长江水系运至上海，南北药材由铁路抵沪，出口药材也在这里装船启航。外地药商来沪的，有川帮、汉口帮、西淮帮、禹州帮、亳州帮、洋广帮、山货帮等。国内药材和进出口药材汇集，上海已成为全国六大药材集散市场之一。日军占领华北地区后，上海的英、法租界相对安全。本地、外地避难的平民、商人拥入租界。上海人口由原来的300万激增到650万，商业出现奇特的“繁荣”。中药业也因此猛烈增长。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全市药业达到1500余家。其中零售店778家，批发商600余家，参茸店114家。抗战胜利后，交通恢复，中药业有过短期活跃。后因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美国洋药倾销，部分药业倒闭，部分药业内迁原藉。1949年，上海仍为中药业最集中的大城市，有药业1000余户，从业人员9000余人。

广州在轮船运输改善，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后，加强了全国药材高级市场地位。中药业进一步繁荣，经营分工分化为八行。南北行专营药材批发；西土行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生药行经营药材小批发及零售，但不经营饮片配方；参茸行专营人参、鹿茸批发及零售；药片行经营药材饮片加工；丸散行制售中成药；熟药行专营饮片配方；生草药行专营草药。日军攻占广州后，中药业遭受巨大破坏。大部分中药店倒闭、停业。陈李济被炸毁后迁佛山，王老吉被烧后迁澳门，李众胜堂搬香港。医药市场几乎为日货霸占。日本投降后，中药业有过短暂复苏。1949年，广州有中药业近1000户，在全国中药业占有相当的地位。

在重庆药市上，为了扭转清末客大压主的被动局面，从民初到抗战前的二十多年，本地和四川药商锐意经营，奋力发展，终于取得了向全国贩运药材的主导地位。其中以“三泰”、“三长”的实力最为雄厚。正泰和药号除经营行栈业务外，还在四川的药材产区绵阳、中坝、广元、宜宾等地设庄收购药材。一年的经纪业务达10万两白银之巨。德泰和药号，单是经营甘肃碧口当归，每年即达

10 万余斤。谦泰隆药号，也在产区设庄收购药材，货物直运汉口、上海、广州等地销售。福远长药号，主营上海业务，年输出药材上万件，几乎占申、浙两帮的总和。聚义长、同义长两家药号，在经营上海业务的同时，还在牛庄、烟台、天津、宁波、厦门、汕头等地开展业务。1930 年，重庆经营药材批发业务的有：运输商 220 家、广药批发 25 家、拆药批发 120 家、特药生产作坊 30 家和 80 家药材行栈。从业 4000 余人。1922 至 1934 年间，平均每年出口麝香 10000 余两、大黄 7500 担、姜黄 24000 担。1931 年至 1937 年，出口药材 102 种，年均输出量为 1600 多万斤。交易额居重庆商业市场交易的第四位。在重庆的药商，有四川七帮和省外的临安帮、广东帮、怀帮、浙江帮、陕西帮、汉口帮、上海帮、天津帮、营口帮等九帮。全国药商在重庆云集和成功经营，确立了重庆全国高级药材集散市场的地位。

抗战期间，由于交通阻塞，进销渠道不通，重庆药材业纷纷关闭。由战前的 400 余家降至 1944 年的 157 家。但是，此时的中药零售业呈现兴旺景象，1947 年统计有 711 户。其中饮片铺 539 户、草药铺 54 户、参茸铺 13 户、银耳铺 6 户、药酒店 27 户、丸散铺 36 户。这与抗战时重庆作为陪都、大量难民流入、不少药业内迁有直接关系。

汉口为水陆交通枢纽，西安是西北药材出境的门户，都在这时发展成为全国药材的高级市场。

与萧条的广大内地市场相比，抗战时期天津、上海、重庆药业相对繁荣，是日军攻占中国大部地区及三市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从本质上看，只是一种带殖民地性质的畸形发展和虚假繁荣。

（四）县以下中药业

尽管民国时期内忧外患，西药业在全国有较大发展。但是，中

药商品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县城及其以下的乡镇中药业仍有相当大的发展。

山东泰安地区辖六县，有中药堂店 1315 家，平均每县近 220 家。

四川县以下中药业发展更大。川东的合川县（今属重庆市），1949 年有人口 60 万。民初有拆药铺 30 余户、咀片铺 200 余户、药材行栈 8 户。后期最盛时分别发展到 80 余户、400 余户和 20 余户，增加了 1 倍以上。其中 300 户咀片铺分布于各个乡镇，占了零售铺的 3/4。川西丘陵的仁寿县，中药业达到 506 户，除城关镇 28 户外，其余 476 户分布在全县 15 个乡镇。什邡县是个小县，1949 年人口 20 多万。清末时药业不多。民国盛期有拆药铺 9 户、咀片铺 169 户、药材行栈 2 户、药酒店 3 户、草药铺 7 户，共计 190 户。其中云西镇占 33 户。云西镇中药业，还从每年的农历 4 月 28 日起，举行三至七天的药王庙会交易药材，川西各县及成都药商前往参与，气氛十分热闹。药王庙会一直持续到 1948 年止。川中丘陵地区的安岳县，交通不便。清末县城只有元顺药号一家拆药铺和少数咀片铺。至 1949 年，在县城先后开业的有拆药铺 19 户、咀片铺 31 户、药酒店 1 户。其中 9 家拆药铺兼营饮片零售配方。在农村乡镇，有拆药铺 4 户、咀片铺 212 户。城乡共计药业 258 户。1949 年安岳全县人口 57 万，城乡平均每 2200 人有中药业 1 户。与中等城市沈阳相比，1948 年沈阳解放时人口 80 万，中药业 460 户，平均 1800 人有一户。相差并不悬殊。

（五）成都“七·四”药工运动

民国时期，中药业历来发达的成都，药工的地位却很低下。药工们从事的工作不认为是技术工作，工资比百货、绸缎等行业低。老板对伙食实行“二三制”，即从农历 8 月 16 日至次年 5 月 4 日，借故白天短，只开两餐饭；端午节至中秋节则开三餐。老板还在每

年的三大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挥舞解雇大棒，随意解雇工人。

1939年，成都市中药业资方，在市政府支持下成立“成都市国药业同业公会”，彼此协调立场，加紧了对药工剥削与控制。药工对资方蓄积的不满情绪随之加剧。1947年初，在物价飞涨的刺激下，药工们终于团结起来。成都八个区的药工，每区选出两个代表，与同业公会谈判。代表们向同业公会和成都市府提出了三项要求：承认药工的工作是技术工作，准许建立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成都市国药业技工会”；增加工资；反对随意解雇工人。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3个月，同业公会仍拒绝接受三项要求。谈判破裂，药工群情激愤。决定于7月4日举行罢市和请愿游行。由于资方告密，4日晨，市警察局抢先动手抓捕了冯象贤等3名工人代表。药工们怒火燃烧。上午，三四百药工汇集提督街中山公园（今成都市文化宫），然后向市政府进发，进行请愿游行。药工们挥舞的手旗上写着三项要求。游行队伍进了市府大院。市长陈炳光被迫接见。徐楚江、刘国泰以首席工人代表身份，向市长提出了立即释放被捕代表和药工们的三项要求。市长接受了请愿书，答应放人，研究提出的要求。药工队伍离开市府大院，继续游行到西顺城街。要王荣丰堂老板，交出在该店被抓捕的工人。资方恼羞成怒，大打出手，工人王仲华被打伤。药工们义愤填膺，将伤者抬置柜上拍照，打算据此向地方法院起诉。当晚，一二百药工在提督街三益庙茶馆集会，商量对策。成都警备司令部出动军警盘查，声称要抓“异党”，驱散了工人。罢市、游行、集会持续了3天；终因无经费、无结果、大批药工被解雇而告终。

（六）西药业迅速发展

进入民国以后，国人奋力发展民族工业形成一种潮流。西药的医疗实效已为更多的人认识和接受，在国内外学习西药的人员逐渐

增多，开办西药药厂和药房能获较高利润等因素，促进了中国民族西药业迅速发展。外商完全控制中国西药工商市场的局面得到一定扭转。

民国三年（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无暇顾及中国，西药进口额减少。中国民族西药业遇上快速发展的好时机。以上海为例，清末的 1911 年，有华商西药房 28 家、药厂 1 家。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药房增至 44 家，西药厂增至 20 余家。但这些药厂大多设备简陋，品种单一。

大战结束不久，国外西药又涌入中国，这批药厂无力竞争而大部停业。以后，华商吸取了教训，又奋力发展。至 1936 年，西药工业企业，上海已有 58 家，广州 30 余家；西药商业，上海已达 166 家，广州 84 家；大小西药房，上海、广州、天津、湖北、河南等 14 省市，计有 1300 余家。上海成为中国西药工商业最集中、最发达的城市。此间较为著名的药厂有：1919 年的佛慈药厂，以提炼中药为主；1922 年的五洲固本皂药厂，生产甘油、汞溴红等 10 种原料药和按国际药典标准的多种制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1925 年的海普药厂，第一家生产针剂；1926 年的亚新药厂，生产有机砷、麻黄碱、葡萄糖等原料药，后在北平、重庆、香港设分厂；1933 年的上海中央玻璃厂，是中国第一家具一定规模的玻璃仪器厂；1934 年的天津永生化学工业公司，开始生产化学试剂。

抗战时期，日军侵占了中国半壁江山。刚有发展的西药业，或毁于炮火，或被日本药品倾销陷于破产。保存下来的西药业在艰难的环境中挣扎。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出现了特殊的畸形发展。原因与中药业的畸形发展相同。

抗战期间上海的西药厂净增 110 家，共计 168 家；西药房净增 486 家，共计 652 家。其中西药房 266 家，西药行 372 家，医疗器械、化玻试剂 14 家。广州的西药业与上海不尽相同。西药商业，

由1936年的84户增至1945年的153户。其中零售89户，批发58户，其他6户。西药工业则受严重摧残。大部分药厂被炸、被烧、被抢和迁移外地。沦陷期日本在广州开设了18家药厂、药房，占广州西药业的70%。日本还成立西药管理机构，保护本国企业，打击中国药业，控制着西药市场。余下的中国药厂多数停业。存留者不足战前的1/3。重庆，由于日占区药厂大量内迁，加上本地几家药厂，总数已达30余家，成为国统区西药生产的主要基地。

抗战胜利后，交通恢复，搬迁的药厂、药房纷纷迁回原籍。西药业有过短期活跃。随即国外药品又大举涌入中国市场。1946年，有25国向中国输出药品和医疗器械，总值达1800万美元。而美国为1480万美元，占了80%。国产西药仅占10%左右。大批华商药厂陷入绝境。仅上海就倒闭了98家，超过了原有的一半。后虽有58家药厂新设，但均为西药行转向的小型厂。倒闭数仍然超过新增数。至1949年，全国有药厂269家、药房7468家，从业约2万人[43]。

民国时期，西药零售业在县级城镇亦有相当发展。如安岳县城，1900年仅有天主教开的一家药房。1920～1948年间已有15家，其中西医诊所兼营者8家，零售药房5家，西药批发2家。什邡县最盛时有西药房48家，1949年仍有27家，其中县城18家，云西、湔底、马井、禾丰、两路口五乡镇9家。仁寿县有西医诊所67家、西药房16家、西药批发2家。在县城的诊所为15家、西药房10家、西药批发1家，其余分布在全县15个乡镇。西药业在艰难的环境中确实有了迅速发展。

西药业在经营中也有大药房设厂，药厂设门市，医生开药房等情况，体现了工贸一体、医药共营的经营模式。

但是，民国时期的西药业，90%的药厂是设备简陋的中小型药厂。多的百余人，少的二三人。大型的上海亚新药厂，盛时有员工1100人，是一个例外。药厂的原料依靠进口，技术力量薄弱，产品基本上仿制国外。原料药仅能生产少量的麻黄碱、甘草膏、葡萄

糖、葡萄糖酸钙、樟脑、磺胺噻唑、咖啡因、烟酰胺、有机砷等十几种。西药房绝大多数是小型的“夫妻店”，经营品种少。全国市售 1000 余种西药，国产约占 200 余种。

西药业迅速发展，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医药的先进成果，中国人民又多了一种防病治病的有效手段。同时，也彻底结束了中药业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历史地位。中国药业从此形成两种不同科学体系药业并存局面，共同占有中国市场。给传统的中药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但是，民国时期的中国药业，从药业户数、从业人数、地域布点、出口贸易和经营效益等方面看，中药业仍占主导地位。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人们主要使用的药物，仍是中药行业提供的传统中药。

（七）革命根据地及解放区药业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重新聚集革命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建立武装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 年 8 月～1937 年 7 月）。从 1927 年 10 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至 1930 年 5 月，已建立了大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 6 万多人。各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1935 年，左倾路线错误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 年 10 月各部红军到达陕北，长征胜利结束。日本妄图占领全中国的野心，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民族矛盾加剧，迫使中国进行八年抗日战争（1937 年 7 月～1945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民在敌占区抗击日寇。革命力量有很大发展，全国建立了十几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并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人民的和平愿望，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妄图消灭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民，又进行了 3 年半解放战争。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蒋家王朝退守台湾省。

1. 封锁围剿药品奇缺

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与围剿，造成药品奇缺。尤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更为严重。“食盐、布匹、药材（药品及卫生材料）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有时真是到了极度”[44]。井冈山根据地的永兴、宁岗两县，一段时间完全断绝了来源。湖南省委答应办药也运不上去。毛泽东向中央写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催要的药品仅是一种消毒用的碘片。食盐水成了主要的消毒液，有时也没有。红军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重伤住进茅坪红军医院。几位战士受全团委托看望首长。离开时留下的礼物是一张小纸包的食盐，这是一千多名指战员一点一粒省下来的珍品。张子清把它珍藏起来，断盐时交给医院，供重伤员消毒用。最困难时，有的红军医院只有食盐、猪油两种“药品”。海南岛的红军医院没有敷料，只好用香麻树皮代替绷带、篓笔树叶制成纱布使用。

抗战时期，根据地扩大；加上爱国人士、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支援，药品、医疗器械和卫生材料供应有一定好转。但是仍然十分困难。在欧美，1935 年后盘尼西林（青霉素）和磺胺逐渐用于临床。1942 年青霉素才由英国友人李约瑟作为样品带到重庆，所以这些药品在延安特别昂贵。一支青霉素针值一两黄金，一瓶磺胺值五钱黄金，一套 38 件手术刀值三两黄金。普通解热止痛药阿司匹林也很紧张。一个营的编制，一季度能配几十种药，数量都很小。如能配 50～100 克阿司匹林、200～300 包行军丹、2 磅健胃药就算不错。珍稀的青霉素只能留给高级干部和重伤员使用。事前还须报中央主管领导李富春批准[45]。为了打破敌人封锁，保证军民用药，促进革命胜利，军队和地方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兴办公营药业，保护和发展集体、个体药业，人民的医药事业有了蓬勃的发展。

2. 大力兴办公营药业

1928 年，井冈山建立第一家红军医院——茅坪红军医院，使

用中西药治疗，建立了中、西药房和制剂室，以后各红军医院均有相同设置。1931 年，井冈山建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生产简单的中西药品、药棉、纱布、绷带及一般外科器械。同年，闽浙赣根据地遵方志敏主席指示，由财政部出资，将江西横峰县城葛沅街四家私人中药铺全部买下，合并成立闽浙赣总药店。内部设置办公室、门市部、种药队、采药队、制药厂，共 80 多人。还在玉山、上饶、弋阳、德兴、乐平、万年等县的苏区建立分店。业务兴旺时分店达 30 多家。总店每月开一次分店会议、派巡视员到各分店检查工作。这是中国药业史上，集农工商一体，产供销合一的第一家公营中药企业集团。红军长征后闽浙赣总店解散。1932 年，闽西苏区才溪红军医院在上杭建制药厂，干部职工 30 余人。同年，中央苏区建红军总医院。1933 年，瑞金建医药材料厂；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建中医院。至 1934 年，苏区医院、药厂已能配制、生产的中药有青蒿丸、金鸡丸、藿香丸、白芷膏、红升丹、柴胡制剂等数十种，西药有樟脑、薄荷油、硫酸钠、硫磺、乙醇、精制食盐、敷料、卫生材料等 10 余种。

抗战时期，军队和根据地壮大，药品需要更多。分散的根据地和日军的封锁、扫荡，要求各地建立自己的物资生产供应系统。中共中央提出了一边战斗，一边“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党政军机关兴办各种实业形成热潮，药厂、药房纷纷组建。

1938 年，八路军总部卫生部在陕西赤水县（今旬邑县）建八路军制药厂，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建光华药厂。1941 年，晋察冀军区建伯华药厂，晋冀鲁豫军区建利华药厂。1942 年，晋绥军区建晋绥军区制药厂。1943 年，胶东军区卫生部建新华制药厂。光华药厂主要生产中成药和中药饮片。八路军制药厂、伯华药厂生产中西成药和卫生材料。利华药厂主要生产卫生材料及部分中成药。晋绥药厂主要生产医疗器械及部分药品。新华药厂主要生产西药、医疗器械及卫生材料。八路军制药厂 60 余人，在厂长李维桢

带领下，1940 年生产中药丸、散、膏、酊等剂型 80 余个品种，西药片、针等剂型 20 余个品种。有抗菌、消炎、解热、止咳、利尿、通便、治感冒、治痢、强壮等类别。有名的中成药是行军丹、健胃散、痢疾灵、红色补丸等。伯华制药厂的中西药品达 120 余种。光华药厂中药制剂和中成药 100 余种。较为有名的是治感冒的樟麻丸（麻黄、桂枝、樟脑、柴胡）、治胃病的健胃散（白术、陈皮、大黄）、通便的大黄末、止泻的木炭末、治痢的痢疾丸等。

在大力兴办药厂的同时，各地还纷纷开办公营药房。1938 年，中共中原局在河南确山县创建中药房。1941 年，山东郭城东桂山建桂山药房。1942 年延安有中央经委的交通药店，联防司令部卫生部的中西大药房，边区政府卫生署的西北药材庄三家大药房。每家药房都经营中药批发和零售配方，也兼营少数西药和卫生材料，并有中医坐堂。延安工商联合会医药组，负责管理医药市场、药价并帮助调剂货源。

抗战胜利后的解放区，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和军民日益增长的医药需求，公营药业有了更大发展。日本、国民政府和汉奸官僚的药厂、药房被人民解放军接管。新建的药厂有：1946 年冀中军区卫生处在河北安国的旗帜药厂、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在河南濮阳的亚光药厂；1947 年冀鲁豫军区在河北彭城的前卫药厂。同时对原有的一些药厂进行合并，扩大了规模。如 1949 年的西安制药厂由 3 个部队药厂合并而成。

在公营医药商业方面，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后，首先接管了大连、旅顺、金县的敌产药房，组建了大连中华医药公司。1949 年，哈尔滨建东北药房，沈阳建东北医药公司。1946 年，山东泰山专署在莱芜办大众药房。冀中解放区党政军机关开办的医药商业，安国有 10 家，邢台 7 家，邯郸 5 家。这些医药商业机构一般都经营中西药品和卫生材料的批发与零售。安国十家的隶属关系是：

康宁药店	冀中军区党委
大中货栈	冀中军区卫生部
伯华药厂推销部	冀中军区卫生部
旗帜药厂中药批发部	冀中军区卫生部
大众药房	冀中军区七分区卫生部
裕华药社	定县地委和安国县委
华励盛兴药行	晋察冀土产公司
华通货栈	安国县委组织部
信昌药庄	安国县委宣传部
兴盛药庄	安国县财政科

革命战争时期党政军机关大办公营药业，是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开展大生产运动结出的硕果，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军民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党政军机关职能正常化，取消了机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各医药机构有的关停，有的先后合并成为国营公司或药厂，成为新中国国营医药工商企业的基础。它们积累的生产经营管理经验，为新中国的医药行业管理提供了借鉴。

3. 保护发展集体个体药业

在大力发展公营医药机构的同时，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保护个体药业、发展集体药业的方针。个体、集体药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形成3种医药经济并存互补局面。1930年至1934年，闽西苏区开办了不少药材合作社，仅模范乡才溪就有5家。资金民办公助，群众自愿入股。合作社里设主任、药剂员、采购员和医生。自制部分丸散膏丹。医生坐堂或出诊不收诊费，药价按进价加两成计算。账务每月公布交社员审查。年底从纯利中提10%分红。开会、审账一律不开支招待费。免费为过路红军伤病员诊病送药。红军家属、合作社社员和特困户减费照顾。群众十分满意[46]。延安的集体药业有保健药社和大众卫生合作社。1944年，山东滨海专区建

立了滨海区医药合作社。都是中西药和卫生材料兼营。1945 年 8 月，安国从日军手中解放，成立的人民民主政府，采取了建立工商联合会，废除苛捐杂税，帮助解决资金困难等措施，衰落了七八年的药业又出现生机。十三帮药业，1945 年 8 月只有 21 户，1946 年 6 月发展到 193 户，1948 年 6 月又增加到 495 户。药材销售迅速上升，1949 年比 1946 年增长了四倍半。

4. 多渠道的药材来源

在封锁、围剿的严酷形势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开辟了多种渠道，解决生产、供应中的原料问题。由于西药原料来源困难，开发中药自始至终都是最重要的来源，主要有下列方式。

自己采药种药：

宁岗红军医院的药材供应部门，经常组织人员上山采挖中草药，品种达 70 多种。暂时未用的药材，晒干后贮存在茶山药库，数量达 40 多担（100 斤为一担）。闽浙赣总药店在横峰县磨山岗和汪家棚有种药场，由 10 多人专门种植药材。汪家棚药场至今仍是药材生产基地。

收购本地药材：

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多在山区，盛产药材。陕甘宁边区出产的大宗药材有甘草、麻黄、柴胡、黄芩、苦参、知母、葶苈、杏仁、苍术等几十种。延安的土产公司、各系统的药店、药厂都收购药材。

与外来药商进行贸易：

有些白区的商人，冒着极大的风险，把药材运到边界集市上出售。交易方式有以货换货和银元现金购买两种。有的甚至直接运进延安城进行交易。这些商人用牲口运来陕甘宁边区不产或产量很少的中西药品。中药有人参、贝母、川芎、附子、白术、白芍等几十种。每次有几个或十几个货驮子不等。品种不多，数量也小。白芍一次十来斤就很不错，有的品种只有一二斤。这些白区商人大多从西安来，每月到延安交易约二三起。换回边区的牲口、皮毛、食

盐、甘草等特产物资。

到敌占区采购药材：

到敌占区采购药材有 3 种形式：一是直接化装成商人，采购贵重急需的抢救性药品；二是在白区建立足点，开设药房、药庄，所需药材办好后上级派人接运到解放区；三是和一些爱国药商挂钩，委托他们代为采购，或把药材运到指定地点交货。陕甘宁边区常去的地方是西安。西安不仅离延安近，也是西北最大的中西药市场。1936 年底发生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利用这一大好形势，大量采购各种药品器材贮备起来。1940 年，蒋介石反共活动又趋猖狂，对陕甘宁边区封锁加紧，药源又很困难，使药厂生产和药房供应下降，采购的范围甚至扩大到冀中的安国、邯郸。一些爱国药商，在与根据地进行药材交易中，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与牺牲。山西平遥县中药铺文景堂、玉文堂，在日军占领下，暗中与吕梁根据地恒兴昌药号进行商业往来，经常把军需药品运往根据地。1944 年，由于汉奸告密，日寇将文景堂的宋国英、胡经王和玉文堂的雷照普杀害。

从敌人手中缴获药品：

打扫战场时，缴获敌军留下的药品。有时专门袭击敌军医院或运输队，截获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在解放城镇时，没收帝国主义和汉奸、官僚开办的药业物资，往往可缴获较多的药品。

争取支援：

抗战时期，海外爱国侨胞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为根据地筹募了大量药品和器材。联合国救济署为华东、华北解放区援助了一批药品和器材。1940 年，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到新四军采访，先后为根据地征集了 5 万多美元的药品和器材。

5. 发展中医药的一贯方针

国民党南京政府摧残中医药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

据地和解放区，在大力执行着发展中医药的方针，中医药和西医药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1928 年，井冈山茅坪红军医院成立时，毛泽东指示“用中西两法治疗”。还特别指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1944 年，毛泽东主席又明确指出：团结中西医是一个路线问题，确定了中西医药要团结合作的方针。这一方针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

茅坪红军医院初建时，3 名医务人员中两名是中医。红军总医院有 40 名中医。1938 年，八路军 129 师 5 个卫生所有 30 名中医。同年建立的八路军制药厂，从延安抽调了十几名中药技术人员，组成了药厂的中药部。延安的五大药房都有中医坐堂。中药工出身，后来参加红军的李三多，任中西大药房经理。在西北药材庄，有真才实学的老药工最高月薪一石五斗小米，而该庄经理胡用贤才月薪八斗，几乎高出一倍。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是陕北著名的老中医。毛泽东主席患风湿病，请李先生诊治后愈。双重身份使李鼎铭成为毛泽东窑洞里的常客。延安整风，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建议，毛泽东向全党赞扬说，李鼎铭先生的建议提得好，我们要按他的意见办。中医李鼎铭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

为了检查医药卫生工作，1941 年延安举办医药卫生展览。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兴致勃勃前往参观。毛泽东在看西北药材庄的中药展品时，对芒硝产生了兴趣。原来根据地药品缺乏，芒硝的清热通便作用被充分应用。大便不通、消化不良、肚子胀痛、轻症痢疾、疮疡肿毒等，医生往往先给一包芒硝，通理肠胃，常有一定效果。芒硝成了军民中知名度很高的“万能药”。所以毛泽东停下来问解说员胡用贤：“芒硝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胡回答：“从三边分区生产的食盐中提出来的。食盐中的苦涩味成分就是芒硝，把它提出来药用，食盐也不苦了”。毛泽东又问产量大不大？胡答很大，三边的食盐很多。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赞扬说：“很好”！

正确的方针与中央的关怀，成为推动中西医药团结发展的强大动力。

五、空前繁荣的新中国药业

新中国成立 50 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人民生活诸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的医药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坚持中西团结共同发展的正确方针，有了巨大发展。中西药业经过由分散到集中，改造私营药业，理顺管理关系，进行技术改造，改革经济体制，健全法制管理，规范医药市场，扩大国际贸易，培养科技人才等重大措施，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集中西药一体的中国药业，以空前繁荣，独具特色，13 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决心，展现于世界医药之林。

（一）理顺管理关系和坚持中西医药团结发展

革命战争时期的医药卫生工作，主要由中央军委卫生部管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设卫生部，对中西药和医疗器械进行统一管理。军委卫生部则管理军队的医药卫生工作。

1950 年 8 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央军委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药工作者”的卫生工作三原则。毛泽东主席为大会提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努力奋斗”。朱德总司令到会讲话，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原料制造药物和医疗器械，逐步自给，减少进口依赖。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和毛泽东主席指示，成为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根本方针。

在卫生部领导下，1950 年 8 月成立中国医药公司，负责药品

和医疗器械供应。1955 年划归商业部领导。1952 年 11 月成立医药工业管理局，负责化学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1956 年划归化工部领导。西药和医疗器械的生产供应开展得非常顺利。但是这时，对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和革命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中医中药，却又受到歧视和排斥。中医进不了国营医院。国营商业中，只有土产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经营部分大宗药材的收购、批发业务。全国 10.4 万户中药工商业、27 万从业人员，缺乏国家的专业领导管理。药材生产恢复缓慢，供不应求状况日渐突出，影响了人民用药需要和中医药政策落实。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卫生部门的少数负责官员，对中医中药仍抱有一定的偏见。

1954 年，毛泽东主席针对中医中药工作出现的偏差，及时做了重要指示。对于中药，他说："中药应当很好的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遗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对各省生产的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47]。同年，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积极贯彻指示精神，向中央财委提交了"关于中药材经营问题"的报告，决定成立中国药材公司，统一对全国中药工作的领导管理，加强中药经营，有重点地设立中药制药厂。报告得到批转。1955 年 3 月，中国药材公司在商业部成立，接管了中国土产公司、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中国医药公司的中药业务。省、地、县亦相继建立各级中药材公司，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结束了中药分散经营和私营商业起主要作用的局面。1957 年，中央决定药材生产由经营部门兼管。药材公司成为农工商一体、产供销结合的专业公司和行业管理体制。

1958 年 10 月，毛泽东主席又明确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给予了中国医药学极高的评价，确立了中国医药学的科学地位，指出了中国医药学的努力方向，阐明了这是国家制定保护发展中医中药政策的出发点。歧视

中医中药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扭转。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的传统医药"。中医中药的存在与发展，从此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护。

中西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曾有多次变更，不利于发展。1978 年以前，中西药品供应紧缺在 100 种以上；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低；新药品、新剂型、新器械发展缓慢。1978 年 8 月，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成立。直属国务院，由卫生部代管。下属中国药材、医药、医药工业、医疗器械四大公司，统一管理全国中西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供应。1988 年，国家中医管理局更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接管全国中药业务。但是，医药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新药审批和药品质量，仍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1998 年，国务院进一步实施政企分开，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卫生行政部门的药政职能纳入其中。医药生产经营的行业管理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行使，基本理顺了药业的管理关系。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药业

建国 30 多年，国营的中西药生产企业和批发经营企业，是全国医药生产供应的主渠道。按行业主管部门下达的计划，进行生产、收购和调拨供应；全行业统一经济核算，盈亏都由政府包干，不与职工的经济利益挂勾。严重制约了企业的产品、技术创新和职工的积极性。中国药业与世界发达国家药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

198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后，药业沿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总目标进行改革，向着产权多元化，打破地域、行业、部门界线，组建规模化和规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和集团公司；批发企业搞代理配送制、零售企

业搞连锁经营，促进企业向形成总代理、总经销的规模优势方向发展。医药企业的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全国有医药生产经营企业 13.16 万家，包含医药工业、商业、医疗器械、保健品和信息产业 5 个门类和国有、集体、民营、合资、独资 5 种经济成分。企业是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在市场竞争中发展或被淘汰。国有公司的主渠道地位有较大下降。

1999 年，全国医药市场的基本情况是：

中药，药材种植面积 600 万亩，种植药材 250 余种，年生产总值约 160 亿元。中成药生产企业近 1100 家，可生产品种 6000 余个，产值 300 多亿元。中药饮片企业 570 家，年产值约 70 亿元。中药保健品企业约 2000 家，生产品种 2500 余种，年产值约 200 多亿元。中药类总产值 700 多亿元。

西药，生产企业近 6000 家，可生产品种 4000 余个，产值 1000 多亿元。

医疗器械，有生产企业 5700 家，其中专营厂 3000 家，生产品种 5000 多个，规格 1 万个以上，产值 320 亿元。

医药经营企业同时经营中西药品，无法按中药、西药划分。批发企业有 1.56 万家，零售企业 11.5 万家。销售总额 1244 亿元，国内销售占总销售的 90%。全行业总利润 105 亿元。

2000 年，医药生产、销售、出口和效益创历史最好水平。医药生产总产值按可比价计算，完成 2332 亿元，同比增长 2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11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实现销售 1750 亿元，同比增长 18.4%，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143.8 亿元。医药商业实现销售 1135 亿元，同比增长 19.4%，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7.61 亿元。进出口总额 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4%，其中出口 38 亿美元，进口 26 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3.8%和 18.7%，进出口相抵，出口高于进口 12 亿美元。

目前，中国医药企业中，有合资、独资企业近 2000 户。中国

医药市场不仅存在国有、集体、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存在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据统计，1999 年上半年药品消费结构比例，国产药占 42.44%，合资药占 45.6%，进口药占 11.96%。

2000 年国家在大力进行医药工业企业 GMP 认证的同时，加强了对经营企业的改革管理力度。4 月，发出了关于进行药品零售跨省连锁企业试点工作的通知，制定了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有关规定。5 月，药品零售跨省连锁试点企业条件出台。8 月，第一批药品零售跨省连锁试点 41 家企业名单公布。10 月，又公布了第二批试点企业 9 家。11 月，国家实施强化经营企业质量监督管理，制定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管理办法（试行）。12 月，即时发出了关于进行 GSP 认证试点工作的通知。针对医疗机构药品多头进货的混乱局面，提出集中招标采购的解决办法，公布了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点工作的若干规定。推行两个认证，提倡跨省连锁，实行招标采购，对全面提高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素质、增强质量创新竞争意识，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批落后的生产经营企业，也将被重组或淘汰。这是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的必然结果。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是一个新生事物。是经营同类药品、使用统一商号的若干门店，在同一总部的管理下，采取统一采购配送，统一质量标准，将采购同销售分离，实行规模化管理经营的组织形式。它来源于国外的先进经验。中国的药品零售跨省连锁试点企业，必须先通过国家 GSP 认证，符合国家质量保证、人员设备、经营品种、注册资金、销售指标、配送能力、网络管理等方面的规定条件，因而都具雄厚实力和强烈的竞争意识。试点不到一年，有的就抢占地盘，将门店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到几百家、上千家。外地连锁店的进入，带来了与地方原有零售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必然影响到该地区的批发药业。地方保护主义失灵，迎来的将是适应

市场的自我调整、全国药业的健康有序大发展。两批 50 家跨省连锁试点企业中，深圳的海王星辰、中联、三九，重庆的桐君阁，广州的采芝林等，步伐是走得很快的。

第一批公布的药品零售跨省连锁试点企业 41 家如下：

1. 北京西城金象医药连锁总店
2. 北京医药保益康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3.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
4. 天津中新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5. 石家庄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6. 辽宁成大星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7. 大连药房有限公司
8. 吉林大药房
9. 哈尔滨市医药公司同泰医药连锁店
10. 哈尔滨市药材公司人民药店连锁店
11.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12. 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公司
13. 南京百信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14. 无锡山禾集团健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5. 浙江英特药房有限公司
16. 宁波四明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17. 合肥市医药公司长江大药房
18. 福州同春药业集团公司同春连锁药店
19. 南昌市黄庆仁栈药店
20. 青岛国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1. 湖北同济堂药店有限公司
22. 刘天保医药有限公司零售连锁分公司
23. 湖南药品金沙经营有限公司金沙大药房
24. 广州采芝林药业连锁店

25. 广州健民医药连锁店
26. 深圳一致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7. 深圳中联大药房有限公司
28. 深圳海王星辰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29. 珠海丽珠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30. 广西梧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回春医药商场
31. 四川天诚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32. 贵州一树连锁药业有限公司
33. 昆明福林堂药业有限公司
34. 陕西怡悦大药房连锁店
35. 陕西西安飞龙医药股份连锁店
36. 甘肃绿叶医药连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7. 重庆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38. 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公司
39. 国药集团国大药房
40. 三九企业集团
41. 内蒙凯蒙医药经销部

第二批公布的药品零售跨省连锁试点企业名单 9 家

1. 北京市医药全新大药房
2. 广东康力医药有限公司
3. 上海医药一店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4. 湖南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零贸总公司
5. 河南神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6. 新华鲁抗集团零售连锁公司
7. 河南省医药公司新药特药商店
8. 珠海嘉伦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9. 嘉事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大型药业集团公司，也发展到有哈药、广药、中新、健

民、三九、地奥、太极、北京同仁堂等数十家。太极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十分令人敬佩。

总部设在重庆的太极集团，主要成员单位为涪陵制药厂，原是20世纪70年代建于川东山区涪陵的地级小厂，长期经营艰难。80年代推出补肾防喘片、急支糖浆等几个主打品种，开展媒体广告宣传，实行全员营销，经济效益直线上升。90年代，涪药人抓住机遇引进人才，更新厂房设备技术，实行现代企业管理，不断开发高效新药，经济效益持续大幅攀升。为了形成规模优势，除在成都另建新厂外，还先后兼并了重庆、江津、四川崇州、绵阳、德阳、南充、自贡、浙江绍兴等地，具一定潜力的7家中西药厂、4家商业公司和1家中药科研机构，组建了太极集团公司。经过七八年运作，推出的急支糖浆、儿康宁、藿香正气口服液、太极通天液和减肥药曲美等20余个新产品，都已成为国内知名度很高的名药。零售公司所属的桐君阁大药房连锁店，发展到500余家。太极集团形成了人才、技术、设备、资金、管理的五大优势。近年，又按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试行）要求，投资建设自己的优质高产无公害药材原料生产基地，使太极成为科、工、贸、农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1999年，全国中成药工业50强中，太极创造了销售收入11.7亿元，列第3位；利税总额2.6亿元，列第2位；利润总额1.5亿元，列第3位的佳绩。太极的成功，是西部贫困山区小厂变为大企业的典范，是改革开放结出的一个硕果。为此，白礼西董事长做出了杰出贡献，获2000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受到了国家表彰。

中国医药市场的另一深刻变化，是逐渐完善法制管理。1984年以来，国家和政府主管部门公布的法律、法规、条例等近百个。其中最重要的有：

198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1985年　新药审批办法

1987 年　假药劣药报告制度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
中药保健药品管理规定
麻醉药品管理办法
1988 年　精神药品管理办法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
1990 年　进口药品管理办法
1991 年　医疗器械管理办法
1992 年　医药商品质量管理规范
中药品种保护条例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修订）
1993 年　医药行业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的若干规定
1994 年　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1995 年　整顿中药材专业市场的标准
1996 年　药品零售企业中药饮片质量管理办法
1997 年　关于加强毒性中药材的饮片定点生产的管理意见
1998 年　修订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
关于禁止开办或变相开办各种药品集贸市场的紧急通知
1999 年　重新修订或新的法规有：
关于印发《开办药品生产企业暂行规定》的通知
新药审批办法
进口药品管理办法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1998 年修订）
药品 GMP 认证管理办法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暂行办法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管理暂行办法
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征求意见稿

2000 年　关于进行药品零售跨省连锁企业试点工作的通知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有关规定
药品零售跨省连锁试点企业条件
公布第一批药品零售跨省连锁试点企业名单（41 家）
公布第二批（9 家）
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点工作若干规定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进行 GSP 认证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修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药品管理法，是制定各种医药法规的依据。国家制订的相关法律，如刑法、产品质量法、计量法、广告法、标准化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仍是医药企业必须遵守的准绳。

几经修订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对生产企业的机构与人员、厂房与设施、设备、物料、卫生、验证、文件、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产品销售与回收、投诉与不良反应报告、自检等 12 个方面的要求，做了详细规定。是生产企业对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基本准则，适用于药品制剂生产的全过程。原料药生产中影响成品质量的关键工序。随后出台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分别对药品批发企业的管理职责、人员与培训、设施与设备、进货、验收与检验、储存与养护、出库与运输、销售与售后服务等 8 个方面，对药品零售企业的管理职责、人员与培训、设施与

设备、进货与验收、陈列与储存、销售与服务等 6 个方面的要求，做了详细规定，是药品经营质量管理的基本准则。通过试点后，2001 年，国家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 GMP、GSP 认证工作，已正式在全国有步骤地展开。各种法规的完善与贯彻执行，将引导着医药行业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三）中国药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改革开放的国内环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给中国药业带来了持续健康发展的大好机遇。

宪法规定的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方针，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近 13 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对医药和保健品需求快速增长。化学药品的不良反应，使人们产生了“回归自然”，乐于使用天然药物的强烈愿望。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已肯定了传统医药的科学价值。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药有了新的认识，逐步放开了进口限制。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已承认了中医药的合法地位。外国人学习中医，用中药为本国人民服务的现象逐渐增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有优势的中药、西药原料药和中间体，以及一般通用常用的医疗器械，会因关税降低和非关税壁垒削弱使出口增长，外国资金和技术将更多地投入中国医药工商企业。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将促进西部的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这些国内、国际因素，将刺激中国医药快速增长。不少省市自治区，都把发展医药产业列入自己的支柱产业。国家制订的一系列法规，尤其是新的药品管理法、新药审批办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贯彻实施，将使医药行业逐步与国际接轨，获得持续健康发展。

但是，中国药业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药材出口，受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竞争。药材质量不够稳定，重金属和农药残留超标，国内出口商的多头竞争，将影响出

口和经济效益。目前中国西药生产 97.4% 是仿制品，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48]。入世后则不能仿制，要仿制也只能是已过 20 年专利保护期以后的产品，并要付出昂贵费用。设备、包装落后，产品质量难上新台阶，影响竞争能力。入世后 6 年，中国关税将从目前的 24%，下降到 5.5%～6.5%，国外药品和经营企业会更多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价格会更低。会对中国一些依靠“高定价、高回扣”为主要推销手段的生产、经营企业带来冲击。特别是对未形成规模优势和先进市场运行机制的企业冲击更大。此外，中国医药行业的整体素质不高，创新能力弱，生产规模小，资金不足，因而抵御医药全球化冲击能力较弱。

中国企业要在全球化过程中站住脚跟，扩大世界医药市场占有份额，只有依靠深化改革，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努力创新，发挥自己的优势来解决。目前国家积极发展中药现代化产业，从无公害药材生产，到新中成药研制，进行规范化的全面质量管理，是发挥自己优势，迎接入世挑战的重大举措。

对于什么是中药产业现代化，药业和学术界有热烈讨论，发表了很多好意见。广州奇星药业董事长朱柏华，提出了“一个理论加五个 P”的定义。一个理论是遵循中医药理论，五个 P 是指与国际接轨的中药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即中药的 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LP（药品非临床试验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试行）、GCP（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 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体现了“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原则精神，非常简明、精辟。虽然中药的主要市场在国内，但是中药产业现代化也必将造福于世界。经过入世后的调整，中国医药产业一定能够跟上世界科技潮流，像历史上那样再创辉煌。

第三章　药材商品的来源

一、野生药材采集

药材的来源，在清代以前，由于人口不多，耗量不大，资源丰富，采挖、捕取野生动植物药材是主要生产方式。

采药实践是医药史的开端，历史最为悠久。有文字记载的最早采药人，是《山海经》里的那般巫医。医生队伍出现后，众多的医人采药，自采自用，文献记载屡见不鲜。但他们采集的药物，未在市场上形成药材商品流通。民间采药，人多地广，是药材商品的主要来源。有个人进山，有家庭出动，有结伙伴行自采，有组织成队合采。农村儿童也参与采药。明清之际的《岱山县志》记载："春夏之交，乡村儿童上山采捕（蜈蚣），以竹签撑之，卖与收客"，"每年所出不少十万条"。盛产药材的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采药也是一支重要力量。《齐东野语》记载，宋时南丹州（今广西南丹县一带），"方春时，瑶女数千，歌啸山谷，以寻药挑菜为事"。明代徐树丕《识小录》记，北方大漠的"鞑靼人掘取肉苁蓉、锁阳，洗涤去皮，薄切晒干，以充药货"。

以耕为主的农民，采药作为一种副业。如海南岛的黎族人，"皆力耕治业，不以采香（香药沉香）专利"。有专事采药者，则以

此为业。韩康入名山采药 30 年，在长安出售，是以采药为职业。《太平广记》卷 40 载："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虚二老人，相契为友，多游嵩华二峰，采松脂、茯苓为业"。

采药本是一种自由的经济活动，官府常有逼民采药上交之事。弄得资源破坏，人民苦不堪言，甚至家破人亡。明代官府逼交上党人参、荥经黄连，后果最为典型。柳宗元询问的那个蒋姓捕蛇人，祖父和父亲都死于蛇伤，自己也险些丧命。

规模最大的采集活动，是采挖东北的野山人参。东北人参采集药用很早。魏晋间的《名医别录》记，"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明代上党地区已无参可采，"今所用者皆是辽参"。人参有大补元气，益气固脱，补脾益肺，宁神益智，生津止渴的显著功效，被现代证明有显著的提高人体免疫力、抗疲劳、抗衰老、强心、生血、双向调节人体机能等重要药理作用。是最常用的治疗、保健药物之一，所以人参的用量大，价值高。明清两代，东北形成了庞大、有组织的采参业。由官府设专门机构管理，收取贡参和税参，直接上交朝廷。进山采参的人员庞杂，有八旗旗人、当地土人、汉族移民、卫所士兵及关内来的偷采者。八旗是 17 世纪初，女贞国大汗努尔哈赤建立的民户军事化制度。全国分八旗，每旗 7500 人，分别以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的旗帜作为标志。旗的首领由努尔哈赤指派，从事生产和战争。士兵所采人参，专供上交朝廷，称为贡参或官参。清康熙至乾隆中叶的半个多世纪，是采参业的鼎盛时期。仅奉天府（今沈阳）所管的采参人就多达 4.2 万人[49]。关内来的偷采者每年不下万余人。《东陲游记》及《柳条边纪略》记载："凡走山者，山东、山西人居多，大略皆偷采者。每岁三四月间，趋之若鹜，至九十月，乃尽归。其死于饥寒不得归者，盖不知凡几矣。而走山者日益众，岁不下万余人"。还在明时，女贞族就严禁汉人、朝鲜族人进入他们的控制区采参，遇则杀之。如清太祖天命元年（1616 年），明朝的沿边民众越境采参，太祖命

使杀之，约杀50人。清太宗天聪三年（1629年）五月，罗璧等率兵一千，越新城，途遇毛文龙采参船四艘，杀60人，伤60人[50]。清代官府派兵搜山，抓获偷采者治以刑罚，仍不能杜绝。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实行放票采参。每年发放参票2万张。每采人参一斤，收税银二两五钱。康熙后改为收参，每张票收人参五钱、一两或二两不等。乾隆初，共收人参一万五千两。人参的价格，在宋时已十分昂贵，寇宗奭记“价与银等”。明万历年间，降至每斤值十两白银；而清太宗时每斤值二十五两白银；康熙年间，一两人参值十两白银，是万历年间的16倍。乾隆时，一两人参又涨到十七两白银的高位。在江浙的一些消费区，人参的零售价，一钱竟高达一二十两白银的天文数字。

参价的扶摇直上，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和资源因素。

清代，尤其是乾隆时期，医生和民间对人参功效过分迷信，滥用现象十分严重。目睹当时情况的江苏名医徐大椿，写了一篇人参论，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率先给过分的“人参热”降温。他说：“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而常人之情，无不好补而恶攻。故服参而死，即使明知其误，然以为服人参而死，则医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尽，此命数（命运）使然，可以无恨矣。……故人参者，乃医家邀功避罪之圣药也。病家如此，医家如此，而害人无穷矣”。徐大椿还指出昂贵的参价给病家带来的沉重负担，几乎无法承受。“盖向日（指康熙年间）之人参，不过一二换（一钱人参不过一二两白银），多者三四换，今则其价十倍，其所服又非一二钱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两家已荡然矣”。

滥用人参的另一结果，是过度采挖，使野生资源急剧减少。市场供求失衡，又导致参价上涨。朝廷和一些高官垄断采参业，既可保证皇室高官享用，又可获得丰厚的利润。一些有权势的大商人、大官僚，把经营、贮存人参作为积累财富的一种方式。顺治时的著

名皇商范永斗，人参的国内国外贸易都做得很大。乾隆时的军机大臣和珅，家藏人参六百斤[51]，可值白银 16.32 万两。

为了获得大量廉价的优质商品，有的药商到产区设庄组织采挖药材。清代嘉庆年间，内地农民大量移居内蒙地区，甘草开始大批量采挖。这时，山西定襄县张姓药商，进入杭锦旗库布其沙漠中下麓两侧，设德盛成、德盛亨药号，组织采挖甘草。同治年间，又有山西德保药商，进入杭锦旗希布格（甘草城）设广盛恒药号，在库布其沙漠上麓两侧组织采挖、收购甘草，运销内地。其后裔将这一经营进行到解放初方止。

在长期的采药实践中，人们逐渐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形成了产之有地，采之有时，加工有法，防止误采的基本原则。《神农本草经》名例中明确指出，“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包含了这四条基本原则。陶弘景在论产之有地时进一步总结说，“诸药所生，皆的有境界”，“江东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在论采之有时说，“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采者，谓春初津润（植物体内浆液）始萌，未充枝叶，势力淳浓也。至秋枝叶干枯津润归流于下也。大抵春宁宜早，秋宁宜晚，花、实、茎、叶，各随其成熟尔。岁月亦有早晏（迟），不必都依本文也”。指出了有共性个性之别，非常中肯。孙思邈说，“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与朽木不殊”。元李东垣在《用药法象》中也做了简明概括：“凡诸草木昆虫，产之有地，根叶花实，采之有时。失其地则性味少异；失其时则气味不全”。这些原则的实施，保证了药材质量，有很丰富的科学内涵。

不同药材的采集，又有不同的经验和方法。

茯苓是一种腐生真菌——茯苓菌丝体形成的菌核。茯苓真菌常寄生在松树根部或被砍伐的树兜上，分解、吸收其营养成分，供菌丝体生长。但大多埋在土壤之中而不可见，给寻找带来困难。宋

代，浙江一带的采苓人很有经验，选择被砍伐松树而根未枯死者，在四周丈余范围内，用铁锥插地深刺，若有苓，“则锥固不可拔，乃掘取之”，避免了盲目乱挖。

广产于岭南诸郡的沉香木，交干连支，岗岭相结，数千里不绝。然而有沉香者，却百无一二。但是南恩、高、窦等州之民，能很准确地找到结香之木。其原因是“山民入山，见香木之曲干斜枝，必以刀砍成坎，经年见雨水所渍，结香后以锯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结为斑点，亦名鹧鸪斑，燔之甚佳”。这是一种切断树脂道，促进沉香树脂溢出凝聚的人工结香法，既提高了产量质量，又不乱伐毁林，能保证主干再生斜枝，持续利用，是非常科学又简便易行的宝贵经验。这种方法，被记入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和张师正《倦游杂录》之中。

栽培的红花，《本草图经》记，冬月布子，至春生苗，夏乃有花。花下作梂猬（膨大呈球状的花序托），多刺，花蕊出梂上，圃人乘露采之（刺软不易伤人），采已复出，至尽而罢。现在采收红花仍是此法。

二、药材种植

与野生采捕药材相比较，人工种植药材量大、集中、方便而利厚，因此古代的药材种植很早就发展起来。后来资源减少，刺激生产，药材种植扩大成为一种产业。

最先种植的药材是医药与食品、手工业交叉需要的品种。春秋有姜、枣、桃、李、橘的栽培。《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西汉万户人家的大城市郊，种有“千亩栀、茜，千畦姜、韭”，这种人的收入与千户侯相等。张骞从西域带回的红花、大蒜、胡麻等在长安种植。东汉京城洛阳的栀茜园由国家专营，是加工红色和紫色染料的原料生产基地。西晋羯族（匈奴别支）人石勒，年轻时居上党武乡

（今山西襄恒县西北），从事人参贩运，常运到洛阳出售。他在家园中种植人参，花开得很茂盛。石勒后来成了后赵主。在大地主的田庄里，辟有药圃种药，供自收自用。到了南朝的梁代，种植的药物增多，《本草经集注》记载有薏苡仁、芍药、菊花、薄荷、合欢等30余种。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古农书。记述了地黄、红花、吴茱萸、栀子、木瓜等20余种药材的栽培方法。主要作染料用的红花，种一顷收入合绢300匹，还收200斤与芝麻同价的红花籽。获利如此之高，所以出现青州富豪强占农民麦地种红花的事。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药物栽培专著《种植药法》（亡佚），反映了南北朝时期药材的种植，已发展到总结方法、推广栽培的新阶段。

隋朝的宫廷医疗保健机构太医署，首辟官办药园，置药园师掌管。“以时种莳，采收诸药”，以供医用。唐朝太医署的药园占地300亩，由两名药园师进行管理。招收民间青年8人为药园生，学习种药、采药，培养专门人才。《千金翼方》卷14，记述了枸杞、百合、牛膝、合欢、车前子、黄精、牛蒡、商陆、五加、甘菊、苜蓿、莲子、藕、青蘘、地黄、杏、竹、栀子、枳等19种药物的栽种方法。《新修本草》记载，唐代有栽培的药物已增至近40种。经过人工栽培的药材，质量有显著提高。如栽培芍药形块大、重实、多脂润，优于形体瘦小的野生商品。

宋代太医局继续置有药园，民间亦有规模不小的药圃。余杭县大涤洞药圃“芝畦术坞，百药之植，靡所不有”，近似于现代的药物种植场。宋代官营民营体制并存，药业扩大，药耗增加，刺激了药材种植。据郑金生《宋代本草史》统计，《本草图经》记载77种药材有人工栽培，加上其他本草及笔记、方志记载的61种（与《本草图经》、《证类本草》重复不计）合计138种。除去粮、果、蔬之类，仍有79种。分别是：

《本草图经》：菖蒲、地黄、车前、木香、薯蓣、奄茼子、蓝

实、芎藭、决明、茜、景天、通草、蠡实、百合、紫草、怀香子、红蓝花、牡丹、姜黄、肉豆蔻、侧子、虎掌、旋覆花、射干、蛇含、苎根、甘蔗、芦苇、续随子、葫芦巴、牵牛子、茼实、桂、辛夷、藿香、栀子、紫葳、合欢、蜀椒、郁李仁、白杨、桄榔、南烛、五加、梓白皮、紫荆、接骨木、栾花、木瓜、罂子粟、白襄荷、薄荷、香薷。计53种。

《本草别说》：芍药、阿魏（非正品）2种。

《本草衍义》：当归、牛膝2种。

《嘉泰会稽志》：忍冬1种。

《嘉定赤城志》：金漆、白芷、菊3种。

《嘉泰吴兴志》：术、橘、梅、批杷、莱菔、芸苔、桑7种。

《春诸纪闻》：鸭脚（银杏）1种。

《闻见前录》：木犀花、橄榄2种。

《癸辛杂识》：瑞香、茯苓2种。

《曲洧杂识》：草乌头、巴榄（巴旦杏）2种。

《游官纪闻》：木患子1种。

《文昌杂录》：珍珠1种。

《益都方物记》：川大黄1种。

《洛阳花木记》：曼陀罗1种。

蜀地的绵州彰明县，附子种植规模很大。做过彰明县令的杨天惠写有《彰明附子记》专篇。记载全县20多乡，只有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四乡宜种。用地520多顷，占耕地2/10，年产量16万多斤。药农用工虽然超过种粮食，但年收入超过种粮一倍以上。附子收获加工后，连同母根可得七种商品规格："其种之化者为乌头，附乌头而旁生者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为鬲子，又附而长者为天雄，又附而尖者为天锥，又附而上出者为侧子，又附而散生者为漏兰"，而以附子产量大、质最好，故以附子之名统之[52]。

茯苓的栽培，梁代已知道用砍倒松树，让其自然长苓的粗放法

生产。形多小，虚赤不佳。南宋时发明用鲜茯苓小块，夹在松材内的“肉引”繁殖法，3 年长成大苓。这一科学性很强的珍贵创举，记录在周密的《癸辛杂识》“种茯苓”专条之中：“茯苓生于大松根之尚矣。近世村民乃择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系其中，而紧束之，使脂液渗入于内。然后择其地之沃者，坎而瘗之。三年乃取，则成大苓矣。洞霄山（今浙江余杭县境）最宜茯苓。往往民多盗种密志之而去，数年后乃取焉。种者多越人”。可惜此法后世并未得到推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70 年代，才用此法大量发展生产。后又研究出“菌引”繁殖法，节约了大量菌种、菌材，并缩短了生长期。茯苓种植进入了科学种植的崭新阶段。

四大怀药、浙八味中的部分品种，栽培亦很有名。《本草图经》记薯蓣（山药），“近都人（河南开封）种之，极有息”。《本草衍义》载“牛膝西京（河南洛阳）作畦种，有长三尺者，最佳”。《日华子本草》云：“今芍药花根，海盐杭越俱好”。为后世发展成为全国公认的道地药材奠定了基础。

元代《王祯农书》记载了芡、银杏、皂荚、枸杞等的栽培方法。

据张仕良统计，明代《本草纲目》中，有栽培的药材总数达 235 种（实录 233 种）。其中草部 79 种，谷部 35 种，菜部 41 种，果部 49 种，木部 31 种。除去粮、果、蔬仍有 130 种，其中 50 多种为常用、大宗药材。全录于下：

草部：黄芪、人参、黄精、萎蕤、白术、玄参、紫草、延胡索、当归、芎藭、芍药、牡丹、山柰、瑞香、茉莉、郁金香、排香草、藿香、零陵香、兰草、泽兰、香茹、假苏、薄荷、水苏、菊、庵茼、茵陈、旋覆花、红蓝花、苎麻、恶实、蘘荷、石龙刍、灯心草、地黄、牛膝、麦门冬、萱草、葵、蜀葵、黄蜀葵、迎春花、瞿麦、剪春罗、车前、蛇含、蓝、甘蓝、蓼、商陆、续随子、附子、天雄、蒟蒻、射干、鸢尾、玉簪、凤仙、曼陀罗花、五味子、使君

子、木鳖子、牵牛子、紫葳、营实、月季花、王瓜、葛、黄环、天门冬、黄药子、茜草、紫藤、菖蒲、石斛、景天。实77种。

谷部：胡麻、亚麻、大麻、小麦、大麦、秕麦、荞麦、苦荞麦、稻、粳、籼、稷、黍蜀、黍、玉蜀黍、粱、粟、秫、秕子、东蔷、蓬草子、薏苡、罂子粟、黑大豆、黄大豆、赤小豆、绿豆、白豆、稆豆、豌豆、蚕豆、豇豆、扁豆、刀豆、黎豆。35种。

菜部：韭、葱、胡葱、薤、蒜、葫、芸苔、芥、白芥、芜菁、莱菔、生姜、茼蒿、胡荽、胡萝卜、罗勒、白花菜、菠薐、蕹菜、蒜菜、苜蓿、苋、苦菜、白苣、莴苣、落葵、芋、薯蓣、甘薯、百合、草石蚕、茄、胡芦、苦瓠、冬瓜、南瓜、越瓜、胡瓜、丝瓜、苦瓜。40种。

果部：李、杏、梅、榔梅、桃、栗、枣、梨、鹿梨、海红、棠梨、木瓜、柰、君迁子、安石榴、橘、柑、橙、柚、枸橼、枇杷、杨梅、樱桃、银杏、胡桃、橡实、荔枝、龙眼、橄榄、海松子、槟榔、无漏子、桄榔子、无花果、秦椒、蜀椒、胡椒、吴茱萸、茗、甜瓜、西瓜、葡萄、蘡薁、甘蔗、莲藕、芰实、乌芋、慈菇。49种。(实48种)

木部：柏、杉、菌桂、月桂、辛夷、漆、梓、桐、罂子桐、槐、合欢、肥皂荚、栾华、棕榈、乌桕木、桑、楮、枸橘、栀子、郁李、女贞、枸杞、石南、紫荆、木槿、扶桑、木芙蓉、腊梅、木棉、黄杨木、接骨木。31种。

由于全国城乡药业有较大发展，尤其是成药生产基地开始出现，明代药材社会需求增加，使种植药材的范围、规模有明显扩大。茯苓宋时主要栽培于浙江，明代已扩大到安徽岳西，湖北罗田，河南商城。岳西、罗田、商城后来成为主产区。当归宋时主要在四川栽培，明代则发展到甘肃、陕西。甘肃产者已优于四川川归。附子种植除彰明外，陕西汉中也开始栽培。安徽亳州广种白芍。诗人刘开路嘉庆年间过亳州，看到家家户户都种芍药，前前后

后都有盛开的芍药花，非常美丽，写了一首赞美诗：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四川绵阳的麦冬，广西田州德保的三七，都有在明代开始种植，后来成为著名道地药材。合州补骨脂在宋代已全国闻名，明代州府辟园专种。万历七年（1519 年）《合州志》记载："补骨脂园，在钓鱼山下，方二亩，立园丁八名种收"。这种官办的地方药物种植场在历史上实为罕见。补骨脂园一直开办到清朝末年，历时达四百年之久。

清代人口比明代猛增几倍，药业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各地相互引种，新产区增加，产量更大。白芷原有四川遂宁、河南禹县、浙江仁和三大产区。1900 年河北祁州从禹县引种，广为发展，形成道地。至此，川白芷、禹白芷、杭白芷、祁白芷四大基地形成。嘉庆年间陕西汉中地区附子种植发展很快，固城县年产达 3 万斤，运销甘肃、新疆等地，成为西北地区的附子生产基地。石柱味连明代洪武年间开始栽种，清代连农已增到上千户。东北野山人参乾隆以后资源急剧减少，刨夫们遂将山参幼苗带回参营栽种，形成"移山参"。小参难觅且生长缓慢，后又用种子繁殖。道光、咸丰年间种参增多。清末出现伐林、烧荒大量种植的参园。

种植技术较高的药农，还去异地包山种药，开辟新产地。光绪年间浙江《霍山县志》载：茯苓，"道咸以前，潜（今安徽潜山县）人来霍兴种，独擅其利，每百斤值钱十千、二十千不等"，获利颇为可观。樟树还有一些药号，派人到药材主产地去包山种药，以获取真正的优质药材。这种新型的经营企业种药场，是一种有重要意义的创举。

药材种植在一些地区发展更快，品种也多，形成商品生产供应的重要基地。如祁州，明代末期种植药材 28 种，清乾隆二十年（1755 年）已发展到 48 种，至 1936 年又发展到 130 种。药材市场上的祁薏苡仁、祁薄荷、祁菊花、祁紫菀、祁白芷、祁大黄、祁木

香、祁艾等道地药材，都来自祁州地区，是药材市场的重要商品。尤其是祁州大黄，一度种植面积很大，主销国外作工业原料，国内一般作兽药应用。

古代动物药材人工养殖极少。宋·《文昌杂录》记有养殖珍珠法，仅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科学试验，并无商品提供。记载的方法是："以今所作假珠，择光莹圆润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开口，急以珠投之。频换清水……此经两秋，即成真珠矣"。现代的人工养珠法，原理与此相似。

《岱山县志》记载的"磨心岭土人种蜈蚣以为田，供药肆之采用，则此物由来以久"。可能是惟一的商业养殖之例。清末以后，有的大药铺建鹿场养鹿，自宰自用，除天津达仁堂外，一般数量不大。大量的商业养殖在新中国时期发展起来。

三、采种药材的加工出售

鲜活的野生、家种药材采收后，要即时加工，才能成为干燥的药材商品。一般的方法是除去泥沙杂质，阴干或晒干、炕干。不少药物，有其特殊的加工方法。

南北朝时，对不易干燥的药材，采用先蒸、后切、再晒法。黄精体润多滋，雷敩说，凡采得"洗净蒸之，从巳至子，薄切暴干"。宋时又增加了去皮、水煮后晒干之法。如《本草图经》记，天麻，二、八月采得后，"乘润刮去皮，沸汤略煮过，暴干收之"。明代，李时珍记紫草，"春社前后采根，采时以石压扁曝干"。又增加了压实（破）干燥法。一些不道德的小人，往往用沙参"蒸蒸压实以乱人参"。

对体大不易干燥者，用先切后干燥法。《本草图经》记大黄，"二、八月采根，去黑皮，切作横片，火干。蜀大黄乃作竖片，如牛舌形，谓之牛舌大黄"。体现出南北大黄的不同加工形态。

去皮、蒸、煮压破后干燥，除去了保湿层，内部细胞胀裂，使水分易于蒸发，干燥程度很高，易于贮存。去皮干燥还能使商品洁白，增加美感。人参的采收加工历史充分反映了这些方法的综合应用。《本草经集注》载：人参“二月、八月上旬采根，竹刀刮，暴干”。似今之白干参。《雷公炮炙论》载：“凡采得，阴干”。即今之生晒参。以后千余年沿用二法。明末，女贞人在与汉人的人参交易中，因干燥不彻底，造成大量腐烂。为扼制女贞强盛，万历三十年(1607年)，明朝停市，使万历三十七、三十八两年，女贞人参烂掉10万斤，损失惨重。后清太祖努尔哈赤，教民用煮后干燥法，克服了这一缺点。煮后干燥有损人参气味，又有蒸后干燥的方法创新。煮蒸后干燥使参体颜色变红，形成了使用最多的红参商品。这一加工方法革新，被记录在《柳条边纪略》和《宁古塔纪略》之中。《柳条边纪略》载：采参后，“先以水渍参，明人佯不欲市，边人恐朽败急售，多不得价。太祖乃命煮而售之，煮参始此。近又以煮则味薄，改而为蒸矣”。《宁古塔纪略》中载：“人参以八九月间采者为佳，生者色白，蒸熟辄带红色，红而明亮者，其精神足，为第一等。凡掘参者，一日所得晚即蒸，次晨晒于日中”。后来，又将形体瘦小、弯曲的人参，洗净、燖过、针刺、入冰糖水中煮一二日，烘干，得糖参商品[53]。

干燥后的药材，有较多的细小须根残留者，也应除去。唐代使用布袋揉搓法。《新修本草》记黄连“用之当布裹掇去毛，令如连珠”。强调不能揉断似珠连的根茎，以免降低等级。明代香附用火燎去细毛，又是一法。

有毒药材的采收加工，有特殊方法。附子有大毒，《蜀本草》载“以生熟汤浸半日，勿令灭气（中断），出以白灰（石灰）裹之，数易使干”。《本草图经》记附子，五物（附子、乌头、天雄、侧子、乌喙）收时，一处造酿。采前半月，用大麦煮粥，以曲酿造制醋。将附子去须根，“于新洁甕内浸七日，日搅一遍，日足捞出，

以弥疏筛摊之，令生白衣（析出白色结晶）。后向慢风日中晒之百十日，以透干为度。若猛日晒，则皱而皮不附肉”。明代则用醋“淹覆弥月，乃发出晾干”。清末，川产附子用盐卤水浸、水煮、削皮、切片、炕干等系列方法加工。历代的各种方法，都能不同程度地降毒性成分乌头碱的含量，起到减毒作用。宋代“黄州（今湖北黄冈南）出蜈蚣，土人捕得，以烟薰干之，商贾岁岁贩入北方”。到了明代，已将蜈蚣逐条用竹签撑之形成商品，可以防止脆断，又提高了商品价值。

趁鲜将药材加工成饮片，是解决干后不易切片的好办法。还可以多获药值或更易脱手。唐时已有人将采得的茯苓切片出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锁阳“土人掘取，洗涤去皮，薄切晒干，以充药货，功力百倍于苁蓉也”。这种做法实际上还包括肉苁蓉等其他药材。

药农等采收加工后的药材，或售于集市，或卖于铺行，或售交官府。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蛤蚧，“俚人采之粥于市，为药，能治肺疾”。长安的宋清药铺，山泽来的采药人，都喜欢把药材卖给他，因为宋清都给较高的药钱回报。宋代官药局置收买药材所，向民间收购药材。至于朝廷规定的土贡药材，药农们交与官府抵税，就以很低的价格折算了。

产新季节，药材初级市场繁忙。把药材卖给来产地收购的药商、收客，是药农出售采种药材的主要渠道。对于那些出产量大、离城市较远的地方更是如此。

《彰明附子记》载，来彰明的收客除蜀人外，还有陕辅闽浙的药商。陕辅药商喜欢买下等品。闽浙药商喜欢买中等品。大的上等品被那些士大夫买去。因为他们是“贵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厌”。

在盛产香药的海南，闽越的药商以余杭船为香市，即在船上开市交易。每年冬季，黎族人待市船抵岛，才入山采药货卖，所以香

市的持续时间较长。

四、新中国的药材种植业

民国时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药材种植业形成，产地、产量都大大超过清代。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国内军阀混战，以及人民为了推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反动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使药材产量起伏较大。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药材生产。1958 年，国务院下达《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后，国家采取了发放扶持资金，提供种子种苗，奖励一定粮食、化肥，建立国营、集体药场和开展科学研究、培养专业人才等措施；取得了巩固、发展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开展异地引种，扩大新产区，引种试种进口南药和野生药材变家种、家养的广泛成绩。

50 年来，有上百种药材扩大了产区；近百种野生药材变家种、家养并提供为商品；南药进口从 50 年代初的 70 多种减少到 1995 年的 34 种。1999 年，全国有中药材生产基地 600 多个，药场 1.3 万个，药材生产专业户 34 万户，药材种植面积近 600 万亩，产量约 35 万吨，产值约 160 亿元。粗略统计，能够种植、饲养的动植物药材 250 余种；其中，提供全部商品的 140 余种，提供大量商品的 60 余种，提供少量商品的 50 余种。

栽培饲养提供全部药材商品 144 种：

根及根茎类（38 种）：当归、白芍、地黄、川芎、山药、牛膝、川牛膝、人参、党参、太子参、北沙参、川明参、白术、麦冬、黄芪、浙贝母、平贝母、湖北贝母、泽泻、附子、川乌、黄连、白芷、延胡索、玄参、天花粉、紫菀、板蓝根、木香、独活、三七、干姜、郁金、莪术、姜黄、高良姜、山柰、夏天无。

皮类（7 种）：杜仲、厚朴、黄柏、肉桂、牡丹皮、合欢皮、

桑白皮。

种子果实类（51 种）：猪牙皂、山茱萸、吴茱萸、佛手、使君子、槐角、瓜蒌、山楂、栀子、枳实、枳壳、木瓜、香橼、化红、乌梅、巴豆、枸杞、草果、益智、川楝子、女贞子、青果、大枣、石榴皮、地肤子、急性子、香椿子、花椒、胡椒、橘皮、紫苏子、芥子、沙苑子、白扁豆、甜杏仁、苦杏仁、桃仁、芡实、莲子、草决明、补骨脂、薏苡仁、柏子仁、棕榈子、银杏、白花菜子、莱菔子、冬瓜仁、小茴香、八角茴香、槟榔。

叶类（8 种）：紫苏叶、大青叶、番泻叶、枇杷叶、侧柏叶、银杏叶、荷叶、芦荟。

花类（9 种）：菊花、槐花、红花、西红花、合欢花、梅花、辛夷、金银花、芫花。

全草类（8 种）：荆芥、薄荷、紫苏、广藿香、穿心莲、灯心草、徐长卿、草珊瑚。

藤木树脂类（7 种）：檀香、桂枝、首乌藤、降香、通草、竹茹、血竭。

藻菌类（4 种）：茯苓、银耳、昆布、螺旋藻。

动物类（12 种）：阿胶、土鳖虫、鹿茸、珍珠母、人工牛黄、熊胆粉、僵蚕、鸡内金、鸭内金、虫白蜡、五倍子、蜂蜜。

栽培饲养提供大部药材商品 60 种：

根及根茎类（23 种）：甘草、伊贝母、红芪、桔梗、丹参、大黄、天麻、射干、知母、玉竹、防风、葛根、白前、黄芩、柴胡、天冬、何首乌、续断、巴戟天、白附子、百合、香附、西洋参。

皮类（2 种）：秦皮、椿皮。

种子果实类（12 种）：苘麻子、牛蒡子、酸枣仁、菟蔚子、葫芦巴、地肤子、木蝴蝶、榧子、砂仁、草豆蔻、蔓荆子、连翘。

叶类（1 种）：艾叶。

花类（2 种）：款冬花、萱草。

全草类（8 种）：瞿麦、细辛、香茹、半枝莲、泽兰、佩兰、排草、鱼腥草。

藤木树脂类（3 种）：苏木、儿茶、阿魏。

菌藻类（1 种）：菌灵芝。

动物类（8 种）：龟甲、鳖甲、五灵脂、哈蟆油、全蝎、石决明、瓦楞子、人工麝香。

栽培饲养提供少量药材商品 48 种：

根及根茎类（14 种）：川贝母、苍术、半夏、天南星、远志、秦艽、三棱、千年健、藁本、商陆、山慈菇、胡黄连、银柴胡、南沙参。

皮类（2 种）：苦楝皮、木槿皮。

种子果实类（11 种）：王不留行、楮实子、枳椇子、千金子、大枫子、澄茄子、五味子、马钱子、望江南、鸦胆子、荜茇。

叶类（2 种）：十大功劳叶、芙蓉叶。

全草类（9 种）：透骨草、豨莶草、益母草、石斛、夏枯草、麻黄、绞股蓝、车前草、红景天。

菌藻类（1 种）：猪苓。

动物类（9 种）：海马、蛤蚧、蕲蛇、金钱白花蛇、蜈蚣、穿山甲、刺猬、水蛭、蟾蜍。

1991 年出版的《中国药用植物栽培学》，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主编，全国 11 个单位的 88 位专家、教授参与编写，是当代中国药用植物栽培的权威专著。该书详论了 231 种、列表简述了 261 种药用植物和药用真菌的栽培技术，使有栽培药材总数达到 492 种。

为了生产优质高产无公害药材，与国际接轨，1999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了“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简称 GAP。对生态环境无害化，种植资源及繁殖材料，生产技术标准操作规程（SOP），产地采收与初加工，包装贮藏运输技术规程，

质量标准制定等方面作了原则规定。论证后的正式文本将在很快颁布实施。与此同时，国家投资在一些地方建立优质高产无公害药材种植园区，地方政府、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也加入了投资行列。科研部门、种植单位的积极性更高。这种多方结合发展绿色药材生产的模式，已成为共识和潮流。药材生产纳入了更高的科学规范化管理。1999 年国家科技部规划建立的 GAP 品种如下：

黑龙江　龙胆、防风、五味子
吉林　人参、鹿茸
内蒙古　甘草、黄芪、麻黄
宁夏　枸杞、麻黄
陕西　丹参
河南　地黄、山药、牛膝、怀菊、辛夷、山茱萸
甘肃　当归、大黄
山东　金银花、北沙参、瓜蒌
河北　白芷、紫菀、荆芥
江苏　银杏、白菊花
浙江　延胡索、白术、浙贝母、菊花、薏苡仁
江西　栀子、枳壳、车前子
安徽　白芍、桔梗、板蓝根
湖北　茯苓、独活、厚朴、射干、苍术
湖南　玄参、玉竹、前胡、吴茱萸
广东　砂仁、巴戟、藿香、佛手、穿心莲
海南　益智仁、槟榔、豆蔻、丁香
四川　川贝、川芎、天麻、麦冬、黄连、附子
云南　三七、云木香、当归
贵州　杜仲、石斛、淫羊藿
新疆　雪莲花
重庆　半夏、天冬

第四章　中药的对外交流与贸易

中药的对外交流与贸易，开始早，历时长，涉及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在清代以前就多达百余个。接受中药交流与贸易有两种原因。一是随着中医学的传播、接受而需要。东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越南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国家在唐代就全面移植了中国医药学，因而中药的需求量大，品种多。他们在发展了自己的医药后，也向中国输出药材。二是作为特效药物或其他用途的商品接受。欧洲、非洲、西亚、中亚、南亚和南洋的国家则属于这种情况，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药材向它们输出的品种和数量较前者少。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些地区，尤其是非洲、西亚和南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向中国输出地产药材，双方贸易一度十分频繁。

在清代以前的漫长时期，药材的进出口贸易有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方式，多用以货换货或金属货币支付。官方贸易中，包含特殊的朝贡赏赐贸易，简称朝贡贸易。

一、汉代　对外交流与贸易开始

（一）通西域与丝绸之路的大黄香药贸易

汉武帝时，国力已十分强盛。为了消除北方匈奴侵扰和对西域

的控制，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东西夹出匈奴。大月氏原住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后被匈奴入侵迁往大夏（今阿富汗境）。张骞途中被匈奴所俘，拘留 10 余年后逃出，到了大月氏。但联络未能成功，13 年后回到长安。公元前 119 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今伊犁河流域一带）打击匈奴。张骞率将士 300 人，每人备马 2 匹，携带亿钱的货物金帛及上万头牛羊。结果也未成功。汉武帝并未完全寄希望于联络西域力量。公元前 124 年至公元前 119 年，3 次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直接大规模出击匈奴获胜。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附汉，北匈奴求和亲互市。后又经过数十年战争，才彻底结束了匈奴威胁。

张骞虽未完成军事使命，但加强了汉族同西域各族的政治经济联系，开辟了通往中亚各国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内陆商道。

统称为丝绸之路的商道有南北两条。两道均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分向。南道在敦煌西南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鄯善、于阗、莎车，西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向西去大月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再西去犁靬（今土耳其），至黑海的君士坦丁堡，全长 7000 公里。再西去大秦（今意大利罗马）。北道出敦煌西北的玉门关，经伊吾（今哈蜜）或楼兰（今罗布泊）至高昌（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经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北部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康居（今乌兹别克撒马尔汗一带）、奄蔡（今里海与咸海之间的哈萨克斯坦地区）等国，再往西去地中海、大秦。中国以丝绸为主的货物多经南道输出，所以南道又称丝绸路。北道诸国盛产皮毛，并由这条商道输入中国，所以又称皮毛路。

汉朝使者和商人，用骆驼作交通运输工具，每年有几起或十几起，经过西域去西亚、中亚各国。人数少则百余人多则数百人，进行政治联系与物资交易。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生丝及丝织品，此外有漆器、玉器、铁器等手工业品。生丝在大秦价与金等，极受

欢迎。药材输出以大黄最为著名。国外文献记载，公元前 114 年，中国大黄由长安出发的商队贩运，经西域、里海转运至欧洲[54]。走的是北道皮毛路。西域商人，也把内地运出的大黄、肉桂、黄连、茴香、花椒等药材，运到中亚和阿拉伯。西亚、中亚各国使者和商人，也沿这两条商道来中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皮毛及毛织品，此外有良马、骆驼、珠宝、犀角及香料等。大宛、康居、大月氏、罽宾（今克什米尔）等地（亦有西域）的葡萄、胡瓜，大宛的胡麻（芝麻）、苜蓿，安息的石榴、胡桃、橄榄，中亚的大蒜、胡荽、胡萝卜，身毒（今印度）、罽宾的胡椒、红蓝花等特产植物也传入中国并种植成功。后来成为中药的一部分。

中国皇帝和权贵们，很快喜欢上了这些外来的香药，燃点飘香，青烟辽绕，高雅而神秘。汉武帝在宫中烧天下异香，有苏合香（还魂香）、沉光香（乳香）、精祇香（没药）、明庭香、金蘼香等。东汉对香药的需求增大，权贵们甚至直接参与香药交易。宦官窦宪是掌握军权的大将军，叫人载杂彩 700 匹、白素 300 匹，换大月氏的马匹和苏合香。苏合香能开窍辟浊，善治昏厥，故又称还魂香，产在属大秦管辖的亚丁湾两岸。窦宪如此大的换货购进，可能有从中牟利的目的。

（二）南方丝绸之路的肉桂犀象贸易

西汉时，还有被今誉为“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陆、水商道。南方丝绸之路起自今四川成都，由两条古道通云南昆明、大理、保山，再往西南去缅甸、印度。商品运输由部落逐个转运。张骞公元前 112 年奏汉武帝，说他在大月氏看到邛杖和蜀布，当地人说是从身毒（印度）传来。证明这条商路存在。海上丝绸之路起自合浦郡徐闻县（今广东雷州半岛南端），西航通东南亚、南洋、斯里兰卡及印度东海岸。海运的管理机构在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市）。这两条当时不是主要商道。但产在中国南方的药材肉

桂，从合浦（今广西合浦县）起航运到了斯里兰卡，再由此转运销波斯湾和红海两岸。斯里兰卡和非洲之角的一些小国，反被大秦称为肉桂之国[55]。

东汉时澜沧江以东的哀牢人归汉，东汉置永昌郡进行管理，郡治在今云南保山县境。境内横断山脉纵贯，怒江、澜沧江、元江直通中南半岛。永昌夹在怒江和澜沧江中游，靠近元江源头，水陆交通便利，成为西南内陆与缅甸（掸国）、印度（天竺）、大秦等国通商的重要城市。象牙、犀角、香药及其他药材，由永昌经大理、昆明至成都，再运往内地。时匈奴又在西域发生战乱，欧洲、中亚和印度的使节、商人，纷纷改由海路来中国。日南（今越南中部广治河与甘露河汇流处）成为来中国贸易的门户。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前166年），罗马商人以大秦国王安敦使臣名义，由海路至日南上岸，到了京城洛阳，献象牙、犀角、玳瑁。是中国和罗马直接交往的开始。也为汉代以后频繁的海上贸易揭开了新篇章。位于日南西南的扶南国（今柬埔寨），也派使臣向东汉皇帝献犀角。

（三）与朝、日、越的医药交流

与中国山水相连的朝鲜、越南，很早就与中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朝鲜在西汉时半岛的北部归汉管辖，置乐浪等四郡。南部为马韩、弁韩、辰韩割据。半岛各地相继接受中国文化，使用汉字，中国医药随之传入。隔海相望的日本（时称倭国），时由一百多个小国割据。其中三十多国经过朝鲜半岛与西汉建立联系，主要获得中国的铜铁器及丝织物。越南在西汉时，南部称林邑国，北部、中部归汉管辖。汉在北部置交趾郡，中部置日南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中国医学及药物传入越南，逐步形成越南医学北方派（中国派）。越南原有的医学则称为南方派（越南派）。东汉政权继承对越南中、北部管理权，仍置日南、交趾二郡。守将马援在那里发展农业。马援常食地产薏苡仁以轻身省欲，抗御

瘴气。他见交趾薏苡实比内地的大，想引种内地。军还时载了一车种子。后来交趾薏苡在中国南方广为种植。

（四）两汉的外贸管理机构

由于中国医学的临床医学体系和药物学体系，是在东汉后期才初步建立；加上运输工具和航海技术相对落后，整个汉代的药材对外交流与贸易规模很小，处于开始阶段。相反，这一时期的外来药物输入相对较多，反映汉代对外比较开放。为了鼓励外国使商来中国建立政治经贸关系，西汉在京城长安设立专管外贸的机构大鸿胪，并有译人职官。长安的藁街蛮夷邸，专门接待外国使者和商人。东汉京城洛阳也有同样机构。在通往西域的商路上，设有驿站方便商旅。从输入中国的药物看，虽然主要是香药、犀角等珍稀之物，供统治阶层作奢侈品用。但是后来，这些商品却成为常用中药，也成为这些地区与中国长期贸易的传统商品。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　交流贸易继续发展

（一）魏蜀吴的对外交流

三国时期，北方的曹魏西与中亚、西亚各国通商，东与朝鲜、日本交流。次数比汉时有了增加。景初二年（238 年），日本女王遣使向魏贡生口（佣人）四男、六女及班布二匹二丈。魏明帝曹叡赠还锦五匹、毛毯十张、各色丝织物一百匹；还另赠女王锦三匹、毛毯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及真珠（珍珠）、铅粉五十斤[56]。珍珠主作装饰品，铅丹作美容用。日本女王显然是献少获多得了大利。

西南的蜀汉，以永昌为中心与掸国（缅甸）、盘越国（今印度东南）、天竺（今印度北部）进行商贸。大秦货物除北走丝路外，

也从水路经永昌输往成都。货物有金、银、玉石、象牙、玳瑁、香药及其他药材。主要换取蜀丝、蜀锦等物。

东南的孙吴，海岸线北起长江口，南至越南中部的日南。内河、海运发达，与东南亚以西各国有商贸交往。其中与大秦交往较为频繁。《魏略》中记载了大秦的65种物产，内有12种香药。大多产于亚丁湾的阿拉伯香岸和非洲的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是输入孙吴的主要商品。这些香药是：微木（乌文木）、苏合香、狄提（芦荟）、迷迷（迷迭香）、兜纳（没药）、郁金香、安息香、芸胶（阿拉伯胶）、薰草（柔毛薰衣草）、薰木（紫檀木）。毗邻的扶南、林邑国也多次遣使节向孙吴献香药。

（二）与朝鲜日本的交流贸易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医药与朝鲜、日本交流更频。东晋时朝鲜进入三国时期，高句丽居北，百济据西南，新罗占东南。公元372年，高句丽仿中国立太学，教授各家经典。有僧医布道施医传布中国医药。南朝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应百济王请求，梁武帝派医生去传授医药知识。不久，百济国仿南北朝医制，设立了医博士和采药师官职。554年，朝医将中国医学传到日本，带去中国医书20几种。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年），吴（今苏州市）人知聪，带医经、本草164卷赴日传授医药。知聪途经高勾丽时，停留传医一年后去日。知聪被日本赐姓“和药使者”，其子孙在日本相继为官。朝鲜医药迅速发展，有不少药材传入中国。仅记入《本草经集注》的，就有人参、金屑、细辛、五味子、款冬花、昆布、芜荑、菟丝子、白附子等11种。书中在谈到人参时说：“人参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丽，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说明这些输入的朝鲜药材，已进入中国药材市场。

（三）与南海以西诸国的交流贸易

在与南海及其以西诸国交易中，番禺已超过日南，为中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与林邑、扶南、盘盘（马来半岛北部）、丹丹（马来半岛南部）等国交流最为密切。从孙吴至南朝，扶南国遣使到中国达30余次。各国所献多为地产的沉香、檀香等香药及其他方物珍宝。他们当然都得到了中国皇帝的回赠。南朝苍梧（今广西梧州市）知医道士，去林邑采药，用温白丸为当地人治病，很有影响。林邑药材也通过民间贸易进入中国。陶弘景记载有水苏和石硫磺。这时的欧洲大秦，势力范围扩展到非洲之角。由此输入中国的香药增加了木香和血竭。运输路线也不走永昌而在番禺入境。所以《本草经集注》说，木香“永昌不复贡，今皆从外国舶上来”。在谈到木香应用时说：“乃云大秦国以疗毒肿消恶气有验。今皆用合香，不入药用。惟制蛀虫丸用之，常能煮以沐浴，大佳尔”。说明在中国是作制香和防虫药使用。没有道听途说相信大秦的经验。后来木香作为行气止痛药用。血竭进入中国名麒麟竭。由五世纪人裴驷记录在《广州志》中。

三、隋唐五代　交流贸易大发展

隋唐五代，中国对外交流与贸易有很大发展。尤其是唐代，已成为亚洲的商业中心，国际商道有五条陆路和两条海路，贸易往来达40余国。在陆路商道上，有很多著名的外贸商城。西北的外贸中心是京城长安，往西还有天水、武威、张掖、敦煌等城，都在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上。此外还有北部的夏州（今陕西横山）、受降城（今内蒙古五原）、大同，东北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和西南的永昌。在海路商道上，南方的番禺（今广州市）是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往西还有交州（今越南河内），往北有泉州、明州（今福建宁

波）、杭州、扬州、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城市。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于688年由新罗统一，结束了三国割据的分裂局面。918年建高丽国。日本则完成大化革新，仿隋唐之制制定了《大宝律令》。其中的《疾医令》规定，医生必学的中国医籍、本草有十余种。中国医药被全面移置。中国医药书籍大量传入朝、日，中国医生也多次应邀传习，朝、日的遣隋使、遣唐使中有学习医药的人员。中国医药的全面移置，大大促进了中、朝、日的药材交流与贸易。

（一）中朝药材频繁交流

朝鲜从边境贸易中获得中国药材。朝鲜的特产药材也通过朝贡和直接贸易进入中国。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金庾信赠定方牛黄九两。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新罗文武王贡牛黄百二十分。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圣德王遣使献牛黄、人参。开元十九年（731年），圣德王又贡牛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新罗道王侄志廉谢恩，献牛黄二十两、人参二百斤。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新罗王景德遣使献牛黄、人参。天宝八年（749年），新罗道使献牛黄。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新罗王惠恭遣使献牛黄。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年），高丽广平侍郎张芬等53人，赴唐献人参、松子[57]。这些献药，照例都是有回报的。在唐人的本草书籍中，由朝鲜输入中国的药材有人参、牛黄、昆布、芝草、鱼牙油、白附子、海松子、延胡索、海藻、腽肭脐、担罗、蓝藤等。

（二）中国药材输出日本的第一次高潮

唐代中国药材输出日本很多。精通医药的扬州高僧鉴真，应邀去日本讲学。他带了一批能干的弟子和药材，历尽艰辛，于754年第六次东渡成功，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鉴真是一位博学家，

在日本传授佛学和中国文化，包括医药知识，尤善鉴别药材真伪优劣。日本的典药头也向他学习药物、本草。鉴真从扬州东渡时，原准备携带的药物，有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荜茇、诃黎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千余斤。此可说明，其他药商赴日或日商使者回国，携带的药物品种也不少。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 年），光明皇太后于圣武天皇七十七岁诞辰之际；令将 60 种中国药物装入漆柜 21 箱，纳藏于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皇家御库。在正仓院出入帐中，记有“药种二十一柜献物帐”。所记药物有：

麝香、犀角、朴硝、蕤核、小草、荜茇、胡椒、寒水石、阿麻勒、奄麻罗、黑黄连、元青、青箱草、白皮、理石、禹余粮、太一禹余粮、龙骨、五色龙骨、白龙骨、龙角、五色龙齿、拟龙骨石、雷丸、鬼臼、青石脂、紫矿、赤石脂、钟乳石、槟榔子、肉苁蓉、巴豆、无食子、厚朴、远志、诃黎勒、桂心、芫花、人参、大黄、蜡蜜、甘草、芒硝、蔗糖、紫雪、胡同律、石盐、猥皮、新罗羊脂、防葵、云母粉、密陀僧、戎盐、金石陵、石水冰、内药、狼毒、冶葛。其中紫雪、金石陵为成药。

未记入帐的药物还有：滑石、雄黄、丁香、木香、丹、白石英、香附、栀子、白檀、胡粉、琥珀、苏方、竹节人参、薰陆、沉香等。

这些唐代药物由扬州贩运至日，目前仍存正仓院。成为中国药材输日的见证[58]。

905 至 927 年，日本《延喜式》一书问世。记有日内府使用的多种中成药：犀角丸、芍药丸、温白丸、调仲丸、芒硝黑丸、鼓丸、四味理中丸、八味理中丸、七味丸、干姜丸、乌梅丸、吴茱萸丸、当归丸、驻车丸、牵牛丸、黄连丸、十三物呵利勒丸、白散、度嶂散、屠苏、千疮万病膏、升麻膏、耆婆膏、神明膏、大万病膏、枕仲膏、大黄膏等等。说明中国输日药材不止正仓院的 70 多

种。很可能达到200余种。日本在全面移置中国医药学后，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自己的汉方医学。

（三）与越南及南亚南洋诸国的药材交流

越南在唐肃宗至德（757年）后，国名由林邑改为环王国。在此前后，两国的医药交流贸易继续扩大。唐开元、天宝年间，林邑王遣使献沉香、琥珀、珍珠。贞元九年（793年），环王国遣使贡犀角，唐顺宗李诵安排在太庙接见。通过朝贡和一般贸易输入中国的越南药材有：沉香、琥珀、珍珠、犀角、丁香、詹糖香、白茅香、苏方木、诃黎勒、槟木、奄摩勒、白花藤等十几种。

中国与印度的交流，唐时有了加强。知医僧人义净，在印度（天竺）居住了20年，传播了中国医学和本草。中国传入印度的药材有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等，全为疗效显著的治疗性药物，被誉为“神州上药”。印度的多种医书也传入中国，尤以眼科医籍最为著名。诗人刘禹锡请印度医生为他治疗眼疾。印度输入中国的药材有阿魏、诃黎勒、郁金香、豆蔻、龙脑、丁香等。

地处丝绸之路中段的阿富汗、尼泊尔和克什米尔，与中国贸易亦较密切。时阿富汗已由大夏改名为吐火罗国。开元八年至十二年，国王遣使赴唐献胡药乾陀罗等二百余品。克什米尔隋唐时仍称罽宾国。贞观十六年、开元七年、八年，都遣使献胡药。尼泊尔时称泥婆罗国，贞观二十年，遣使献波棱菜，浑提葱二药。

印尼的爪蛙，时称诃陵国或阇婆国，苏门答腊岛称堕婆登国，与中国交往也很密切。诃陵国在唐宪宗元年和八年（813年）、十三年，向唐献香药、玳瑁、犀角。堕婆登国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遣使献古贝、象牙、白檀香等。

（四）大食输入中国的药材与胡商

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大食帝国，唐初强大起来，控制的疆域包括西亚、北非和西南欧大片地区。后又占领了印度北部，达到中国西部边境。大食人善经商，在世界许多大城市开展进出口贸易。大食崇敬中国文化，通过陆路、海路与中国进行频繁的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从唐永徽二年（651 年）至贞元十四年（798 年）的 147 年间，大食遣唐使节贡献方物达 37 次。有玛瑙、阿芙蓉、薰陆香、苏合香、无食子、诃黎勒、丁香、龙脑香等药材。波斯帝国即今伊朗，虽为大食控制，但在商贸上有一定独立性。整个唐代，波斯与中国的贸易都十分频繁。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7 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 年）的 115 年间，波斯国使节 28 次到中国献香药及方物[59]。大食、波斯等国的民间商人，也蜂涌来中国经商。由于路程遥远，进货、售货需较长时间，大批大食、波斯商人在中国长期居住，被称为胡商、蕃客。他们的聚居区称为蕃坊。广州的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和欧洲人，高峰时多达 12 万人[60]，为全国首位。长安的蕃客有 4000 余户。其次是交州、泉州、扬州等大城市。在云南昆明、甘肃甘州、凉州及新疆地区也有不少。波斯胡商李沙苏，甚至深入到蜀地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开香药铺。阿拉伯使者及胡商，在中国主要进行珠宝和香药贸易，载回中国的主要商品是丝绸和瓷器。他们运进中国的药材，仍是传统的香药、犀角、象牙、玳瑁、珍珠，此外有苏木、白矾、阿魏、诃黎勒、破故子及底野迦等。唐时输入的香药达四五十种。香药中以乳香最为大宗。8 世纪中叶，海南岛万安州冯若芳海盗集团，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获得大量乳香、苏木等商品。他会客时，点用上等乳香烛，一次用去百余斤之多。

（五）五代十国的香药进口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战乱割据，但阿拉伯与中国的药材贸易继续发展。李沙苏的长子李珏继承父业，仍在四川贩卖香药。次子李珣，已成为一个中国通，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诗人和药物学家。李珣到过岭南，目睹了外来药物及岭南药材的贸易盛况，写了《海药本草》。载药 124 种，绝大部分为舶来品，其中香药达 50 余种。地处东南沿海福建的闽国、江浙的吴越国，相对较为安定，积极发展海外贸易。闽国以舶来的龙脑、胡椒、肉豆蔻、玳瑁等药材，向中原诸朝进贡，求得不受侵犯。结果还是亡于南唐，仅存 34 年。吴越国 907 年建立，都城杭州。960 年赵匡胤兵变废后周建立北宋，以后才逐渐平定、合并了其他割据政权。在此期间，吴越频繁向北宋贡献舶来的香药，以讨好求生。次数之多，数量之大，十分惊人。据《浙江医药史》统计，961 年贡香药 15 万斤。973 年贡乳香 2000 斤。975 年贡乳香、香药万计。976 年 1 月贡乳香 5 万斤、香药 3 万斤；2 月贡乳香 2 万斤、香药 3 万斤；3 月 2 日贡乳香 5 万斤；3 月 4 日贡香药 20 银盒、白乳香 1000 斤；6 月贡香药 1 万斤。977 年，1 月贡龙脑、檀香、乳香 5000 斤，杂香 5000 斤；10 月贡乳香 1.4 万斤，白龙脑 10 斤；12 月贡瓶香 1 万斤，香药 1 万斤、苏木 1 万斤。如此大的进贡量，说明杭州成为重要的外贸城市，香药进口量是很大的。数十万斤的进贡，也未能阻挡北宋的统一决心。只是未兵戎相见，978 年被和平统一，吴越存在了 71 年，是十国中的长寿者。

（六）东罗马帝国朝贡底野迦

罗马的大秦，隋唐时称为拂林园、即东罗马帝国。势力范围扩大到中东和埃及。与中国仍有医药交流。拂林国最重要的药物传唐，是唐高宗封乾二年（667 年）遣使献底野迦。底野迦是多种药

物的制剂品，内含鸦片。其实，在659年颁行的唐《新修本草》中，底野迦已按中国药物收载。底野迦，“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说明是作为止痛药使用。大食、波斯的使节、商人，早已带此来中国进贡和销售。

（七）唐代的香药消费

隋唐五代四五十种香药输入中国，一部分用于医药，一部分转销东亚，另一部分则供宫廷、权贵装饰、燃点飘香享用。需要量日益增大。还在唐初，高宗就在“显庆元年（656年）敕（皇帝的诏令）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异药，是中国不产的香药。昆仑包括中印半岛南部、南洋诸岛及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苏丹、索马里等国。采购的地域是很广的。统治阶层对香药的滥用，唐时已到十分奢侈的程度。宋人《香品集要》中说：“香品最多，类出交广崖州及海南诸国。然秦汉以前未闻，惟称惠、兰、椒、桂而已。至汉武奢广，尚书郎奏事者，始含鸡舌香，其他皆未闻；迨晋武帝时，外国贡异香始；隋（朝）除夜火山烧沉香甲煎不计数，海南诸品毕至矣；唐明皇君臣多有用沉檀脑麝为亭阁，何多也”。以后富室大户、佛寺道观也多燃香。《开元天宝遗事》记，丞相杨国忠，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用麝香、乳香拌泥饰壁，连皇宫中的沉香亭都不及。春季芍药花开，聚客登阁观景，景美香浓，好不气派。后唐有一权贵，用香药制了一座庭园工艺品，取名灵芳园。是以“沉香为山阜，蔷薇水、苏合油为江池，零藿、丁香为树林，薰陆香为城郭，黄紫檀为屋宇，白檀为人物，方围一丈三尺”。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对大食、南海诸国，也有较多药材输出。主要有肉桂、大黄、黄连、生姜、土茯苓及炼丹用的矿物药火硝、磁石、朱砂等。肉桂被称为“中国木”，土茯苓称为“中国根”，火硝称为“中国雪”，磁石称为“中国土”。影响是很大的。

四、宋金元　交流贸易鼎盛期

（一）空前增加的药材朝贡贸易

宋代国家经济重心南移，国内商业繁荣。西北的丝绸之路，由于大食控制了中亚各国，吐蕃控制了河西走廊，外贸往来呈现衰落之势。宋朝便积极发展海上贸易，盛时贸易往来达五十余国。这时，中国药业体系全面建立，中医药在世界进一步传播，药材的进出口贸易与交流不仅品种多，数量大，而且利润很高，成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

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外贸的控制、管理，宋仿唐制，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胶县）设市舶司，在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设市舶务。掌管抽解（征税）、博买（官府低价优先购买）、处置舶货、办理商船进出口手续、招来与保护外商、办理外商在中国内地售货等职能。而这种集管理与经营两重职能的外贸机构，唐时仅有广州一处设置，名市舶使。外国使节和宋廷之间的朝贡赏赐贸易，不属市舶司的管理范围。朝贡贸易不上税；使节是中国的客人，来去的吃住行都受到优待；作为大国的宋朝回赠赏赐自然丰厚。所以各国来宋的朝贡十分频繁。据穆德全统计，960 至 1178 的 218 年间，国外朝贡 633 次，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交流的 98 次[61]。以朝鲜、日本、越南、印尼、大食等最勤。朝贡贸易在总外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中朝交流新高与中日民间贸易

中朝医药交流宋代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两国使节、医生交往频繁，大量的中国医籍进入朝鲜。与药物有关的交流：朝鲜在 982 年

献香药，1030 年献人参、香油、硫磺，1070 年献人参、松子千斤以上。最重要的一次交流是 1079 年，宋廷派医官邢慥等数人，去高丽为文帝治中风病，带去一百种大批量药材，另还有牛黄、龙脑、朱砂、麝香、杏仁煮酒。1080 年 3 月，高丽派户部尚书柳洪入宋答谢，所赠方物中，有人参、松子、香油等各千余斤。

宋与日本政府间文化交往处于低潮。民间医药贸易却未中断，仅北宋期间就互航 70 余次。北宋运去的药材，有沉香、麝香、甘松、薰陆、青木香、龙脑、鸡舌香、白檀香、紫檀香、苏方木、巴豆、雄黄、诃黎勒、槟榔子、犀角、空青、丹砂、燕紫（脂）、胡粉及成药制剂红雪、紫雪、金益丹、银益丹等。香药的比例较大。南宋时输日药材以常用大宗为主，有甘草、川芎、当归、巴豆、大黄、雄黄、辰砂、龙眼、蜂蜜等。日本输入宋朝的药材以硫磺为大宗，此外有水银、鹿茸、茯苓等。民间交流贸易中，存在民向官献赠情况。983 年，日本名僧奝然及弟子数人，搭乘吴越回国商船到了中国。奝然回日后，于 988 年派弟子赴宋，向宋太宗赵炅献琥珀及七百斤硫磺。1028 年，福州客商周文裔载货到日，献给日本右大臣藤原实资不少方物，中有麝香二脐、丁香五十两、沉香五两、重陆香二十两、诃黎勒十两等。

（三）宋与东南亚及以西诸国的药材贸易

宋与东南亚及以西诸国，交流贸易也十分频繁。这时越南北部为交趾，中南部为占城、西南部为安南。交趾国于 995、996、980、982、983、985、986、994、998、1001、1009、1082、1087 年，向宋贡方物，多为犀角、象牙和香药。占城国献方物达四十余次。有犀角、象牙、玳瑁、龙脑、乳香、沉香、檀香、豆蔻、丁香、木香、胡椒、笺香、茴香、槟榔等药材。其中最大的两次是，995 年，遣专使李波珠、副使诃散、判官李磨勿等进献犀角十株、

象牙三十株、玳瑁十斤、龙脑二斤、沉香百斤、夹笺黄熟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胡椒二百斤；1018 年，献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斤、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豆蔻六十五斤、沉香百斤、笺香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槟榔千五百斤。1155 年，占城国运到泉州港的七种香药，共 63234 斤。可见非朝贡的其他贸易量也是很大的。安南国也有多次朝贡。方物中有苏合香、光香、朱砂、沉香、檀香、玳瑁、珍珠、象牙等药材。

南宋时有交趾药商到京城临安大量采购土茯苓，引起京城药价上涨了几倍。并不值钱的土茯苓用于治疗梅毒，是当时最有效的药物。时称真腊国的柬埔寨、丹眉流国的泰国、罗斛国的缅甸，也向宋廷朝贡。如 1001 年，丹眉流国遣使打吉马等九人，进献木香千斤、苏木万斤、象牙六十一株、紫草百斤、胡黄连三十五斤等。一个小国如此大的进献量，显然是利用朝贡的优惠政策，与宋做一笔大宗贸易。马来半岛，是东西海运的必经之地。半岛西岸的个罗（今马来西亚吉打）、哥谷罗（今泰国南部薰里），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13 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特在《地名辞典》中说，哥谷罗是中国肉桂的交易中心，并从这里转运到阿拉伯地区。任过泉州市舶司提举的赵汝适，在《诸番志》南毗条记，南毗国（今印度西南沿海）商人，将本国货运到个罗，当地商人“用瓷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瓷器、樟脑、大黄、黄连都是中国商品。

南洋诸国，有三佛齐、阇婆、渤泥等，分属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岛。三佛齐国在北宋初就频献方物，整个宋代进献三十余次。有犀角、象牙、真珠、龙脑、乳香、蔷薇水、白沙糖、珊瑚树、龙涎香等药材。980 年，三佛齐商人李甫海，运香药、犀角、象牙抵广州。阇婆国商人，用运宋的犀角、真珠、玳瑁、龙脑、檀香、丁香、豆蔻、毕澄茄、降真香、胡椒、槟榔、硫磺等，换取中国的川芎、白芷、朱砂、绿矾、砒霜等药材。当地人

用砒霜治疟疾，用朱砂治疮痈及作化妆品，用川芎、白芷治头痛。尤其是川芎最受欢迎，认为是治头痛的特效药。《诸番志》阇婆条说：阇婆国“地之所产，胡椒最多，……其采椒之人为辛气所薰迫，多患头痛，饵川芎可愈”。中国商人到阇婆，接待规格较高。《宋史·外国》记载：“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992年，阇婆国王穆罗茶，遣使陀湛、副使蒲里亚、判官李陁那假澄等进献方物。有象牙、真珠（珍珠）、檀香、玳瑁、槟榔、龙脑香等。渤泥国于977年遣使施弩等，向宋进献大片龙脑、二等龙脑、三等龙脑、苍龙脑、玳瑁、檀香、象牙等。将龙脑分为四等进献，而不是统装货，实事求是精神可嘉。以后渤泥国又有使节向宋进献方物和香药。

南亚印度，时北部为天竺国，南部有注辇国。以注辇国与宋交往最多，规模也大。1015年，注辇国王罗茶乍遣使婆里三文等52人，献珍珠二万二千一百两、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其他香药三千三百斤，还另献珍珠六千六百两。1033年又献大批珍珠、象牙等物。1077年，注辇国遣夺罗罗等27人，献白梅花脑、犀角、象牙、丁香、珍珠等药材。南印度商人，还常去个罗、哥谷罗、三佛齐市场换取中国药材。中国和阿拉伯商人也直接运去一些中国药材。主要商品有肉桂、麝香、大黄、黄连、使君子、高良姜等。

传统的经商国大食与中国贸易最勤，宋代仅朝贡贸易就达50余次。比较重要的有：984年献棟香、白龙脑、白砂糖、薔薇水；993年副酋长李亚勿献薔薇水百瓶、无名异一块、象牙五十株、乳香一千八百斤；995年舶主蒲押陁黎遣蒲密等人，献白龙脑一百两、腽肭脐五十对、龙涎香一银盒、眼药二十瓶、千年枣、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薔薇水二十瓶、乳香山子一座。大食商人向中国贩运的货量是很大的。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一个叫蒲罗辛的商人，贩运到泉州的乳香就值30万缗。大食使节来宋进献，既

可得到大宋的丰厚回报，有的还沿途市其香药，获利真是不少。

欧洲的拂林，与宋的直接贸易显著减少。他们可以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买到所需要的中国药材。重要的朝贡是1081年，拂林遣大首领向宋赠珍珠等物。

粗略估计，由西亚、中亚、南亚及南海诸国，输入两宋的商品约300种，其中药材约60种，香药又占药材的一半左右。

（四）宋代输出的中国药材

在大量进口国外药材的同时，两宋也积极向外输出中国药材。据《宋会要》记载，市舶司通过阿拉伯商人输出的中国药材有六十余种。这些药材是：

朱砂、人参、牛黄、硫磺、茯苓、茯神、附子、水银、白附子、川芎、雄黄、川椒、石钟乳、白术、芜荑、山茱萸、茅术、防风、杏仁、五灵脂、黄芪、牛膝、石斛、使君子、肉桂、天南星、秦皮、橘皮、鳖甲、官桂、红豆、蓬莪术、石决明、乌药、桂皮、姜黄、椿皮、桂心、半夏、常山、远志、桔梗、泽泻、益智仁、甘草、荆三棱、草果、松香、滑石、白芷、蔻仁、生姜、黄芩、龙骨、蔓荆子、金毛狗脊、五加皮、菖蒲、大黄、黄连。

阿拉伯商人常将这些中国药材，转销到北非亚历山大、西亚土耳其及欧洲的威尼斯和西班牙。中国商船也有直运阿拉伯各国，甚至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10世纪阿拉伯旅行家马苏弟，目睹过西航的中国商船。他在《黄金草原》一书中记载道：中国商人往往携带麝香在海上作长途旅行，使麝香暴露在潮湿之中和恶劣条件下。如果中国人不这样糟蹋麝香，而是装入密封的玻璃器皿里运往阿曼、波斯、伊位克等各伊斯兰教国家，那么中国麝香就会和吐蕃麝香的质量一样好。麝香暴露在潮湿空气中运输，说明这些宋商毫无包装意识，不在乎受潮会严重影响麝香质量，使香气大为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麝香数量大，商人的购入成本不会很昂贵，运抵时

也很容易脱手。

（五）宋廷对进口药材的严格管理

宋廷对进口药材的管理十分严格，保证有最大的财政收入。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宋太宗赵匡义诏令：公布 5 种进口药材由政府收购专卖，另有龟皮和宾铁两种商品，共 7 种，称为禁榷；37 种药材可以民间贸易，称为放通。

5 种禁榷药材：玳瑁、象牙、犀角、乳香、珊瑚。

37 种放通药材：木香、槟榔、石脂、硫磺、大腹、龙脑、沉香、檀香、丁香、桂皮、胡椒、阿魏、莳萝、荜澄茄、诃子、破故纸、豆蔻花、白豆蔻、鹏砂、紫矿、胡卢巴、芦荟、荜茇、益智仁、海桐皮、缩砂、高良姜、草豆蔻、桂心苗、没药、煎香、安息香、黄熟油、乌楠木、降真香、琥珀、苏木。

南宋时增加的放通药材有：真珠、龙涎香、血竭、腽肭脐、栀子花、蔷薇水、没食子、黄蜡、苏合香、金颜香、无名异、红花。高宗绍兴十年（1141 年），户部重新确定的放通药物中，将北宋起专卖的玳瑁、乳香、象牙及犀角中的药犀纳入其中。国家专卖品仅剩珊瑚、龟皮、宾铁及犀角中的螺犀，比原减少了一半。红花中国有产，南宋时栽培亦广。但染料用量很大，南方仍有进口。

外国货船使抵中国港口，在规定的水域停泊。由地方官和市舶司共同验货。市舶司抽解的商品进口税，宋初是十五分之一，后增至十分之一。宋哲宗绍圣、元符年间（1094～1100 年），将货分为粗细两类。珍珠、龙脑等为细货，十分抽一。玳瑁、苏木等称粗货，十分抽三。以后大体上是十分抽一。抽解后，市舶司低价博买收购禁榷药物的全部，放通药材的十分之四至六。余者允许外商在进口州界内自由销售。取得特许公凭的外商，也可以在其他地区销售。宋太宗淳化二年（991 年），规定博买良者十分之五，粗劣者

不买。宋孝宗隆兴时（1163～1164 年），对犀角（药犀）、象牙博买十分之四，珍珠博买十分之六。抽解、博买的药材，部分上交朝廷，部分由市舶司高价卖给国内商人或转销其他国家获利。如汴京榷易署，把所得的犀角、象牙、香药、珍异的一部分，增价卖给商人，一年收入曾多达 50 万缗之巨。

（六）宋代大量进口香药及其原因

宋代进口药材中，香药比例很大。香药之中，又以乳香最为大宗。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 年），运到中国的乳香有 35.4 万斤。南宋时又有增加。仅“建炎四年（1130 年），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绍兴年间（1131～1162 年），蒲罗辛运到泉州的乳香，值三十万缗，比神宗元丰元年（1078 年）明、杭、广三处市舶司，卖出的乳香总额还多出四万缗。相当于南宋初年财政收入的 3%、外贸收入的 15%。可见经销乳香之巨。乳香的规格等级也十分复杂，分棟香（滴乳香）、瓶乳、袋香、塌香、斫削香、缠末香 6 种。瓶乳、袋香又分上中下三等。塌香又分乳塌、黑塌、水湿黑塌 3 种。

蕃商贩乳香能赚大钱，走私和与中国商人私下交易获利更丰。葱岭以西的回鹘人贩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严重违反宋的禁榷规定。元丰初宋就不准他们再和中国通商。直到南宋才有松动，又准他们与中国贸易。

香药中的最贵重商品，莫过于有香王之称有龙涎香。据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介绍，它的来源功能颇为传奇。《岭外代答》说：大食西海（阿拉伯海和索马里海域）多龙，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鲛人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色紫，甚久则黑。因至番禺，尝见之。不熏不莸（臭气），似浮石而轻也。龙是不存在的传说动物，自然没有它的唾液凝结块。实际上是真甲鲸、抹香鲸分泌的胆汁凝块。大概是因为剧烈呕吐而浮凝海面。上等龙涎香

产在非洲东海岸和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海域。马尔代夫群岛、印度洋东部及苏门答腊附近岛屿产者质次。飘浮的龙涎香多随海浪泊至岸边，有的也浮游于大洋深处。大小不等，或三五斤，或十余斤。1156 年，三佛齐国使者向南宋进献的一块竟有三十六斤。

龙涎香在公元六世纪传入中国，称为“香神”。其实生者并无香气。用蕃栀子花、素馨花、茉莉花等炼制后才香气横溢。阿拉伯人用龙涎香调制香膏，用于化妆品和烹调。波斯人称龙涎香为香中之王。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胶结性能，配制其他香药，能散发众香，经久不绝。中国也主要用于配制香烛和香料。龙涎香还有清暑的药理作用，但价值昂贵而医者少用。只有像唐懿宗同昌公主那样的人才用得起。《杜阳杂编》卷下记，她用涂有龙涎香的澄水帛消暑：“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云其中有龙涎，故能消暑毒也”。用龙涎香配制蜡烛，有耐燃、聚烟两大特点。甚至《岭外代答》说：“和用真龙涎焚之，一铢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座客可用一剪分烟缕”。

龙涎香的来之不易与独特功用，使它们的身价极其昂贵。张知甫《可书》中记述，说他亲眼所见，一番商出售二钱真龙涎香，索价 30 万缗。明节皇后出价 20 万缗还不愿成交。如此高的要价可能是商人牟取暴利的贾用伎俩，不一定代表真实情况。但南宋时广州一两真龙涎，可值五六万缗确是事实。

香药在宋代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有以下原因。第一，宋代宫廷、富人奢侈之风远胜唐代。皇宫中用龙涎、龙脑、沉香屑和蜡制烛，点起来既明亮又香气四溢。宫外的“云霄间、石窍间，脑麝烟起如雾”。贵族妇人外出乘车，要携带香球、香囊，车驰过后“尘土皆香”。大官僚、大商人用薰炉薰衣，穿衣人离开后“数日香不灭”。权贵之间，上下之间馈赠、行贿，香药是重要的物品。如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八月，泉州节度使陈洪进父子献麒麟竭二百斤贺皇帝登位。外商的药材抽解后，也要向地方和市舶司官员送香

药。1083 年，三佛齐一船长，向广州市舶司提举孙迨赠龙脑和布。孙迨如实向朝廷报告。朝廷诏令按价收入官库。看来孙迨是一个清官。第二，经过汉代以来的千余年实践，中国医生发现，香药有芳香开窍，辟秽解毒，行气止痛，活血化瘀，温中散寒，开胃健脾等多种医疗作用，而且疗效显著，因而广泛用于临证处方和制造成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三百余种成药有香药配伍。治诸风成药中，香药使用更多。香药还在饮食业中广泛应用，包括菜肴、面食及小贩的风味小吃和饮料等等。成药和饮食业的广泛使用，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对香药的需求。第三，香药需求大增，官方、民间、外商经营香药有厚利可图，因而积极性很高。据赖存理《回族商业史》统计，宋代外贸收入及占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如下：

年号 时间	年财政 收入（缗）	年外贸 收入（缗）	外贸收入占 财政收入中比重（%）
北宋初年（960 年）	1600 万	30 万	1.9
元祐初年（1068 年）	4800 万	41.6 万	8.7
崇宁元年（1102 年）	6000 万	110.1 万	1.8
南宋初年（1127 年）	1000 万	200 万	20.0
绍兴末年（1162 年）	约 3300 万	200 万（仅闽广两处）	约 15.0

南宋初年外贸收 200 万缗，占全年财政收入的 20%，是北宋初的六七倍。而外贸收入中，香药收入又占极大的比重。有说占南宋初的一半。所以《宋史·食货志》总结说："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药）之利博，故以官为市焉"。为了鼓励外商向中国贩运香药及其他舶货，宋廷对中国外贸官员及中外商人，采取了有力的奖励措施。"绍兴六年（1136 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钢首（货主）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资，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缗）者补官有差。""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

转一官；又招商人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尝”[62]。即中外货主能招商，为宋赚取五万缗、十万缗者，可以封官当差。征税、博买乳香到一百万两的官员，升官一级。那位贩乳香值三十万缗的大食蕃商蒲罗辛，招来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的中国钢首蔡景芳，都被宋廷授官职补承信郎。另一个阿拉伯巨商薄庚寿，对宋外贸发展有功，被朝廷任命为泉州市舶司提举，掌泉州外贸 30 年之久。对来中国贸易的阿拉伯商人，来时设宴欢迎，去时犒宴送行。宴请的对象有“番汉纲首（中外货主）、作头（船长）、稍工（海员）人等，各令与座，无不得其欢心”。

（七）泉州香药走私凶杀贿赂案

高利的香药贸易，刺激国内商人甚至官员进行海上走私。淳熙五年（1178 年），泉州从义郎王元懋主舶船贸易，出资以吴大作为纲首，一行 38 人同舟泛洋。一去 10 年，获利数十倍。返至惠州（今广东惠阳东）时，同行的林五、王儿想多霸货产，杀吴大等 21 人。凶徒换小船回泉州报元懋，说船舶遭水，货损失其半。王识破有诈，凶手坦白其过，并说：“今货物沉香、真珠、脑麝，价值数十万，倘或发露，尽当没官，却为可惜”。王元懋亦利其物，通过都吏吴敏，重赂新上任的泉州市舶司提举张逊，免于报关。张逊除得抽解货物外，还可分余货之利。恰逢被屠的 21 人中 1 人死里逃生，正好告与市舶司张提举下。张叫下属南安县以船漏损人处置。原告不服，又申诸司，被安抚使马会叔查明。王元懋知情杀人，包赃入己，改送晋江县审问核实。晋江县宰赵师硕审听查明实情，捕懋下狱，并奏请朝廷，将舶使张逊、南安县宰罢官，都吏吴敏等刺字发配，凶犯处死。这场泉州香药走私凶杀贿赂大案得到公断[63]。

（八）进口药材犀角象牙

除香药外，犀角、象牙也是输入宋代的重要商品。

犀角是疗效极佳的解热止痉药，汉代已用于临床。中国长江以南虽有出产，但质次于印度、非洲的进口品。进口犀角大多为朝廷、富家所用，作腰带、杯盘器皿之类。宋代的进口货单中，有螺犀、药犀之分，各又有上、中、下3个等级，证明进口犀角中确有部分药用。宋时犀角仍很珍贵。仁宗时（1023～1056年）京师大疫，命太医院合药救济。尚药局拿出犀角2根，视之其一为优质的通天犀。御前内侍李舜举请留给帝用。仁宗十分生气地训斥道："吾岂可贵异物而贱百姓?"当场就将通天犀击碎。

象牙中国南方亦产，量不大。宋代输入的象牙主要来自东南亚、印度和非洲，用制多种奢侈品，如大臣朝见皇帝手持的象笏，皇室用的象轿，妇人戴的凤冠及各种牙雕、牙箱、餐具、器皿等，消耗量大。非洲运来的大象牙，大的重50～100斤。1131年，大食商人蒲亚里，运来象牙209株、犀角35株。当时象牙每斤值二贯六百文，共值五万余贯。市舶司一时难以筹足货款，只好买了大象牙100株、大犀角25株，其余就地官市出售。象牙加工切削下来的碎块细屑则作药用。

（九）元代的药材进出口贸易

元代外贸十分发达。首先，元统治者对西亚、中亚实行军事占领，地域横跨欧亚大陆，中国西北丝绸商路重新开通并有发展。从京城大都出发，有两条驿道通往欧洲：一条经陕西、甘肃、沿天山南路到中亚、西亚、欧洲；一条经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沿天山北路到中亚、西亚、欧洲。沿途增设驿站，有武装保护商旅。中外商人往来频繁，超过唐宋。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珠宝、犀角、象牙、玉器及香药。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及麝香、大黄等药材。《马可·波罗游记》记载："肃州境内多山，山上出产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来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另外，元朝在造船和海运技术上，仍领先世界。载重

二三百吨的中国商船，可直航波斯湾海域。海运通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元朝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一是谋求巨大的财政收入，二是为了获得珠宝、香药供统治者享受；而对珠宝的喜爱又高于香药。

陆道的西北商路以大都为中心。海上贸易以泉州为中心。另外还有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县西南杭州湾北岸）、杭州、庆元（今浙江宁波）、温州、广州等港口。最多时这七处均置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后上海、澉浦、温州并入庆元，杭州市舶司并入税务机构。泉州、广州、庆元成为元代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

元朝对高丽（朝鲜）、日本贸易，主要以庆元为进出港。尤其日本商船来往频繁，几乎每年不断。输入中国的药材，仍以高丽的人参、白附子，日本的硫磺为大宗。硫磺既可药用，又是制造火药的原料，用于战争。元军在战争中多用火器，所以需要大量的硫磺。

越南时称安南国。1263 年后，每 3 年一次向元朝进献方物。其中药材有苏合香、光香、朱砂、沉香、檀香、玳瑁、珍珠、象牙等。真腊国（今柬埔寨）与元贸易中，最希望得到 8 种唐货（中国药材）：水银、银朱、硫磺、焰硝、檀香、麝香、草芎（川芎）和白芷。可能真腊人患疮痈和头痛者较多。前 4 种矿物药是制外科用药的重要原料，川芎、白芷是治头痛的要药。

西亚和南海诸国，输入中国的药材主要是沉香、乳香、安息香、龙涎香、蔷薇水、苏合油、降香、金颜香、没药、血竭、胡椒、红花、槟榔、茯苓、腽肭脐、犀角、象牙、珍珠等。1273 年，元世祖忽必烈，遣札术呵甲失寒等人，持金十万两，去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购药。1275 年，又命阿合马等人去购买药材。如此大规模购进药材，一定是为了贸易需要。按照贯例，这些官本经营者，7/10 的利润上交朝廷，3/10 的利润归己所得。

元时，中国输出的药材也不少。在中国生活 27 年，被元世祖

封官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他在马拉巴（今南印度沿岸）看到大批中国船只，装载着中国药材运往亚丁港，再转运至（埃及）亚历山大等地。元代输出的主要药材有大黄、麝香、樟脑、川芎、白芷、硫磺、焰硝、肉桂等。输出的其他药材，大体与宋相当。

（十）世界最大的胡椒市场泉州

这一时期，南洋各国的胡椒产量很大，中国成为世界胡椒销售的主要市场。仅杭州每天销售胡椒就达 43 担，合 3870 公斤。胡椒运抵港口是泉州。元代的泉州，又叫刺桐城，已成为超过广州的最大外贸中心。一百余国和地区的商船向这里运送货物。《马可·波罗游记》说：泉州港，“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像。每个商人，必须付出自己投资总额百分之十的税收。所以，大汗（元朝帝国）从这个地方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商人们租船运货，对于上等商品，须付该货价值的百分之三十的运费，胡椒必须付百分之四十四的运费。对于檀香木、其他药材以及一般商品，运费是百分之四十。据商人们计算，他们的花费，包括关税、运费在内，总共达到货物价值的一半。然而，就是从这余下的一半中，他们也能获得很大的利润”[64]。

产胡椒之地，最需要中国药材川芎，宋代已是如此。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又载：“胡椒……其味辛，采椒者多不禁（忍耐）其味之触人，甚至以川芎煎汤解之”。川芎成为治疗采椒人头痛职业病的特效药。真腊希望得到的 8 种唐货中，就有川芎。

元代的对外贸易发达，但主要由色目人经营。地位低下的汉人、南人，不准从事对外贸易。色目富商佛莲有海船 80 艘，珍珠二百三十石。被元世祖令去外国采购异药的阿合马，就是一个色目

商人，曾被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居于相位高官。《元史·奸臣传》中说他，“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述”，所以把他列在奸臣传之中。元朝蒙古统治者，就是利用色目富商为其供应珍宝，聚敛财富。

五、明代　时闭时启的交流贸易

（一）两次海禁与两次开禁

朱元璋1368年建立明朝后，东南沿海残存着国内的反明势力和日本“倭寇”的烧杀抢掠。朝廷怕他们勾结反明，势力壮大，因而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禁止一切私下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如规定朝贡国家、路线、港口、船只数目、贡品种类、进京人数、朝贡次数等。一般情况是船限两只，人限二百，次数则依关系亲疏而定。有二年一次、三年一次、五年一次、十年一次。日本被规定为十年朝贡一次，人限二百，船可三艘，并须持发给的“勘合”（申报文书），勘合不符者不予接待。对西北商路的朝贡贸易也有限制。如规定麦加（今沙特阿拉伯境）、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境）使节和商队，从哈蜜入境，只许五年一次，每次只能选派三五十人到京进献。各国的朝贡，多附搭有其他货物。贡物按质赏赐，附搭商品十分之六由官府收买，余者通过官方牙行与民间贸易。

明成祖朱棣时（1403～1424年），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对私人海贸稍有放宽，并先后派出使节，出访西域、南洋各国，加强政治经济联系。其中以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影响最为巨大。郑和奉命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七下西洋，历时28年，涉足南洋、印度洋沿岸30余国。最大规模出航有宝船62艘，官兵27800余人，随船医生180人。所到之处，宣扬明皇朝威德，厚赐

各国君长，接受回赠礼物，进行商品贸易，收集方物珍宝等。极大地加强了与各国的政治联系和贸易交流。

可是，郑和下西洋的巨大成功，并未使明朝统治者受到鼓舞，继续开放外贸大门，反而得出将无法控制和得不偿失的错误结论。就在郑和下西洋胜利结束的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 年），朝廷重申海禁，关闭了大的造船厂。直到嘉靖四年（1525 年），朝廷又下令取消市舶司，烧毁两桅以上海船，封锁港口，逮捕下海人员，实行全面海禁。第二次外贸关闭，持续了 130 多年。

隆庆年间（1567～1572 年），戚继光平定倭寇，朝廷对珍宝享用、香药厚利需要迫切，海禁又逐渐放开。明代后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侵占南洋各地，并以此为跳板与中国开展贸易。1511 年，葡萄牙占领满剌加（今马来西亚），次年就向中国贩运胡椒。嘉靖十四年（1535 年）葡萄牙占领澳门。腐朽的明皇朝竟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予以承认，澳门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最早据点。16 世纪末，荷兰占领印尼爪哇、苏门答腊后，即向中国运售胡椒、檀香等香药，购进中国的黄金、白铜、生丝和麝香。荷兰武力向东扩张，万历三十一年占领中国澎湖；天启四年（1624 年）占领中国台湾。英国、沙俄，也打着要求与中国贸易的旗号，骚扰中国广州、黑龙江。西方殖民者的骚扰与强迫贸易，也迫使明朝第二次开放海禁，并为列强后来大肆入侵中国，打下了一定基础。

明代对外贸易的两次关闭与开放，说明当国内的困扰问题解决后，对外开放，发展经贸交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郑和下西洋的药材贸易

郑和下西洋时向各国输出有大黄、麝香、肉桂、樟脑、人参、茯苓、生姜、当归、鹿茸、水银等中国药材，也就地转运一些地产药材，如龙涎香、胡椒、木香、檀香、金银香、苏木等。带回中国

的药材有犀角、乳香、没药、丁香、木香、血竭、龙涎香、苏合香、胡椒、阿魏、芦荟、木鳖子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短，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中国的丝绸、瓷器、铜铁器及金银。药材交易品种不可能很多，数量也不可能很大。但是这些药材，代表了明代输出的部分重要品种。随郑和出海的助手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述了一些药材交易的盛况："锡兰（今斯里兰卡）山国对中国麝香……樟脑甚喜，则用宝石、珍珠换易"；"中国宝船到彼（指祖法儿国，在今阿拉伯半岛东南沿岸），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之类，来换易紵丝、瓷器等物"。

（三）海禁中的药材走私

明代的两次海禁，长达170余年，使航海事业、商业贸易，蒙受重大损失，但并未使海上贸易停止，更未阻止明皇朝的最终灭亡。

海禁中的药材交流，是中外民间存在的频繁药材走私。明初，外国商船就运到大批龙涎香，每两值三千余文，为南宋的十七至二十分之一。造成频繁走私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和南洋以西国家之间，有长达千余年之久的药材互补贸易传统，对已无彼有的药材形成了长期的依赖性。在南洋的几十万华侨，有用国药治病习惯。东南沿海人民和海外华商，有从事海外贸易的传统和经验。加上高额利润的驱使，武装走私逐渐频繁起来。1518年，旅行家德·巴布萨说，他亲眼看见中国商船从亚丁湾进入红海。其时，在南印度沿岸的马拉巴，有中国商品的众多仓库，那里成为中国货物的转运站。存放和转运的药材商品，主要有姜、大黄、麝香、肉桂、土茯苓等。土茯苓在中国并不值钱，属不著名的一般药物，但它在欧洲的声誉却很高，连国王们都喜欢用它来治疗梅毒和风湿痛。葡萄牙人也参与走私。1580年，一位在亚洲旅行的英国商人说：葡萄牙人

从澳门前往日本，带去了大量的白丝、金子、麝香和瓷器。他们从日本带回来的只有白银。他们有一只很大的帆船，每年都去日本[65]。一个叫王贵的四川武平县药商，贩贝母、川芎到苏州卖，蚀了本钱。又买药材3担，顺利乘船运到了日本长崎。明末，福建漳州、厦门的走私船，常向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运去麝香。郑芝龙（居福州的南明唐王政权实权人物）的武装船队，向日本运去麝香、土茯苓和其他药材。据统计，明末清初，通过私人海上走私贸易输出的中国药材有：红豆、欠实、槟榔、檀香、芍药、黄精、何首乌、白术、石斛、甘草、海螵蛸、紫金锭（成药）、蜡药、丹桂、南枣、附子、珍珠、眼茄、土茯苓、冉蛇胆、天门冬、降真香、茴香、肉桂、樟脑、犀角、川芎、生地、当归。共29种[66]。实际上恐不止此数。

（四）限贡中的搭附药材

明初限制朝贡贸易后，贡国不能随意安排时间、品种和数量，收入显著减少。各国为了弥补限贡造成的损失，贡舶常搭附大量的其他药材，明代前期都全部官买。日本贡舶搭附的药材量最大。宣德八年（1433年），搭附硫磺2.2万斤，苏木1.06万斤。景泰四年（1453年），搭附硫磺36.44万斤，苏木10.6万斤。与宣德八年相比，硫磺是16.5倍，苏木是10倍。苏木的收买价，宣德八年每斤1贯，景泰四年每斤降至100文，是宣德八年的十分之一。明朝对搭附商品高价变卖，以充经费。曾变卖苏木得银1.12万两，供充军饷。宣德八年，将胡椒每斤折钞100贯，苏木每斤折钞50贯，作为俸禄（工资）支付南京、北京的文武官员。景泰四年，朝廷用苏木发放京城文武官员俸禄时，每斤仍按50贯计算[67]，是收买价的500倍。获利之高，实在惊人。

朝贡贸易的双方，实际上都是贱买贵卖，也给贡国带来很高利益。所以，明初虽有朝贡限制，贡国仍然显著增加，搭附商品数量

越来越大。在郑和下西洋时，朝贡达到鼎盛。由于朝贡品多是奢侈之物，实用价值不大；明朝虽为泱泱大国，过多的朝贡赏赐，也使国家财政吃紧。朝廷不得不恢复对朝贡的严格限制。对内也立法加强管理："贡舶未曾报官盘查，先行接买番货者，比照私自下海收买香（药）十斤以上事例，边卫充军"。但是，仍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朝贡不遵中国规定。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明廷又作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规定。

（五）中朝医药交流贸易向深层次发展

明代中朝医药交流，向更深层次发展。朝鲜医家整理 15 世纪前传入的中国医籍，编成了大型医学丛书《医方类聚》和《东医宝鉴》。1617 年，朝鲜皇室批准内医院御医崔顺立，带着某些医药问题，到中国与太医院讨论。明廷任命御医傅懋光为正教，与另外 3 人为其答疑，互相进行多次讨论。之后，傅懋光将答疑与讨论内容，以问答形式整理成 38 则，汇编成《医学疑问》一书刊行。这次交流，实为 17 世纪初，中朝两国举行的一次国家级医学学术讨论会。《医学疑问》是其记要。

在药学方面，永乐四年（1406 年）八月和十二月，明使者到朝，赠送牛黄、麝香、羚羊角等 40 多种药材。朝鲜也多次遣使向明献人参、鹿茸、虎骨等药材。永乐十九年（1421 年），朝鲜派精通药理的黄子厚，来中国广求本国不产之药。永乐二十一年（1423 年）和宣德五年（1430 年），朝鲜两次派医官来中国学习药材鉴定，并带来了 28 种朝鲜药材，请求鉴定真伪。结果定真品 20 种，伪品 8 种。同年四月，朝鲜颁行唐药（中国药物）输入鼓励政策，允许民间生药铺私自进口唐药，大力促进两国药材贸易。两国使节往来时也互赠药材。朝鲜输出中国的药材，仍以人参最为著名。《本草纲目》人参条中说：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今皆属于朝鲜，其参由来中国互市。明人杨升庵《蜀都赋》中记，在成都的药市

上，有来自高丽的人参。朝鲜人参在中国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六）各国朝贡的主要药材

各国向明朝贡的药材仍然不少，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统计有 19 国 40 余种。实际恐不止此数，全录于此。

暹罗：犀角、胡椒、苏木、片脑、米脑、糖脑、脑油、脑柴、蔷薇水、丁皮、阿魏、紫梗、藤竭、藤黄、硫磺、没药、乌爹泥、安息香、罗斛香、速香、檀香、黄熟香、真降香、树香、乳香、木香、丁香、乌香、肉豆蔻、莪茇、大枫子等。

琉球：硫磺。

美济居：丁香。

婆罗：降真香、黄蜡。

占城：伽南香、犀角。

拂林：丁香、米脑。

渤泥：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降真诸香。

满剌加：犀角、片脑、蔷薇露、苏合香、栀子花、乌爹泥、沉香、速香、金银香、阿魏诸药品。

览邦：檀香、降香、胡椒、苏木。

淡巴：沉香、速香、檀香、胡椒。

彭亨：片脑、乳香、檀香、胡椒、速香、苏木等药。

古里：龙涎香、苏合油。

小葛兰：胡椒。

锡兰山：乳香、木香、树香、檀香、没药、硫磺、藤竭、芦荟、胡椒等药。

榜葛剌：犀角、乳香、熟香、乌香、麻藤香、乌爹泥、紫胶、藤竭、乌木、苏木、胡椒、粗黄等药品。

不剌哇：没药、乳香、龙涎香等药。

阐化王：犀角。

西天阿难：解毒药。

鲁迷：羚羊角。

六、清代　从限制对外贸易到外贸主权丧失

（一）海禁停止药材正常外贸

清朝建立之初，东南沿海仍然存在着郑成功等反清势力。因而清仿明制，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准官民出海商贸，违者处斩，货物入官。后来又下“迁海令”、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五十里。城镇荒芜，人迹罕见，包括药材在内的对外贸易停止了。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朝镇压了台湾人民抗清斗争后，次年才开放海禁，允许商船渔舟出海，准许外国商人到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四处通商。30 年海禁中的药材交流，与明代一样，只能是民间频繁的药材走私。

（二）限制外贸中的重要商品大黄

16 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海盗式的西方商人入侵中国沿海，烧杀抢掳，无恶不作。沙皇俄国向中国北方扩张，17 世纪中叶侵入黑龙江，犯下累累罪行。清朝为了防范这些海盗商人的侵扰掠夺，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如只准在广州一处通商；外商只能和官准的中国“洋商”、“洋行”打交道，处办外贸事务；限制外商居住与行动；限制出口货物种类和数量。严禁粮食、五金、硝磺、书籍（史地类）出口。限制出口茶叶，每年不超过 50 万担；大黄不超过 1 千担，生丝每船不超过 1 万斤。

火硝、硫磺为弹药原料，严禁出口。大黄则是需求量很大的重

要药材。规定大黄出口每年不超过1000担，确实很少。对作恶多端的沙俄，茶叶、大黄也属严禁出口商品。当时进口中国大黄的主要是英国和俄国。18世纪的中英贸易，占中外贸易的一半以上。大黄是主要商品之一[68]。

俄国历史上，有长期进口中国大黄的传统。16世纪，莫斯科大公国将中国大黄列为官方专卖，牟利不少。清人赵翼在《簷曝杂记》中说："俄罗斯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今蒙古国北部边境恰克图市，清时属中国管辖）。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

事实上，沙俄还是不断侵略中国，禁止大黄出口也是禁而不止。在新疆的边境上，存在着大量的大黄走私俄罗斯。清军设卡进行严格的查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哈密查出商民从内地肃州私贩大黄5000余斤；喀什噶尔查出安集延（今乌兹别克东南安集延市）回民和当地商人私贩大黄4000余斤；阿克苏查出，安集延回民私贩大黄7080斤，内地商人私贩870斤。道光八年（1828年），和阗查出29户安集延人，囤积大黄3000余斤、茶叶2840斤；阿克苏查出65户安集延人，囤积大黄7650斤、茶叶60390斤。均准备通过中亚运销俄罗斯[69]。

清廷根据向俄罗斯走私大黄屡禁不止的情况，于乾隆五十四年，再次指示新疆官员："大黄乃俄罗斯必须要物，恰克图地方禁止贸易后，伊犁、喀什噶尔等处新疆地方，与布鲁特（今吉尔吉斯、塔吉克一带）、安集延地方接壤，由彼处可通俄罗斯。如不行禁止，势必由彼处贩与俄罗斯。前已敕谕新疆地方，将大黄严行禁止矣。昨据明亮等查出大黄千余斤，今福菘查出大黄七千余斤，此皆奸商希图重利，特从内地贩出，售予安集延回子，转售俄罗斯等地方。若不谕令严行禁止，则俄罗斯仍旧可得大黄"。又谕："今闻新疆地方，屡经从贸易回民并安集延回民内，搜出私贩大黄至数

千、万斤……若不以重治罪，无所示惩”。

30年海禁，150多年限制外贸，清朝并未摆脱列强的骚扰掠夺。相反，这种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经济往来和科学文化交流，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削弱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自卫能力。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彻底打开了大清帝国闭关的大门。中国社会、药材交流贸易，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三）朝贡贸易衰落与药材出口

从明末开始的殖民者海盗式骚扰，到清代前期变本加厉，至1840年发展为大规模武装入侵，大清已沦为受人欺侮的弱国。从前那些频繁向中国朝贡的国家和地区，也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占领、控制。清代的朝贡贸易就逐渐消失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列强除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外，还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如协议关税，管理海关，在沿海和内河航行自由，开辟商埠，掌握领事裁判权，享受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给中国的对外贸易打上了殖民地性质的烙印，药材出口只能在不平等条件下进行。

这时，西方医药在世界迅速传播，中国药材出口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出口量仍然不少。据1912年《中国年鉴》统计，1906～1910年，中药出口价值，每年在200万～400万港币之间。多销售到华侨集中的南洋地区。每年输出越南的川芎、白术、当归等药材，约为10万担[70]。销往欧洲、美国、日本，以大黄、樟脑、当归、麝香、甘草等为大宗，多用作医药、化工原料使用。光绪末的3年间（1906～1908年），由福建海关输出樟脑就近4万担。东北药材出口，以营口为集散地，有人参、北五味子、关黄柏、关木通等药材，销香港、澳门并出口土耳其。人参的出口量很大，仅《集安县志》载，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出口野山参77539海关两（1两为37.68克），宣统元年（1909年）又出口野山参74908海关

两。

在国界地区，仍然有传统的边境贸易交流药材，如云南与缅甸、老挝接壤的地区，盛行马帮贸易。峨山大白邑村 100 多户人家，20 多户赶马帮走缅甸、泰国、老挝经商。去时带中国日用百货，返回时贩染料、鹿茸、虎骨、象牙及其他药材。3 个月左右往返 1 次。

（四）东洋参、西洋参进入中国市场

明时，日本的医生因参价太昂，多不用人参疗病，人们也不注意发展本国的人参产业，所以李时珍《本草纲目》谈到人参贸易时，只有朝鲜人参进入了中国市场。清代时，日本已发展了自己的人参产业，并向中国出口，中国称之为东洋参。东洋参销售价低于中国人参和朝鲜人参，所以在中国很有市场竞争力。《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此参近日颇行。无力之家，以之代辽参亦有效。每枝皆重一钱许，亦有二三钱者。总以枝根印有日本二字名，价八换（一两换八两白银），无字价五换。盖有印字者，乃彼土之官参，最地道。无印者，彼土之私参也。今苏州有东洋参店，专市此参者"。

西洋参生长在加拿大南部、美国北部。西洋参的发现及成为一种产业，与中国人参和中国市场有直接关系。

中国人参在宋代就可能经过阿拉伯商人传到欧洲。以文献方式向欧洲介绍中国人参，最早是在 1642 年。以后在 1675 年、1714 年、1719 年都有报道。1714 年的论文附有一幅中国人参插图，由法国耶稣教牧师雅图斯，以"关于鞑靼植物人参的描述"为题，在英国皇家协会报刊上发表。同年，应加拿大魁北克地区拉菲泰请求，雅图斯将论文送至。拉菲泰熟悉论文和插图后，坚信在与中国东北同纬度的加拿大南部山区，能够找到人参。他们将人参图拿给当地印地安人看时，印地安人立即说认识这种植物，并带领二人将其采得。经法国植物学家鉴定，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西洋参。与中

国人参同科同属不同种。

由于人参在中国价与金等，诱惑力极大。1715 年北美迅速形成采挖西洋参、向中国贩运西洋参的热潮。人们只要能挖到西洋参和有运输条件就驶往中国。至 1752 年，仅法属加拿大专卖业，每年向中国输出价值 5000 万法郎的西洋参。为了急求暴利，参商已不顾质量，威信扫地。1759 年西洋参贸易仅为 6500 法郎，不足常年的 1%。这时的美国，还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北部，与加拿大西洋参产地相连，也形成了采挖西洋参、向中国贩运西洋参的热潮。旅行者可以在泥泞的路上看见，用毛驴驮着一袋袋的西洋参在行走。一个记者记述了采参的情景：殖民者们穿着垦荒者的服装，骑着马，驮着大包西洋参，在泥泞的福尔伯——布拉多克路上走着。寻找人参的放山人，有一种野外流浪的精神，象诱捕海鼠和打猎一样，当他们看到绿色的西洋参在栗树下面，如同一群数不清的鸽子飞去，满怀喜悦地把隐藏在地里的参根挖出来，用鹿皮袋装好带回庄园。印地安人也掘人参，用它来交换水壶、布匹、白兰地。甚至在伊犁运河的勘测人员和工人们，一看到人参那巴掌似的叶子，也扔下自己的工作去采挖西洋参。北美的采参业与中国东北采参业，真有些相似。1784 年 2 月 22 日，美国独立后开往中国的第一艘商船——中国女皇号，开往广州。运去的西洋参在中国销售，使他们获得了 3 倍以上的利润。1840 年后，美国每年向中国运销西洋参达 64 万磅。暴利导致滥采，最后使北美野生西洋参濒临绝灭，无参可采。19 世纪末，美国创办第一家西洋参种植场。以后加拿大也开始人工种植[71]。现在的西洋参，全是人工栽培品。西洋参 1715 年进入中国，药业开始经营，中医即用于临床。发现它性凉，不燥，善益气生津。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吴仪洛就收入《本草从新》中，仅仅经过了 42 年。中国医药学家吸收外来医药成就，反应是很快的。

七、民国时期　殖民地性质的原料药材大出口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妄图瓜分中国。抗战前，英美控制东南沿海，日本控制东北。抗战时，日本独控沦陷区市场。抗战后，美国又独霸中国市场。西药大量进口，中药作为原料大量出口，医药进出口贸易受帝国主义垄断控制，这是民国时期医药外贸的殖民地特征。中药出口，针对东南亚华人和朝鲜，多为治疗性药材和成药，品种较多。针对欧、美、日，多为原料性药材，品种少而量较大。

在世界范围内，海外华侨日益增加，中药材作为医药、化工、食品原料等方面的价值越来越大，因而药材出口的地区广泛，品种增加，数量扩大。外贸出口的中心由过去的广州转移到上海。由上海出口的药材达 141 种，出口到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大的有香港、澳门、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及英、美、法、德等国。上海、广州、天津是主要出口港。香港是最大的药材转运地，大批药材通过香港、新加坡运销世界各地。民国时的《中国年鉴》、记录了药材输出的一些数字。现据薛愚主编的《中国药学史料》转录如下。

1923 年《中国年鉴》药材输出地区及价值香港两：

地　区	1917 年	1918 年	1919 年	1920 年
香港	201386	2949889	3077506	3493171
澳门	25900	45180	27464	26054
泰国（暹罗）	2759	14473	36530	14292
新加坡等地	24210	40107	28361	40567
朝鲜	13765	59930	43197	4295

续表

地　区	1917 年	1918 年	1919 年	1920 年
日本	73546	35455	156134	112582
共计（含其他地区）	3417974	3258071	3404562	3731959

1923 年《中国年鉴》甘草输出价值海关两：

地　区	1913 年	1918 年	1919 年	1920 年
香港	234387	150681	173240	193841
朝鲜	8056	13366	25546	17141
日本	58316	134500	2115816	125041
美国		23155	1844005	1298664
总计（含其他地区）	336444	694026	4185114	1635339

1923 年《中国年鉴》樟脑输出价值海关两：

地　区	1913 年	1918 年	1919 年	1920 年
香港	85117	89587	875231	1631840
英国	3767		29816	159952
法国				46695
美国	39818	189915	464655	513903
总计（含其他地区）	129352	418074	1595313	2840043

1931 年《中国年鉴》记载主要药材输出量及价值香港两：

	1928 年		1929 年	
药　材	重量(担)	价值(香港两)	重量(担)	价值(香港两)
樟　脑	648	55292	739	60046
肉　桂	121247	929146	101144	173941
金鸡纳根		249130	21547	269481

续表

药　材	1928 年		1929 年	
	重量(担)	价值(香港两)	重量(担)	价值(香港两)
五倍子	99250	1632491	78448	1359913
姜	66242	276188	69973	286143
人　参	1641	326054	2064	373061
甘　草	52183	807236	58152	884923
麝　香	35174 两	938102	39108 两	186695
大　黄	14154	354624	17157	460362

1934～1948 年全国几种主要药材出口量(人参公斤，余者公担)

年度	五倍子	槟榔	桂皮	茯苓	甘草	姜黄	大黄	桂枝	人参
1934	52929	77	98175	8042	8860	214	16434	1572	262
1936	42599	49	150358	13281	12274	291	20779	1451	238
1941	22073	2488	74170	7652	5903	11	23079	659	4944
1947	16208	128	73554	2537	2362	159	2037	482	862
1948	11071	50	66949	3541	2765	280	893	1346	247

大量出口的还有江苏的薄荷油、察哈尔的麻黄等。江苏薄荷油最高年输出量近 1000 担。1940 年察哈尔麻黄销美国 143 万磅。

有些治疗性药材在国外很受重视。如德国大量进口当归生产优美露在世界畅销。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医药改进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中国藿香在德国大受欢迎的情况："近二三年来，中药中的一味藿香，在德国出足了风头，他们认为是能治百病的圣药，酒醉也去吃它，疲倦时也去吃它，伤风感冒、胸怀烦闷的时刻，都去泡杯藿香茶喝，家家户户都备有一些藿香。此物在中国并不值钱，然而在德国价值很高，一马克只能买一二两。所以许多华侨出售此药，无不利市三倍。更有许多德国人，怀中都藏着一包藿香。同时，他们并在试种藿香草，以便将来可以自给。想不到中药

在海外竟这样受人欢迎，却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与药材出口同时，有少量中成药销往东南亚的华人集中区。

八、新中国　中药进出口贸易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积极恢复发展药材、中成药生产。由于国内需求迅速增长，国家制定了“先国内，后国外”的供应原则。加上与西方国家关系未恢复正常，中药的信誉程度不高，在1978年以前，出口水平一直很低。1956年仅出口药材总值2168万美元。70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世界重新掀起中医中药热。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药业快速发展，中药国际交流频繁，对外贸易迅速增长。1978年出口10800万美元。1995年达到65500万美元，17年增长了5倍。出口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药材和中成药的出口比例，大约药材占2/3，中成药占1/3。出口值较高的中药材有人参、黄芪、当归、党参、甘草、枸杞、鹿茸、鲜蜂王浆、冬虫夏草、三七、茯苓、川芎、地黄、白术、白芍、杜仲、黄连、天麻、菊花、姜黄、半夏、大黄、蜂蜜等，中成药有片仔癀、人参蜂王浆、至宝三鞭丸、牛黄清心丸、乌鸡白凤丸、青春宝、洁尔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云南白药、银翘片、六神丸等30多个品种。中药材、中成药及各种中药保健品，总数近3000余种销往世界各地。出口较多的国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

与此同时，也有大量药材、成药进口。进口药材主要是中国不产或产量很少的传统南药和美国、加拿大西洋参。南药是一个习惯称呼，因历史上多从广州入境而得名。五六十年代，进口药材盛时约90余种，目前每年进口约40余种。主要有乳香、没药、血竭、儿茶、苏合香、胖大海、西红花、西洋参等。西红花、西洋参已引

种成功，进口量大为减少。进口成药以日本救心丹、新加坡正红花油、美国洋参丸（胶囊剂）及德国的银杏制剂最为著名。在中国有洋中药之称。

累计主要的进口药材及其主产国如下[72]。

日本：东洋参、珍珠、海马、石决明、燕窝。

朝鲜：高丽人参、海狗肾、石决明、五味子。

韩国：高丽人参。

蒙古：羚羊角。

俄罗斯：羚羊角、海狗肾、番红花、鹿茸、鹿角。

越南：肉桂、沉香、降香、安息香、藤黄、砂仁、草果、莪芰、胡椒、豆蔻、槟榔、大腹皮、马钱子、胖大海、吕宋果、大风子、象皮、千年健、胡黄连、穿山甲、蛤蚧。

老挝：安息香。

柬埔寨：沉香、肉桂、砂仁、马钱子。

泰国：砂仁、豆蔻、肉豆蔻、安息香、降香、藤黄、胡椒、吕宋果、马钱子、天竺黄、槟榔、大腹皮、胖大海、阿魏、儿茶、大风子、象皮、海马、海龙、蛤蚧、犀角、珍珠、燕窝。

缅甸：老广香、肉豆蔻、砂仁、豆蔻、槟榔、大腹皮、胖大海、儿茶、诃子、西青果、马钱子、犀角、象皮、穿山甲、燕窝、琥珀。

马来西亚：沉香、檀香、降香、肉豆蔻、胡椒、胖大海、大风子、血竭、天竺黄、诃子、西青果、豆蔻、儿茶、海马、猴枣、燕窝。

印度尼西亚：胡黄连、沉香、檀香、肉豆蔻、大风子、槟榔、大腹皮、没食子、梅花冰片、豆蔻、儿茶、血竭、藤黄、天竺黄、安息香、丁香、胡椒、莪芰、砂仁、肉桂、玳瑁、石决明、猴枣、燕窝、珍珠、海马、海龙、象皮、犀角。

菲律宾：珍珠、海马、海龙、玳瑁、石决明、槟榔、莪芰、降

香、吕宋果。

印度：老广香、胡黄连、肉豆蔻、大风子、茜茛、槟榔、大腹皮、没食子、番泻叶、阿魏、苏合香、豆蔻、胡椒、天竺黄、诃子、西青果、白檀香、降香、马钱子、沉香、藤黄、珍珠、牛黄、猴枣、象皮、犀角。

巴基斯坦：老广香、象皮。

斯里兰卡：丁香、肉桂、豆蔻、象皮。

伊朗：番红花、阿魏、苏合香、安息香、血竭。

埃及、苏丹：番泻叶、苏合香。

埃塞俄比亚：乳香、没药。

索马里：乳香、没药、苏合香、广角。

坦桑尼亚：丁香、广角。

南非：芦荟。

西班牙、希腊：番红花。

美国、加拿大：西洋参、海狗肾、牛黄。

澳大利亚：海龙、海马、石决明、牛黄、黄檀香。

历史上从泰国、缅甸、印尼、印度、斯里兰卡进口犀角、象皮，从索马里、坦桑尼亚进口广角，后因犀牛、大象属于珍稀保护动物，从20世纪80年代起已停止进口。中国政府也下令全国禁止使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编的《中药进出口贸易资料》，公布的部分中药进出口情况如下。

1980～2000年中药进出口年度总表　金额单位：万美元

年　份	出口额	中药材	中成药	进口额
1980年	24196.40	17388.72	6807.68	841.99
1981年	25291.41	17025.94	8265.47	1834.38
1982年	26429.22	18100.66	8328.56	4501.58

续表

年　份	出口额	中药材	中成药	进口额
1983 年	26539.43	18910.57	7628.86	1750.99
1984 年	27214.24	19076.50	8137.74	2297.80
1985 年	22261.49	14810.70	7450.79	2646.56
1986 年	24840.77	17645.27	7195.50	4312.00
1987 年	29059.00	21016.00	8043.00	3929.00
1988 年	36408.00	26071.00	9977.00	5553.00
1989 年	40519.00	29705.00	10814.00	3881.00
1990 年	41702.02	30414.97	11287.05	3404.00
1991 年	36793.76	24125.53	12668.23	5646.00
1992 年	41067.93	24134.16	16933.77	4531.00
1993 年	39017.10	26926.90	12090.20	5299.00
1994 年	65174.50	52148.30	13026.20	3326.00
1995 年	65501.20	51982.15	13519.05	3363.00
1997 年	60329.00	46167.00	14162.00	18797.00
1998 年	49247.00	36130.00	13117.00	22767.00
1999 年	51455.00	33283.00	7899.00	10117.00
2000 年	46000.00	29600.00	16400.00	50300.00

1994、1995 年中药品种出口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美元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94 年		1995 年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总　计			65174.50		65501.20
中药材合计			52148.30		51982.15
田　七	吨	404	728.60	407	820.42
当　归	吨	2772	642.80	2712	726.23
甘　草	吨	14271	1287.50	6252	689.98
黄　芪	吨	3508	841.70	4247	1552.13

续表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94年		1995年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党　参	吨	2245	803.10	2198	1149.07
茯　苓	吨	4277	1317.10	3063	783.87
枸杞、血杞	吨	4313	1349.90	3861	1192.61
川　芎	吨	1762	316.40	1139	283.54
地黄（生地）	吨	1631	257.40	1188	241.48
白　术	吨	1891	478.80	1750	461.31
白　芍	吨	1556	371.30	1924	416.07
杜　仲	吨	3892	1493.70	1167	1169.09
黄　连	吨	492	234.50	570	208.46
贝　母	吨	414	728.90	401	776.41
天　麻	吨	358	613.60	378	663.90
菊　花	吨	1668	347.00	1862	550.88
姜　黄	吨	1717	219.20	2552	297.79
半　夏	吨	1296	979.10	968	621.14
大黄、籽黄	吨	773	99.60	1140	160.44
甘草液汁及浸膏	吨	5134	1058.90	2883	892.37
槐　米	吨	185	37.30	112	17.07
冬虫夏草	吨	83	3748.00	58	3655.66
槟　榔	吨	31	12.30	14	2.58
丁香（丁香醇）	吨	0.0		4	0.90
肉　蔻	吨	6	0.60	0.0	0.01
豆　蔻	吨			23	4.49
番红花	吨	70	91.70	23	59.29
西洋参	吨	966	2920.40	1145	2989.07
野山参	吨	3	7.20	11	5.43
园　参	吨	2221	2145.50	1230	1541.70
大海子（胖大海）	吨	14	2.00	8	0.33
沉　香	吨	42	27.40	15	27.02
乳香、没药、血竭	吨	11	2.10	33	6.99
阿　魏	吨	3	0.70		
其他植物药材	吨	98421	18780.70	97898	20407.80

续表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94年		1995年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鲜蜂王浆	吨	853	1928.30	252	752.64
干海龙、海马	吨	0.345	0.20	8	28.58
天然蜂蜜	吨	102102	7501.60	86991	8748.39
燕　窝	吨	22	41.30	2	19.31
其他动物药材	吨	1237	682.00		
矿物性药材	吨	873	49.90	417	57.70
中成药合计			12027.90		12603.60
片仔癀			1567.30		1496.90
白　药			53.40		24.76
清凉油			783.60		1094.00
蜂王浆制剂			1122.10		814.67
其他中成药			8501.50		9173.27
中药酒合计			998.30		915.45
中药酒			998.30		915.45

1994、1995年药材品种进口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美元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94年		1995年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总　计			3326.00		3363.00
药材合计		29种	2808.00	34种	3209.00
五味子	吨	10.00			
马钱子	吨			32.00	2.00
檀　香	吨	2.00	2.00	151.06	20.00
朝鲜参	吨	8776.11	402.00	5.00	70.00
柯　子	吨	30.00	1.00		
西青果	吨	38.00	2.00	18.88	2.00
茯毛（大腹皮）	吨			65.00	3.00
芦　荟	吨			100.00	

续表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94年		1995年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天竺黄	吨	8.50	4.00	6.00	1.00
原砂仁	吨	0.32	2.00	9.00	7.00
番泻叶	吨	231.03	18.00	36.00	27.00
猴　枣	吨	63.64	58.00	89.55	27.00
荜　茇	吨			11.00	2.00
玉果（肉豆蔻）	吨	89.79	14.00	71.15	15.00
肉　桂	吨			500.00	2.00
胡黄连	吨	100.00	4.00		
槟　榔	吨	16.00	2.00	24.00	3.00
公丁香	吨	290.24	29.00	55.00	5.00
白豆蔻	吨			21.00	4.00
番（西）红花	吨	550.00	26.00	62.00	2.00
西洋参	吨	41.12	331.00	202.97	539.00
大海子（胖大海）	吨			114.40	36.00
沉　香	吨	1.50	27.00	46.74	37.00
乳　香	吨	222.60	16.00	800.24	56.00
没　药	吨	261.90	44.00	560.28	100.00
血　竭	吨	4.45	9.00	403.50	25.00
鹿　角	吨			4.00	1.00
蛤　蚧	万对	31.75	42.00	1549.13	85.00
海　龙	吨	73.92	2.00	375.00	10.00
海　马	吨	4300.71	53.00	5255.00	12.00
羚羊角及其粉末	吨			6.00	11.00
黄药（牛黄）	吨	20.77	23.00	45.25	69.00
鹿　鞭	吨	927.68	13.00	240.00	4.00
玳瑁壳、爪	吨	0.41	3.00		
石决明	吨	33.38	3.00	27.00	24.00
鹿尾巴	吨	105.02	7.00		
燕　窝	吨	423.00	39.00	524.00	48.00

续表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94年		1995年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海狗鞭	吨			312.00	16.00
山甲片	吨			17.80	26.00
膨鱼腮	吨	0.08	1.00		
其他药材			1631.00		1918.00
成药合计			518.00		154.00

1997～2000年中药进出口贸易情况表

单位：万美元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进出口总额	79126	72014	61572	96400
出口总额	60329	49247	51455	46000
进口总额	18797	22767	10117	50300
出口药材	42522	32682	33283	29600
出口提取物	3645	3448	10400	16400
出口中成药	14162	13117	7899	16400
进口药材	5531	5164	6704	6200
进口提取物	200	351	894	44100
进口中成药	13066	17252	2516	

第五章　药业的经营技巧

为了快销多销药物商品，获取更多的利润，生产经营者不断探索，采取了多种促销方法和措施，形成了一套经营策略和技巧。

一、使用广告商标

1. 实物广告

把实物商品带到市场展示给人们，提供出售信息，是最早的广告形式。“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表明商品交换萌芽时期，都是采用的实物广告。由于这种广告形式最简单、明白，因而获得最广泛的应用。至今仍是一种最基本的广告形式。

早期的医药广告，无论药摊、药铺、药市，都是实物广告。药商们把药品摆在市场上或店铺内，既提供了销售信息，展示了商品质量，又便于随时销售，所以唐末成都药市有“一川所出药草”，北宋汴梁药市商品堆积之多，有如“香山药海”。药铺经营的品种很多，人们必然追求店容整洁、取货方便而注意商品陈列。《太平广记》载南朝萧梁天监年间（502～519 年），有一个人去扬州找一家王姓药铺，正看见“王老者方当肆陈药”。说明此时已注意药物商品的陈列。

2. 叫卖广告

为了更多地引起人们注意，在繁闹的市场上，小药贩常用叫卖声唤告顾客。北宋汴梁，“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南宋杭州腊月“各坊巷叫卖苍术、小枣不绝”。成都大慈寺药市，“有以窗隙间呼货药一声，亟投以千钱，乃从窗隙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深入偏街小巷的药贩，沿街叫卖，可以唤出屋内的顾客。宋医张杲记载了一个叫卖广告的传奇效果。徽宗年间，一爱妃患咳嗽，终夕不寐，面浮如盘。徽宗见之甚为忧虑。急诏御医李防御：“若三日不效，当诛”。李已先用数药未果，今忧技穷，与妻相对而泣。忽闻外间叫云：卖“咳嗽药一文一贴，吃了今夜得睡！”李使人市药十贴，并三为一自先试服，无不良反应。于是取三贴合为一贴，入宫授妃，属分两服。当夜咳止，至晨面肿亦消。李虽幸其安，而念必宣索方书，无言以对，亦为死罪。命仆人俟前卖药人过，邀入坐。说愿以百两银买其方。卖药人回答：一文药，安得如此？防御要得方，当便奉告。只蚌蛤粉一物，新瓦上煅红碾粉，拌青黛少许。又问其来源。答曰：壮而从军，见主帅有此，故记而得之。以其易办，姑借以度余生，无他长也[73]。这起叫卖广告取得了治一病，救一命，得一方的传奇效果。此外，卖药人不图金钱的无私奉献精神，也十分令人敬佩。

3. 音响广告

用工具撞击发声代替叫卖广告，表明人们对这种音响是卖何物，已十分熟悉。如敲马蹄铁叮当声卖麦牙糖，击竹板帮帮声卖米糕。古代医生肩负药囊，走村串寨，走街串巷，行医卖药，使用一种串铃发声。传说孙思邈用串铃撑虎口为其拔刺，故串铃又称虎撑。推测唐代已使用串铃。宋代走方医李口次，使用串铃作音响广告。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收藏一铜制串铃，鉴定为宋代文物。铜铃环状，外径 12.5 厘米，内径 4 厘米。正面铸有图案，日月在上，星辰列左右。背面铸有八卦。两面图案之间，饰有罗形云

纹。铜环中空，内置四颗铜丸。周转摇动，发出铃声[74]。樟树药铺，营业时要求“三响齐备”。即算盘声响、捣药声响、碾药声响，显示出生意兴隆和员工的工作热情，很有广告宣传效果。

4. 模型广告

黑膏药是中成药里的常用剂型，既可用于外科疮疡肿毒，又可用于内科杂病，有验、便、贱的特点，很受百姓欢迎。药铺或膏药铺，用木制或铜制一串大黑膏药模型，高挂檐下，成为自己的经营标志。这种模型广告在清代较为普遍。灭鼠药使用很早，《诗经》即有记载。市售鼠药的地摊，大多用一堆死鼠作广告，难看又不卫生。唐末成都有李姓卖鼠药人，用木鼠为广告。“李客者，不言其名，常披蓑戴笠，系一布囊，在城中卖杀鼠药，以一木鼠记”。既明了方便，又清洁卫生[75]。

5. 悬物广告

东汉汝南郡一卖药老翁，将一个葫芦悬在药摊前，作为市药的标志，是中药悬物广告的开始。葫芦为葫芦科植物葫芦的果实。挖去果肉，干后可以装药盛酒，体轻耐用。此后，用葫芦装药出售的记载常见不鲜。《太平广记》中记载，唐代的长安、洛阳、益州，都有提葫芦的卖药人。民国时期，仍可见挂着葫芦的小药摊，“悬葫”成为卖药的标志之一。

一些医药世家，医高药良，治愈了皇室疾病，皇帝常有赏赐之物。他们将赐物放大复制成模型，作为市招，以示获得过最高荣誉。南宋钱塘名医陈沂，治愈宋高宗赵构妃子吴氏重病，得御赐宫扇一把，官至翰林金紫医。陈沂子孙遂以妇科为业，皆以扇裱其门，名声甚远。然纸裱之扇，日久凋敝。元末，曾孙陈仲常，以木刻扇，悬于门，世人以“陈木扇”称之。清道光年间，其裔孙迁至嘉兴角里街，门前乃列一木扇，上书“宋赐宫扇，南渡世医”八个大字。南宋京城还有“金杵臼”严防御药铺、“金药臼”楼太丞药铺，大致也是这种情况。

6. 雕塑广告

还有一些药家，标新立异，设计出生动活泼的木雕动物或人与动物形象，置放柜上，作为自己的独特市招。北宋汴京专售疝气药的李家药肆，用木牛为记。南宋临安王继先药铺，用黑虎为记，经营不错。后来他做了朝廷医官，与秦桧结为兄弟，力主卖国，留下骂名。《夷坚志·三志辛卷》记，饶州高姓药肆，世售风药，用一人手持叉钩，牵一黑漆木猪的木雕，为自己的标记，故得高屠之名。唐代药王韦慈藏，行医卖药，常携黑犬伴行。有的药家也以此雕为市招。合州凌姓元仪堂药铺，柜台上置青铜猴一对。明初火灾后，改用木质精雕，人称“凌猴子”药铺。雕塑广告为店主传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7. 供奉广告

药铺供奉的对象是药王和药神。普遍供奉的药王是孙思邈。传说中的药神，是神农尝百草时携带的那头尝药神狮。神狮为发现药物为民献身，被尊为药神。药王为木雕，贴金。药神有木雕和石雕，木雕多贴金或漆黑。药铺供奉药王和药神，是广告为民除病的服务宗旨，并有药王、药神保佑安康。

8. 文字广告

把医方写在立于乡村要道的木板上，或刻在石碑、石崖上，或抄写在纸上贴于大街要口，向行人传播医药知识，唐代已有出现。如唐玄宗在开元十一年九月、天宝五年八月、贞元十二年二月，敕令郡县将《广济方》中常用方张贴昭示天下。这种文字宣传，多由官府设置，对促进药品销售无疑起到了广告作用。宋代起，药业使用店名、产品介绍及多种牌匾的文字广告。到产地采购药材的庄客，贴条招聘药贩帮助收购药材，或直接告诉人们此处收购药材，是最常用的文字广告。

9. 印刷广告

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造纸业发达使各种纸张成为供应社

会需要的廉价商品。这时出现了印刷广告。第一份印刷广告由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主要是针灸用针）铺推出。这个广告用铜版印刷。顶部印店名，下部印经营方针，两侧有“认门前白兔儿为记”的导引，中间为白兔捣药图的商标。是一张功能较全的高水平印刷广告。此后，官药局和一些民营药铺，用铜版或木版印刷药品仿单及外包装上的图文内容，起到了印刷广告的宣传作用。清末，主产沙苑子的陕西大荔县，在每包1斤的商品外包装上，封面红纸金字，中书“同州蒺藜”4个大字，两旁印有“唐为贡品，金塔最佳”，“补肾固本，清心明目”的竖条。品名、产地、功效、历史、商标都说得清楚明白。

10. 图画广告

五代时，出现在裹药纸上画鬼神犬马之类图案，作为推销药品的图画广告。到了南宋，有人用图画广告宣传一种眼药。画面上两个身着戏装的演员，一人用手指眼，一人手持一瓶眼药，示意他使用这种药物治疗。形象生动，幽默有趣，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76]。

11. 灯笼广告

在灯笼上书写红色店名，每笼一字，吊在门前，夜间点灯后十分醒目，采用者较多。清代，北京同仁堂三字的灯笼广告，还吊在每年一次、历时月余的街道疏沟工地上。同仁堂的灯光照着沟渠和行道，给行人以方便，又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12. 音乐广告

西周时，卖麦芽糖的小贩吹箫，可能是最早的音乐广告。江湖上的流动卖药人，常常携带锣鼓琴弦，在街边、茶馆小唱聚众卖药。南宋京城茶肆，夏天常添卖雪泡梅花酒、缩脾饮等清暑保健饮料。“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既起娱乐作用，又起音乐广告的宣传作用。

13. 武术广告

在宽敞的街边、空旷的场坝，弄刀舞棒聚众卖药，是江湖流动

习武的卖药人。《太平广记》载："前蜀……市内有一人弄刀枪卖药"。这些人常售治疗跌打损伤、风寒湿痹之类的自制药品。武术不仅能聚众，也使人们将药物与他们强健的体魄联系起来，促进购药决心。

14. 动物广告

江湖上还有用动物作广告，玩蛇耍猴，聚众卖药。《夷坚志》记，"临州（今甘肃临洮）有人以弄蛇货药为业"。玩蛇人卖的常是特效的蛇伤药。民国时期季德胜弄蛇卖药，他的祖传蛇伤药在新中国开发成著名的季德胜蛇药片，畅销国内外市场。

15. 门面广告

商品经济发展、商业竞争激烈，门面广告应运而生。门面广告是多种广告的综合应用，常与店铺设施、经营特色结合起来设计。包括店铺名称、门面装饰、货柜货架、商品陈列、各种牌匾、实物雕塑等内容。在彻底摆脱坊市制束缚的宋代城市里，商业的门面广告迅速兴起。

药业店铺的名号，在唐代似未出现。京城长安的宋清药铺，开办40年声誉极高，从官员、医生到市民、农夫，几乎无人不知。但是，文学家柳宗元为他写传时，却未说该铺叫什么名号。有文献提到五代成都一家生药铺，也只是"卖生药黄氏子家"。到了宋代，开封、杭州两京，被记载下来的药铺有40余家。至少30余家有名号。其中20余家药铺直接用业主姓名做店名，或在姓名后体现经营特色。如开封的杜金钩家、柏郎中家、仇防御药铺、张殿丞药铺、李生菜小儿药铺，杭州的潘节干熟药铺、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等等。张择端反映北宋开封的社会生活写实画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家药铺，店门上方置"赵太丞家"四字店名横匾。证实北宋确实盛行用业主姓名添上"家"字作店名的习俗。30家店名中，叫某某"堂"的只有仁爱堂熟药铺一家，显得特别；另有丑婆婆药铺和三不欺药铺两家店名更觉新颖。这三家店名的标新立异，表明药铺的

主人想通过店名吸引顾客和争取信任的创新精神。元代，用某堂作店名的情况增多。明代，流传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每逢初一、十五，在公堂置案为众多贫民诊病的故事，导致药业的店名出现了时至今日的堂号潮流，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堂的含义之一，是专做某种用途的房屋。医药的根本是济世活人的人道主义目的，所以药铺的店名几乎都用“仁”、“义”、“德”、“寿”、“生”、“健”一类字眼加堂字组成。既反映社会对医圣张仲景的纪念之情，又体现了药业的经营宗旨，真是两全齐美。

除店名外，门前、店内的各种牌匾亦引人注目。赵太丞家药铺，门前两侧树高近屋檐的四座布制路牌广告，上书经营的各种膏丹丸散。其他药铺，计有“膏丹丸散”、“生药饮片”、“道地药材”、“参茸燕窝”、“尊古炮制”、“依法炮制”、“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等经营特色和经营信誉等内容。清同治年间，苏州宁远堂的三块挂匾是：“宁远堂道地药材”、“宁远堂膏丹丸散”分挂门外两边，屋檐下悬短挂，上书“本堂创始迄今已有 200 余年，只此一家，并无分出”字样。山西临汾的大兴堂，大门两边挂对联：“大盖尧都无第一”，“兴济临汾头一家”，显示历史悠久、实力雄厚。

门面牌匾还有一些特殊的荣誉性内容。定州张极珠眼药铺，生产的金牛牌眼药较为著名。乾隆出访途中患眼疾，专程去定州使用该药，竟然药到病除。乾隆大喜，欣然提笔书写“金牛张铺”4 个大字作赐。业主惊喜万分，即制成金字横匾展示，生意从此兴隆。重庆伍舒芳膏药铺也于乾隆十年，在唢呐、鞭炮声中，挂出一块“心存寿世”横匾，是由巴县正堂王忠武书赠。王正堂之妻患体弱不孕症，多医诊治不效，后用伍舒芳膏药外贴治愈，遂赠匾作谢。伍铺销售因此与日俱增。胡庆余堂挂有“戒欺”二字大匾，与其他牌匾相反，此匾面向店内，是给从业人员看的。提醒他们时时注意：医药济世活人，绝不欺骗顾客。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堂内设施，齐腰长柜，后立独有的万格药橱，上层一排青花瓷

坛。柜上置配方用具及雕塑、供奉品做市招。堂内墙壁及药橱与天花板之间的空挡，用当地名人山水、书法装饰，增加店堂美观及文化气氛。两宋京城药铺人员，还统一着装上岗。整洁精神，增加顾客的信任感。

16. 商标广告

药业在生产经营的商品上，使用自己特有的商品标志——商标。宋代官药局在产品上贴“合剂局记”印记，陈李济用“杏和堂”三字组成盾形标记，是文字商标。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捣药图，张极珠的金牛图，沐泰山的泰山图，雷允上的九芝图，同州蒺藜的金塔图，鸿翥堂的鸿衔灵芝图等等，则是一种图形商标。商标的使用，表达了商品的出处、质量和信誉，便于推销和消费者辨认。这反映药业很早就有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意识。

二、加强各种宣传

为了向消费者塑造可信赖形象，药业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

1. 形象直观展示

胡庆余堂自办鹿场。配制全鹿丸时，每次杀鹿，先抬鹿沿街鸣锣通报，然后当众杀鹿。沐泰山堂生产人参鳖甲丸，也在店门当众杀鳖。围观者甚众。道光年间，沐泰山周围一场火灾而无恙。利用这个偶然的机会，业主在门前摆一杆大秤，旁写“进货这把秤，销货这把秤，行善良心好，大火烧不到”。在相信眼见为实、因果报应的当时，起了很好的形象宣传作用。

2. 馈赠与慈善救济

利用特殊日子，向新老朋友馈赠药品，建立和加强感情联系，巩固、扩大药品销售。这种方式从宋代起就在商业中盛行，时间集中于年末。南宋《梦梁录》记载：“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挑符……馈与主顾。更以苍术、小枣、避瘟丹相遗”。“医士亦馈屠

苏袋，以五色线结成四金鱼同心结子，或百事吉结子，并以诸品汤剂，送与主顾弟宅，受之悬于额上，以辟邪气”。《武林旧事》也载：“都下自十月以来，……医家亦多合药剂，侑以虎头丹、八神、屠苏，贮以绛囊，馈赠大家，谓之‘腊药’”。同仁堂抓住京城会试时机，向来自全国的应考学子赠送时令药品，促进了产品推向全国。

开展慈善救济，向贫病者及社会施药，是中国药业的传统美德。宋清开药铺，也是为了获利谋生。但对贫困病家，允许写条赊欠而从不追问，年底就将堆积的欠条付之一炬。得到他照顾的人何止数百。清代河南平西县人于省三、业医营药，在山寨和大槐树镇开了两家药铺。遇贫病无钱支付医药费者，也以药赊之，先后积债卷数千金，悉投之于火。遇瘟疫流行，官药局和民营铺都在疫区施药救治。财力雄厚的同仁堂，还冬施米粥，夏施暑药，救助大众。这样的实例历代各地都常见不鲜。药业开展慈善救济，使他们迎得了社会广泛赞誉，反而促进了销售获利。

3．利用节日显示实力扩大影响

春节挂彩灯、放烟火是重要民俗，游人如潮。一些药家灯火装饰辉煌，塑造了实力雄厚的大商形象。宋代灯夕精巧华丽莫过于杭州、苏州、温州三地。而苏州的卖药朱家，灯烛之盛，达到号称“天下第一”的程度。杭州清河“蒋御药家，闲置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游人仕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规格确实很高。

药王庙会是药商们的重大节日。全国同仁聚会，八方药材汇集，相互进行交易。会期各地药帮请班唱戏，张灯结彩，散发传单，争奇斗胜，大开宣传之战。个体药铺则在四月二十八药王孙思邈生日，举行药王会，宴请地方名流和顾客好友，加强友谊，宣传效果十分强烈。本书后有专论。

4．争取参展评优

清末民初，有的药业把自己的拳头产品，拿到国内外的博览会上去参展评优，参与国内外竞争，使宣传从传统的小范围扩大到全国和世界的广阔天地。对药品促销和产品创优是一个很大的推动。部分参展情况如下。

苏州戈氏秘制半夏

宣统三年（1911 年） 物产南洋劝业会 获三等奖状、奖章
民国九年（1921 年） 上海总商会第一届展览会 获一等奖

苏州德大亨沐泰山联合参展 7 种药材

醉仙桃、苏薄荷、九空子、佛耳草、挂金灯、卷柏、川芎

民国三年（1914 年）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获好评

苏州雷允上九芝图牌六神丸

民国四年（1915 年） 江苏省地方物品展览会 获奖状、奖章
民国五年（1916 年） 农商部物产品评会 获奖状、奖章
民国十八年（1929 年） 工商部国货陈列馆 获奖状
民国十九年（1930 年） 西湖博览会 获奖状
民国二十年（1931 年） 实业部 获奖状

山西广盛号龟龄集

民国四年（1915 年）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获好评
民国四年（1915 年） 农商部国货展览会 获奖状、奖章
民国八年（1919 年） 山西省第一届实业展览会 获奖状、奖章
民国十八年（1929 年） 西湖博览会 获奖状、奖章

山东济南宏济堂福禄寿财喜牌阿胶

民国三年（1914 年） 山东省商品展览会 优质金牌奖
民国四年（1915 年）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获金牌奖

山东平阴树德堂福字牌阿胶

民国四年（1915 年）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获金牌奖

河北定州眼药

民国四年（1915 年）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参展

三、坚持药品质量

1. 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思想

成功的药业，始终抓住购销优质药材、制售优质成药的基本原则，坚持质量第一的经营思想。经营药肆40年的宋清，一直坚持“居善药”而享誉长安。在平江府（今苏州市）有两家药肆的南宋药商江仲谋，谈自己的经验是“收市良材，不惜价值，而所货日增”。《神农本草经》指出的“阴干暴干，采选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和剂局制定的一套规章制度，充分体现了在药材、成药生产的全过程都要坚持质量第一的思想。

2. 采购道地优质药材

同仁堂配方制药，惟重道地与质量。大黄必用西宁或凉州所产，当归必用甘肃所出，人参、鹿茸专人去吉林抚松等地采购。麝香贵重，掺假复杂难辨，则用全国著名的麝香专营药号杜盛兴供应的上等品。真正做到只求质优，不怕价高。所以全国和北京的大药号，都乐于向同仁堂提供优质药材。不少大批发药业，常在产区直接收购药材，确保质量优良和降低成本。

3. 精细加工，创造品牌产品

精明的药商，在产地设庄收购良材，再经整理加工成为有品牌的商品，好销而价高。如重庆天福同药号的天麻、大半夏、福字杜仲，自立诚药号的双喜牌虫草、声字头当归，运至香港，买家不看货还出高价。

生产成药的药业，除选用道地原料外，还在精选良方，精细加工，改进包装上狠下功夫，努力推出品牌产品。山西太谷广升聚药号的龟龄集、定坤丹，选自明代宫廷秘方，功效卓著，在全国畅销。连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都知道它的宝贵，在太平军准备进攻山西时，提前下令要保护广升聚药号，并将人员和设备迁往南京。后

因太平军失败，未能实现。

四、开展优质服务

1. 延长营业时间，实行日夜售药

宋代以前，药肆被严格限制在商业区“市”内，只准白天营业。顾客、业主都觉不便。宋代坊市制彻底打破，零售药业开始日夜售药。1136 年，官药局实行轮流住宿，遇夜，民间缓急购药，都得出卖。违者要受重罚。民营药铺，不管白天黑夜，总是有求必应。在有早市、夜市的城市里，小贩卖药，更是不辞辛苦，守摊经营。

2. 医生坐堂，诊后及时取药

医生开办的药铺，由自己坐堂看病售药。药铺业主不懂医者，则请医生坐堂。这种方式宋代已很普遍，因为“药铺要（请）当铺郎中”，“有行老引领”介绍，十分容易。此后这一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3. 配方单包，便于检查

清代以前，配方药物统装于纸质药袋内。大的药铺，药袋上加盖药号印记。如明代任太医药铺，药袋上盖《世医任氏药室》，以示负责。但对药味多少，每味剂量是否准确，病家仍不易查实。清代后期，药铺出现配方每味药单包。民国时期成为普遍的发药形式。

4. 代客加工，方便顾客

在出现药铺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医兼营药，代客加工合药多为常规。《李悝法经》中的“诸医为人合药”，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制药技术日趋复杂，特别是成药普遍上市后，医生已不能担此重任。但是，成药往往是针对某一病证的一般治则配制，不能照顾病家的个体差异和复杂病情。不少医生常要求随方制剂。药铺开展代客碾

制粉末、配制丸散、煎熬滋膏等业务应运而生。大致在明代以后，药铺开展的本店或来料加工才普遍起来。清代苏州良利堂开展代客加工后，生意十分兴隆。上海县寿山堂业主何长治，还在店内备药罐、炭火、炉灶，方便病家及时煎药。民国时期，不少药业增设按方送药、代客煎药服务。一些药铺还辟药圃，提供常用的鲜药配方，如鲜的藿香、佩兰、薄荷、紫苏、生姜、芦根、银花等。这些便民措施，促进了销售增长。

5. 医疗咨询，问病售药

问病售药既是一种医疗咨询，又是零售成药业的基本经营方式。药铺常安排知医懂药的年长人员承担。在配方发药时，对煎药方法、服药时间、饮食宜忌等也作详细交待，并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光绪八年，苏州良利堂在竞争失利后，采取了加强门市医疗咨询等多项综合措施后，很快恢复了兴旺。

6. 赊销折扣，价格优惠

赊销多限于贫病顾客在门市上的小量购药，药业本着济世活人之心，让其先货后款。清代以前多立欠据，民国时期多记帐簿。月底、半年或年末结算索付，无力支付者多毁卷免除。药铺虽有一些损失，但好名在外，能招来更多顾客。宋清、于省三是典型代表。一些富贵之家，长期在某铺购药，可以定期一次支付，讨个方便，药铺也可长期稳定顾客。批发中的赊销少于零售。唐代南京药商杜鲁滨，常赊销一个南昌药商，说明多在老顾客中进行。民国时期，大药商向小药商、拆药铺向饮片铺及批发商之间的赊销，立据付款期限，酌加协商利息，比较常见。赊销本为商业不乐之事，为了扩大业务，解决商友困难，在掌握对方能守信用后，也不失一种良策。

优惠的价格不仅是针对买方。为收购优质药材，从宋清到同仁堂的很多药业，都肯出高价优惠卖方，长期稳定了一批供货商，也维护了自己的声誉和利益。

销售中的低价薄利，仍可获较高利润。宋代官药局初期，成药的零售价比民营铺低 1/3，每年都赢余三四十万缗，超过成本一倍以上。乾隆年间，合州元仪堂以七零扣优惠批发，远在贵州的药商也前来进货。

在药材批发市场上，商品滞销时，常采取折扣若干的降价销售，盘活流动资金。民国时重庆药市部分药材折扣是：七七扣黄柏、黄芪、大黄、叙党，七八扣白芷、麻黄，八零扣郁金，八八扣黄连，九零扣使君仁，九二扣附子，九五扣使君子、补骨脂等。

7. 热情服务，礼貌待客

济世活人的宗旨，配方需一定时间，加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药业采取了一些礼貌待人和热情服务的措施。如来时看座，去时呼走好，不许与顾客争吵，门市设座，置水烟、茶壶，批发顾客招待便饭，安排客栈，走时送行等。清代沐泰山堂，还置炒米、蓑衣（避雨）、灯笼三物，供农民顾客借用。海南岛的黎族，对来收沉香的客商，除引路外，还用酒菜招待，加深感情，使其以后再来收货。

五、开拓国内外市场

医药是人人都需要的消费商品。各地都出产一些有价值的药材。中药使用复方并强调道地药材。以上三种因素，决定了中药的消费具有最广阔的市场，但是，市场的培育、形成，要靠药业自身的努力开拓。

1. 流动卖药寻找市场

在医药形成的早期，医学理论正在萌芽，用药经验不足，使用品种不多，人们对医药的信赖也未普及，市场十分狭小，死守一地不能维持生计。卖药必须与行医相结合，开展流动的行医卖药，寻找消费市场。战国名医扁鹊如此，三国的华佗也如此。就是在坐业

药铺普遍出现后，那些小本的卖药人，仍流动卖药寻找市场。他们的流动范围有的很广。第二章里的那个唐代卖药人殷天祥，从甘肃卖到浙江，又从江西卖到四川，真是不辞辛苦“游行天下”寻找市场。

2．时机成熟发展市场

宋初，坊市制打破，国内商业空前发展、繁荣，但出现私商垄断市场情况。宋神宗决定推行王安石变法，对某些重要商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朝廷令太医局在京城开办官药局，获得巨大成功，受到社会称赞．财政获利亦丰，后又及时在全国推广达七十局，占领了相当大的国内市场。清代药业空前繁荣，广东、福建、浙江药商积极发展北方市场。同仁堂成药在全国打响后，也在多处设立分店，显著扩大了经营业务。

3．抓住机遇开拓市场

庙会市场是药商卖药的好机会。抓住某些庙市的巨大潜力，建立药王庙，形成专业的药王庙会市场——药市，最终成为全国药业的批发交易中心，是抓住机遇开拓市场的成功典型。药市的形成固然与全国药业帮会有关，更与当地药业和官府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由于药市能促进地方药业发展，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自唐以后到民国初期，全国三级药材市场发展到100个以上。明代的佛山药商，抓住佛山镇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之机和地处沿海的优势，积极发展成药业，成为中国南方的成药生产基地。

4．积极开拓国外市场

重视开拓国外市场，发展对外贸易，互通有无，是中国药业的传统。西北丝绸之路刚刚开通，中国大黄就运到了西亚和欧洲。唐代至明初，官方和民间的药材进出口贸易，都进行得规模大而频繁。中国出口药材在百种以上，运销的国家和地区元代时就在百个以上。只要有利可图，中国商人也在途中做国外药材的转口贸易。国外市场的开拓，为中国官方和民间药商都带来了高额的利润。有

些药材，如大黄、麝香、樟脑、土茯苓、甘草、人参、川芎、肉桂等，已成为世界药物市场的重要商品。

六、提高业务素质

药物关系顾客性命。生产经营靠人员掌握。因此药业始终重视提高全体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

1. 启蒙必学医药知识

从事药材收购、加工或门市零售的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医药知识。唐代，朝廷太常寺下设太医署，既是医疗机构又是教育机构。教育职能是培养医生。但有一个药学部，辟药园三顷（百亩为一顷），从民间招收青年8人，名药园生。由药园师指导学习药材栽培、采集、炮制、制剂知识。毕业后留用或分配到地方医疗机构从药。宋代，太医局用公开考试的办法招收太医局学生入校学习。入学考试有内经、医方、本草等专业内容。有不少“市井盘药、合药、货生药之徒”报名试考。这些人中虽然有“捐数百缗赂判局（副校长），即得之（录取）”的腐败现象，但相信只是少数。多数药肆的青年报考人员，具备一定的医药知识水平。清代以来，《医学三字经》及各种《汤头歌诀》、《药性赋》等医药方书启蒙读物，成为青年学徒的必修教科书。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在师傅指导下学习认药和读书。1940年，北平国药业公会还出资兴办中药讲习所，提高青年学徒的医药知识水平。

2. 实践中学习操作技能

青年学徒入店，拜店主为师，但店主并不直接教艺，而是指定老药工负责传帮带，在工作中学习药材的鉴别、拣选、洗润、切制、炮制、丸散、配方、保管等技能；适合搞经营的，还要学习联系业务、接待顾客、产地座庄、账务知识、收方划价等内容。3年期满，考核合格，才结束学徒身份。或留店从业，或自谋职业。这

种工学结合的学习方式，十分实用。

3. 招聘能人上关键岗位

择优招聘熟练技工和经营能手，是提高素质的另一重要方法。一些药业采取能者提升加薪，差者辞退解雇的措施，保持素质上的优势。专营广浙药材的樟树义新美药号，聘用由学徒升中柜的能人朱芝庭为头柜，主持店务。数年之间业务飞快发展，资金猛增至50万银元，房屋70余间，占了樟树边街的一半。长春药店从业40多人，聘用精于丸散的陈祥可，擅熬龟胶的何财瑞，长于加工切制的余寿祥，使该店自制成药五六十种，饮片七八百种，商品行销全国，并在上海、广州、成都、汉口、长沙、湘潭设有代庄，成为樟树的著名药业大户。

七、严格内部管理

1. 机构精练，岗位职责明确

药业的内部机构组织，大的药铺一般由门市、库房、刀房（饮片加工）、丸散房（成药加工）、细料房、帐房六部组成。人员构成各地名称不尽相同，配置大体与此相适应。老板是企业的所有者，头柜是企业的经营者，指挥协调各部门工作。二柜负责丸散，么柜负责刀房。门市、库房、细料房、帐房等关键部门多由头柜直接掌管。

2. 多种工资形式

学徒无工资，只发理发费及春节少许压岁钱。临时工实行计时、计件工资。跑街（采购）、销售人员与效益挂钩，一般为三七分成或二八分成，老板得大头。头柜、二柜、么柜及各种技工、杂工，依其责任大小发基本工资，年终赢利，老板按级分红。经营中出现亏损，老板要减发工资甚至裁减人员。所有从业人员均与老板签有合同上岗。合同上特别注明风雨寒暑，生病吃药，天灾人祸，

听天由命，与店无涉。没有丝毫医疗费用和人身保险。员工成为最廉价的劳动力。个别药业工资、福利不错，员工与业主结成相依关系，使业务获得持续发展。

3. 建立制度奖惩分明

宋代官药局的规章制度、奖惩办法，在第二章宋代部分已有详论。奖惩之严，值得借鉴。尤其是制售假药、冒领公物治罪判刑，占公家便宜、虚报实情杖一百，不称职者罢官，有反腐倡廉、重看实绩的巨大震慑作用。

第六章　药业的行会组织

历代政府都有管理商业的中央和地方部门，药业也在其中。但是，药业自身的行会组织，在维系经营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是药业的行会组织，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

中药业的行会组织萌芽于唐，形成于宋，清代后期至民国达到鼎盛。开始并无专用名称，后来又复杂混乱，民国后期才趋统一。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行业管理的新体系。

一、唐代的药行

中唐时期，城市的商业区与居住区仍然严格分开。商业交易集中在“市”内进行。“市”周筑墙设门，启闭有时，有各种官员进行严格管理。同类商品集中在“市”内某一区域出售，形成不同的商业行业。唐代文献中有一百二十行、二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等说法，言其商业繁华，有各种行业为市场提供消费商品。诸行之中，就有药行。

官府对商业行业有征税和其他差役摊派，对于同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矛盾冲突的协调解决并不过问。这就需要一种行业的组织来协调承办，于是出现了冠以“行头”、“行首”、“行老”的人物，成为行业组织的领导者。他们由同行推选，官府批准。并无行业组

织专用名称。

唐代药业繁荣，药行是国家重要商业行业之一，但是行会组织的具体情况至今不详。有两条史料谈及药行。

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五年（845）条记：唐武宗求长生药，道士献方为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武宗使人到“药行”寻找，所有的药店都说没有。显然是受了道士欺骗。这药行当在京城长安。

扬州也有药行。《太平广记》卷 23 记载：开元中（713～741 年），有张、李二人，张富李穷，李至扬州见张，张叫李拿他的一顶旧帽子去找王老家药铺要钱。李得钱后向王问张是什么人。王回答说：“是 50 年前来（买）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寄存）在药行中”。

可见这两处药行均是指的药业铺户，不是行会组织。

但是，这并不意味唐代药业行会组织不存在。如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 年）后，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出现了一年一度的药材交流会。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载：“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号元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元龙池中，货其所赍之药，川俗因谓之药市，递明而散。……药市之起，自唐王昌遇始也”[77]。这种由天下药商参加、陆续七八天到达、开创性的大型交易活动，没有行会组织承办，不可能年年顺利进行的，由此可以说唐代至少有了药业行会组织的萌芽。

二、宋代的药市

彻底打破坊市制的宋代城市，各行各业的商店、作坊分布于大街小巷。官府为了便于管理，强令建立各业行会组织，所以《都城纪胜》说：“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行会组织

的名称有“行”、“团”、“市”、“作”等好几种。

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中有行会组织“团行”的专论。他说：“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其名称，“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又有名为‘行’者，如……姜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其他工役之人，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可见，南宋药业行会组织的名称为一般称呼的“药市”。很显然，药市既是药商集中交易的场所，又是行会组织的所在地。行会组织仍无特殊的专用名称。除炭桥药市外，临安（今浙江杭州市）还有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珍珠市。明显具有按经营某路、某种药材药商组建药业行会组织的性质。是后世按地区、按主营品种组建药帮的开始。详细记载宋代药业行会组织职能的史料很少。《梦梁录》卷19·顾觅人力项下记有：“药铺要当铺郎中、前后作、药生作、下及门面铺席要当铺里主管后作、上门下番当直安童，俱各有行老引领。如有逃闪，将带东西，有元地脚保识人前去跟寻”。说明药铺需要雇请的一切人员，如坐堂医生、管理人员、技工普工，都由各自所属的行会组织负责人介绍承办；出了问题有保人协助解决；在“药市”下面，存在着药业各层次人员的基层行会组织，行会组织的体系已基本形成。

三、明代的药行商会

明代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出现了以同一地域或某一行业商人组织的商会会馆。首创于京城北京。北京药业在明代中期以后发展很快，嘉靖年间（1522～1566年）建立药行商会，辟会馆为议事机构，是第一个具专用名称的药业行会组织。药行商会是否包括外地药商尚不清楚。药业会馆到了清代就很盛行了。

四、清代复杂的行会组织

清代中国人口猛增至三四亿，城市药业同步增长，经营分工更加精细，形成不同的经营集团。总的分为批发商集团、零售商集团和草药业集团。在大的药材集散地，有来自全国的大批药商，形成主帮、客帮两大阵营，相互往来又相互竞争。在药业实体内部，有业主、股东、头柜、药工、牙人等不同阶层。这些经营集团、经营集团中的大、中、小企业，主帮、客帮及其实体内部的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组建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业内部组织。因此，清代药业行会组织十分复杂，名称极不统一。有管全行业的总组织，有行业内部的分支组织或称基层组织。

乾隆年间（1736～1795 年）禹州的药商会，道光年间(1821～1850 年）祁州的安客堂，大概是管全行业的总组织。

行业内部的分支组织为数最多。上海的批发业建喻义堂（1877 年)，大型零售业建和义堂（1788 年)，中型零售业建信义堂(1905 年)，参茸业建参业公所（同治年间)。在樟树，业主建归仁堂，股东建集仁堂，头柜建守信堂，药工建享仁堂。湘潭的八家大铺建八堂会。成都的草药业建神农会。重庆的牙行、药栈、广药铺、拆药铺联合建药王会。其中广药铺和拆药铺又合建同庆会，经纪人建公益会等。这些堂、会、所均为本地药商的行会组织，但有的并不包括所属范围的全体同仁。

针对全国商业行会组织名称混乱，清朝商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盛之地，可设商务总会，商务稍次之地，可设商务分会。祁州药业遂将安客堂更名为商务分会。1906 年合州建药帮同业分商会。清廷的统一商会令未得到认真贯彻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了。

五、药材批发商的帮会组织

外地药商集中于某一药材集散地，依来自地区组成药帮，是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的一种行会组织形式。他们多置会馆或药王庙为议事机构。如重庆广东帮的广东会馆，浙江帮的浙江会馆，怀帮的河南公所，樟帮的万寿宫，汉口帮的禹王宫，陕西帮的三元庙。帮首由推举产生或轮流担任，多为著名业主，因而只是兼挂头衔，负责组织处理内外事务。帮内同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形成一个松散的药商集团。

药帮的正式名称最早出现于祁州药市。乾隆年间，北京、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药商组成京通行，山东药商组成山东行参加交易。道光九年（1829 年），各地药商集资在药王庙前铸了两根铁杆，底坐捐资名单出现有关东帮、陕西帮、山西帮、山东帮、黄芪帮、京通卫帮、古北口帮。后来，到祁州药商增加了西北口帮、怀帮、亳州帮、宁波帮、江西帮、广帮、彰武帮。除去祁州本地的黄芪帮共 13 帮。13 帮在祁州形成，才真正确立了祁州作为全国高级药材集散市场的地位。

帮的形成，同治四年（1865 年）祁州药王庙内建立的《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合帮新立碑》碑文上有说明："凡客商载货来售者，各分以省，省自为帮，各省共得十三帮"，并列出了如前的 13 帮名单[78]。实际上省自为帮只是基本如此。河南就有怀帮、彰武帮、禹州帮 3 帮，有的帮又含相邻省份的药商。

对祁州药市 13 帮的说法略有差异。乔冀民统计为关东帮、京通卫帮、古北口帮、陕西帮、山西帮、彰武帮、怀帮、山东帮、浙宁帮、禹州帮、亳州帮、江西帮、广帮。《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记为关东帮、京通帮、古北口帮、西北口帮、陕西帮、山西帮、怀帮、彰武帮、山东帮、宁波帮、川帮、江西帮、亳州帮。据上述增

加了禹州帮、川帮，反映出这两帮在清末民初进入了祁州药市。加上后来形成的药帮，全国共有大药帮 17 个。他们活跃于全国各大药材集散地，主要从事药材购销的批发业务。

17 帮的药商组成和经营特色如下[79]。

1. 关东帮：由辽宁、吉林、黑龙江药商组成。以营口为主要集散基地。主销人参、黄芪、虎骨、木通、胆草、木贼、防风、五味子、鹿茸等关外药材，购进全国其他地产药材。进销量大，药商户多，在祁州药市被称为关东大军。

2. 古北口帮：由古北口（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热河（今河北省承德一带）药商组成。以承德、营口为集散基地。主销黄芪、防风、知母、柴胡、肉苁蓉、甘草、赤芍、鹿茸等药材。

3. 西北口帮：由呼和浩特、包头、张家口一带药商组成。以包头为集散基地。主销甘草、黄芪、赤芍、肉苁蓉、当归、大黄等药材。

4. 京通卫帮：由北京、通州、天津一带药商组成。以北京、祁州为集散基地。主销北京同仁堂中成药、转口药材黄芪、穿山甲、紫硇砂及进口鹿茸、藏红花、洋桂枝、洋枳实、洋枳壳等。

5. 祁州帮：由河北祁州一带药商组成。以祁州药市为集散基地。药商众多，实力雄厚，活跃全国，与樟帮齐名。主销薏苡仁、薄荷、黄芪、祁白芷、板蓝根、草决明、牛膝等地产药材，还利用祁州全国药材集散地的优越条件，转销各地大宗药材。

6. 山西帮：由山西及部分陕西药商组成。以太谷为集散基地。主销黄芪、党参、甘草、菖蒲、连翘、秦艽、款冬花、远志、羚羊角、枸杞、紫草、西贝母、肉苁蓉、小茴香等药材。

7. 陕西帮：由陕西、甘肃、宁夏一带药商组成。以西安、汉中为集散基地。主销当归、枸杞、羌活、大黄、羚羊角、麝香、鹿茸等药材。

8. 山东帮：由山东药商组成。以济南为集散基地。主销全蝎、

阿胶、银花、瓜蒌、柏子仁、曹州丹皮等药材。

9. 怀帮：由河南怀庆、沁阳一带药商组成。以怀庆、郑州为集散基地。主销怀山药、怀牛膝、怀菊花、怀地黄四大怀药及麝香、朱砂等药材。

10. 彰武帮：由河南彰德（今安阳市）、武安一带药商组成。以彰德为集散基地。主销红花、瓜蒌、香附、白芷、菖蒲、党参、连翘、麝香等药材。

11. 禹州帮：由河南禹州一带药商组成。以禹州为集散基地。主销禹白附、会全蝎、密银花等药材。

12. 宁波帮：由浙江、江苏一带药商组成，宁波药商为主力军，故称宁波帮。以宁波、上海为集散基地。主销“浙八味”（浙贝母、浙麦冬、浙玄参、浙玄胡、浙枣皮、杭白术、杭白芍、杭菊花）及栀子、二红皮等药材，并做大量出口业务，运销日本、香港及东南亚。

13. 亳州帮：由安徽亳州及其他地区药商组成。以亳州为集散基地。主销亳菊、亳芍、瓜蒌、白芥子等药材。

14. 江西帮：由江西药商组成，清江县一带药商为主力军，故又有樟帮之称。以樟树为主要集散基地。药商众多，实力雄厚，在全国各大药材市场十分活跃。除主销地产枳实、枳壳、半夏等药材外，还转销各地大宗药材。樟帮还以饮片加工精细闻名全国。

15. 汉口帮：由汉口及湖北其他地区药商组成。以汉口为集散基地。主销茯苓、猪苓、桔梗、莲子、龟板、鳖甲、蜈蚣等药材。

16. 川帮：由四川及云南、贵州一带药商组成，四川药商为主力军，故称川帮。以成都、重庆、昆明、大理、贵阳、遵义为集散基地。主销川麦冬、川黄连、川贝母、川枳壳、川枳实、川佛手、川陈皮、川大黄、川丹参、川芎、附子、虫草、麝香、天麻、栀子、杜仲、厚朴、黄柏、三七、吴茱萸、朱砂、雄黄等药材。

17. 广帮：由广东、广西一带药商组成。以广州、香港为集散

基地。药商众多，实力雄厚，活跃全国。主销中成药、广藿香、石斛、田七、蛤蚧及进口南药，并大量经营出口业务。

六、民国后期的同业公会

中药业行会组织名称混乱持续到民国前期。1929 年国民政府颁行《工商同业公会法》，各地药业又纷纷更名或组建同业公会。经营药材批发的称药材业同业公会，经营饮片零售的称饮片业同业公会，不加区分的称国药业同业公会，结束了名称不统一现象。入会有的自愿参加，有的则包括全体同仁。

1941 年，国民政府又颁行商会法，规定以经营输出业务为主的同业公会，应改称“输出业同业公会”。输出包括向省外、国外输出。经营这种业务的药材业同业公会，有的又更名为药材输出业同业公会。

七、中药业行会组织的职能作用

中药业行会组织有十分重要的职能作用。对上应付官府需索，代收捐款，筹集物资；对外排斥其他药业组织或个体药商；对内协议药价，调剂货源，组织活动，制定帮规，解决纷争，维护本集团利益。

清代重庆药材市场为外来的樟帮、广帮、怀帮、浙江帮、陕西帮、汉口帮垄断。本地药商实力薄弱。于是牙行、药栈、广药铺（批发商）、拆药铺联合建立药王会抗衡。经过奋力经营，终于在民国中期扭转了客大压主局面。

上海和义堂由蔡同德、童涵春等 18 家大药铺组成。规定入会须一次交纳会费白银 500 两，中小药铺无力交纳被排斥在外。后来 50 余家中型药铺建信义堂抗衡，又把小型药铺排斥在外。光绪末

上海已有药铺200余家，两堂合计才近70余家，大部药业受到排斥。

湘潭药材行那个权威性的八堂会，由全美堂、崇谊堂、崇庆堂、崇福堂、福顺堂、聚福堂、怀庆堂和公正堂等8家大铺组成。药材交易不论数量多少，都必须经过八堂会成交，农民卖药也不例外。违者八堂采取一致行动，与买卖双方断绝交易，从而实施垄断控制。

成都市国药业公会是资方组织，他们共同对雇用药工实行微薄工资、随意解雇措施，引起成都药工一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随意解雇、要求建立成都市国药业技工会的运动。

为了维护本帮和业主利益，各帮会都建立严格的帮规。如樟树帮规定不准招收外籍学徒，不准同外籍妇女通婚，避免泄露内情。有的规定非帮会成员不准从事其业务活动，学徒期间要为老板做一些家务劳动，期满后还须为业主低薪服务数年等等。这些封建性措施，在当时条件下对业主累资起一定作用。有些规定也有积极意义。如在成都新开药铺，必须有跟师3年的学徒经历，否则不准开业。

八、新中国的行业组织

旧的中药业行会组织具有垄断性、排它性和封建性。新中国成立后自然被历史淘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行业组织。

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建国初一段时间，业主仍维持国药业公会，药工成立店员工会，分属当地工商联合会和工会管理。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零售药业全部纳入公私合营，以后分别转为国营药店或集体药店；批发药业全部国有化，建立各级药材专业公司。1955年3月成立的中国药材公司，成为全国中药行业的管理机关，各省级药材公司，为地方的行业管

理机关。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它们一方面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一方面仍然承担行业管理工作。90 年代初，各级药材公司的管理职能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各省医药管理局（后改建为药品监督管理局），由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其间，各地也建立了一些药业行会组织，如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贮运协会、中国医药包装协会、中国保健食品协会、中国中药协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等。但多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中介组织，主要业务范围是行业管理、信息交流，咨询服务、技术与业务培训等，并无多大权威性。随着改革深化，政企严格分开，药业行会组织将有进一步发展趋势。

第七章　药市与药王庙会

一、庙会与庙会市场

中国古代宗教盛行，大的寺庙有自己的朝拜节日，形成定期庙会。庙会大约出现于中唐时期，规模逐渐扩大，是天然的消费市场。包括药商在内的各业商人，抓住这一机会推销商品，形成庙会市场。庙会市场到明清时已十分普遍，成为城乡的一种重要市场形式。随着经济文化发展，庙会的经济功能逐步增强，以致达到“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谒乎庙者一”的地步。有些庙会甚至转化为纯粹意义的商品贸易市场。

庙会市场定期集市，有一年一次，一年两次和一月数次。如北宋京城汴梁相国寺（今河南省开封市自由路西段）庙市，“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中庭两庑可纳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各类商品集中在寺内某一区域，包括药材在内的各种商品无奇不有，甚至解甲归田的“诸路罢任官员”也参与出售“香药”[80]。显然，这种一月数次的频繁交易，主要是针对一般百姓的药品零售，卖药人中也有一些是非专业的第二职业者，在整个药业经营活动中不占重要地位。

二、古代药市的形成

古代药市是庙会活动与药材交易的紧密结合，在药业经营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最早的药市出现于中唐时期的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记载："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号元子，大中十三年（859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元龙池中，货其所赍之药，川俗因谓之药市，递明而散。逮国朝天圣中（1023～1031年），燕龙图肃知郡事，又展为三日，至十一日而罢。药市之起，自唐王昌遇始也。"

王昌遇生平不详，大概是易元庙（在三台县城关镇书院街，解放初尚存）中一位精通医药的道家。梓州城筑于南朝元嘉年间（424～454年）。左带涪水，右挟中江。陆路北通京城长安，南连蜀府成都，居水陆之要冲。北方药材经汉中运进四川，四川药材北运去中原，大都要经过梓州。同时，梓州及临近诸州也盛产药材，所以唐代梓州药业十分发达，吸引了波斯（今伊朗国）药商在此定居经营香药。可能是在平常的易元庙会药材交易中，王昌遇在当地及省内外有较高声誉，尤其受到药业崇敬，故在他去世之日，各地药商汇集梓州悼念并开展药材交易，以后传习，形成一年一度的药材交易会，当时称为"药市"。市期为何择在不方便的夜间进行，尚不明了。

梓州药市的创举意义十分重大，它推动了全国药材的流通与生产，对当地医药经济发展更是一个极大的促进，所以，这种定期药市形式很快为成都府效法，后来逐步推向全国，清末民初达到鼎盛，成为药材批发交易的重要市场。全国性的祁州、百泉、樟树三大药市，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唐末五代的成都药市，规模和热闹场面都大大超过了梓州，而且改在白天举行。《岁时广记》引《四川记》载："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为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这种官、商、民共庆，帅守设酒欢迎进入药市一般百姓的庆贺场面，反映出药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地位有相当大的提高。这时药市地点不在寺庙内或其附近，而是在城市商业区"市"内进行，实为一种进步。

宋代成都药市先设在城北的玉局观，后因玉局观修建五凤楼门移于城东大慈寺（今成都市蜀都大道——东西干道东段，现庙为清代重建）。虽有百货汇粹，但药材是主要交易商品。市期由原九月九日一天延长到三至五天，具有庙会性质。药市中川产道地药材很多，川芎、川大黄、麝香堆积，"香溢于廛（存放地方）"，"今医家最贵川芎、川大黄"，也有进口的人参、犀角；还有值一千钱一粒的高档珍贵成药解毒丸。《铁围山丛谈》记录了此药的畅销原因及销售盛况："往时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于是有于窗隙间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亟投以千钱，乃从窗隙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宋代成都药市仍十分隆重，官员参与观市、庆宴，与商、民共庆成为传统。

药市虽在唐宋出现，但在明代经开国皇帝朱元璋提倡，才迅速发展到参与药商更广的新阶段。

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诏令全国药商在药材贸易繁盛的禹州集结交易，初步形成全国市场。又在洪武八年（1375 年）四月八日（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日）到百泉卫源庙祭祀。卫源庙为隋代所建，供奉卫源河河神，后每年农历四月八日有祭神庙会。清乾隆四十三年，山西闻喜县珍珠商行在庙拜亭东南石柱上刻文，记录了明太祖的这次活动及其旨令："明洪武八年，御祭于四月八日，令

起大会，以振神功……”[81]。在此前后几日形成更大庙会及市场，大宗太行山药材及外地药材商人参加交易。清代百泉建药王庙后，药市更加繁荣，发展成为“中原药都”。在禹州、百泉药市的带动下，其他地区药市亦快速发展。

祁州在明万历前已有较大庙市，有不少外地药商参加。万历年间八省药商出资三次维修药王庙，每年清明节举行一次庙会进行药材交易。到清代雍正年间每年举行两次。春季庙会 4 月 4 日至 28 日，冬季庙会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1 日。道光年间（1821～1850 年）后有全国 13 帮药商汇此交易，发展成为“北方药都”。

樟树自南宋以来已有九月药市。明初建三皇宫后形成更大庙市。清初又改原有的药师寺为药王庙，并换供孙思邈。每年农历 4 月 28 日举行庙会交易药材，后发展为“南方药都”。

大理观音寺（今云南省大理市飞机场附近），每年农历 3 月 15 日（传说观音在大理传教后离开之日）至 19 日在城西点苍山麓举行庙会。有传统的赛马、射箭、歌舞等文体活动和盛大的物资交流，称为“三月街”、“观音市”，起自中唐时期。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游大理时值街期。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记录了当时的盛况：“由西门向西一里半，人演武场，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其北为马场，千骑交集”，“时男女杂沓，交臂不辨”，“十三省物无不至”，“观场中诸物，多药，多毡布及铜器、木具……”[82]。药材列为十三省物之首，可见上市的品种多、数量大。大理观音市药材交易以后规模越来越大，民国时期的药材上市量占云南省全年药材上市量的一半以上，成为我国民族地区最大的药市[83]。

当然，药市并不全由庙会转化而来，如唐末五代成都药市、明代禹州药市等。但从前述可以看出，有相当部分，尤其几个全国性药市，都由庙会转化而来。

三、药王庙会与药材交易

我国寺庙大多供奉佛神、道仙、城隍或其他神仙菩萨、英雄人物，有的地方也供传说为民除病的有功之臣。如北宋祁州的邳彤庙，南宋樟树的药师院。邳彤庙的被供者邳彤，本是东汉的一名武将，传说他为民除病消灾，故筑庙供奉。又说被供者为皮场王张森，也是汉代的一名官史，也为民除病有功，故被供为神灵。药师院的被供者为佛教的如来佛。以上 3 人都不是真正的中国医药圣贤。反映出人们希望有医药圣人，保佑他们健康无病或有病早愈的愿望。元代，在江西建昌府（今南城县）出现三皇宫，浙江衢州路（今衢州市）出现三皇庙，均供与中国医药有关的先圣伏羲氏、神农氏和轩辕黄帝，为满足人们愿望开了一个好头。建昌三皇宫由帝诏在城北建造。衢州三皇庙由该路医学提领（医官职）刘光大领创。都是官办，没有形成较大的庙会药材市场。所以，明代以前，在有药市的庙会里，药商们长期祭祀的都是这些与医药行业无关的庙神圣贤。随着医药经济发展，药市逐渐增多，规模逐渐扩大，药业也建立起行会组织，药商们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供奉圣人和庙宇，作为行业的崇拜偶像及活动场所，以产生更加强大的凝聚力。于是，他们选择了历史上的医药始祖和德高望重、成就卓著、影响较大的医药学家作为对象，为他们筑庙供奉。这些人被誉为药王，供奉的庙宇被称为药王庙。

明初，樟树药业率先在镇边街北偏西处建三皇宫。明永乐年间（1403～1424 年），祁州药业将邳彤庙改建为药王庙，塑药王 10 人。清康熙年间（1662～1722 年），百泉药业在百泉书院东侧建药王庙，塑药王神农、长桑君和孙思邈。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浙江兰溪药业建药王庙，塑神农。咸丰年间（1851～1861 年），建昌药业将三皇宫扩建为药王庙，增供名医扁鹊、张仲景等 10 人。

历史上各地药王庙供奉药王的原形并不完全相同。综合建昌、祁州、樟树、百泉四大药王庙，中药业供奉的药王为伏羲、神农、黄帝、岐伯、长桑君、扁鹊、张仲景、华佗、皇甫谧、王叔和、葛洪、雷公、陶弘景、孙思邈、韦慈藏和李时珍，累计 16 人。清代后期，全国城乡的药业组织、个体药铺则普遍供奉孙思邈。

药王庙一称盛行于明代中期以后。各地建药王庙的时间也有先后，以清代后期至民国前期建立最多。庙址有的建于城镇，有的建于山上，规模相差十分悬殊。建昌、祁州、樟树、百泉等大的药市，药王庙经过药业出资不断扩建，形成包括正殿、后殿、客厅、宿室、戏楼等的庞大建筑群。小的药王庙仅有一二间庙房，甚至在其他寺庙或药业会馆内借一角之地。

合州药业于嘉庆年间在漆家巷内建药王庙，设住持僧人一人，由药业买帮、卖帮、行帮三帮提供经费。庙较宽大。1929 年药业同业公会在庙内办同德小学，多时学生达 10 个班。

药王庙增多使全国各地的大小药市相应增加。由药业行会组织承办的药王庙会，使祭庆活动和药材交易更加专业化、制度化、规模化。有些地区甚至把药王庙会或药王生日祭庆活动叫做“药王会”，突出了鲜明的药业特色。

各药王庙会会期长短不一，据当地实际而定。少则几天半月，多则一月两月。各种祭庆活动以清末民初最为丰富多彩。归纳内容包括祭拜药王，药王巡市，请班唱戏，庙会庆宴，药材交易，切磋技艺，事务商讨等。实力雄厚的个体药业及医人团体，也常举办药王会，会期、规模、宗旨自然有所区别。

药材集散地的大型药王庙会，也有其他行业商人参与市场，借此机会盈利，但药材交易是其主体，各路药商多时达到数千人。祭拜仪式分帮进行，先燃点香烛，后向药王披红挂彩，再作揖叩头，敬献赤诚之心，求药王保佑生意兴隆，来去平安。会期正日，一餐聚宴。请班唱戏各帮自办，张灯结彩，对联仿单，争奇斗艳以展实

力。祁州庙会，人们抬着药王神像前往观戏，所过之处户户门前焚香设供以迎药王。灌县太平场（今四川都江堰市青城乡）药王庙会，将药王孙思邈塑像抬出巡市，随行者敲锣打鼓，唢呐鞭炮齐鸣，声响震彻街市，旁观者逾万人；剧团必唱之戏是“坐虎针龙”，赞颂药王医技和医德。比邻的什邡县莹西镇药王庙会，孙思邈塑像坐八抬大轿，由青白旌旗开路巡市，众人争相登高眺望，以目睹药王为幸事，喜庆场面同样热闹非凡。

庙会中的药材交易实行现金买卖或以货换货方式。各地药商将货药提前运到。或船装、车载、人挑、牲口驮运，市场车水马龙，药气薰天，喧哗不绝。药材成交，药利收入，十分可观。樟树镇明代宣德年间已成为全国税收最多的 33 个府州镇之一。至清道光年间已是“药材之利甲诸郡”。

小型药王庙会，如洪雅（今四川省洪雅县）4 月 28 日药王会，有县城和乡村中医、药商百余人参加。药王庙设在城隍庙后院。祭拜药王之后，中医切磋医术，药商相互交易，中午一餐药王宴后方散。

大的个体药家，也在 4 月 28 日自办药王会。或宴请宾客，或请班唱戏，或二者兼办。所请宾客多为本地名人、亲朋好友和老顾客。合州唐姓药家年年药王会成习，不少客人不请而至恭贺。或向药王披红，或赠主人薄礼，客多时药王宴摆至三轮，乞丐上门也不拒绝，这种形式对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加深主客情感，稳定和扩大业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药王庙中的十六位药王

伏羲氏

姓风，又名太昊。原始氏族社会后期人。传说他制九针，是针灸疗法的创始人。

神农氏

即炎帝。姓姜。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传说他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发现医药，以疗民疾。

黄帝

姓公孙，名轩辕。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传说他与岐伯、雷公研讨，创立医药之学。

岐伯

黄帝之臣。传说他与黄帝共创医药之学，所以后世有称中医学为“岐黄之术”。

长桑君

战国初期人。医学家。扁鹊之师。传有医方及药物与扁鹊。

扁鹊

姓秦，名越人。约生于公元前 5～4 世纪。勃海郡鄚（今河北省任邱县鄚州镇）人。战国名医。通晓内、外、妇、儿、针灸诸科。带弟子挟技周游天下，到过山东的齐国、鲁国，河北的赵国，陕西的秦国，河南的周都及虢、魏、蔡、卫、宋等国。所到之处，无论官民有疾，皆潜心诊治，活人者众，深受世人欢迎和称赞。因治愈虢太子尸厥之症，传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回答：“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令人敬佩。他还反对巫术迷信，积极倡导医学，为医学发展作出了贡献。晚年定居咸阳。秦太医令李醯知医术不如扁鹊，使人杀之。李醯成为千古唾骂的小人。

张仲景（约 150～219 年）

名机，字仲景。河南涅阳（今河南邓县，一说今南阳市）人。东汉杰出医学家。他看见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与疾病，抨击那些追名逐利的当今之士，全不留神医药，遂勤求古训，勇于实践。把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与人体的脏腑、经络联系起来，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临床医学基

础，也奠定了中药炮制学和中药药剂学基础，成为中医学的经典之著。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被后世誉为医中圣人。

华佗（141～208 年）

字元化，沛国谯（今山东亳州）人。东汉杰出医学家。精通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尤精外科。挟技行医，到过今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的许多地方。曾用麻沸散麻醉做腹部外科手术。还积极倡导运动锻炼，防病延年。他说："人欲得劳动，动则谷气得消，血脉流利。譬如户枢，终不朽也。"遂模仿虎、鹿、熊、猿、鸟动作，编成"五禽戏"传世。实为运动医学的先躯。他医技高超，医德高尚，多次谢官不就，甘在民间为医。后因不愿再为曹操效力被杀。被后世尊为神医。

皇甫谧（214～282 年）

字士安。安定郡朝那（今甘肃灵台县）人。魏晋间著名医学家。幼时家贫好学，常"带经而农"。对文学、史学颇有建树。后患中风兼耳聋，遂奋力学医。写成《针灸甲乙经》，为中国最早的系统性针灸专著，为后世针灸学发展奠定了基础。《针灸甲乙经》是学医者必读之书。

王叔和（生卒不详）

又名王熙。高平（今山东金乡）人。西晋著名医学家。幼时见战乱四起，田园荒芜，疾病流行，遂抱济世活人之心，学习医学。后医术高明，任太医令之官。据此机会，努力学习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实践，写成《脉经》一书，为中国第一部脉学专著。后世言脉者，皆宗王叔和之法。

葛洪（281～341 年）

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西晋著名医药学家、道家。长于炼丹术和急救法。著《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原名肘后救卒方）。积极倡导生产成药备用，并首创"成剂药"一词。对化学制药和成药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肘后备急方》

用药多为易得之品，须买者亦价贱，针对了广大贫家野居，为民之心实在可嘉。

雷公（生卒不详）

又名雷敩。南朝刘宋人。著名炮制学家。著《雷公炮炙论》三卷，记述了300种药物的炮制方法。为第一部炮制专书，使中药炮制学成为中药学里一门分支学科。

陶弘景（456～536年）

字通明，号华阳陶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东南）人。南北朝著名药物学家、道家。综《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撰《本草经集注》，为继承和发展本草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当时药业情况十分熟悉，书中记录了不少药业的重要史料。还十分强调药材质量和调剂、制剂规范操作，揭露制售假药，在中国药业史上有重要地位。

孙思邈（581～682年）

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代杰出医学家。医术非凡，不受朝廷命官，甘在民间为医。通晓内、妇、儿、外及老年医学、保健美容。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两部综合性医药巨著，大行于世，对中医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极重视医生的道德修养。《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专论医生应具的职业道德：技术上要精益求精，诊治不误；态度上要和蔼可亲，普同一等；思想上要治病救人，不贪钱财；作风上要不贬别人，抬高自己。他身体力行，医德高尚，堪称万世医表。是最受后世崇敬的药王。

韦慈藏（644～741年）

又名韦讯。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唐代著名医学家。武则天继位时，曾任朝廷御医。后归乡里，为民治病。常携一黑犬行医卖药。医德高尚，传说被唐玄宗赐号药王。

李时珍（1518～1593年）

字东壁，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蕲州市）人。明代杰

出医药学家。医术名震四方，曾被荐举到北京太医院任院判。一年后托病辞归乡里。一面为民疗疾，一面精研药物。积27年心力，书考800余家，到过北京、江苏、安徽、江西、湖广的很多地方采药询访，写成巨著《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载方11000余首，附药图1000余幅。集明代药学之大成。刊行后大行于世。

五、当代的药材交流会与常年药材专业市场

新中国成立后，庙会和旧的行会组织不复存在。药材批发业务纳入国营药材公司计划调拨之内。传统庙会形式的药材交易自然消失。

改革开放恢复了药市的市场形式，但与传统药市有了很大区别，一般称作药材交流会。首先已无庙会色彩。各级药材公司都有权举办不定期的大中小型药交会，发请帖邀请同仁参加。较为有名的地方性药交会数安徽亳州。自1985年以来，每年都在华佗生日9月6日举办大型交流会，历时6天，应邀者来自全国各地。1991年以前每次成交额都在2亿元以上。特大型药交会，如安国会、百泉会、樟树会，由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委托当地政府举办。昔日的三大药都仍然是全国定期药材交流的大市场。交易方式由过去的现货交易变为合同调拨。参与交易者扩大到国有、集体、合资医药工商企业的代表和个体药商，还有来自港澳台及五大洲的商人和朋友，人数多时超过万人。各种样品、广告、商标、印刷品及音响宣传充斥会场内外及整个城镇。现代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现代通讯交通使市场信息更为灵通。交易规模、效率、数量及服务都远超历史。90年代前半期，三大会的成交额都在10亿元左右。药交会，尤其是安国、百泉、樟树会，已成为全国医药工商企业的重要活动市场。

综观药市、药交会历史，无论过去、现在都起了重要作用。它表现出有医药购销大市场，医药商品大宣传，医药同仁大联系，医药信息大交流，医药技术大促进等多种功能，发挥了产、供、销之间的桥梁作用，因而有利于医药事业发展。目前国际、国内盛行的各类商品定期博览会、展销会、供货会，与中国流行了千余年的药市本质一致。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各地药材专业市场增多，上门供货普遍，市场价格变化快，工商企业的购销节奏加快，药交会的作用和成交量有了显著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批准了少数常年药材专业市场。后来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许多常年开放的药材市场，多时达到117个。这些药市初都经营地产药材和外地药材，后逐渐有中药饮片、中成药和西药上市，形成了庞大的药品市场。进入药市的有个体药贩，也有国有、集体、民营工商企业的经营网点。对促进流通、繁荣地方经济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不少证照不全或根本无证照的药贩也挤入药市开张卖药，大量伪劣药品也通过低价销售流入市场，经营极其混乱，后果十分严重。1995年3月，国务院发布53号文件，整顿规范医药市场，严禁除中药材以外的饮片和中西成药上市。经过整顿，1996年11月27日国家确定了14个中药材专业市场。1998年2月20日，又确定了3个，共17个。它们是：

河北省安国药市
安徽省亳州药市
江西省樟树药市
山东省鄄城县舜王城药市
河南省禹州药市
湖南省邵东县廉桥药市
湖南省岳阳市花板桥药市
广东省普宁药市
广州市清平药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药市
重庆市解放西路药市
昆明市菊花园药市
西安市万寿路药市
兰州市黄河药市
成都市荷花池药市
湖北省蕲州药市
哈尔滨市三棵树药市

第八章　假药及防止措施

历史上的人口不多，医药科技水平、消费水平不高，生产、流通规模小，很多零售药业由医生兼营，比较重视药品质量，医药济世活人观念被药业普遍接受，因而假药的规模及其危害较今为小，更不是医药业的主流。但是历史上确实存在假药现象，人们一直在为防止、消灭假药而努力奋斗。

一、历代都有假药

战国时候，中医学基础理论和复方配伍的用药特色基本奠定，民间药铺出现，药材流通规模扩大，中药商品经济萌芽。这时已出现假药。

到南北朝时期，医学、药学进步，用药品种增加，中药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医药分业开始明朗化，假药增多起来。对药业情况熟悉的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众医睹不识药，惟听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采送之家。采送之家，传习造作，真伪好恶莫测。所以有钟乳醋煮令白，细辛水渍使直，黄耆蜜蒸为甜，当归酒洒取润，螵蛸胶着桑枝，蜈蚣朱足令赤"的人为现象。加工也不认真，该去的心皮未去，配方剂量不足，合药时好药贵石被盗，"紫石英、丹砂吞出洗取，一片经数十

过卖（反复使用数十次）”。价格昂贵的牛黄，“药中之贵，莫过于此。一子起二三分，好者值五六千至一万也。俗人多假作，甚相似”。他还特别指出“诸有此例，巧伪百端，皆非事实。虽复监检，终不能觉。以此疗病，理难即效。斯并药家之盈虚，不得咎医人之浅掘也”。

唐代也有假药。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患心悸、痞满疾。医生令服茯神。他在市上买回煎服后病反加重，烦满不已，怪医生用错了药。医生请视药渣后说：“吁！尽老芋也，彼鬻（卖）药者欺子而获售，子之懵（糊涂）也，而反尤（怪罪）于余，不以为过乎?”柳宗元自感惭愧，后写了一篇辨茯神的文章反思。

宋代国内商业发达，对外贸易频繁，药业出现空前繁荣局面，假药现象也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针对社会出现的消费“香药热”，有人以“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被斥为“白日贼”。进口的香药中不仅有劣质品，更有用犀牛粪制造价值连城的龙涎香坑害中国人。贵重药材麝香的造假更为严重。《证类本草》记“此物极难得真。蛮人采得以一子香刮取皮末杂内，余物裹以四足膝皮共作五子，而土人买得又复分糅，一分为二三，其伪可知”[84]。这样的层层掺假伪造，一子真香制成十至十五子香了。官药局生产的成药质量好、信誉高，贴有“合剂局记”的印记商标保护，仍然有人敢于冒充，而且情况严重，高宗皇帝说要依法惩处；但是官药局在后期由于管理不善、内部腐败，也造起伪劣药品来了。

陈嘉谟在《本草蒙筌·贸易辨真假》中，谈到明代医药贸易中的假药时说：“许多欺罔，略举数端……荠尼指人参，木通混防己，古圹灰云死龙骨，苜蓿根谓土黄耆……研石膏和轻粉，收苦薏当菊花，小半夏煮黄为玄胡索，嫩松梢盐润后为肉苁蓉……如斯之类，巧诈百般”。《本草纲目》也指出了不少假药。如熬制阿胶在驴皮中“杂以马皮、旧革、鞍靴之类，其气臭浊，不堪入药”；用沙参、荠尼、桔梗充作人参，甚至“有薄夫以人参先浸取汁自啜，乃晒干复

售，谓之汤参，全不任用，不可不查”等等。

清代最有名的假药莫过于安阳“龙骨”。19 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村农民将翻地时得到的骨头碎片，当成龙骨卖给药商。这批货运到北京在药铺零售，被买药的大学问家清朝国子监祭酒（官名）王懿荣发现，骨片上刻有横七竖八的符号。后来确认这些刻在甲壳、兽骨上的符号是我国的最古文字，距今有三四千年历史。不过这一非人为的假药，导致了甲骨文和殷墟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据《伪药条辨》统计，清末的假药达 111 种之多。医药学家吴仪洛发现柴胡中有假，在《本草从新》中记述说：“柴胡所用甚多，今药客入山收买，将白头翁、丹参、小前胡、远志苗等俱杂在内，谓之统柴胡。药肆中俱切为饮片。其实真柴胡无几”。一药杂四药，又切为饮片，实在难辨，难以择除。这种药材掺假现象绝不止柴胡一种。医药学家张志聪对熬胶作过调查，发现阿胶作假情况与李时珍说的一样，而手段更加高明。他在《本草崇原》阿胶条下说：“余尝逢亲往东阿煎胶者，细加询访，闻其地所获阿胶，不但用牛马诸畜杂皮，并取旧箱匣上坏皮鞍辔靴履，一切烂损旧皮，皆充胶料。人间向（喜欢）黑，则入马料豆豉，以增其色。人嫌秽气，则加樟脑等香，以乱其气”。

民国时期假药又增。如用黄花菜、莲须加工藏红花，土豆加工天麻，光慈菇充炉贝，黄羊角充羚羊角，水牛角充犀角等等。

二、防止假药的种种措施

历代对如何防止假药泛滥，坑害百姓，扰乱市场，采取了不少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制定打假法律

早在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法经》中就制定有专门针对医药的法律条款“医合药不如方”。制售假药，不管医生、药商，无论死人

与否都将受到法律严惩。详见第二章《李悝法经》中的医药立法。

唐代《永徽律》第二十卷杂律中，也有“医合药不如方”的类似规定。

北宋时对官药局制售假药，予以严惩。大观二年（1108 年）十二月，上令修合药所：今后若修制不依方，给散不如法者，徒一年。绍兴六年六月又诏令社会：“撰合假药，伪造贴子印记，作官药货卖，并依伪造条法”。元代，至元九年（1272 年）七月，刑部奉旨出榜谕示，禁止街上出卖假药，如用米面诸色包裹充药之类。皇庆元年（1312年）四月，中书省又奉旨禁止江湖之徒贩卖假药。清代北京同仁堂药品全国有名，官府专门为此出保护布告。咸丰年间，冒充同仁堂产品的假药受到官方取缔，制售假药的人也受到了重罚[85]。

2. 制定国家药品标准

政府组织编写、颁布药材、成药的权威性典籍，起到了规范质量标准的促进作用。这些典籍有唐代的《新修本草》，宋代的《图经本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明代的《本草品汇精要》。遗憾的是这些标准由于多方面原因，并未真正成为全国必须自觉遵守的法定依据。

3. 建立药材检验和成药生产销售监督制度

宋代官药局为了组织合格原料，专设“收买药材所”，置专职药官，辨验药材真伪优劣。著名药学家寇宗奭就任过此职。文献记载的成药生产、销售监督制度是：“当时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出售则又各有官监。皆以选人经任者为之”（详见第二章宋代部分）。正统的民营药业，业主视质量为生命，也安排能人在重要岗位把关。这些监督管理措施对防止伪劣药起了重要作用。

4. 掌握药材鉴别加工制药技术

广大民营药业，靠积累实践经验，掌握药材的真伪优劣鉴别方法和饮片、成药的加工技术，确保药品质量。如黄连以连珠状、色

黄、味极苦、质坚实、产四川者为佳；牛黄“唯以魔爪甲舐拭不脱者是真”；硝石（火硝）“烧之紫青烟起”是真；秦皮“水渍便碧色，书纸看青色者是真”；“欲试上党人参，但使二人同走，一含人参，一空口，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其人参乃真也（《本草纲目·人参》）”。这些鉴别经验，包含了性状、荧光、物理、化学、药理等鉴别方法。为了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普遍实行了口传身授的师徒制度。有的地区药业行会组织规定，无3年以上的跟师学徒经历者，不准自启药肆营业，避免了药盲营药。

5. 强调职业道德

受时代限制，历史上没有监督检查药品生产、经营中质量问题的全国系统，人的因素就成为防止假药的关键，因此极其强调医药人员应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战国时期的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就明确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86]。东汉名医张仲景将医药活动概括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人道目的[87]。经过唐代孙思邈的总结，形成了人贵千金，医药济世活人，普同一等，药务真精的职业道德核心。唐代国家法典《永徽律·九·诈伪律》甚至规定，医生利用职务之便，不讲职业道德，谋取财物，以盗窃罪论处。“诸医违法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以后宋明清各代都有相同规定。药业则普遍用“制药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童叟无欺”等警句来规范自己。职业道德高尚的人，受到社会和行业的广泛赞颂。韩康、孙思邈、宋清、何澄、严乐善等是其代表。

张杲《医说·卷十·医不贪色》记载：宋人何澄善医，宣和年间一妇人夫病日久请到，引入密室，告之曰：“妾以良人抱病日久，典当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酬。”澄正色曰：“娘子何为出此言！当为调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污。不有人株，必有鬼神谴责。”未几，良人疾愈。后来，何澄得到了朝廷的重赏与任用。《嘉兴府

志》记载：明代人严乐善业医营药启肆于星胡市南。一天一个男子突然闯进，出金首饰后下跪说："请先生受，而后敢言"。原来是求毒药杀人。严掷金大怒说："我今不发汝隐，更若求他医杀汝同气，我必讼于官！"后来男子觉悟，向严乐善表示真诚的谢意。何澄、严乐善的言行，树立了治病治人，不为色财所动的崇高典范。

对那些利用医药贪财好色甚至制售假药的人，社会及医药行业都极其鄙视，认为是天理不容，应受到惩罚。《夷坚志》记载了一个叫段承务的人，医药精妙，然甚贪财。一次一个富贵病家来请，段视病后说："此病不过汤药数剂，然非五百金为谢不可"。病家许诺一半，段扶袖而去，只好如数答应；另外还给银五十两为药资，段亦索至百两，乃出医为治。数日病愈，段载银归家。途中住店，夜梦一红衣者曰："上帝以汝为医而专贪财贿，无济人利物之心，命杖击二十"，叫随行者棒打。段惊醒觉背痛，呼仆人视之，有鞭痕在身。段还家即死。这段记载的神话部分虽不可信，但它反映人们对缺德行为的深恶痛绝，对高尚职业道德的强烈呼唤。

三、有益的借鉴

由此可以看出，假药是伴随医药商品经济兴起而出现。不顾职业道德，无视法律规定，追求更多金钱，是产生假药的主要原因。知识缺乏和技术水平低下，内部腐败和无严格有力的监督执法管理机构也是重要原因。这些遗留下来的因素还未根除，又加上新产生的百业经药，药盲办厂，贿赂推销，现代化的作伪手段，13 亿人口的开放大市场，地方保护主义和改革措施未来得及配套，使现代假药的规模和危害远超历史。借鉴历史，消灭假药，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制建设，规范医药产销秩序，严格配套的监督执法管理，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过硬的专业素质，尤其要注意克服古代尚无的贿赂推销和地方保护主义。

第九章　古代药材的开发利用

古代对药材进行了广泛的开发利用，取得了巨大成功。药材开发利用，不仅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新产品，形成了新的商业行业，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有些还直接用于生产技术，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众多的开发项目中，以保健食品、保健美容、染料、洗涤剂、香料、火药、农药等，历史最为悠久，开发最为成功，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保健食品

1. 保健食品的理论与市场形成

药物是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的。药食同源之说，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在本草中，动植物食物都与药物一样，有自己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是一类既有营养作用又有治疗作用的特殊药物。在医学、药学不发达时期，重视食物的治疗作用是十分自然的。因而历代本草都收载了大量的粮、果、蔬、肉、蛋、禽类食物，甚至还有数十部食物、食疗专著，形成了中医营养学和食疗学。

《黄帝内经》说："地食人以五味……神乃自生"，并明确提出维持人体健康，要靠"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完全膳食原则（素问·藏气法

时论），所以保健食品的动植物原料是十分广泛的。中医重视食物疗法的基本理论，是基于“人之性，皆厌于药，而喜于食”；食物又是一类特殊药物，“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具有扶正祛邪的双重作用。但是实践证明，食物以营养为主，治疗作用过于缓和；药物以治疗为主，又多无营养作用，使用不当可伤人正气；所以孙思邈提出了为医的先食后药原则：“为医者，当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88]，“贵不伤脏腑”。

事实上，在提倡食物治疗的同时，医生们已将药物与食物结合起来治疗疾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聪明的饮食业商人，抓住这一信息，首先选择可以食用的滋补药与食物相结合，烹调加工成保健强身菜肴，在餐馆里销售。后来逐渐形成了菜肴、饭食、面食、汤羹、饮料、糕点、蜜饯类食品，并投放于市场。按其功效，可分为食补、食治两大类型，即今之强壮益寿类和辅助治疗类保健食品。中药保健食品，在行业内又称为药膳食品，概括了有药、有食的组成特点。

2. 保健食品的开发利用

在中国历史上，中药保健食品是最早而广泛开发的门类。

殷商，甲骨文记用鱼治腹疾，用枣治病疟，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保健食品方和医方。

西周，食医为周王配制美食及药酒、饮料，疾医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是药食并用。

春秋，《山海经》记 20 多种药物有强壮作用。

战国，饭馆里有枸杞蒸猪肉、韭菜炒鸡蛋的药膳菜肴。《黄帝内经》13 方中有半夏秫米汤、鸡天醴、豕膏方、四乌贼骨一芦茹丸、左角发酒、马膏方、桂酒、蜀椒桂酒等 8 个药膳方。

东汉，名医张仲景用猪肤汤治阴虚火旺咽痛，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治产后寒凝血瘀腹痛，用桂枝汤（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治风寒感冒，并在服药后喝热稀粥一碗以助药力。张仲景《伤

寒杂病论》用方300余首，三分之一含有食物成分。第一部药物学专书《神农本草经》，明确记载有延年益寿作用药物165种，其中人参、黄芪、枸杞、大枣、山药、芡实、薏苡仁、蜂蜜、灵芝、天门冬、菟丝子、五味子、何首乌、甘草等，被现代研究证明确有强身益寿作用。

晋代，医学家葛洪用黑豆豉酒渍或酒煮治脚气，用昆布、海藻治瘿瘤（甲状腺肿大）。

唐代，孙思邈用葶苈羊头羊蹄汤治寒凝头痛。皇宫中用糯米饭、龙眼粉、龙脑末、牛酪作冰糕食用。市场上有用砂糖加蜂蜜、水牛乳或米粉、牛乳汁合煎的奶糖出售。

宋代，中药保健食品、饮料大量上市，品种十分丰富。饭馆的药膳菜肴有两熟紫苏鱼、荔枝腰子、香药灌肺、香药灌藕、山药元子、炸肚山药、姜豉鸡。较小的食店里，有七宝粥、五味粥、腊八粥、莲子羹、决明羹、荷叶饼、丁香馄饨。沿街叫卖的有紫苏虾、薄荷虾、姜虾。小贩卖的糖果糕点有荔枝糖、鸡头（芡实）糖、麝香糖、薄荷糖、荆芥糖、缩砂糖、芝麻糖、姜糖、乌梅膏、薄荷膏、紫苏膏、杏仁膏、枣膏、菊花饼、梅花饼。小贩兜售的药材疗效风味小食，有法制青皮、半夏、杏仁、砂仁、豆蔻、香药、橄榄、薄荷。饮料摊铺出售木瓜汁、乌梅水、沉香水、香薷饮、大顺散、五苓散、缩脾饮等有名饮料，夏天则添卖雪泡缩脾饮、甘草冰雪凉水和其他散暑药冰水以解暑热。有的茶铺，冬天添卖葱茶，以散寒解表，预防感冒。食品饮料向疗效型发展是其特色。

元代，出现了第一本药膳专书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记载了94种保健食品的制法和作用。著名品种有地黄鸡、青鸭羹、羊肉羹、山药羊肉汤、山药面等[89]。

明代，保健食品有薏米粥、法制黑豆、山药茯苓包子。著名的饮料是酸梅汤和夏天的冰镇酸梅汤。

清代，著名的保健食品有茯苓酥、茯苓饼、山楂糕、虫草全

鸭、田七蒸鸡、黄芪蒸鸡及各种蜜饯果脯。

民国时期，八宝粥、百合苡仁粥、枸杞大枣粥、银耳羹、人参汤圆、天麻煮鱼头等，是普通食店的挂牌品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药保健食品开发利用取得了重大进展。生产的强壮、抗衰老、壮阳、降血脂、减肥、益智、补钙等各类保健食品约1300种，有近2000个生产厂家，年销售上百亿元人民币。食品中经常使用的保健药物有人参、枸杞、黄芪、蜂王浆、花粉、山楂、银耳、薏苡仁、大枣、茯苓、山药、鳖龟、鹿茸等。保健饮料中，新开发的人参茶、绞股蓝茶、杜仲保健茶、银杏保健茶、菊花茶、减肥茶等，为大众化的有效饮料。

3. 著名的疗效型风味小吃

宋代保健食品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出现了一批属于风味小吃的法制药材疗效食品。其中的半夏为有毒药材，经用陈皮、降香、草豆蔻、生姜等药依法复制后，毒性消除而供食用。细嚼法制半夏，口觉甘香，且能开胃健脾，燥湿化痰；食至半月后，咽喉也自觉甘香舒适。是一种老少皆宜的风味小食，很受市场欢迎。一个叫孔平仲的人，欲将一包生半夏寄给远方的亲人。他的一帮孩子以为是法制半夏，相互争食而中毒。“孔平仲常父寄半夏”一诗对此作了生动细致的记述[90]。

齐州多半夏，采自鹊山阳。累累圆且白，千里远寄将。
新妇初解它，诸子喜若狂。皆云已法制，无滑可以尝。
大儿强占据，端坐斥四旁。次女出其掖，一攫已半亡。
小儿作蟹行，乳媪代与攘。分头各咀嚼，方爱有所忘。
须臾被辛螫，弃余不复藏。竟以手扪舌，啼噪满中堂。
父至笑且惊，亟使啖以姜。中宵方稍定，久此灯烛光。

宋代在岭南地区有食槟榔的习惯，说是可以御瘴。广州又加入丁香、桂花、三柰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广州“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询之于人，何为酷如此？答曰：辟瘴、下气，消食。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宋人罗大经对此作了四点概括性解释：一曰醒能使之醉，盖每食之，则重然颊赤，若饮酒然；二曰醉能使之醒，盖酒后嚼之，则宽气下疾，余醒（醉态）顿解；三曰饥能使之饱，盖饥而食之，则充然气盛，若有饱意；四曰饱能使之饥，盖食后食之，饮食消化，不致停积。嗜食槟榔的好处被阐述得妙不可言。嚼食槟榔的嗜好后来传到北京。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记：“槟榔……粤人、闽人熟而后食，台湾则生时即取食之。……京师小人和苏子豆蔻贮荷包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齿摇转，面目可憎，岁靡数十千。近则士大夫亦有嗜者”。卖槟榔者有烟铺和货郎担。反映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北京社会生活的《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中，有货郎担向一妇女卖槟榔图。《北京民间卖药轶事琐议》对此有介绍：“货郎挑两个大圆筐，筐内用木板截成若干格，格内装各种整、碎槟榔及小包豆蔻、砂仁。卖槟榔多以枚计，货郎用剪夹成块后交与顾客。有生槟榔、熟槟榔、盐水槟榔等规格”[91]。

用紫苏叶加工的风味小吃也很有名。《宋氏种植书》记载了三种紫苏叶的加工方法。香紫苏：采苏嫩心长三寸许，约三斤用盐二两，淹一宿，梅卤浸三日，晒干，入甘草、甘松、白芷末拌匀，掺收之。细酸紫苏叶：同茭白、青梅作丝，入白糖暴干。另一种用梅酱淹一日后糖浸。随时取之细嚼慢咽，能利症结，消五鬲。

二、保健美容品

中国使用保健美容品的历史很早。《墨子》记：“禹作粉”。晋

人张华《博物志》载："纣烧铅作粉，谓之胡粉，即铅粉也"。后汉马缟《中华古今注》云：燕脂"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地所生，故曰燕脂，涂之作桃花状"。说明殷纣时期有了红白两种面部美容化妆品。《诗经·卫风伯兮》："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膏沐润泽头发用。《战国策》记载：春秋时"周郑之女，粉白墨黑，玄于衢闾（大街小巷）。"战国后期《韩非子集·显学》记有："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脂以染唇，泽以润发，粉以敷面，黛以画眉"。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一套用于唇、脸、眉、发的保健美容化妆品，但使用并不普遍，仅为宫廷、贵妇所用。战国时期民间和军队使用一种防止手冻裂的药物，是美容保健品的一个类型。汉代贵人之中美容成风，以致宫中男人也涂脂抹粉取悦皇上，城市出现卖脂粉的民间商业。司马迁对此很看不惯，对脂粉业斥之为贱业。魏晋间男人亦搽粉。如尚书何宴、诗人曹植，脸上经常都涂得白白的出入市井。三国时曹魏将胡粉列为官府专卖，足见销售市场扩大，有利可图。到了南北朝，面部美容化妆品就在市场易于买到了。刘义庆（403～444 年）《幽明录》记载了一个卖胡粉女子的优美爱情故事：一位青年爱上了在市场上卖胡粉的少女，他难于启齿，又常想念，就每天去少女粉店买胡粉。时间长了，少女好奇地问："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尔，不敢自述，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少女被感动了，遂相许以私，终成眷属。胡粉的胡字，不是指外域之地。后汉刘熙《释名》中有解释："胡，糊也，合脂以糊面也"，说明是国产货。

唐代经济繁荣，社会开放，讲究化妆十分盛行。化妆品常被当作礼品、赏赐品。《岁时广记》卷 39 载："唐制，（皇帝在）腊日赐宴及赐口脂、面药，以翠管银罂盛之"。《刘梦得集》也载："赐臣……腊面脂、红雪、紫雪"。民间妇女，则就地取材，用兰草和油，香泽头发。亦用兰草煮水沐浴，既可香身，又可疗风，治皮肤瘙痒。但唐代以前美容处方严格保密。孙思邈才在《千金要方》和

《千金翼方》中专章讨论美容问题，公开了各种美容处方160余首。王涛《外台秘要》卷32也为美容专卷，有28类200多首美容处方。对中药保健美容品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这时的美容剂除燕脂、胡粉外，还有面脂、口脂、手膏、衣香、澡豆、乌发油等，都可以在世上买到。因为这些商品已为“仕人贵胜，皆是所要”。

唐代明确记载有美容作用的药物约百余种。多为祛风除湿、芳香行气、芳香辟秽、活血解毒之药，如白芷、白术、白附子、细辛、川芎、麝香、檀香等。另用猪脂、白羊脂、白鹅脂、蜜蜡等作基质。

面脂多由白芷、珍珠、茯苓、麝香、胡粉等药材与白羊脂、白鹅脂配制而成，具有增白润肤、香体作用。手膏多由杏仁、桃仁、橘仁与牛羊脑配制而成，具润肤防裂作用。澡豆是一种洗涤剂，加入药物、香料后，又具增白、润肤、悦色、去皱、去粉刺等作用，是集洗涤、美容、防治于一体的多功能保健美容剂。

唐玄宗时，在长安市场上有两种来自西蜀的著名美容剂，面膏和补鬓油。面膏用白胭脂、白杏仁心、梨自然汁、白龙脑相熬合和，用以调粉匀面，使面白而光润。补鬓油用紫芝麻油、胡桃油、黑松子、乌沉香制成，润鬓黑发而复香。这两种美容剂由西蜀一女犯制造，蜀主向朝廷进贡，杨玉环常用此匀面、乌发。后被宫中人偷卖于民间，民间呼为西蜀油，只有富者才买得起。大众化的美容品，以相州、卫州、澶州的胡粉，兴州府的胭脂最为著名，被列为朝廷贡品。

宋代，《太平圣惠方》载美容方200余首，《圣济总录》载100余首。市场上已出现有名号的生产、销售美容剂、美容药的专业铺户，如杭州备义坊北有张古老胭脂铺，官巷北有王家胭脂铺，开封大内西右掖门外的张戴花洗面药铺等。挑担、摆摊卖胭脂、合粉（以胡粉为原料的面部增白剂）、画眉七香丸的小经纪也见于巷陌街市。

明代胡粉以金陵（今南京市）、杭州、韶州（今广东韶关市）、辰州（今湖南沅陵市）、桂林、嵩阳（今河南嵩县）为主产地，以韶州、辰州、桂林产者最为有名，称为韶粉、辰粉、桂粉。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的生产方法是："铅百斤，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水甑内，甑下甑中各安醋一瓶，外以盐泥固济，纸糊甑缝。安火四两，养之七日。期足启开，铅片皆生霜粉，扫入水缸内。未生霜者，入甑依旧再养七日，再扫，以质尽为度。"每扫下的霜一斤，入豆粉二两、蛤粉四两，加水，缸内搅匀，沉淀去清水。另用细灰做成沟，上置纸数层，将湿粉铺于上，将干，截成瓦形或方块，干后货卖。由此可知，胡粉是铅与醋酸作用的最终产物，白色的碱式碳酸铅$Pb(OH)_2 \cdot PbCO_3$，为有毒之物。所以，涂面日久脸色变青，生产胡粉易慢性铅中毒。明人何孟春记载："嵩阳因产铅之故，居民多制胡粉为业。……然其铅气有毒，制者必食犬肉、饮酒以御之。若枵（空虚）腹中其毒气，辄病至死。业久之家，长幼为毒薰蒸，多萎黄，旋致风挛瘫软之疾，不得其寿而死"。说明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职业病。

明代燕脂有4种：一种以红蓝花汁染胡粉而成。一种以山榴花汁作成。第三种经紫矿染绵而成，紫矿即紫草茸，产南方，故紫矿燕脂多为南人所用。又落葵子亦可取汁和粉饰面，谓之胡燕脂。燕脂用于涂面和口唇。

清代传统的美容剂继续发展。至清末，舶来化妆品增多，西方生产方式引入，传统保健美容品逐渐衰落。

使用牙粉、牙膏刷牙，也是重要的保健美容。

古人刷牙，《外台秘要》说是"第朝用杨柳枝咬头软、蘸取药粉揩（牙），香而广洁"。后周末年出现用马尾植的毛植牙刷。不过毛植牙刷的应用明代以后才多起来。人们习惯的仍是用手或柳枝揩牙。《梦溪笔谈》卷五记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参揩齿。

唐宋的牙粉很多。《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

《圣济总录》等都记载了不少处方。基本原料是祛风清热、洁齿去垢之品加青盐、香药。如《太平圣惠方》揩齿龙脑散，由川升麻、白芷、藁本、细辛、芎藭、石膏、寒水石、盐花、龙脑等组成，能增白益齿。有的牙粉还加麝香作香料。宋代出现药物牙膏。《太平圣惠方·口齿论》载：用“盐四两烧过，杏仁一两浸去皮尖双仁。右件药者研成膏，每用揩齿甚佳”。这是早期的牙膏处方和制法。未言包装，大致是装入瓷盒里备用。

三、保健用品

《山海经·北山经》记载，薰草“佩之可以已疠”，是以原药材形态出现的最早保健用品。由人工加工制成的保健用品，以香囊、香枕最早。马王堆汉墓出土了6个香囊、6个绢袋、1个绣花枕头和两个熏炉，装有辛夷、桂（肉桂）、花椒、茅香、佩兰、高良姜、姜、藁本等芳香性药材，是供辟秽防病之用。汉代以后，男女佩带香囊就较为常见了。唐代用香药制园庭工艺品，虽为奢侈之物，却开辟了保健用品的新思路。宋代官药局生产的苏合香圆（丸），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内服，一种是“用蜡纸裹一圆如弹子大，绯（红色）绢袋盛，当心带之，一切邪神不敢近”。这是官药局市售的保健用品[92]。市场上的保健用品，主要是香药匣和用绛囊装的屠苏袋及各种香药袋。香药匣用“紫苏、菖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屠苏袋（主药为大黄、防风）用五色线结成四条金鱼的同心结子、悬于额上，以辟邪气。做工颇为精细。清代最有名的保健用品，是浙江嘉兴兰台药局生产的腰带型安息香葆元贡带。用安息香、麝香、丁香油、黄芪、当归、鹿茸、附子、肉桂等30味药碾粉，与艾绒合匀，置白棉纸上压成带型，用两层丝棉和绢固定密封，再用红绸做成腰带。贴肉束腰，有补虚、强身、益寿之功。

总的来看，古代保健用品的开发是一个薄弱领域。现在，中药保健用品已有药枕、被褥、护心、护背、护膝、护腹、护腰、内衣、文胸、鞋袜、鞋垫、梳子、口罩、香囊及芳香药材室内工艺品等多种形式。

四、染料

我国古代很早就使用染料美化生活。周代天官下有“染人”官职，掌管染帛；地官下有掌管染草的官职，是染草的贮备、供应者。作为染料原料的染草，都是植物药材。郑玄在注解《周礼·地官司徒》时说：“染草，蓝、蒨（茜草）、象豆汁水；蓝以染青，蒨以染赤，象豆染黑”。后来染草原料增多，各种染草的配合使用，可以染出更多的色彩，并发现用一些矿物药作助染剂，能起重要的染色作用。由于染色是社会的普遍需要，染料药材需要量很大，因此多有人工栽培。

见于古代本草中的主要药材染料如下：

药材名	染　色	始载本草
茜　草	红　色	《神农本草经》
红蓝花	红　色	《神农本草经》
紫　草	紫红色	《神农本草经》
苏方木	紫红色	《新修本草》
紫　矿	紫红色	《新修本草》
栀　子	黄　色	《神农本草经》
黄　柏	黄　色	《神农本草经》
姜　黄	黄　色	《神农本草经》
黄　栌	黄　色	《本草拾遗》
槐　花	黄　色	《日华子本草》
蓝　实	蓝　色	《神农本草经》

橡实壳	黑　色	《新修本草》
栗　壳	黑　色	《食疗本草》
莲子壳	黑　色	《药品化义》
五倍子	黑　色	《本草拾遗》
绿　矾	黑　色、助染蓝色	《神农本草经》
白　矾	助染各色	《神农本草经》

茜草《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都有使用，治经闭、痛经。其根含茜素，是一种绛红色染料。汉代以前染红色都用它。虽然茜草的种植早，由于需要量大，在汉代仍很昂贵。种千亩栀茜，可比千乘之家。东汉京城洛阳，有朝廷经营的栀茜园，专门为生产黄、红色染料提供原料。直到唐代，茜草仍为重要的红色染料。《新修本草》记：茜根“可以染绛”。1959～1972 年出土的吐鲁番唐代丝织物，有红、黄、青三种颜色。经化学鉴定，红色由茜素经铝盐（白矾）助染。宋代以后，红花染红技术得到改进，染红鲜于茜草，南方也广为种植，取代了茜草的重要地位。

红花原产非洲埃塞俄比亚。作为一种黄色染料，后来传到埃及和中亚。公元前 2 世纪，在紧临中亚、被匈奴控制的天山、祁连山北，被作为黄色染料引种。妇女用红花汁作化妆品，名烟支、燕脂，涂面及唇。甘肃山丹县东南 50 里的焉支山，种有较多的红花。匈奴被汉军赶出河西走廊后，编出的歌谣说：失我祁连，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张骞通西域后，带回红花种子种植于长安。3 世纪时用作红色染料，并有红蓝之名。种植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发展。唐代又在秦岭南北种植。宋以后长江流域和五岭地区也广为种植。成为优于茜草、苏木、紫草、紫矿（紫胶）的主要红色染料。

红花含红花黄色素和红花红色素。前者溶于水，染黄，后者溶于碱性水溶液中，染红，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红花只用于染黄色或赤黄色。唐代已用于染红。宋代南方棉纺业发展起来，完全掌握了红

花的染红技术。《图经本草》说“红花今处处有之……其花暴干，以染真红，又作燕脂”。《云麓漫钞》也载北宋红花，“近世人多种之，收其花，俟干以染帛，色鲜于茜，谓之真红，亦曰干红。目其草曰红花。以染帛之余为燕脂。干草初渍则色黄，故又为黄蓝也”。《天工开物》记载的生产方法是：先将红花捣绒，水浸，布袋绞去黄汁，捏薄饼阴干，收贮为红花饼。再将红花饼用碱水浸煮取汁，用乌梅水澄数次，则得红色素染料。染红鲜艳于茜草、紫草，持久于苏木。直到清代，红花仍用于染红丝、棉、毛、麻等纺织品，以及纸、漆、颜料、化妆品等盛而不衰。贩卖红花之利很高。在北宋，洛阳的商人到盛产红花的湖南去做转口生意，贩于吴越，一年可获十万缗之利，与做棉花之利相等。

紫草《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谓能“主心腹邪气”。《本草经集注》记：“今出襄阳，多从南阳新野来，彼人种之，即是今染紫者”。北宋时广用于作紫色染料。根含紫色素。

苏木《新修本草》记载产于中国南方的交州、爱州，主“破血，产后血胀，闷欲死者”。用作红色染料的苏木，则“自南海昆仑来”。宋时大量输入中国。至明代以后，染用减少，用药为多。本品含红色苏木素。

栀子是主要的黄色染料。西汉时已大面积种植。《神农本草经》记载有“主五内邪气，胃中热气……疮疡”等作用。但直到南北朝仍以染用为主，于药甚稀。本品含黄色素。

蓝实《神农本草经》记：“主解诸毒”。《名医别录》记可以染青。陶弘景甚至说人中毒不得生蓝汁时，可以用染布汁解之。唐代已知有菘蓝、蓼蓝两种染料，明代达到五种。蓝实的色素为靛蓝，是一种苷类物质，与白矾共同作用染成深蓝色。中国百姓穿蓝布者多，直到民国时期蓝实仍为一种重要染料。

槐花为凉血止血药。染色成分为芸香苷，又称芦丁，黄色。《本草纲目》记：“其花未开时状如米粒，炒过煎水，染黄甚鲜”。

花未开时芸香苷含量更多，炒过可破坏芸香苷的分解酶，这是能够染鲜黄色的两个关键因素。

五倍子含 50%～70%的鞣质，为收涩药，与录矾合用生成黑色物质。宋代的百药煎为五倍子发酵加工品，含低浓度没食子酸。《本草纲目》说："皮工造百药煎，以染皂色，大为时用"。

矾石古代分类复杂，有白矾、绿矾、黄矾、胆矾四种，统称矾石。白矾又名明矾，主要成分含水硫酸铝钾$KAl(SO_4)_2 \cdot 12H_2O$，为白色结晶体。绿矾又名青矾、皂矾，主要成分含水硫酸亚铁 $FeSO_4 \cdot 7H_2O$，为绿色结晶体。黄矾主要成分含水硫酸铁（高铁）$Fe_2(SO_4)_3 \cdot 9H_2O$，为黄色结晶体。胆矾又名石胆、蓝矾，主要成分含水硫酸铜 $CuSO_4 \cdot 5H_2O$，为蓝色结晶体。其中以白矾、绿矾应用最早也最重要。

绿矾之所以又称皂（黑色）矾，是因为它能与鞣质原料，如橡斗、栗壳、莲子壳、五倍子等生成黑色化合物而染黑色。绿矾又用于蓝实染蓝色，其机制是将靛蓝还原为易溶于水的靛蓝，待布帛吸收后，日晒氧化为蓝色。前者属染料作用，后者为助染作用。

白矾在染色中也起助染作用。它水解后生成带电荷的氢氧化铝，牢固地吸附于染织物上，对植物染料也有很强的吸附性。因此，它可以用于多种染色，如茜草、苏木染红，槐花染黄，蓝实染蓝等。

绿矾、白矾大约在周代已用于染织。以后历代不衰，并扩大到染皮、染纸、染漆工艺之中。消费量很大，成为国家的一种重要商品。矾石的生产与销售，唐朝时一度为国家专控。唐文宗开成三年（838 年）下放州县官营。五代至宋又由国家专卖。

宋代，朝廷对矾的专卖控制极为严格。当时矾的主产地是幽州、坊州、无伪军等地。宋太祖赵匡胤在北宋建立之初的建隆年间（960～963 年）就下诏："商人私贩幽州矾，官司严捕没人之"。继定私贩幽州矾一两以上，私卖矾三斤，及盗官矾十斤者，斩首弃

市。开宝三年（970年）限制稍微放宽，增私贩至十斤，私卖及盗矾满五十斤者死，余据违犯多少论罪。当时白矾每斤零售价，无伪军（今安徽无为县）六十钱，坊州（今陕西黄陵东南）八十钱，汾州（今山西汾阳）一百九十二钱。地区差价如此之大，不从严控制，专卖达不到目的。果然，至道中年间（995～997年），白矾岁课达到九十七万六千斤，绿矾四十万斤，卖钱一十七万贯。真宗末年（1022年），白矾增加二十五万一千余斤，绿矾增加二万三千余斤，卖钱增加六万九千余贯，岁入达二十三万九千余贯。北宋的财政收入除茶、盐之外，要算矾利最高了[93]。

五、洗涤剂

人类生活离不开洗涤，因此洗涤剂的发明应用是很早的。我国历史上不少洗涤剂都以药材为原料，并被收入本草书籍之中。

冬灰与石碱

《周礼·考工记》记载，当时用草木灰的水浸液洗丝和衣冠。草木灰含碳酸钾，溶水生成氢氧化钾，带碱性而去油垢。《神农本草经》下品有冬灰一药，能腐痣疗疮。陶弘景说：冬灰“此即今浣衣黄灰耳，烧诸蒿藜积聚炼作之”。但是炼作之法未交待。直到明代，人们一方面仍然“以灰淋汁，取碱浣衣”，另一方面则提取碱汁，制造出使用方便的固体洗涤剂石碱。《本草纲目》石碱中记载：“石碱出山东济宁诸处。彼人采蒿蓼之属，开窖浸水，漉起晒干烧灰，以原水淋汁，每百引（十丈为一引）入面粉二三斤，久则凝淀如石，……货之四方，浣衣发面，甚获利也”。

皂荚与肥皂团

皂荚也是使用很早的民间洗涤剂。在西汉市场上是常见商品，上等每枚值一文钱。当时柏子仁下等每斤十文，可见售价不低。《神农本草经》将皂荚列为下品，能祛风痰，杀虫，解毒。《名医别

录》记可为沐药。用时捣烂溶水，所含皂苷产生泡沫，有很强的去垢力。《新修本草》指出："此物有三种，猪牙皂最下，其形曲戾薄恶，全无滋润，洗垢亦不去。其尺二寸者，粗大长虚而无润。若长六七寸，圆厚节促直者，皮薄多肉，味浓，大好"，称为肥皂荚。但用法仍无创新。皂荚虽然是普通的农副产品，却也是皇宫中的重要洗涤剂。唐人陆勋《志怪录》记，乾符三年冬，有宫人外出上坟，摘了一笼皂荚带回宫中。

宋代市场上出现"肥皂团"的商品。李时珍记下的明代制法是："十月采荚，煮熟捣烂，和白面及诸香作丸。澡身面去垢，而腻润胜于皂荚"。宋代制法可能与之相同。这种肥皂丸直径一至二寸，加入香料为香肥皂，故多作洗面、沐浴用。明代《鲁府禁方》记载了一种"香肥皂"，用藿香、甘松、樟脑、细辛、猪胰、白芷各一两，肥皂角（去皮弦子）半斤，研末，用枣膏及汁为丸，不仅能洁身面，而且能润肤增白。很显然，这里所说的"肥皂团"、"肥皂丸"、"香肥皂"，都不是现代含义的肥皂（能溶于水的高级脂肪酸盐），而是肥皂荚加工成的团、丸型商品形态。

猪胰、澡豆与胰子

猪胰在北魏《齐民要术》中记可以去垢。北齐《药对》把它作为通乳药物。猪胰含多种消化酶，可以分解脂肪、蛋白质、淀粉而去垢，但是使用不便，成本也高，不能形成市售商品。

西晋出现沐浴用的"澡豆"。大富豪石崇家用硫璃碗盛澡豆，可见当时是十分珍贵之品。唐代澡豆的使用才较普遍起来。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载了十几个澡豆方。制法用猪胰研磨成糊状，与豆粉、香料、药物粉混合制成块状物，是一种带芳香气、具润肤增白作用的沐浴洗涤剂。其中洗面药澡豆方，由猪胰五具、荜豆面一升、皂荚三挺、栝蒌实三两、萎蕤、白茯苓、土瓜根各五两组成，各药捣筛，拌猪胰浆，成块晒干，每日取洗手面。可以看出，澡豆的质地坚硬、粗糙，含较多的原料颗粒。

胰子是在澡豆基础上的重大科学创新。用猪胰与砂糖研磨成浆，加入天然结晶碱及少量水拌匀，再加入熔化的猪脂，继续搅拌、研磨，加入香料混匀，压制成球形或块状固体，称为“胰子”。在生产过程中，胰所含的胰脂酶使猪脂分解成脂肪酸，再与碱皂化生成脂肪酸钠，因此，胰子具有现代肥皂的性质，但胰子比肥皂更滋润皮肤且无副作用。是明代以来广为应用的洗涤剂。清朝末年，北京有胰子店 70 多家。品种按香型分有桂花胰子、玫瑰胰子等多种。20 世纪 50 年代后，随着现代洗涤剂工业的发展，胰子生产退出历史舞台[94]。

白垩块及其他洗涤物

其他可作洗涤用的土类药材，有白垩、甘土、东壁土、自然灰等，都含碱性成分，故用于浣衣去油垢。本经下品的白垩，陶弘景说即今画家用的白色颜料。明代白垩别名画粉，说明仍用于作画。不过在唐宋时白垩作浣衣用。唐代苏颂记，人家往往用以浣衣。宋代寇宗奭说：白垩京师为土白子，切成方块卖于人浣衣。说明是加工成商品投放市场。这大概是最便宜的洗涤剂，故人家往往用之。

六、香料

利用香药制造香料，应用十分广泛。

香口　汉朝的大臣在朝见皇帝时，口含丁香，手握兰草，怀揣薰草，芳香避臭。唐代有一个贵族宁王，每会宾客前，先含麝香，谈论起来，香气喷于席间[95]。

香面　入胭脂、面脂等化妆品用。

香衣　《千金翼方》卷五干香方，用丁香、麝香、白檀香、沉香、零陵香、甘松、藿香，研细合匀，叠衣时撒布贮衣箱中。既可防虫，又可香衣。

香身　将香料装入香囊佩带香身、无论宫廷、民间都为习用。端午节佩香囊，民间多装价廉易得的苍术、白芷、川芎、辛夷、香草，既可香身，又可避秽防病。宫中香囊多装麝香、龙脑、龙涎香之类珍贵香药。南北朝时宫中还将龙脑香放鞋中避臭、香脚。在澡豆、肥皂团、胰子等洗涤剂中加入香药沐浴，集去垢香身两种作用。

香室　将香料燃烧放出香气美化环境，多用龙涎香、乳香、檀香、沉香等。陆游《避暑漫钞》记：北宋末期，宫中用珍贵的龙涎香、沉香、龙脑香合蜡制烛，点照起来火光明亮又香气横溢。唐代宫中还用香药制亭阁，寺庙用的柱香中亦加入香药。《新修本草》记，沉香、熏陆香、鸡舌香、藿香、蜡糖香、枫香，此六种香皆合香家要用。

香食　《本草经集注》记：煮有臭气的肉，加少许小茴香、大茴香可无臭气。以后，卤肉、烧肉广泛使用的香药还有山柰、桂皮、甘松、草果壳、砂仁、豆蔻等。糖果、糕点中有的也加入香药改善风味，如宋代的荆芥糖、薄荷糖、麝香糖等。元代市售的“炒团”（主料为炒黄豆粉、沙糖）、“松花饼”（主料为新松花粉、白沙糖）均加入少许“香头”。香头是由沙糖、大蒜、葱白、生姜、麝香密封瓶内，重汤煮粥时后的备用调香品，临用取少许便香[96]。

香茶　宋代市场上广为销售的一种腊茶，是茶叶加香药的制成品。用茶三钱，龙脑三钱，麝香半分，百药煎（五倍子加白矾、乌梅、酒曲的发酵品）、檀香、白豆蔻各二分半，甘草膏、糯米糊适量，混合捏片，切成眼状块，干燥。泡沸水饮之香气浓郁，又能醒脑，健胃。

香墨　战国时代已能制墨。有些墨的制造商和工匠，在其中加入香药，增添香气。通常加入的香药有松香、龙脑香等。宋代有一种御用的龙香墨，加入的香料是麝香、龙脑，磨墨、挥毫都香气扑鼻，爽心悦神。

此外，在蚊烟、浆糊、冷饮、热饮、牙粉中，也有加入香药的。

七、防蛀药　农药　灭鼠药　灭蚊药

用植物药、矿物药杀虫，《山海经》中已有记载。西晋时用黄柏汁浸制出黄色的防虫纸。唐代用木香制蛀虫丸。唐宋时有些珍贵的古籍、佛经，经特殊处理后有防虫、防霉效果。《洞天清禄集》载："硬黄纸，唐人用以写经，染以黄檗，取其避蠹（蛀虫）"。沈括说宋以前古人藏书用芸避虫蛀，芸即香草，能芳香杀虫。元代，一位宫廷的裱褙工人能制一种防虫浆糊。《秘书监志》记载，他用的原料有飞箩面、白及、明胶、黄蜡、藿香、茅香等。飞罗面是一种极细的淀粉，与明胶、黄蜡能调制细腻润滑而光泽的优良浆糊。白及含胶质，能显著增强粘性。藜芦、皂角、白矾能杀虫防腐，藿香、茅香，既增香气，又可防霉。配方选料十分精当。

明代，用砒石生产农药有相当大的规模。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江西上饶、江南信阳、湖南衡阳等地都产砒霜。衡阳"一厂有造制万钧者"（30 万斤），"每年千万金钱速售不滞，以晋地菽麦必用拌种，且驱田中黄鼠，宁、绍郡稻田必用蘸秧根，则丰收也。不然，火药与染铜需用能几何哉"[97]。

毒鼠和熏蚊《诗经》里即有记载，市场销售一定很早。《太平广记》记成都有用木鼠作市招的卖鼠药人。鼠药和蚊烟是宋代市场上的普通商品。《本草拾遗》记载，当时有用"伏翼（蝙蝠）晒干，和桂心，熏陆香烧烟蚊子"。《医方类聚》载用木屑、天仙藤粉，装软纸套管，点燃用，称为"印香"。《海上方》载一方用木鳖、川芎、雄黄作蜜丸燃用。明清则多用青蒿、艾叶扎把或作成印香出售。

八、火药　鞭炮　焰火

战国时代道家、方士就开始用矿物药烧炼“仙丹妙药”，逐渐发现火硝（硝酸钾）、硫磺能燃烧并产生大量烟雾。利用这一性质，《本草经集注》明确指出，用硝石投炭火中发生爆发性燃烧来鉴别真品。精通炼丹的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磺法》中记载：向火硝、硫磺粉中投入烧存性的皂角子，能急速燃烧并产生火焰、浓烟，被认为是早期的火药配方。宋代已能大量生产火药，在汴梁、临安有了专门生产火药的作坊，制造火箭、火球、火炮等兵器用于军事。火药的基本原料是火硝、硫磺、木炭，另加一些助燃、发烟、有毒药物，如油蜡、沥青、干漆、松脂、砒霜、雄黄、黄丹、铅粉之类。元代随着向西军事入侵，火药与火器制作技术传到阿拉伯和欧洲。火药的开发利用对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很早就用燃烧竹子发出的爆裂声来驱逐魔鬼，求吉祥如意，称为“爆竹”。南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日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劈山臊恶鬼”。北宋在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有的已用硫磺作爆药，响声更大，称为“爆仗”。《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时将爆仗作成果子、人物形，内装药线，逐个相连达百余个，形成连续爆响，这是鞭炮一名的来源，也是火药在鞭炮中的正式应用。

在火药中加入铁屑等物质能产生耀眼的火花，制成各种烟火炮单放或搭架连续燃放，是宫廷、民间都喜爱的娱乐活动。南宋放鞭炮、烟火盛行。宋理宗和太后一次在庭中看烟火，“地老鼠”喷着火在地上乱窜，吓得太后赶忙逃跑。每到十二月，市场上就有大量鞭炮和烟火出售。

九、颜料

中国应用颜料的历史很早。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有黑陶，殷商甲骨文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文物染有黑色、红色，是使用颜料的证据。利用中药材作颜料也很多。

黑色颜料有石涅、墨和黑石脂。《山海经》有石涅一药，即是黑色的石墨。魏晋时制墨的原料用漆烟和松烟，而干漆在《本经》中已作药用。黑石脂，也是《本经》五色石脂之一种。

红色颜料主要有丹砂和银朱，均为硫化汞成分。不过，丹砂是天然矿物药，银珠为加工品，色泽鲜红。《本草纲目》记载的制银珠法用水银一斤、硫磺二斤，装罐密闭火煅，贴罐者得银珠，贴口者为丹砂。此外，红色颜料还有雌黄、雄黄、铅丹（四氧化三铅）、胭脂、茜草等。

白色颜料除用高岭土白垩外，重要的是加工品铅粉（胡粉、铅白）。铅粉为碱式碳酸铅，与空气中的微量硫化氢气体长期接触，会生产硫化铅而变黑。

黄色颜料主要用土黄、藤黄、密陀僧和铅丹。藤黄是一种剧毒蚀疮的树脂，密陀僧为氧化铅，铅丹为三氧化二铅，都是铅的烧炼氧化加工品。

蓝色颜料主要是空青、曾青和扁青，为含碳酸铜的矿石药。

绿色颜料除用绿青、铁落外，亦用植物加工品青黛。

十、其他开发利用

药材的其他开发利用还很不少。如在冶炼工艺中，用炉甘石（碳酸锌）炼锌。赤铜中加入炉甘石炼为黄铜，加入砒霜炼为白铜，加入明矾、火硝炼为青铜。又如用蜂蜡制烛，桑根皮造纸，芜荑制

酱，胡麻榨油，麻贲（牡麻）织布，白及作糊，石膏点豆花，红花子油作车脂（润滑剂），滑石粉刷画纸，百药煎加绿矾染须发等等。《新修本草》载，用梧桐树叶和梓树花叶饲猪，能催肥三倍且易于饲养。《鸡胁编》记，用生地黄四两研汁，洒桑叶上喂蚕，能增加取丝量且质更坚韧。《茅亭客话》记载，北宋太平兴国时，成都西市有妇女“造花为业”。《夷坚志》也记载：“饶州天庆观后居民李小一，以制造通草花朵为业”。《梦梁录》说南宋临安有“齐家、归家花朵铺”，制作极其精巧。民国时期，仅重庆十八梯街区有造花户二三十家。通草为清热利尿通乳药，用通草制花，已成为一项历史悠久的手工业。

第十章　药业基本名词探源

中药之名出自近代，而在此之前，已有其他种种名称。研究各种名称的来源、含义及其变迁，不仅具有药业史学意义，也具有一定现实的学术意义。

一、药　药物　药品

上古时代的典章文献汇编，现存最早的是《尚书》，说命篇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即吃药不到头昏眼花的地步，疾病是不会好的。说明商代后期已明确“药”是治病之物的统称。以后药这一名词就被广泛应用直到现在。药既是治病之物，自然就产生了药物一词。《左传》昭十九年，有“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一语，说明在春秋时已为常用。

药品一词，最迟见于南宋。《梦梁录》卷3“五月”中载：五月五日天中节，“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避瘟疾等用”。卷18“物产”中，有“药之品”的专项，记载了杭州地区所产的74种药材。说明药品包括药材和成药商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102条，根据生产经营中存在不同的商品类别，对药品的含义作了全面解释：“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

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三者比较，药、药物是泛称，药品是指药物商品，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

二、毒药

《周礼》是记载周代王室官制和施政纲要的重要典籍。其中《天官冢宰·医师章》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说医师是主管医药卫生工作的行政命令，贮备药物来供医疗需要。可见毒药之名是当时官方给药物确定的标准名称。我国第一部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在素问移精变气论中也说：“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也表明毒药即是药物的泛称。

毒药即药物的称谓，是基于凡药皆有毒的认识。金·张从正说：“凡药皆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明·张景岳对毒药的含义解释最为精辟：“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药，以气味之有偏也。盖气味之正者，谷食之属是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是也，所以去人之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之为病，病在阴阳偏胜耳。欲救其偏，则为气味之偏者能之，正者不及也。……是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曰毒药攻邪也”[98]。

这种凡药皆有毒，药物即毒药的笼统概念，不利于认识药物的毒性作用，只能导致“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的消极影响。所以《黄帝内经》在接受药物即毒药概念的同时，已开始根据药物的毒性大小有无，把药物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四类，并指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的用药原则（素问·五常政大论）。《神农本草经·序录》也按无毒、无毒有毒、多毒把365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中药无毒有毒，斟酌

其宜；下药多毒，不可久服”。也提出“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的用药原则。所以，毒药的概念到汉代已发生明显变化，是指作用峻猛、能够“伤人”正气的药物。

现在，毒药的概念也是指那些作用峻猛，在治疗剂量下能对人体器官和功能带来严重损害的药物。也主张给药从小剂量开始，或间断性给药。

三、本草

本草一词始见于西汉。《汉书》卷25郊祀志记载：汉成帝二年（公元前31年）诏罢“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汉书》卷92游侠传记载：“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皇帝诏罢的“本草待诏”是他的药物、药学顾问。楼护读诵的“本草”只能是书籍；我国第一部药物专书取名《神农本草经》，森立之说：“考经名以本草者，盖谓药物以草为本”，经是经典书籍，本草即指药物。所以，本草一词最早就有药物或药物著作的双重含义。本草即药物的含义，五代后蜀医药学家韩保升在《蜀本草》中解释最为清楚：“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众也”[99]。

汉代出现本草一词，是当时植物药大量增加，占了药物中绝大多数的结果。草是植物的泛称，因而《说文》对药作了“治病草”的独特解释。不过，本草即药物的含义，历代多用在书名之中，如数以百计的各种本草著作。清末以后此用法渐绝，代之以中药、国药之称。近年又见再起之势，已有《本草学》、《中国本草图录》、《中华本草》等专著出版。

四、医药

医药一词，战国时已用。李悝《法经》规定，在役防人、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应负刑事责任。《史记》载“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时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那时人们在觅食过程中逐渐发现一些植物食后能解除某种疾苦，是药物知识的萌芽阶段，更谈不上有医学理论。始有的医药当是指能够解除某些疾苦的药物。宋代官办的成药生产、销售机构，一度名“医药合剂局”、“医药惠民局”，医药也是指医疗用药。明代医药学家陈嘉谟说“医药贸易多在市家”，更明白是指药物了。

古代，医药之称也有医学与药学合称的含义。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这里，作者严厉抨击的是不重视医学和药学的研究与应用，不单纯是指不重视药物。

现在，医药一词仍然包含供医疗使用的药物、药品，及医学与药学合称的两重含义。

五、官药

官药之称出自宋代。公元 1076 年，北宋宫廷医疗保健机构太医局设“熟药所”，又称“卖药所”，生产成药并公开向社会销售，当年即获巨利。以后这种制度向全国推广，并把生产和销售机构分开，分别设立了“医药合剂局”和“医药惠民局”，形成了庞大的中药工商体系，被称为“官药局”。南宋《癸辛杂识》载：“和剂惠民药局，当时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药成分之内

外，凡七十局。出售则又各有监官，皆以选人经任者为之。”所以，官药原是指宋代官办和剂惠民局生产、销售的成药。

官药局体制推行到明代已逐渐削弱。到了清代就完全废除，全由民营药业代替。官药消失了，但官药之称仍有，而且有“官料药”称呼的变化，含义也有了不同。

《草药性》说：“恐有士庶不知官药、草药，在铺采办，问明便知”[100]。张志聪解释：“所谓官料药者，乃解京纳局之高品”。高鼓峰在《四明医案》中谓：“浙西人言出自医家药笼中者，谓之官料药。俗方一二味，谓之草头药”[101]。药业则把自己经营的药称为官药。可见，清代所指的官药（或官料药），是与草药相对而言的、比草药高一个层次的药物群体，是指各地朝贡京城的优质药材和为医家常用、为药业经营的药物。

民国时期，官药自然是指中药。现代，苏州药业仍有把进口及省外所产药材称为官料药的遗习。不过，西药传入中国后，官药之称逐渐消亡，由中药、国药之称取代。

六、中药

中药和中医是西方医药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药物和传统医学的统称。始自何时，尚难肯定。1857 年英国来华医生合信著《西医略论》等书，内有“中西医学论”篇名及“中土医学”、“中土所产药物”等提法。1903 年，清大学堂章程医科大学拟定设置“中国药材”课。1904 年，我国早期的中西结合医生周雪樵说：“仆之治病，凡治病器具，如寒暑表、听诊筒等概用西法，至开方用药则用中法，有急病及中药之力所不及者则用西药以济之”。1909 年 4 月，上海举行医士考试，其中一试题为“中药辨气味，西药辨质，质与气味分别何如?”[102]，可见，至 20 世纪初中药之称已较普遍。中药的含义也大致是指为中医所用、为中国所产之

药。

考虑到中药应用受中医理论指导，来源基本为天然药物，分布国外亦有少数，商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三大部分，中药的概念应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的天然药物及其加工品、制剂品。既反映了中药的本质，又概括了它的内涵和外延。若中药泛指中国各民族使用的传统药物，自然也含民族药在内。中国药典一部习称中药部分，就收入了部分疗效确切的民族药材和民族成药。不过通常指的中药不含民族药。中药绝大多数产在国内，历史上，外来的天然药物经中医消化、吸收，按中医理论指导使用，也属于中药范围，如乳香、没药、胖大海、西红花、西洋参等。相反，即使产在国内的天然药物，若不是按中医理论指导应用，也不属于中药。

七、国药

中医称为国医较早，中药称为国药于20世纪初已有出现。其意在强调中医药是我国固有的宝贵文化遗产。但是国药、国医称呼的广泛使用，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1929年2月2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内拟了消灭中医的六条措施，引起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3月17日，由上海中医药界发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情绪激昂，提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大会决定：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定3月17日为国医节。迫于压力，南京政府答应暂不执行。但其后南京当局仍继续执行歧视中医、中药政策。1929年12月1日，在上海又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决定继续要求中医药应有合法地位；中医、中药一律改称国医、国药。从此，中药正式称为国

药，中药店称为国药店，中药业称为国药业，中药团体称为国药团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中医、中药制订了保护发展的方针政策。国药、国医之称失去意义，自然恢复了中药、中医的名称。

八、药材　道地药材

药材是中药三大商品之一，其名使用早在三国时代。《三国志》魏·赵俨传说他在正始四年“老疾求还”。《魏略》载“（俨）发到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忘持其常所服药，雍州闻之，乃追送杂药材数箱”。宋代，官药局设“收买药材所”，有专门官员辨验药材，以保证药源和质量。《岁时广记》卷39记载：宋代“腊日，政府以供堂钱制药，分送诸厅，其后多分送药材，如牛黄、丹砂、龙脑、金银箔之类”。可见，药材是指经过采收加工后供生产饮片、成药的原料性中药，包含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这一概念一直沿用至今。中药概念形成后，药材也称中药材。由于长期以来药材是中药商品的主体，所以全国经营中药的各级商业公司都称为药材公司或中药材公司。

道地药材又称地道药材。出现虽比药材名迟一千多年，但历代医家、药家对此已有一定认识。《本草经集注·序》指出：“诸药所生，皆的有境界……。自江东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荆、益不通，则全用历阳当归，钱塘三建（指天雄、附子、乌头三药），岂得相似，所以疗病不及往人，亦当缘此故也。”唐代实行州、县两级制，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了对地方的监察制度，因山河形势之便，唐朝太宗时把全国分为10道，唐玄宗时改为15道。为编《新修本草》，朝廷下令全国献送所产优质药材。孙思邈根据这一变化，在“药出州土”专题中

首先按道归纳药材产地，计 13 道 133 州 519 种，质次者不予收载。唐代的这些措施，为道地药材概念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宋代出现了经营主产地药材的专门药市。明代官修的《本草品汇精要》，在产地项下专列“道地”一条。在 916 种植物药中，有道地产者 268 种，几乎全为优质药材。这时，道地药材的特殊含义已趋明朗。所谓道地药材，是指那些来自特定产区，在长期医疗、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渐形成并被全国公认的优质药材。可是，道地药材的全称，现知最早所见竟不是医药文献，而是明代汤显祖 1589 年的剧作《牡丹亭》。《牡丹亭·诇药》中有“好道地药材”一语。这可能是道地药材为药材行业的专用术语，医药学家多所不用之故。古今中医重视使用道地药材，成为控制药物质量的一种重要手段和特色。药业挂出道地药材或地道药材的牌匾，表示经营药材的质量上乘。

在历史长河中，道地药材虽有产地变迁和品种变化，命名亦有显示形态特征（耳环石斛）或产地（川芎、石牌香）、集散地（炉贝）的不同，但特定产区、品质优良、历史悠久、全国公认，始终是基本要素。

九、生药

生药是药材的另称。生药之名不是外来，五代即有所见。《太平广记》记载，成都东市有“卖生药黄氏子家”[103]。宋代此称已十分常用。两宋京城都有不少署名为某“生药铺”的民间药业。临安还有专门经营四川、两广药材的“川广生药市”。《宋会要》载，1102 年太医局令禁止将不合格生药制为熟药。生药之称在宋代盛行，与当时“熟药”业空前发展有关。宋代把可以直接服用的成药叫熟药，自然就把仅经过产地采收加工，不能直接服用，供生产饮片、成药的原料药材称为生药。近人有用“生货原药”作简明概括[104]。明代至今，继续沿用生药即药材的概念。

生药还有另一含义。从《神农本草经》到《金匮玉涵经》、《本草经集注》、《千金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论述药物炮制时，都有药物“有须烧炼炮炙，生熟有定”的强调。《外科正宗》说：“凡药必遵雷公炮炙，入药乃效。如未制生药入煎，不为治病，反为无益”[105]。显然，能够入煎的生药，绝不是粗大体长的原料药材，而是指仅经过切制加工的饮片——生片。现代中医和药业仍然十分强调，使用中药材必先经过加工炮制，该切要切，该制的要制，不能整药、生药配方。

十、饮片　咀片

饮片是中药三大商品之一。其名称最早见于南宋。《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京城临安有生产“生药饮片、熟药丸散”的作坊。可见当时饮片用量很大，饮片之称也为药业常用。但医药文献使用较少。清代吴仪洛在力著《本草从新》柴胡项下，记有“药肆中俱切为饮片”一语。吴氏为著名医药学家，此后医药书籍才较多使用饮片一词。

饮片的原本含义，是切制成供煎汤饮服的药片。现在，饮片的含义扩大，不仅经过切制加工后的药材叫饮片，凡药材经加工炮制供配方使用的制成品都称为饮片。饮片的形状除片形外，还有节、丝、丁、块、粒、绒、粉、卷等十余种。因此，全国从事药材加工炮制的企业，几乎都叫中药饮片厂。

咀片是饮片的另称，至迟见于明代。《本草蒙筌》谓：药材“古人口咬啐，故称咬咀，今以刀代之，惟凭剉用，犹曰咀片不忘本源”。可见咀片之称与古代用咬咀法加工药材有关。咬咀一法，最初可能是行医售药的医生，将个大、体长的药物用口咬啐、咬断，便于给药的快速、简便加工方法，至后汉含义已有变化。《金匮玉涵经》附记载：“凡咬咀药，欲如大豆，粗则药力不尽”。虽未

说明用何法使之如大豆，但后世已指出是捣法。梁·陶弘景说："凡汤酒膏药，旧方皆云㕮咀者，谓称毕捣之如大豆者，又使吹去细末，此于事殊不允；药有易碎、难碎、多末、少末，称两则不复均，今皆细切之。较略令如㕮咀者，差得无末，而片粒调和，于药力同出，无生熟也"。

显然，用咬和捣的㕮咀法加工药材，有不卫生、损牙齿、数量小、有粉末等缺点，因而产生了从咬碎、捣碎到切细的衍变过程，这也是饮片加工的发展过程。

根据《本草蒙筌》的说法，咀片即是切细的药片。现在咀片的含义与饮片相同。饮片之中，片形药最多。咀片实际上既取了"咀"又取了"片"，一来不忘本源，保留古意；二来概括了饮片的基本形态，这应是咀片一词的全部含义。

十一、成药　熟药

中成药是中药三大商品之一。最早称成剂药，见于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卷8："众药并成剂药，常自和合，贮此之备最先于衣食耳"。并记有金牙散、玉壶丸、三物备急丸等成剂药十余种。卷2又特别指出："理中丸、四顺、厚朴诸汤，可不预合，每向秋月，常买自随"。宋人洪迈在《夷坚志》补卷第18中记载，赵祖寿向邑宰吴君"绥以成药一小盒"，可见宋时已有成药之名。金元名医朱震亨在评论成药制剂专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时指出："和剂局方之为书也，可以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可见，成药是按一定处方和工艺生产的，可供医师和病家直接购买使用的成品中药。朱震亨还给《局方》成药以多代全，取了一个"丸散"之名，在药业中广泛使用了500多年。成剂药、成药之称虽见于晋、宋，但晋后至清，历代多未采用，而常称以丸散或熟药。民国以来，成药或中成药之

名才被普遍使用。

熟药是成药的另称，宋代已很常用。北宋太医局生产、销售成药的工商机构，最初就取名“熟药所”。两宋京城有不少署名为某“熟药铺”的民营药业。当代苏州药业至今还有称丸散膏丹为熟药的遗习。不过熟药之称宋以后就逐渐少用。在中药炮制领域里，仅经过切制加工的饮片叫生药（前已考释），经过火制或水火共制的炮制品就称为熟药，也称为熟片。

十二、草药

草药之名使用较早。《本草经集注》附录“合药分剂料理法”在讲到过筛时规定：“若筛散草药，用轻疏绢”，“其石药亦用细绢筛”。《新修本草》卷2“畏恶七情表”有小标题“草药上部”40种，“草药中部”31种，“草药下部”21种。皆为根、根茎、种子及全草类药[106]。可见，草药的最早含义是仅指植物药。

宋代出现“草泽医”之称，是指用单方、独药治病的民间流动医生。宋御医李防御买来的十包咳嗽药，“疑草药性犷”，所以“并三为一自试之”，已有草药是草泽医用药之含义。南宋洪迈《夷坚志》记载，绍兴十九年三月，有客船从番禺至英州（今广东英德）祭庙。舟中士人之仆，脚痛不能行，舟师同情说：“吾有一药治此病如神，饵之而差者不可胜计，当以相与”。酒饭毕入山求得此药，酒渍后授病者，令天未明服之。士仆如其言，药入口即呻呼云：“肠胃极痛，如刀割截”，近明而死。士人以咎舟师。舟师发怒说：“何有此！”即取昨夕所余药自渍酒服之，比士仆死得更快。洪迈分折，舟师醉不识药，采到山上的断肠草，招此大祸，得出“草药不可妄服”的结论。显然，此处草药，是指民间百姓的经验单方用药。即高鼓峰说的“俗方一、二味，谓之草头药”。宋代仍有草药指植物药的含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的“论合和法”

规定，“若罗草药为散，以轻细绢”，“其石药，亦用细绢罗”。

明清两代，新药大量增加，走街串巷、走村串寨摆摊看病售药的民间医生队伍空前壮大。仅成都清宣统年间的草药业行会组织“神农会”，就有会员350多人。民间医生用药以植物药为主，且多自采、自制、生用、单用，不重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与“正统”的坐堂医生相比，被称为“草泽医”或“草医”，他们使用的药物被称为“草头药”或“草药”。草药的含义除以植物药为主外，还有非草木之草的“草粗之义”，因而受到一些“正统”医家的轻视，成为比官药低一个层次的药物群体。草药经验的总结也来源于临床实践，有确切的疗效，所以清代乾隆年间的《百草堂草药验方》举例进行了反驳：“黄疸走胆周身黄，金钱草是救命王，炕干为末冲甜酒，草药更比官药强”。清代名医张志聪则主张不分官药、草药。他说：“夫官料药亦多系草根木皮，又何分草药之非官料，而官料之非草药乎?”

现在，草药仍然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植物药；二是与中药相对而言，指分布使用有一定地区性，药性理论不很成熟，药材行业一般不予经营或较少经营，主要由民间医生或群众自己凭经验使用的药物。但是，不少疗效好的草药理论已经充实，使用遍及全国，药材部门也在大宗经营，中医使用草药，草医使用中药的现象也很普遍，所以草药的后一含义不很严密。从本质上看，草药运用仍遵循中医理论，是中药的一部分，古代也统属本草之中，没有分的必要。现在人们把某药称为中药，某药称为草药，或二者全称为中草药，除层次上的区分外，更多的只是一种习惯。

第十一章　著名百年老店

中药店铺是构成中药行业的基层单位。留传下来的百年老店，多有自己的经营特色和经营技巧。它们的经营历史是中药行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择部分有代表性的著名百年老店予以介绍。

一、明代以前　1家

广州　海辐禅院

东晋（317～420年）年间在广州创建。禅院后有医僧问病售药。隋朝时（581～618年）生产的“金汁水”，治疗小儿热证发烧有很高的疗效而远近驰名。海辐禅院遂制药历代不衰。1964年，海辐禅院与潘人和等13家中药店铺先后合并建公私合营潘人和联合制药厂。1964年更名为广州健宁药厂，1965年又更名为广州中药八厂。

1956年，以老字号歧生堂为核心的广州另外14家私营药店，联合建公私合营歧生堂联合制药厂。1965年更名为广州中药五厂。1979年，广州中药八厂并入五厂。1981年，广州中药五厂更名为广州奇星药厂。

奇星药厂在容纳了27家药店的人才后，继承古方正药、制药求精的优良传统，开发了千柏鼻炎片、复方感冒宁片、猴枣散等一批新药。1981年，千柏鼻炎片在北京试销，出现了千人排队争购，

挤坏了3个玻璃柜台的壮观场面。千柏鼻炎片等6个品种也荣获省市优质产品称号。奇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已显露锋芒。同年，国家将开发治疗心脑血管病及其后遗症的新药——华佗再造丸，下达给奇星药厂。经过3年研究，取得了疗效卓著，市场前景好的初步结果。1984年，国家将华佗再造丸列入“六五”科技重点攻关项目，继续进行深层次研究。1986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朱柏华，调任奇星厂长。他报着科技兴厂的强烈信念，与多家科教单位联合，于1988年完成了第二期研究，使华佗再造丸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这是全国中药首次获得的最高荣誉。华佗再造丸成为奇星的支柱品牌。1989年，奇星利润额首次超过1000万元，华佗再造丸就达521万元，超过总利润一半以上。为了适应发展需要，跟上世界潮流，从1986年开始，奇星人抛弃老厂的横街窄巷，在广州赤岗按GMP要求另建新厂，分期投资基建费1亿多元，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和生产线款5000多万元，使奇星成为现代化新厂。1996年11月通过了澳大利亚TGA组织的GMP认证，1998年11月又通过了中国GMP认证。与此同时，奇星进行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劳动用工、工资分配、重组产权结构、立足一业拓展它业、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多项改革。奇星药厂已成为拥有与香港广永公司合资的广州奇星药业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奇星马中合资公司、奇星女足实业公司、奇星贸易公司、奇星饮料公司、深圳奇星蓝藻公司等多家企业的集团公司。固定资产比1986年增长了约380倍，进入全国中药工业50强之列，并连续4年实现利润超2000万元，为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之一，并被评为中国明星企业。

奇星药厂由老字号的药业组合到实现腾飞，为传统药业的改造、发展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如紧紧依靠现代科技进行设备和技术改造；加强科研，不断创造科技含量高的品牌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如华佗再造丸、虚汗停、扶正丹、梦驼铃片、生津咽喉片、

螺旋藻口服液等；抓住机遇对人事、用工、分配等关键环节进行改革，实现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人为本、加强人才引进和教育培训，600多人的员工队伍中有220名专业技术人员，其中高级职称10人，并拥有博士生1人、硕士生9人、本科生41人、执业药师13人；同步进行企业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员工中树立了“德、信、新、和”的企业精神，1988年1月，出巨资与中国足协共建中国女子足球队，开创了中国企业共建国家体育队的先河，引起社会轰动，被誉为“星球结缘”、“奇星模式”，共建活动持续至今，女足已成为世界强队，奇星药厂不仅大大提高了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女足的拼搏精神和爱国热情，也成为奇星人努力奋斗、走向世界的强大动力；有一个具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精神的领导班子，是奇星成功的关键。带头人朱柏华厂长因而受到表彰，1998年被评为广东省劳动模范，1999年又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殊誉。

二、明代　4家

太谷　广盛号

嘉靖二十年（1541年）在山西太谷创办。业主习医，启广盛号药铺诊病售药。后得明宫秘方制售龟龄集、定坤丹而名声大起。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加入其他股东，营业扩大，更名为广升聚药号，主营药材批发，兼营饮片、成药零售。光绪十一年（1885年），业务兴隆，广升聚分为广升远和广升誉两家药号。广升远生意红火，在全国不少大城市设分号，又在香港没庄，经营药材进出口。设在太谷的总部也扩大了龟龄集、定坤丹等成药生产，成为远近闻名的“太谷药”中坚。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广升远、广升誉合并成立广誉远制药厂。后又吸收广源兴和延龄堂。1973年更名为山西中药厂[107]，为山西的骨干中药厂之一。

佛山　梁仲弘蜡丸馆

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在广东佛山镇早市（今佛山市福贤路）创办。业主梁仲弘原从医务，将临床心得之方制售获利后，遂启肆营药，经营抱龙丸独一成药。抱龙丸组方独特，对小儿急热惊风、痰涎壅盛疗效颇佳，因采用当时最新蜡壳包装工艺，故载誉四方。时年佛山正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中成药业迅速发展，一直兴旺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梁仲弘蜡丸馆和冯了性等五十七家药店合并建厂，几经分合发展成为今日佛山市制药一厂，2000年又更命名佛山冯了性药业有限公司[108]。

广州　陈李济

万历二十七年（1600年）在广州双门底（今北京路原厂址）创办。业主陈体全、李升佐，均广东南海县人。陈先为小商，李业医营药自启药肆。一次同船赴广州，陈体全上岸时遗落货款，被李升佐捡获。李不昧钱财，整日在码头守候失主。陈失金后四方寻找至码头，因得李助喜获失金。互通姓名方知同乡。陈感其李品德高尚，遂以一半失金赠李营药。李拒受不得，于是决定合营，取店名陈李济，表示二人同舟共济之决心。

陈李合作后即扩大业务，把制售成药作为发展方向，以广收良方，精细加工，务求实效为经营方针。至清代，陈李济已成为南方著名药家，享誉全国。同治年间（1862～1874年），清帝穆宗因病服用陈李济药品获益，赐“杏和堂”封号。以后陈李济又挂此匾，并以杏和堂三字组成盾形商标使用至今。慈禧太后也指定陈李济贮藏的陈皮为贡品。陈李济生产的成药不仅质量好、疗效高，而且大蜜丸首创蜡壳包装，这在明清时代是优良的包装材料和最新工艺。清末民初，产品发展至70多个，是广东成药的骨干力量。著名产品有追风苏合丸、附子理中丸、宁坤丸、乌鸡白凤丸等。进入20

世纪30年代，陈李济资本已十分雄厚、分别在香港、澳门、上海、佛山、潮安、新加坡等地开设分店，营销进入鼎盛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陈李济扩大了成药生产规模，制定了恢复老字号形象，重建现代化新厂，实现制药现代化的三步走奋斗目标。在现任厂长李国驹的带领下，已经实现了前两个目标。1993年国家国内贸易部授“中华老字号”证书并挂牌。1997年，座落在广州大道上的现代化新厂建成，并通过国家GMP认证。以壮腰健肾丸、喉疾宁胶囊、补脾益肠丸、新血宝胶囊、乌鸡白凤丸、参茸白凤丸、大活络丸、驱风苏合丸等为代表的新老产品，畅销于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可观的产值和利润使陈李济进入中成药工业50强和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行列。2000年末进行的建厂400年大庆，使陈李济名声再震国内海外。现在，陈李济正以突出中药特色，实施品牌战略，坚持技术创新，向实现第三个目标迈进。陈李济的成功，是继承了老字号“工艺虽繁必不减其工，品味虽多必不减其物”的制药宗旨，大力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和技术，深化内部改革，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治厂、不断创新的结果。目前，陈李济正致力于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风湿平胶囊的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开发和创建有陈李济特色的中医药艺术馆，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109]。

汉口　叶开泰药室

崇祯十年（1637年）在汉口鲍家港码头创办。业主叶广基，祖籍安徽徽州。青年时行医故里，后挟技江湖，迁居江苏溧水县，终落籍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汉口镇，启肆叶开泰药室，业医营药。自制八宝光明散、虎骨追风酒等成药。开始时薄利多销，甚至以送自荐。因疗效颇佳，很快盈得顾客，生意日渐兴隆。清乾隆年间，后裔叶松亭继业，改店名为叶开泰药号，本人也由科举跳入仕途。

直至清末，叶家都有人为官。其中以道光年间的叶铭琛官位最为显赫，1850 年出任两广总督。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叶铭琛被英军所俘，受尽屈辱死于国外。叶开泰借此大肆宣扬叶铭琛的“民族气节”，发起抵制洋货运动，很得人心，生意更加兴旺，声誉遍及海内外。1895～1930 年达到鼎盛时期。1917 年营业额由 20 万两白银升至 40 万两，1928～1930 年接近 50 万两。1912～1927 年的 15 年中纯利超过 100 万两，成为当时全国四大中药店之一。后叶开泰迁址于大夹街下段闹市区，占地宽阔，堂店豪华。

叶开泰的成功主要在于经营有道。叶氏业主在聘用经理、店员时，打破一般只照顾本帮及亲朋好友的帮规陋习，唯才是举。掌管经营的人有南京帮、安徽帮、汉阳帮，胜任者一再委任，虽年高而不辞。对一般员工，按需设岗去留自定。工资较他店优厚，急需时可以预支，实行“在叶开泰不穷，出叶开泰不富”的原则。生活有保障，因而能纳省内外高技药工。有的甚至祖孙几代在店从业，稳定了技工队伍。从业人员最多时达一百人。采购药材，务求优质。常在药行开秤前不惜高价先行选购。炮制、制药、务求精细。推出的名牌产品，滋补与治疗并重，售价高低结合。有参桂鹿茸丸、十全大补丸、六味地黄丸、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大活络丸、虎骨追风酒、八宝珍珠散、梅花点舌丹等。

新中国成立后，叶开泰药店联合陈太乙、陈天宝二家药店，于 1953 年建私营武汉健民制药厂。1955 年公私合营。1966 年转为全民所有制的武汉健民制药厂。70 年代在武汉市汉阳鹦鹉州建成新厂。现在已发展成为全国医药工业的著名集团公司[110,111]。

三、清代 24 家

温州 叶同仁堂

康熙四年（1665 年）在浙江温州创办。业主叶心培，浙江慈

溪人，江湖郎中。启肆后批零兼营饮片、成药。主要产品有八宝眼药粉、五疳保童丸、伤科七厘散、牛黄安宫丸、人参至宝丹等。行销浙南、闽北一带，生意十分兴隆，获利颇为可观。1870 年至解放前夕，单从红利、官息项下叶姓分到一百多万银元。叶同仁堂以疗效确切，制作精细为经营方针，业绩超越同行。1956 年，十多家药铺并入叶同仁堂，创建国药联合制药厂。1959 年更名为中新药厂。1963 年中新药厂与化学药厂、卫生药厂合并，建立温州制药厂。现在，该厂成药远销东南亚及日本[112]。

北京　同仁堂

康熙八年（1669 年）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新开路创办。业主乐尊育，祖籍浙江宁波府慈水镇（今镇水县）。祖上几代都以行医卖药为业。明永乐年间（1403～1424 年）迁居北京，仍操旧业。乐尊育为乐氏第四代裔孙，青年时在清宫太医院任医士，职掌出纳文书，有机会博览历代方书，收集宫廷秘方。康熙八年辞官自启药肆，起店名同仁堂药室，经营饮片、成药。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其子乐东梧继承家业，迁址于前门外闹市区大栅栏街，更店名为同仁堂。经过二十余年努力，同仁堂在京城官民中有良好声誉。雍正年间（1723～1735 年）获得向清宫供药特权直至清末。清宫内廷机构庞杂，各种人员多至万人以上，加上皇帝对下、对外的赏赐，需要各种药材、成药的量很大。规定同仁堂每三个月进货一次，不得违误。御药房开出的进货药单，少则近百种，多则数百种。临时急用之药，随时通知供进。同仁堂向清宫供药，先是固定价格不变，后来随行就市，并可预领官银。官府还发通告对同仁堂招牌进行官方保护，凡冒同仁堂之名开设药室、借方行医者，一律治罪。同仁堂由此获得稳定的利润，提高了身价和信誉，并得到迅速发展。

清代中叶，同仁堂受到火灾和族人不和造成的严重挫折，几易

其主，最后还是渡过了难关。清末民初之际，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设分店达47家。仍尊官令，分店均未用同仁堂之名。采用达仁堂、宏仁堂、永仁堂、乐仁堂、继仁堂、宏达堂等名号。

清代后期，同仁堂以制售成药为主要业务。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刊的《同仁堂药目》中，记载有成药处方和制法495种。而生产最盛时达1170种。产品畅销全国及东南亚地区。名牌商品有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再造丸、参茸卫生丸、女金丹、大活络丹、虎骨酒等十种，号称十大王牌。同仁堂成为民国时期全国四大药铺之一，从业人员近200人。

同仁堂的经营成功，首先是精选良方、投料道地、加工精细，故可生产出大批具有确切疗效的名牌产品，占领全国市场。乐氏的先辈几世行医卖药，又有人在太医院任职，为他们能掌握大量效方、秘方提供了条件。给清宫提供官用药物的身份，使同仁堂能在任何药市取得优先选购上等道地药材的权利，然后才开市定价。“不怕价高，但求货好”的购药原则，使一些大的批发药业与同仁堂建立起长期的、于双方有利的供货关系。在药材炮制、丸散生产及成品包装等方面，有严格的工艺要求和质量标准，因而能够保证药品质量。20世纪60年代同仁堂药库发现一批160年前生产的蜡壳装蜜丸，药丸依然色泽鲜艳，香味浓郁，未曾变质。优良的服务和大力进行的各种广告宣传，也为同仁堂在全国树立良好形象，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同仁堂获得最辉煌发展。制药部分分别建立了同仁堂制药厂、同仁堂药酒厂、同仁堂提炼厂、同仁堂膏药厂。在大栅栏的同仁堂门市，店堂宽畅，药品齐全，门庭若市。同仁堂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大药店[113]。同仁堂集团公司已成为全国中成药企业排序的第一名。

定县　白敬宇眼药店

康熙年间（1662～1722年）在河北定州（今河北定县）创办。业主白敬宇是回族名医。由西北迁至定州启肆经营成药，尤以眼药最为著名。清末，后裔白瑞启继承祖业，在定州城西十字街创办白敬宇眼药厂，雇工百余人扩大眼药生产。名牌产品为祖传秘方瓜子眼药、棒状眼药。1931年，白瑞启派次子白双十去南方拓展市场，在南京升州路老坊巷口设白敬宇眼药庄。1946年，长子白泽民在重庆建白敬宇眼药总行。1947年，总行和定州眼药厂迁至汉口。1948年，汉口、南京两处均获民国政府卫生部颁发的许可证和奖状。优质高效使白敬宇眼药畅销整个中国市场。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的眼药庄更名为南京第二制药厂，汉口的眼药厂也建新厂。均为医药行业的骨干企业[114]。

通海　老拨云堂

壅正六年（1728年）在云南通海创办。业主沈玉柏，云南通海人，知医药。以“可以济人者莫如医”为宗旨。广求良方，得眼科秘传，就医者立效。遂启眼药铺老拨云堂，声誉渐传四方。光绪元年（1874年），老拨云堂眼药由开化镇台夏豹白亲自护送进京。药“座轿”而行，轿前挂对联“拨翳抽丝眼光若电，云开雾散医道神通”，一路锣鼓、唢呐喧天，十分隆重。民国初期，云南总督唐继尧发奖状表彰。老拨云堂眼药远销甘肃、青海、新疆地区，又由马帮驿道运销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再转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名牌产品有拨云眼药锭、拨云珍珠散、拨云复光散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停业。1985年恢复建老拨云堂制药厂。现为云南省重点制药厂家[115]。

苏州　诵芬堂

壅正十二年（1734年）在苏州老阊门内天库前创办。业主雷

大升，字允上，号南山，苏州人，精医药，好自制丸散膏丹。乾隆初考官不中，于是在诵芬堂内挂牌悬壶，集医药于一体。雷允上研制的药品多选犀角、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等贵细药材，疗效卓著，闻名遐迩。人们习将他的名字与店名合称雷允上诵芬堂。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去世。诵芬堂由后裔继承。咸丰十年（1860 年）庚申战乱，雷氏族人携贵细药物到上海避难，摆摊售药谋生。同治二年（1863 年），族人在上海兴盛街（今上海人民路永胜街）启店，为上海雷允上诵芬堂之始。同治三年、六年，雷氏族人返苏两次重起老铺。光绪年间，后裔雷慈蕃在沪私启雷桐君堂药铺，根据祖传秘方制售雷慈蕃牌六神丸。光绪二十八年协商停业交诵芬堂家铺。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后，上海诵芬堂分为南号、北号、北支号三家。此后诵芬堂共有苏申四家，苏州为老店。

雷允上诵芬堂以经营成药为主。精选良药，务求实效，雇用能人，参与竞争是其经营方针。制售的名牌产品有六神丸、行军散、痧药蟾酥丸、玉枢丹、避瘟丹、八宝红灵丹等。尤以九芝图牌六神丸最为神效著名。针对世上众多六神丸的激烈竞争，诵芬堂携六神丸参加各种展览会，让社会公论。民国四年至民国二十年的十七年中，五次获奖。现在，雷允上诵芬堂已发展成为著名的苏州中药厂。

绍兴　震元堂

乾隆初（1736～1740 年）在浙江绍兴创办。业主杜景湘，浙江慈溪人，极善经营。震元堂初即前店后坊，以经营饮片、成药零售为主，兼营拆药批发。由于重视药品质量，经营道地药材，乾隆中期生意兴隆。至咸丰初，财力大增，先后在绍兴陡门启慈和震、临浦启义大震、柯桥启春元震、东浦启天宁震，共五肆。成为绍兴药业第一大家。

震元堂的经营思想是务用道地药材，加工必求质量，不以次货低价吸引顾客，只凭货真价实、老少不欺赢得声誉。尤以销售“大补药”远近驰名，此方来源于坐堂医生方孝儒，由八珍汤加炙黄芪、淮山药、炒杜仲、制玉竹组成。1934 年销 18.6 万贴，得 2.3 万多银元。远销港澳及东南亚地区。今日震元堂，仍为绍兴市供货齐全的大型中药店[116]。

苏州　沐泰山堂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在苏州渡僧桥创办。业主沐姓，浙江宁波药商。在购得原小药店的基础上开业，以泰山图为商标，起名沐泰山堂。经营饮片零售业务。沐氏力求优质药材，炮制遵法精细，生意迅速兴隆，声誉上升。到咸丰年间，已为苏城大药店之一。在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过程中，沐泰山堂两次被夷为平地。

1868 年，沐氏后裔结识药商张蓉亭，沐张合伙重开沐泰山，扩展成药制售业务。经营上，采取当众杀鳖、带货提成、销售给奖、方便顾客等措施，生意十分红火。至解放前夕，年销售额仍在 5 万银元以上。名牌产品有肥儿八珍糕、退云散眼药、消痞狗皮膏、虎骨木瓜酒、人参鳖甲丸等。现在，沐泰山仍为全国名牌药店之一[117]。

上海　童涵春堂

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在上海小东门瓮城地段（今浜中路原址）创办。业主童长善，浙江宁波人。以经营药材贩运为业，在南市咸瓜街启恒泰药行。小东门瓮城地段原有一小药铺，店名竺涵春，长期与童长善有业务往来。由于竺涵春经营无方，生意惨淡，拖欠恒泰药行大笔货款，无力偿还，遂将竺涵春店出让给童长善抵债。童长善喜“涵春”二字，于乾隆四十八年更名童涵春堂。童长

善逝世后由子童蕙楼、童宾霞继承。童蕙楼善制膏药，以治疗跌打损伤的红布太乙保珍膏最为著名，背面盖有“上洋童蕙楼监制”牛角图章，一直畅销到解放前夕。童涵春饮片、成药、药材兼营，生意兴隆，至1918年已发展成为三间五进深的大店，从业100多人，为上海四大药店之一。1919年后，童氏裔孙放松经营出现亏损，部分股权卖给孙、徐等28人，变成股份制企业。1933年童涵春堂改组经理，破格选用能人，生意大有起色。1937年在上海大世界西设童涵春堂分号，称北号，原小东门铺称南号。

两百多年来，童涵春堂的经营思想是保证疗效，精细加工，品种齐全，优质服务，以质量、服务上乘占领国内外市场。如人参再造丸具与众不同的香、糯、甜特点，胡豆大的半夏可切一百五、六十张薄片，而且片片厚薄均匀，光亮透明，深受国际市场欢迎。

现在，童涵春堂经营药材、饮片、成药计1780余种，年配方量百万余贴，是国内外著名的老字号药店之一[118]。

广州　敬修堂

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在广州城南门口创力。业主钱树田浙江慈溪人，儒医兼丝绸商。常从杭州贩运丝绸到广州，沿途施医赠药，治愈不少疑难杂症，名声远传。时广州一富商儿子患重疾，历访名医不效，急候钱树田到广州诊治。钱外施刮痧，内服自制药剂回春丹而愈，富商感激不尽，酬以厚金，钱执意不收。富商后得知钱想自启药肆业医营药，苦短资金，遂出资相助，实现宿愿。钱树田将药肆取名敬修堂，意为“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修明者，积极进取以精于其业也”。表明医药之业，必须不断求医精药良之道，方能达济世活人之心。德高药良的经营方针，使敬修堂成为清代至民国时期广州著名药店之一。回春丹、追风透骨丸等是成药中的名牌产品，远销内地及港澳、东南亚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敬修堂扩大成药生产，建立了敬修堂药厂，制

售中成药成为主营。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前，发展仍然缓慢，固定资产仅 38 万元，实为作坊式小药厂。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敬修堂人发扬“同心同德，奋发向上”的企业精神，抓住国内外市场，走技术进步道路，实行现代企业管理，敬修堂已发展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前进的现代化大型制药企业。厂房面积 14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1 亿元以上。1989 年荣升国家二级企业。1993 年进入全国 100 家大型制药企业，居最佳经济效益第 11 位，1994 年又升至第 10 位。1996 年通过澳大利亚医药管理局（TGA）GMP 认证，1998 年 9 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GMP 认证，成为广东省第一家获得国家 GMP 证书的中成药生产企业。第一次腾飞使敬修堂不仅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连续十几年被评为国家、省、市先进集体，被国家国内贸易部授中华老字号证书和铜牌。原董事长肖承荣也获 1993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有企业转制后，敬修堂药厂更名为广州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海涛（硕士）女士的带领下，公司员工达到 600 多人，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 35%，能生产 11 种剂型 140 个产品，畅销国内市场和欧、美、亚、澳洲的 20 多个国家。以园田牌作商标的产品，以中风回春丹、追风透骨丸、化痔栓、跌打万花油、固肾定喘丸、养血生发胶囊、清热消炎宁等最为著名。新药清热消炎宁，在 2001 年第一季度广州地区中成药销售前 100 位排序中，占第 13 位。现在，黄海涛女士又带领公司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继承老字号敬业、修明的优良传统，以“外扩内强”为经营方针，为实现敬修堂第二次腾飞而努力。

嘉兴　兰台药局

乾隆年间（1736～1795 年）在浙江秀水县（今嘉兴市）角里街创办。业主徐大椿，字灵胎，祖籍江苏吴江县人，清代著名医学家。乾隆见他医术高明，留太医院任职，住兰台阁内。兰台阁为宫

中藏医药典籍之处，遂博览群书，抄录宫廷秘方。数年后辞官南归。一面行医著书，一面选址建局。店名初创时为徐兰台药局。两易其地，最后在北门大街定址，更店名为兰台药局，前店后坊，经营饮片、成药、诸胶、酒露零售业务。名医启肆，自然倍重质量实效。对药工要求十分严格，进店必读“兰台规范”，配方务求“真诚谨慎”。在价格运用上虽执行货真口不二价，但在朔望之日——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以九折优惠顾客，药局在杭嘉湖地区很有名气。名牌产品有神香苏合丸、至宝丹、安宫牛黄丸、安息葆元贡带等。

安息葆元贡带为腰带型保健用品。由安息香、麝香等三十味组成。有补虚、强身、益寿之功。清宫中有类似贡品使用，徐大椿受此启发而研制本品，体现了很强的创新精神。

现在，兰台药局的加工部与其他几家药店的加工部合并，发展成为嘉兴中新制药厂；原来的两开间老铺已扩大为六间，又在市中心区盖了新楼，兰台药局成为备货齐全的综合性大型药店[119,120]。

成都　同仁堂

乾隆年间（1736～1795 年）在四川成都创办。业主陈能光，江西樟树人，知医药。乾隆初，到成都摆摊卖药，逐渐累资，后购置房产自启药铺，起名同仁堂。经营饮片、成药零售，生意日益兴隆。道光年间（1821～1850 年），北京同仁堂派人到成都，以陈能光盗用同仁堂牌号告官。成都官府以易地启肆且开设已久而未作处分。两地仍用同一堂号营业。成都同仁堂的现店址，在成都市闹市区的红星路口。除经营饮片、成药外，还开办了国内第一家药膳餐厅，首创药膳食品社会化销售，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85 年，该店主管单位成都市中药材公司，组织专门班子，总结药膳经验，编写出版了《中国药膳学》，使传统食疗上升到一个新阶段。药膳餐厅和药膳食品便迅速在国内外发展开来。

芜湖　张恒春药号

嘉庆五年（1800 年）在安徽凤阳创办。业主张宏泰，江苏溧水人。后因凤阳大疫，救济过重，停业回原籍务农时，宏泰三子张鸣鹿，在当涂护驾墩孙大春药号当学徒。为人精明能干。孙大春年老又不善经营，亏损严重，以致拖欠张鸣鹿多年工资无力兑现，遂将药号盘给张鸣鹿所有。张鸣鹿决心继承父业，重振家威，店名复为张恒春药号。恒春药号几迁其址。1850 年，由长子张文金落籍芜湖长街状元坊口，前店后坊，经营药材、饮片、成药。张恒春总结正反经验，树立了“虔诚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经营理念，精选道地药材，严格遵古炮制，精良制药工艺，业务即有起色。时逢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不断与清军进行大规模激战于苏皖。张恒春抓住这一机遇，精选良方，大力生产行军散、军中跌打丸、刀伤散药等一批军需成药，生意从此火红。至 1930 年已累资白银 50 万两之巨，成为南方国药业“巨擘”，全国著名药店“三块半招牌”的半块招牌，与北京同仁堂、汉口叶开泰，杭州胡庆余齐名的大铺。

新中国成立后，1959 年门市公私合营建芜湖张恒春国药店，后坊的生产部分建国有芜湖张恒春制药厂。制药厂迅速发展，80 年代进入全国 56 家重点中药厂之列。1997 年被评为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90 年代中期，药厂一度经营困难。1997 年，邹中旺调任厂长。采取的措施，除引进人才，加强管理，更新厂房设备外，紧紧抓住针对常见病、多发病的药物研制，开发出补肾良药恒春奇圣胶囊、治疗冠心病的黄宁片等数种新药，大力发展浓缩丸、胶囊剂，并以优势价格迅速推向市场，经济效益大幅持续攀升。2000 年 6 月，企业改制，成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更名为芜湖张恒春药业有限公司，兰守庆为董事长，邹中旺任总经理。当年实现销售收入 2.6 亿

元。现在，张恒春公司已成为占地 3.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的花园式高新技术企业。有按 GMP 要求的 7 条生产线，可生产 8 种剂型 68 个品种。其中 42 个品种被列为国家基本药物，38 个品种被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目录。主打品种有恒春奇圣胶囊、恒制咳喘胶囊、断血流胶囊、黄扬宁片、六味地黄丸、桂附地黄丸、三七伤药片、三七片等。公司员工 412 人，大中专学历 132 人，高工 1 人，中级职称 26 人，执业药师 5 人，公司领导层和高级管理人员平均年龄 36 岁，全为本科学历。年生产能力可达 10 亿元以上。

恒春药业抱着继承中国传统医药精华，融合现代制药科学技术，与天下人共享健康幸福的宗旨，正在为在几年内成为上市公司而努力奋斗。

东平　树德堂

道光年间（1721～1850 年）在山东东平县东阿镇创办。业主邓发是制胶能手。慈禧孕中患病，服用该店阿胶后愈，喜生龙子同治。咸丰皇帝大喜，赐店主四品官服、进出宫门手折子和树德堂阿胶为福字阿胶，并定为贡品。1915 年福字阿胶参展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金奖。新中国成立后，树德堂等十几家制胶作坊合并，建立山东平湖阿胶厂，是生产阿胶的重点厂家之一[121]。

新绛　德义堂药庄

咸丰年间（1751～1861 年）在山西降州府（今山西省新绛县）创办。业主郝瑞芝，原在河北武强县开药店。清宫王太监有祖传良方七珍丹、梅花点舌丹，常治愈宫内婴儿惊风抽搐、疔肿疮毒，遭奸臣嫉妒诬陷。王怕被谋害，良方失传，遂授方于在京好友韩某。韩为商人，不懂医药，又传方于外甥郝瑞芝制售。郝瑞芝怕清宫追查，将药店迁往山西绛州府。为纪念王太监济世仁德之心，改店名

为德义堂。七珍丹、梅花点舌丹为名牌产品，享誉三晋大地。新中国成立后，德义堂改建为新绛中药厂。原来的名牌产品七珍丹、梅花点舌丹屡获国家、省级优秀产品奖[122]。

安庆　余良卿膏药店

咸丰五年（1855 年）在安徽安庆大南门正街创办。业主余良卿，知医，善用膏药治病。启肆后专营膏药业务。生产的鲫鱼膏药配方独特、膏质细润，无刺激性，对疮疡、冻伤用后不留瘢痕。且售价低廉，使用方便，畅销于南方各地并一度远销东南亚。有余良卿膏药之称，成为安庆的地方名产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余店扩建为余良卿膏药厂，后更名为安庆市余良卿制药厂，是安徽省惟一生产中药外用药的定点厂家。名牌产品有活血止痛膏、麝香镇痛膏、狗皮膏等。剂型改铅硬膏为橡皮膏，使用方便、美观，更受市场欢迎[123]。

合川　存心堂

同治元年（1862 年）在重庆合川创办。业主邓德亨，精通医药。启肆初名德安堂，经营饮片、拆药。光绪三十二年（1907 年），其子邓惠嘉继承产业，更名为存心堂。取“制药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之意，经营扩大到成药。以自制的育麟多、存心油、华健丹、卫生丸、万应救急丸、痧疫救急水、万应油、太乙拔毒膏八大成药最为著名，生意十分兴隆。抗战期间业务达到鼎盛，产品行销重庆、四川各地，并自办《存心药报》和《民舆公报》。前者为月刊，后者为周刊，介绍本堂经营药物和医药卫生常识，名声大振。存心堂以追求药品质量、提高药工素质、加强广告宣传为经营方针。成功后捐资兴办存心堂小学，学生免交学费，受到社会赞扬。该店至今为合川市大药店之一。

苏州　华家琢针店

同治元年（1862年）在苏州护龙街（今人民路）创办。业主华春山，制针手艺人。参加太平军到苏州，因一只眼失明退伍，定居苏州，从操旧业，启华家琢针店，生产缝衣针和针灸针。清末，次子华茂卿继承父业，悉心研究制针工艺，生产针灸针、挑痧针、痧刀、三棱针、皮内针等医疗用针及民用针。1930年，华茂卿之子华觉如又启两号，专门制售针灸用针。新中国成立后，华店与十余家针铺相继合并，于1966年成立苏州医疗用品厂，该厂为生产针灸器械的专业厂家。华陀牌针是畅销国内外的传统名牌产品。现在产品增加到300余种。

杭州　胡庆余堂

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杭州闹市区大井巷创办。业主胡雪岩为杭城巨商。原籍安徽绩溪。年轻时为钱庄学徒，发家后自启银号。与官场熟，因为清军镇压太平军筹集钱粮有功，捐得“江西候补道”官职，成为亦官亦商之巨富。正当他全盛时，创办了胡庆余堂雪记药号，经营药材、饮片、成药批零业务。店堂建筑华美，堪称中国药业之最。整个建筑宛如一只仙鹤，象征店铺与顾客共享长寿。进门的“鹤身”大厅为营业场所，上端卧挂“药局”横匾，两旁金漆木制柜台，其后是高大百眼药橱，四周雕栏玉柱、飞檐画廊，柜台两侧有对联两副：“庆云在霄甘露被野，余粮访禹本草师农”及“益寿引年长生集庆，兼吸并蓄待用有余”。堂店四周的风火墙高12米、长60米，有名人书写的“胡庆余堂国药号”7个大字。现在，营业厅的左右厅辟为中药历史博物馆。整个古建筑是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雪岩极善经营。还在堂店建筑时，就请名医能人，收集各种成药处方四百余首，编成《胡庆余堂雪记丸散集》分送各界；针对战乱瘟疫流行，制造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和痧药，连续三年广

施灾区。因此，尚未开业已名声在外。光绪四年（1878 年）堂店落成开业，生意兴隆，顾客盈门。以“雪记”字样作商标，胡氏经营十年闻名国内外。1914 年胡庆余堂在上海南京路（后迁北京路）开设分店，两店规模相仿。营业额为全国药业之冠。

胡雪岩以“戒欺”为经营宗旨。“戒欺”二字的大横匾高挂堂内，是告诫下属“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也告诉顾客他的诚实济世之志。胡庆余堂还善作广告宣传，除华美的建筑、商品陈列、各种牌匾、资料赠送、灾期施药、朔望日减价等方式外，还在杀鹿取茸之前，鸣锣通知或张贴海报，抬鹿“游街示众”后当众杀取，极富宣传效果。

1883 年，胡雪岩在与帝国主义商人蚕丝竞争中失败。胡庆余堂及其他资产转归他人，两年后胡雪岩积郁而死。易主后的胡庆余堂招牌、商标沿用“雪记”，家人仍可按招牌分得红利。

新中国成立后，1956 年公私合营。1958 年改建为杭州市胡庆余堂制药厂。1980 年恢复了胡庆余堂门市部。现在，胡庆余堂依然是当代药业的一颗明珠，更加闻名于国内外[124,125]。

苏州　童葆春堂

光绪元年（1875 年）在苏州道前街创办。业主童姓。原店名童葆山堂，光绪末改为童葆春堂，经营饮片、成药业务，以全鹿丸为拳头产品。童氏经营善作宣传。铺内办有养鹿场，制全鹿丸时当众杀鹿，以示货真，并请戏班唱戏三天，扩大宣传。因此业务甚为兴隆。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分合更名，1979 年恢复童葆春国药店名。

上海　蔡同德堂

光绪八年（1882 年）在上海英租界抛球场后（今河南中路）创办。业主蔡同德，原在汉口启药肆，后迁至上海。前店后坊经营饮片、成药。尤以各种胶类（驴皮胶、龟胶、虎骨胶）及药酒、花

露著名。蔡同德堂以选料地道、加工精细为经营宗旨，生意十分兴隆。资雄后积极拓宽业务，在杭州建立胶厂，在上海霍山路建药酒厂。至20世纪30年代，产品远销港澳、东南亚及美国。从业一百多人，分饮片、丸散、细货、刀房、料房、胶务、制酒等16个部门。成为上海四大中药店之一。名牌产品有驴皮胶、虎骨木瓜酒、万应锭、洞天长春膏等。1932年启用鹿鹤寿星商标。现在，店址已迁至繁华的南京东路，使用由李鸿章书写的蔡同德药店店名，店堂宽敞，古朴又有现代氛围，生意更加兴旺不衰[126]。

贵阳　同济堂

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贵阳创办。业主于德楷、唐炯均贵州人。于德楷曾任四川知县。唐炯曾任云贵总督、清朝矿务大臣。二人谢官后崇尚医药，合资2000两白银创办同济堂，共图济世活人之业，开展医疗、饮片、成药、药材业务。是驰名省内外的著名大铺。

重视引进人才，坚持药品质量，崇尚职业道德，提供优质服务，严格经营管理和保证员工福利，是同济堂成功发展的主要原因。同济堂从湖北、江西请来能人主持店务，通宵营业，方便顾客。配方后加盖店章，在处方上注明多少味药和称足各包字样，方便顾客复查。包药纸上印有药名、性味、归经、功效、主治，有的还注明配伍禁忌。贫困病家半价售药。每年端午节，用加工炮制所积药末制药成“百味散”香包，馈赠民众路人，供避疫防暑。从业人员工资高于其他药店，年终月发双薪或分红。夜间值班另有补助。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各得一份礼品。店员若有婚丧嫁娶，店主必登门祝贺或慰问，并送厚礼一份。中午享受工作餐。每个店员发给“药折”，需要时凭折登记取药，年终按一定优惠结算扣款。遇意外事故，店主亲临慰问并给一定补助。如此优厚的福利待遇，在全国实属罕见。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敬业精神。

现在，贵阳同济堂座落在市中心正新街，仍是贵州省的著名大药铺[127]。

济南　宏济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7 年）在山东济南院前大街创办。业主乐镜宇，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后裔。受故交山东巡抚杨士骧委托，于 1902 年到济南承办官药铺惠民药局。由于官药铺资金严重不足，被迫招商承办。乐镜宇遂缴还官银 2000 两后独资经营，取店名宏济堂。1915 年店堂在兵乱中烧毁，迁址院东大街。主营饮片、成药。经营方式、生产品种，均按北京同仁堂传统，故对外号称乐家老铺济南宏济堂，因而生意兴隆，财源茂盛。1909 年建宏济堂阿胶厂，生产福、禄、寿、财、喜牌阿胶。由于质量上乘，畅销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安徽等地及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1914 年获山东省展览会优质金牌奖，1915 年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优质金牌奖”。

新中国成立后，宏济堂成药生产不断发展。1960 年与艮一堂、永昌济、济南阿胶厂合并，建“公私合营济南宏济制药厂”。1966 年更年名为济南人民制药厂。1980 年又更名为山东省济南中药厂。现在，山东济南中药厂已发展成为全国重点厂家之一[128]。

重庆　桐君阁熟药厂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在重庆闹市区鱼市口（今市中区解放东路）创办。是中国内陆最早的中药厂之一。业主许健安，重庆著名富商。他出资万两白银办熟药厂，并设门市自产自销，兼营饮片零售。桐君传说是黄帝时臣，精医药。用“桐君阁”作厂名，取中医药历史悠久和“桐君阁不卖假药”之意。开业不到一年，经销成药 240 余种、饮片 400 余种，生意兴隆超过同行。桐君阁经营成功的秘诀是用药地道，品种齐全，起用能人（1939 年经理蓝肃雍

是本厂学徒出身的拔尖者），革新机具，加强宣传（如当众杀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桐君阁进行过多次技术改造，专事成药生产，并更名为重庆桐君阁制药厂，是重庆市的重要中药厂之一。名牌产品有大活络丸、一粒止痛丹、保心片、化症回生片等。1997年，桐君阁被太极集团兼并，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以桐君阁大药房为名号的零售连锁店，在全国跨地区发展到500余家。其中，座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桐君阁大药房，占地千余平方米，备受国人关注[129]。

樟树　长春药店

清朝末年（1911年）在江西清江县樟树镇创办。由谢子谨等五人合资经营。开展药材、饮片、成药批零业务。以精湛加工，货真价实，热忱服务为经营方针。生意兴隆，资金猛增后，并不失时机在上海、广州、汉口、成都、西安、长沙、湘潭等地设庄，拓展市场，成为樟树药业的首户。长春药店的饮片切制规格众多，外形美观，工艺精湛，是樟树药业的典范。长春药店最重要的措施是雇用能人，对学徒的要求十分严格。第一年日间碾药做杂务，夜间认药，读中药入门基础书籍，如《珍珠囊》、《药性赋》、《汤头歌诀》等；第二年跟学炮制；第三年见习上柜司药、配制丸散；期满再实习一年，四年后才改变学徒身份称为“先生”。现在，长春药店仍是樟树的最大药店，原来的加工部发展成为清江县制药厂[130]。

四、民国　1家

天津　达仁堂

民国元年（1912年）在上海创办。1914年迁至天津。业主乐达仁、乐达义等四兄弟，为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第十二代裔孙。乐达仁青年时留学英、德，学习到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经验，对

老铺不允许以同仁堂名号在外设分店的森严家规十分不满，认为是束缚发展的桎梏，决心另辟蹊径。四兄弟遂集资4万两白银，挑选了同仁堂精通药业、长于管理的两名精英，继承同仁堂制药求精的优良传统，以主营成药产销，兼营饮片零售为方向，南下上海启达仁堂。后因交通不便、效益不佳，两年后迁址天津生根。

天津初创时，达仁堂即抛弃传统前店后坊家店合一模式，生产场址设在沈家栅栏，门市设于估衣街西口。店面高挂“达仁堂”横匾，两傍挂“严选川广云贵地道药材”、“蜜制丸散膏丹汤剂饮片”冲天竖牌，堂内悬“乐家老铺”牌号，三、四米长的柜台上，放独具特色的长龙算盘。开业那天，搭彩棚，放鞭炮，唱堂会，热闹非凡。1916年，乐达仁在中山路购一栋花园，建立达仁堂制药总厂。以后又建有六七百头存栏的养鹿场及养蜂场、铁工厂（机修用），彻底告别家店合一模式，走上工商结合新路。达仁堂业务迅速膨胀，有中国“蜜丸王”之称，并从1917年起，先后在北京、青岛、福州、长沙、西安、大连、郑州、开封、香港等18处，开设达仁堂分号，销售饮片、成药1000余种，不仅畅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地区。1935年，达仁堂资产累计至百万银元，为初创时的20倍。获利之大，在全国中药业中名列前茅，使祁州药市形成了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未到不开市的传统。1934年乐达仁病逝，产业由乐肇基、乐松生等5位第十三世后代继承。乐肇基游历过欧美，管理上中西法结合，生产上引进西方科技，率先安装冷冻设备贮藏药物和电动石磨、电动筛，大大提高了质量和效率。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业务遭受严重打击。

新中国成立后，达仁堂迅速恢复生产。1953年在北京建提炼药厂和新药研究室，开始生产片剂。1956年制药厂国营，天津及埠外分号公私合营。进入90年代，天津达仁堂制药厂，以“转变旧观念，建立新秩序，努力开创中药生产现代化新格局”为指导思想，继承传统优势，广泛引进人才，发掘中医药宝库，采用现代设

备技术，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在总厂原址改建花园式新厂，达到国家一级企业标准，并于 1996、1998、2001 年，分别获得澳大利亚、德国、中国的 GMP 认证。目前能生产中成药 200 余种，其中的牛黄降压胶囊、安宫牛黄丸获国家银质奖，牛黄清心丸、血脂宁获部优产品，其他著名品种有大活络丸、藿香正气软胶囊、生血丸、清肺消炎丸等。1999 年销售收入 6.5 亿元，占全国中成药工业 50 强排序的第 7 位。达仁堂门市仍在原处保持古朴风貌继续经营，生意更加兴隆。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建后，达仁堂成为其中的骨干企业之一。

参 考 文 献

1 廖育群. 萧山竹林寺女科考略. 中华医史杂志, 1986, 3

2 郑灿. 易经来注图解. 成都: 巴蜀书社, 1988

3 温少峰, 袁庭栋. 有关医学的殷商卜辞. 浙江中医杂志, 1985, 1

4 薛愚主编. 中国药学史料.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4

5 范行准. 中国医学史略.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6

6 戴望. 诸子集成. 第7册. 北京: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7 汉·班固. 汉书·食货志. 第四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8 清·黄奭辑. 黄奭逸书考·子史钩沉·李悝法经. 民国甲戌江都朱长圻据甘泉黄奭原版补刊. 1935

9 汉·班固. 汉书·食货志. 第四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0 宋·范晔. 后汉书. 第三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1 清·黄奭. 黄奭逸书考·子史钩沉·范子计然. 民国甲戌江都朱长圻据甘泉黄奭原版补刊. 1935

12 晋·葛洪. 肘后备急方.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13 梁·陶弘景. 本草经注集. 尚志均, 尚元胜辑校本.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14 范文澜. 中国通史. 第三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15 宋·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地理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6 胡焕庸, 等. 中国人口地理. 上册.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17 唐·柳宗元. 柳宗元集·宋清传. 第二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8 王开义. 新疆出土医药文献述要. 新疆中医药, 1992, 1

19 唐·孙思邈. 千金翼方·卷十四.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20 朱德明. 浙江医药史.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1999

21 宋·周密. 癸辛杂识·别集. 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清光绪3年

22 宋·西湖老人. 西湖老人繁胜录.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23 宋·周密. 武林旧事·卷六.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24 宋·俞文豹. 吹剑录外集，见：陶御风等. 历代笔记医事别录.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25 隆炜主编. 中国通史·第二部.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26 明·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27 明·陈嘉谟. 本草蒙筌·制造资水火.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28 明·李时珍. 本草纲目·上册.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29 洪光祥等. 建国前的上海中药零售行业. 药学通报，1986，3
30 罗一星. 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 经济史，1988，2
31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27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32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32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33 冉懋雄. 百年老店贵阳同济堂. 中国药学杂志，1996，9
34 徐伯夫. 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城镇经济. 新疆社会科学，1988，5
35 王开义等. 新疆药学发展概况. 药学通报，1986
36 清·张志聪. 本草逢原. 见：张瑞贤主编. 本草名著集成.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37 清·吴仪洛. 本草从新·熟地黄.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
38 清·徐大椿. 徐大椿医书全集·医学源流论.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39 陈新谦，张天禄. 中国近代药学史.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
40 赵洪钧. 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41 乔冀民. 安国县药材集散市场. 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 中药通报，1958，6
42 周汶，徐国成. 古今药都说.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43 齐谋甲主编. 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4 毛泽东.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毛泽东选集·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45 胡用贤. 回忆我在延安时期的医药工作. 药学通报，1985，5

46 华碧春. 闽西苏区的中医药（1929～1934）. 中华医史杂志，1985，5
47 齐谋甲主编. 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8 李宗友，朱佳卿. 加入 WTO 对我国医药市场的影响. 中国中医药报，2000－6－7
49 于永敏. 东北古代人参史考述. 中医药学报，1989，4
50 林仲凡. 明清时代我国东北各地人参的开采与经营. 中国农史，1988，4
51 白寿彝. 中国通史纲要.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2 宋·杨天惠. 彰明附子记. 见：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编. 经史百家医录. 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53 宋吉成. 中国人参加工史. 人参研究. 1993，3
54 南京药学院. 药材学·大黄.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
55 沈福伟. 中国与非洲. 北京：中华书局，1990
56 吴慧. 中国古代商业史. 第二册.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57 张文宣. 古代中朝医药交流简史. 中华医史杂志，1991，2
58 杜石然. 中药在国外. 见：冉小峰主编. 中国中成药保健品集粹.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59 甄志亚主编. 中国医学史.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60 沈光耀.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61 穆德全. 宋代以前的外来药物及其在方剂中的应用. 上海中医杂志，1957，9
62 元·脱脱. 宋史. 第十三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7
63 宋·洪迈. 夷坚志. 第三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1
64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 陈开俊等译，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
65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66 林仁川. 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67 李金明. 明代海上贸易实质初探.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2
68 李浚源等. 中国商业史.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
69 徐伯夫. 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城镇经济. 新疆社会科学，1988，5
70 周一良主编. 中外文化交流史.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71 玉芳. 西洋参源流考. 人参研究，1993，1
72 邬家林主编. 药材商品学.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

73 宋·张杲. 医说·卷四·治咳嗽.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0册.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8
74 吴鸿洲. 葫芦与串铃. 上海中医杂志，1987、3
75 宋·李昉等. 太平广记. 第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1
76 和中孚，戴广忠. 广告学原理.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77 宋·陈元觀. 岁时广记·卷36·置药市. 见：翦伯赞，郑天挺.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第五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2
78 马兆民等. 安国药业全盛时期概况. 药学通报，1987，8
79 胡世林主编. 中国道地药材. 哈尔滨：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89
80 宋·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卷三.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81 曹鸿云等. 百泉药材交流大会发展史略. 中药通报，1986，8
82 明·徐弘祖. 徐霞客游记·卷八. 上海：上海中医古籍出版社，1980
83 仲春明. 中国的庙会市场. 上海经济研究，1987，5
84 宋·唐慎微. 证类本草·卷十六.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85 北京中医药老年保健研究所. 北京同仁堂名药.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86 战国·黄帝内经·素问卷第八·宝命全形论.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87 东汉·张仲景. 伤寒论·自序. 见：南京中医学院编著. 伤寒论译释.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88 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89 彭铭泉主编. 中国药膳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
90 湖北省中医研究院编. 经史百家医录·半夏.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
91 赵中振，唐晓春. 北京民间卖药轶事琐议. 中国药学杂志，1992，增刊
92 宋·太平惠民和剂局编.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三.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
93 元·脱脱. 宋史. 第十三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7
94 何瑞生. 我国古代的洗涤剂，见：赵匡华主编. 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95 曹元宇. 中国化学史话.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96 元·韩奕. 易牙遗意.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

97 明·宋应星. 天工开物.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
98 明·张介宾. 类经·上册. 广州：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99 尚志钧等. 历代中药文献精华. 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
100 清·无名氏. 草药性·后记. 重庆刻本. 光绪丙午年
101 清·高鼓峰等. 医宗已任编·四明医案.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9
102 赵洪钧. 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
103 宋·李昉等. 太平广记.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4 楼之岑. 生药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
105 明·陈功实. 外科正宗.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3
106 唐·苏敬等. 新修本草·卷2·畏恶七情表.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107 张建成. 一朵信誉之花——山西中药厂. 中成药研究，1983，12
108 欧展熊等. 兴旺发达的岭南风格中成药厂. 中成药研究，1985，7
109 梁超. 广东陈李济药厂简介. 中成药研究，1984，1
110 赵鸿云. 从叶开泰药店到健民制药厂. 中华医史杂志，1986，2
111 何全，李斌. 鹦鹉洲上的一颗明珠. 中成药研究，1983，10
112 毛德进，陈遇龙. 鹿城药苑一枝花——温州中药厂简史. 中成药研究，1986，12
113 郭玉山. 古城国药——北京同仁堂制药厂. 中成药研究，1983，8
114 张立. 白敬宇今昔史话. 中国医药报，1996－10－8
115 王正坤. 礼乐名邦的老拨云堂制药厂. 中成药，1989，3
116 胡金林，沈晓光. 药店之魁——绍兴震元堂. 中成药，1990，8
117 陶诒武，华根元. 苏州沐泰山药店店史. 中成药研究，1984，1
118 包光宇. 创设二百年的童涵春堂国药店. 中成药研究，1984，4
119 范士宏. 南湖之滨百年老店——嘉兴兰台药局. 中成药研究，1987，4
120 范士宏. 谈安息葆元贡带. 中成药研究，1988，1
121 韩瑜. 阿胶溯源. 中国青年报，1993－1－17，2
122 秋明等. 弹指一挥间，老厂换新颜. 中成药，1996，6
123 杨启俊. 老树绽新枝. 中成药研究，1985，9
124 李炳森. 胡庆余堂——江南药王. 中成药研究，1985，8
125 胡丹文. 名山足灵药 盛世多寿人. 中成药研究，1983，3

126 朱菩君. 百年老店展新貌. 中成药研究，1988，4
127 冉懋雄. 百年老店——贵阳同济堂. 中国药学杂志，1996，9
128 顾玉重. 老厂展新姿——山东济南中药厂简介. 中成药，1989，2
129 苏国棣，张友全. 巍巍南山一奇葩. 中成药研究，1983，6
130 卢文清. 长春——樟树药业古店. 中成药研究，1987，12

历代中医书籍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不管哪种方式，看到你的信息我会第一时间回复，尽全力帮您！

加微信可以扫描以下二维码加我！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